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聯蘇

著 柏爾哈
譯 建曹 復馬

者編主
五雲王
翹 章

748.85

431

2

行發館書印務商

74520

譯者序

最近二十年來，世界上最堪注意的國家，就是我們西北的鄰國——蘇聯。這個國家曾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以其驚天動地的大革命與綿延四年之久的國內戰爭，使全世界人士萬目炯炯地注意她的大破壞。但自一九二一年百業凋敝的最低點至一九二六年，僅在五年的短短期間，她的經濟狀況竟能恢復到戰前水準；隨後更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實施五年計劃，改造全國的生產機構，以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為目的。她的大建設便從此震驚全球。過去以破壞相垢病者，現在均一變其向來的態度，稱頌該國經濟的發展，爭相倣效。各國人士對蘇聯建設的成功，初甚懷疑，繼而半信半疑，終而至於信其真實，且潛心研究，欲明其成功的原因，以作他山之助。美國哈爾伯教授 (Samuel N. Harper) 以客觀的科學方法，並作實地的探訪，著此『蘇聯公民教育』一書，實為研究蘇聯者開了一條捷徑。因為蘇聯建設之所以成功的主因，不在物力，而在人力；人力的增進與利用，則全恃公民訓練的得法。

一九二九年為本書初版的時候。從這一年起，世界其他各國均先後陷入經濟恐慌的旋渦中；蘇聯卻在此時非但沒有不景氣的現象，而且日趨繁榮。該國的計劃經濟正在這時候表現其獨異的優點，人民的情緒也非常興

誓，提出以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口號。這口號終於一九三二年實現。一九三三年，該國政府繼續實施更繁重的第二屆五年計劃，以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及消滅階級和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爲其正鵠。據最近塔斯社消息，這第二屆五年計劃已於今年四月一日實現，即較原定計劃早九個月完成，且第三屆五年計劃亦將於今年七月一日以前擬定。多數重要生產部門將於今年年底超過原定的計劃。重工業已於一九三六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九八·三。同年，棉花的收穫則已大量超過五年計劃，而鐵道方面的五年計劃亦已全部超過。這種驚人的成績，已使蘇聯能在十年之內從工業落後的農業國一躍而爲最先進的工業國，其工業生產量已居歐洲首位，而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這種突飛猛進的現象，決非偶然。因爲「公民」二字在蘇聯有特殊的了解，並因此公民訓練的方法亦有其獨到之處。這對於該國的經濟發展，影響至鉅。

哈爾伯教授在本書第一章即已扼要地說明：正在組織、訓練，與教育中的蘇聯公民是「從事生產的公民」(the citizen in production)。蘇維埃的選舉制度，亦不像其他各國按照區域原則，而是按照生產原則，人民必須以某種工作人員的資格，於其工作所在地選舉職業代表。不生產者就沒有公民的資格，同時失卻一切公民的權利。這種公民觀念，確如哈氏所說，應於閱讀本書時「牢牢記在心中。」

「生產」二字，涵義十分廣泛。這不僅專指工業的生產或農業的生產而言，凡對於社會有益的勞動均得稱爲生產。譬如在各機關服務的職員，他們的服務工作就是他們的生產。服務成績的好壞，就是他們生產成績的好

壞學校的生產工作，就是教學的工作；教員的生產是授課，學生的生產便是學習。學校每學期中每一週都有預定的教學進程，視此教學進程為學校的生產計劃，與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計劃作同樣看待。其他一切教育的、文化的、與甚至政治的機關都是如此，經濟的機關更不必說。故所謂「從事生產的公民」即指能作社會有益的勞動而非遊手好閒與剝削他人勞動的任何行業的人民。蘇聯以此種人民為其合格的公民，足見其如何注重生產事業。這與其他各國一般的公民觀念絕不相同的。

雖是這樣一般地重視社會生產，但蘇聯政府與民衆對於工業生產尤為重視，而產業工人則成為該國公民中的中心人物。在經濟方面，以工業為一切生產事業中之最重要的部份。工廠的組織與管理方法為其他一切機關的模範，即蘇維埃政府機關亦不例外。農業生產發達的極點，就是要使之工業化，使農業與工業間的異點漸歸消滅。現在蘇維埃國營農場，已具有工廠性質。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一天增加一天。該國人士的信念就是：工業為百業的根本，必須使工業發達纔能有機器供給農業，纔能使運輸與交通的工具日益進步，纔能使一切教育與文化事業得到充分的物質基礎。工廠裏的組織，認為是最合理的社會組織與生產技術的組織。工廠裏的生活能訓練出有勞動習慣，不自私，和堅決而爽直的工人。按該國當局的計劃，在未來的社會中，階級的分歧將漸歸完全消滅，因之政治的組織亦逐漸消失，社會上的經濟組織日益重要，而以工廠為一切經濟組織的中心，工廠裏的生活就成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成份。所以在社會方面，以工人為全體人民的模範，彷彿工人具有一種標

準的人格，而此種人格必須在現代的工廠中纔能訓練出來。因之，各級教育機關都有工廠實習，這種工廠實習，在蘇聯稱爲「生產實習」。不僅學習電機、機械、土木、應用化學等技術科的學生要到工廠裏實習，即學政治經濟與任何社會科學的學生亦必須有相當時間的工廠實習。凡派到工廠實習的學生，均完全過工人的生活，參加工人的各種會議與一切社會活動。他們所實習的，不僅在生產的技術方面，而尤其是在生活習慣方面，要使青年學子接近工人生活，並在實際的參加中了解工人生活。

工人在蘇聯固已一般地加以重視，而「在業工人」尤爲各界人士所推崇。這與上述一般的公民觀念有密切聯繫。因爲所謂「從事生產的公民」如果脫離生產事業已久，則在生活上亦有腐化的可能，所以公民必須現在「從事」於生產。在業工人被認爲是直接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公民，以蘇聯最通行的術語來說，他就是站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前線的「戰士」。他在政治上與社會生活上都享有特殊的權利，其他團體或個人的錯誤，時常要請在業工人來糾正。這樣推崇在業工人與一般的工人份子，是蘇聯立國的基本原則，從這個基本原則上推演出種種公民組織、訓練與教育的方法及其具體的形式。

蘇聯公民訓練的組織如蜘蛛網一樣，分佈得非常周密。每個公民至少參加二三種公民組織，有些公民參加到十餘種組織之多。加入一種組織，就領得一個會員證。公民本身亦須向政府機關註冊，領得公民證。無論到什麼機關，或參加集會，甚至進入遊戲場，均須攜帶本人的證件，方可入內。所以蘇聯沒有一個散漫而無組織的公民。公

民訓練工作之所以能夠深入並能獲得良好成績，端賴這樣周密的組織網。

蘇維埃政府機關本身即含有公民訓練的意義。「蘇維埃」意即代表會議，在這裏主持行政工作的人員無非是人民的代表。他們與其他各國的官吏不同，並認為「官吏」這一名詞是對他們的侮辱。因為在蘇維埃機關裏時常作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若稱他們為官吏，等於說他們是官僚，就是說他們沒有代表民衆的資格。除了少數常駐的工作人員以外，蘇維埃的代表仍在繼續他們在工廠或農場裏的固有職業。這些代表時常改選，藉以吸收許多新的份子，可使民衆都有被選到蘇維埃，以作政治上實習的機會。蘇聯的政治領袖們常說：「勞動者應練習管理這國家的機器，」意即他們應被選到政府機關作行政的實習。每次蘇維埃改選所標榜的政策，都是多提拔新的工作人員。往往知識很低而能盡職的勞動者被提拔到蘇維埃機關，成為政府的行政人員，使她或她練習管理這國家的機器。所以說蘇維埃本身便是一種公民訓練的機關，並非虛語。

在本書中特別舉出而自成一章的職工會與合作社，可說是蘇聯國內最廣大與最基本的公民訓練的必需組織。若說蘇維埃是政治的組織，則職工會與合作社是經濟的和文化的組織。職工會所負的任務是促進各機關的生產效率，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水準，滿足會員的物質要求，保護他們各種切身的利益，等等。合作社所負的任務是：以集體的原則促進生產與節省耗費，調節生活必需品的流通，滿足勞動者的需要，等等。兩者都以集體主義訓練公民，使一般民衆在日常生活中感覺到集體主義勝於個人主義，漸漸引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是

職工會，稱爲「共產主義的學校」，對於勞動者的生活領導無微不至；勞動者且以此監督本地的行政機關，並進而糾正政府的缺點。所以正確地說來，這兩種組織都具有政治性質，而職工會的政治性質更爲濃厚。蘇聯的職工會是職工國際組織的屬員，所以該會對於會員尙有國際主義的訓練。這兩種組織包羅羣衆最多，而與社員或會員的切身利益極有關係；以此種組織作公民訓練的場所，其收效之大，自在意料中。

蘇聯的城市居民，差不多全體是合作社的社員。除了幾處國營的大商場以外，自各大城市以至窮鄉僻壤所有的商業機關，可說完全是合作商店。合作社社員到商店裏購買物品，可以打折扣，而且有些物品非社員不能購買。工人社員則更爲優待，他們非但可以得到特別廉價的東西，且可購得大量生活必需品。在這種優待辦法裏，寓有很重要的公民訓練意義，使一般人民自然地趨向於集體主義，並願自己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人。

鄉村的農民向來經營其個人主義的小農經濟，他們的生產品很少到市場上出賣，而且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之仰給於市場者不像城市居民之多，所以集體主義很難爲他們所接受。當本書作者最後一次到蘇聯考察時（一九二六年），該國農民仍在過着很守舊的生活，所以本書對於鄉村的公民組織，祇能說些農民互助會與鄉村會議等組織，這類組織可以說是歷史上的陳跡了。自第一屆五年計劃完成以後，蘇聯的農村已起了根本的變化。集體主義已在鄉村獲得驚人的成績。現在鄉村農民的個人經濟幾近絕跡，百分之九十農民都已加入集體農場。集體農場運動（colhoz movement）成爲農村中最重要的公民活動，且可說是全國最重要的公民活動之一。

集體農民（即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被認為是「鄉村社會主義的柱石。」他們有全國代表大會的組織，對於農產品的增加，農業的機器化，與全部國民經濟的進步，以及人民團結的鞏固，都有絕大的功績。

集體農場的原始形式是農民耕種互助社（Societies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Agriculture）。這是一種農民自動組織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因感自己耕種器具的不齊備，彼此互通有無，組成耕種互助社，把社員的牲畜與農具聚在一處，共同享用，共同耕耘，而所得農產品仍各自分開，不相混同。在起初時，互助社祇在農忙季節作這樣的合作，而平時則仍把牲畜與農具分開，歸原主保存，而依然各營其個人經濟。但自此種試驗見出成績之後，農民漸漸放棄其個人經濟，羣起加入耕種互助社，且不願再行分離。這些互助社因此日益鞏固而具永久性，遂蛻化而為集體農場。許多集體農場，非但農具公有，而且農產品亦歸公有。此種組織依其成員的志願，可有很大的伸縮性，其最高度的發展形式，便是公社（commune），在這種組織裏集體農民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完全出於自願，如有不合意，隨時可以退出。當集體農場運動發展的初期（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農民的情緒游移不定，加入與退出的都是很多，有如潮水漲退一般。後來終為實際的利益所信服，退出的現象頓形消滅。至一九三一年，過半數農民已加入集體農場，農村經濟的集體化運動，成為普遍的公民活動。自此以後，鄉間舊有的農民組織漸歸消滅，而以集體農民的組織代替之。集體農場就成為鄉村一切經濟、文化與整個公民活動的中心。本書以根據較早時期的材料，對此極重要的農民集體化運動，未能與對職工運動及合

作運動同樣地加以充分敘述，不免稍有遺憾。

集體農場所以有今日的成績，可說是工農聯合的結果。城市工業以大量新式的機器供給集體農場，使牠們握有曳引機(Tractor)與複式收穫機(Combine)等最進步的生產工具，藉以提高農業生產率，並增加農民的收入至數倍之多。此等機器非個別農民所能置辦；要應用這些機器，必須有大規模的經濟組織。故農民雖富於保守性，終於見利而趨，願拋棄其向來的個人經濟，而進行集體的生產方法。但此種集體的經濟組織，農民素無經驗，若沒有城市工人的幫助，集體農場亦難見諸實行。所以隨着集體農場的發展，蘇聯有大批工人從城市裏派到鄉村，將他們在工廠裏所得的經驗搬到鄉村，而成為農民的直接幫助者。集體農場在此物力與人力的援助之下，就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迅速成功（第一屆五年計劃在農村經濟集體化方面祇兩年即已完成。）自此以後，工農的聯合愈加鞏固，而且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放棄私產觀念，他與工人間的矛盾亦無形消滅。工農的聯合，因此愈加鞏固。

當革命的初期，蘇聯鄉村祇有幾個少數的國營農場，以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作為農村經濟的模範。但農民本其平素的習慣，各營個人經濟，以致農村的階級分化依然難免，而農民對於國家的經濟建設亦無若何積極的幫助。曾有少數領袖認農民為反動份子，主張加以壓迫。其他領袖則堅持聯合全體農民（意即聯合中農與貧農），而以審慎的態度對付農民羣衆，於是當局者內部發生劇烈的爭論。約當一九二四年，又有一番爭論，前者主張用

強迫的方法使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者則認為彼時客觀條件尚未成熟，不能組織集體農場，而強令農民加入。到了一九二八年，後者纔策進農村的集體化運動，但依然反對採取任何強迫的方法，當時仍有不少人員徒求速效，以致在實施中忽視教育方法，而趨於強迫之一途。其結果遂使許多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如潮漲一般地蜂擁而入，不久後又如潮退一般地相率而去。自當局改正一切強迫的方法並對農民作多方的教育後，集體農場纔得真正的發展，所以集體農場運動實含有重大的公民教育意義。

在蘇維埃制度之下，還有下列幾種特殊的公民團體：

第一，扶護社：這種組織是多方面的，有工人對農民的扶護，青年對幼童的扶護，行政機關對政治落後團體的扶護，教育機關對文化落後團體的扶護，等等。這種扶護的性質，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或文化的。凡在任何方面較有能力的團體，都應組織扶護社來幫助在這方面較弱的團體。甚至工廠的工人可以組織扶護社來扶護蘇維埃政府機關，助其肅清官僚主義。這種扶護工作是蘇聯公民最重要的社會服務之一，對於該國的文化革命與經濟發展都有極大幫助。

第二，肅清文盲社：革命前的俄國，不識字的人民佔了很大的百分比；因此，肅清文盲成爲革命後特殊繁重的工作。凡學校的師生與各機關的職員，都隨處組織肅清文盲社，以本機關的識字者來教不識字的下級職員讀與寫。不論人數多少都可開班，每日於工作之暇，作一二小時的學習。這種公民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服務，教者

完全是義務職，社員的加入都是出於自願，且不繳納任何社費。但這種組織可說已成過去，現在蘇聯已沒有不識字的人民。

第三，工農婦女代表會：在革命前，俄國婦女與中國婦女相似，頗受壓迫，無論在知識與能力上都比男子弱得多。在蘇維埃制度下，認為勞動婦女有特別組織的必要，使她們可在這種組織中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鬥，設法提高她們的經濟地位，文化水準，以及政治的認識。這種婦女代表會完全是公民訓練的組織，代表於會議中討論自己切身問題以後，即組織政治常識班，各種研究組，參觀隊等等，以進行自身的教育工作。

第四，航空化學會：這是一種國防的民衆組織，在其會員的普遍與工作的性質上都與上述三種組織不同。在蘇聯一切機關裏都有這種組織。會員須繳納相當的會費，並領有會員證。該會的宗旨是：動員民衆的力量促進航空事業發展，並授會員以防空與防毒氣的知識。蘇聯城市居民，賴這種團體的活動，都已學得能運用防毒面具與避免飛機的轟炸。這種團體的設備與其指導的人才，得軍事機關的幫助甚多。蘇聯飛機的數目現居世界列強首位，成爲空軍實力最雄厚的國家，其得力於這種公民的組織者，實不在少。

第五，國際革命者互濟會：這又是另具一種特殊性質的公民組織。顧名思義，即知其爲範圍更廣的並含有政治與慈善性質的國際組織。這種團體也與航空化學會一樣地普遍設立於全國各工廠，學校，與一切經濟的與文化的機關。會員須繳相當會費，並於必要時舉行募捐以救濟各國的革命者。該會對各國革命的逃亡者招待得非

常懇勸。會員時常與世界的革命事件及其參加者發生接觸，並對世界弱小民族與被壓迫者的革命運動表示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援助。參加這種組織者有各國的老革命黨員，例如法國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參加者亦有加入這個組織。

以上五種團體都是較重要的公民組織，使人民在這些團體裏的活動中養成自強不息的精神，互助的習慣，與團結的能力，而且對於國民經濟的建設，文化的發展，與國防的鞏固，都有莫大的輔助。本書對於這些組織都予以詳盡的敘述。其他還有不少次要的組織，如反宗教的團體等，則有時附帶述及，略而不詳。

一切這些團體都是自願的，羣衆的，非政府與黨的組織。他們的組織完全獨立，但在思想上受該國唯一合法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該黨黨員自稱是人民的先鋒，對公民羣衆的一切活動，或居倡導的地位，或出全力予以扶助。該黨在一切公民團體裏都派有重要的工作人員，以執行黨在各方面的政治路線。各種公民活動的領導與公民訓練的方針，都在黨內作經常的討論，並對各種工作成績加以檢討。所以該黨實為蘇聯公民訓練的領導者。凡成年的積極工人與農民以及各界的先進份子都加入該黨。青年工人、農民、學生及各機關的職員中之先進份子，則加入共產青年團。在同一系統之下的兒童組織，則為兒童先鋒隊。更幼的兒童，則為十月革命兒的成員。這是一個按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而定的黨的組織。嚴格地說來，他們認為祇有共產黨是政黨，自共產青年團以下都是羣衆的組織，說他們是公民訓練的基本組織，亦無不可。不過這些組織與黨的關係更為密切，而且彼此

在組織上有連續的關係。年齡較長的十月革命兒可同時加入兒童先鋒隊，較年長的兒童先鋒可同時加入共產青年團，而較年長的共產青年亦可同時加入共產黨。所以黨的政治影響可以直接由黨團員傳達到青年團，並再經過這個連續關係而一直傳達到兒童的組織。這些組織各在其年齡相似的全體人民中起領導的作用。本書共有三章專述這些團體的組織狀況、發展情形與領導方式。這在本書中所佔的篇幅與牠們在蘇聯公民訓練上所站的地位頗相適合。

蘇聯公民訓練，除上述各種組織以外，還有種種工具與方法。

各種定期刊物、報紙與小冊，都是公民訓練的無上工具。黨與政府的中央機關報，除登載國內外的重要消息外，把日常重要的經濟建設問題與政治問題，以很大的篇幅提示於讀者面前。各機關工作的優劣點之具普遍意義者，都按實際情形在報上批露，分別加以言論上的獎勵與警誡。這對於民衆起很大的教育作用。各省市另有其地方的報紙，對於本地的經濟與政治等消息多加紀載，但其一般方針仍與中央機關報一致，此外，工人有工人報，農民有農民報，紅軍有紅星報；這些是適應每一種公民範疇的需要之日報。其他局部的小報，種數甚多，每一大工廠，或蘇維埃國營農場，都出版一種報紙。其他較小的工廠農村與一切機關，都定期出版一種壁報。這些小報或壁報都能把本機關或本地方的生活反映出來，並為這部份公民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蘇聯的報紙都沒有營業性質，而是民衆的宣傳者與組織者。該國報紙種類的繁多與銷數的廣大，為世界各國所未有。其在公民訓練上所起作

之偉大，於此可想而知，本書對於這種蘇維埃的出版物，亦有專章論述。

在文化與思想方面的公民訓練，時常寓於娛樂中；因此，文藝、戲劇、電影、音樂、無線電等，均成爲公民訓練的工具。聽戲、看電影、遊公園等娛樂，在蘇聯認爲是勞動者應有的文化生活，與其物質生活有同樣的重要性。政府不惜以鉅資建立很多劇場、電影院、博物館、文化公園、俱樂部等娛樂場所，以滿足勞動大眾的需要（據一九三七年度計劃，應開辦新劇場九所，電影院五十六所，裝設電影機五九四五架。）常有各工廠的工人，或鄉村的農民，組織集團的參觀、遊覽、聽戲、看電影等等。這些工作的組織者是各機關的俱樂部管理員或在本地任文化工作的人員。

俱樂部在蘇聯起很大的作用，其設立的普遍，亦爲世界上所罕見。牠不僅是娛樂的場所，而且是領導文化生活的機關。每一工廠或其他機關，凡人數在幾百以上的，都有一個俱樂部，負組織本機關勞動者的文化生活之責。或出外參觀、看戲、看電影等等，或自行組織晚會、音樂會、體育表演等等。較小的機關，則設立同樣性質而規模較小的紅色處（The Red Corner），在這裏設備一些有益身心的消遣東西，如運動器具、樂器、小說、詩歌之類。蘇聯每一機關、村莊、軍營、船艘，都至少有這樣的設備。

附設於各機關內而成爲最普遍的公民教育方式的，則爲各種研究組。有戲劇、音樂、文藝、繪畫、無線電、政治現勢、社會科學、軍事常識等研究組，均由當地的勞動者自由加入，聘請專家指導。這些專家亦以指導研究組爲他們應盡的公民義務。學校學生、機關職員、工廠工人、集體農民等，都興高彩烈地於其正常工作之暇加入這些研究組，

以作業餘的研究。這些組織成爲人民提高文化水準與增進科學、軍事、政治等常識之有力的工具。

一切這些公民教育的方法與其所採取的形式，都是在學校的正常教育以外於全國最廣大的民衆間進行。至於蘇聯的學校，則更是計劃周詳並具有一元系統的組織。該國教育制度的特點，首先爲一切學校都是勞動者的學校，而工人與貧農的子弟特別得到優待。其第二特點爲對於政治教育的重視，任何學校都有其最低限度的政治課程，並時常舉行政治講演，而學生對於政治的認識亦爲學校當局經常關心的一點。其第三特點爲在學科上重視應用科學及各種生產技術的訓練，除了專門的政治學校（卽所謂蘇維埃黨校及共產主義大學）外，大多數學校都是技術的學校，而中小學的課程分配亦以自然科學的比數居多。在該國內部階級矛盾逐漸消滅的過程中，自然科學的比重日益增加。其最後特點則爲學校教育與實際的生產過程密切聯繫，此點已在上而敘述工廠實習時言及。學校與學生的數量及其增多的趨勢，尤足驚人。計去年（一九三六年）小學及中學學生人數共達二七、四一八、〇〇〇，今年且要增至三〇、〇三三、〇〇〇名。幼稚園兒童人數去年爲一、〇三〇、〇〇〇，今年將增至一、二七九、〇〇〇名。又在今年的計劃中，要在各城市增設新辦學校九百三十所，添收學生五二八、〇〇〇名。讀者若能以這些數字與本書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所得的相當數字作一比較，則對其進展的迅速便可一目瞭然。

圖書館與讀書室亦隨着民衆文化水準的提高有加無已。每一學校，每一工廠，每一集體農場，每一政治的、經

濟的、或軍事的機關，以及公衆的場所（如公園）都有這種設備，即在偏僻的鄉村裏亦至少有一個讀書室。這些設備使肅清文盲的工作易於進行，並使黨與政府的宣傳品及報告易於深入民間。各種研究組的實行，亦非先有這些圖書的設備不可。圖書館與讀書室在蘇聯已不是學校及其他學術機關的專用品，而是一般公民的文化必需品。讀書室與俱樂部是該國最重要而普遍的兩種文化設備，成爲人民煅煉心身的有力工具。在較簡陋的處所，有時這兩種設備混在一處，往往鄉村讀書室就是代表這種混合的組織。本書作者時常把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相提並論，但實際上並不是說：在城市的稱俱樂部，在鄉村的稱讀書室。凡在城市的大工廠裏，除俱樂部的設備外，另有讀書室，且甚至有單獨的圖書館；在鄉村裏亦有俱樂部存在。讀者幸勿誤會。

蘇聯公民練訓的組織和方法大致如此，但其所採取的形式不是一成不變的。現在正隨着該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多種新的方法，並採取新的形式。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競賽（the socialistic competition）與突擊隊（the stroke brigades）的組織。這是最近發展出來的公民訓練形式。作者所收集的材料限於一九二九年以前，對於這兩種重要的組織，未能予以敘述。

社會主義競賽這一名詞並非最近纔發生的。常列寧在世時，曾指示應如何在勞動者中間舉行社會主義競賽，不過當時祇是作思想上與原則上的宣傳，沒有成爲廣大羣衆間的實際行動。等到實施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民衆高喊以四年完成這計劃的口號，於是列寧關於社會主義競賽的言論就爲當局者乘機提起而成爲實際行動

的南針。

這種競賽的策源地是工廠。各工廠的工人本來有其每間的個別生產計劃，各間的工人為保證其自身能按期執行生產計劃起見，與他間的工人彼此互訂條約，定出每週或每月的生產總量應該多少，勞動生產率應提高到百分之幾，每日按時到工，不遲到，不浪費材料等等，期滿後，彼此互按條約上各點來審查；那些是超過條約所規定的，那些是剛剛如約執行的，那些是沒有執行的，然後作一總評。凡能如期執行條約的，都認為完成他的義務；超過條約的，認為是優等；沒有履行條約的，認為是劣等。優等者的名字寫在紅色板上，劣等者的名字則寫在黑色板上，懸示大眾。以同樣的辦法，舉行各工廠間的競賽，一工廠以內的各部門間的競賽，以至各個人間的競賽。自這種辦法定出後，人人都不願成爲上黑板的落伍者，各努力於其自身的工作；於是生產的速度日益增加，且達到驚人的成績。這種競賽的辦法，從工廠推行到一切經濟機關以及全國的政治、軍事、教育、文化與任何公民的團體。

與社會主義競賽同時發生的羣衆運動，是突擊隊的組織。後者與前者有密切的聯繫，凡在社會主義競賽中能時常上紅板的勞動者往往是突擊隊的隊員。所謂突擊隊，即是各機關中能力較強而且較能負責者的組織。凡自信能出類拔萃地定出普通勞動者所不能執行的生產計劃者，都可宣佈自己是突擊隊員，由這些人員於每個機關內組成一個或數個突擊隊，以爲大眾的模範。突擊隊員在社會上享有特殊的榮譽與物質上的優待，他們時常被人稱爲勞動的英雄，但是突擊隊員並非以超人自居的自高自傲者，在他們的突擊工作中尚有領導與幫助

大眾的成份。突擊隊的存在，無形中提高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標準，勞動生產率因此逐年增高。蘇聯近十年來經濟上的迅速發展與各方面的進步，受這種組織的影響甚大。

這兩種組織是世界上最特別的勞動組織，與其他各國所進行的生產合理化完全不同。這是勞動者自動與自願的組織，亦即是公民活動的一種。社會主義競賽的參加，是不能強迫的；所以仍有少數的消極份子沒有參加競賽。但十之八九的勞動者都已加入這種競賽，而且當局往往以勞動者參加這種活動的百分比增加為民衆積極性的表徵。

社會主義競賽又與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絕對相反。這非但沒有個人主義的競爭成份，而且含有扶助弱者的意義。訂約競賽的兩方不是互相猜忌，互相傾軋，而是互相督促，互相幫助。有時能力較低的人可在守時間守紀律等條款上勝過能力較強的人，並因此在執行整個條約的總成績上獲得優勝。訂約競賽的目的，並不在於賭勝負，而在互相監督條約的履行。

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發展的結果，產生了最近的史達漢諾夫運動，這就是突擊運動的最高形式。史達漢諾夫本是礦工中的一個突擊隊員，他以自己的天才與熱情發明一種新的勞動組織，能使礦工的勞動生產率增至數倍之多。各地勞動者爭相模仿，亦得到新的驚人成績。於是這種工人自動改良勞動組織以創造勞動生產率的新紀錄之運動，就稱為史達漢諾夫運動。這是勞動者的積極性與創造力的表現，是蘇聯公民活動的最新形式。

茲再重複一句：蘇聯公民訓練的形式不是一成不變的。讀者欲了解該國公民訓練的狀況，不要專在形式上追求，以致覺得五花八門難以捉摸，應在原則上與方法上找到線索，並以動的邏輯把握其發展的趨勢。本書的價值即在供給豐富材料，使讀者能有系統地了解該國公民訓練的一般狀況及其特殊的方法。有些材料或已陳舊而與目前的狀況不合，但若讀者能從大處着眼，則於大體上仍無妨礙，本書的價值斷不因此稍減。

本書原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所出版的各國公民教育叢書之一，計有蘇聯、意大利、德國，以及英、法、美、奧、匈、瑞士等國的公民教育研究。蘇聯公民教育是一種新的試驗，且其重要性隨着這種試驗的成功與日俱進。哈爾伯教授在著作這本「蘇聯公民教育」以前，曾對於俄國的語言、歷史與政治制度作多年的研究。他初次至俄國時（一九〇四年），該國現握政權的「布爾塞維克派」尚在萌芽時期，正在社會民主黨內與「孟塞維克派」作劇烈的鬭爭。此後他又多次赴俄考察，並於大戰方酣的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以及一九一七年的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均居留俄國，這些革命前時期的考察，使他能洞悉俄國革命的背景及其醞釀情形，得於革命後探訪蘇維埃制度下的公民訓練方法時作一比較。本書的材料都是根據作者親身的考察，同俄人直接的談話，與在俄文出版物上直接閱讀所得的實際情形。作者撰述本書的目的是在研究蘇聯公民團結力怎樣造成，並指示其發展的動向。

序言

在目前要對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蘇俄）著一本書，不免受到某種限制。這首先必須提出革命時期的特殊時候來研究，認為這是過渡的階段。這階段是比較綿長的，這確是如此；革命的領袖提到這本書研究範圍內各種制度的多種目的之實現時期，總是說需要「一代」之久。

因為截至一九二一年止的革命初期所有的主要任務，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與防禦此種制度之受國內外武裝襲擊，教育的問題與非軍事的公民活動的組織問題鮮能注意到。這最初的幾年組成一種嚴格苟暫時期，並主要的是破壞與鬭爭的時期。這最初幾年的有些制度與設施是要持續並予以發展的，有時祇須加以微小變更。在另一方面，有許多設施與方法，在過去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曾覺得是必要與便利的，都要於握得政權之後從速加以廢止。最後，有許多制度雖自革命初起時即已予以討論與籌劃，但直至目前這較晚時期未能予以實行。所以，本書要研究的制度是很晚近的，且甚至在其許多組織形態上還正在草創的過程。

這些公民教育與訓練的綱領與組織所包括的區域，是蘇聯所領有的地球表面上六分之一的大地。這是除了芬蘭、巴羅的海各小國、舊俄的波蘭領土、與卑沙拉比亞（Bessarabia）以外的舊俄羅斯帝國。這是各部分連接鬆懈的一塊大地。離莫斯科僅數百英里以內的地方，還有全體居民不曾看見過汽車（舉例說）的村莊，且此等

村莊距鐵道之遠，以未加平舖的小路計算，亦不過三十英里。無線電的發展，正開始打破這樣多的俄國人口之孤立的冷酷生活。必須時常記着這塊廣大地面的土地遼遠與交通不便。若要在本書中涉及當局欲使其政治宣傳與公民活動的綱領甚至及到最偏僻的邊疆之努力的成績已達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或把目前各區域的成績作一比較，則這是不可能的。蘇聯境內有許多不同的種族集團，蘇維埃制度對多種此等集團定出變通或特別待遇的辦法，我們對這種現象祇能作最廣泛的敘述。在時間與本書所能利用的材料範圍內，特別注重於中央的機體來敘述，蓋往後可以看到這種中央的機體所指導與欲加以控制的，不僅是用以促進公民興趣的材料內容，而且是所發展的一切公民活動。

本書所用統計材料必須以保留的性質採用。蘇維埃制度的第一次戶口調查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舉行，而且這是該國自一八九七年以來的第一次完全的與澈底的調查。一般地說來，這些晚近幾年的統計估量是對革命的各種制度與各種觀念的進步抱樂觀主義的。各機關樂觀主義的程度不同，引起了官方統計的矛盾。但是，極大多數的統計都能給予多少正確的數字，以說明所描寫的特殊制度之規模。

蘇聯的公民教育方法之研究雖因此有這些顯然的限制，但蘇聯亦有種種條件與其政治經濟制度的特點，可認為是對本書的研究特別便利的。第一，一般教育的與文化的發展，與特殊的公民訓練與政治教育，最近纔稱為革命的「第三戰線。」據革命的領袖估計，其他兩個戰線——軍事的與政治的——已在一九二一年於三年

多不斷的與劇烈的戰爭之後獲得最後的勝利。爲要過渡到革命的第二階段，即建設的階段，必須給過去的活動形式以新的方針並促進羣衆間更普及的活動。此種任務的完成，舉例來說，必須藉「蘇維埃的公民活動」與「蘇維埃德謨克拉西」來達到。其次，爲準備後輩的人執行革命的原則起見，特別注意於兒童的教育，尤其注意他們的公民訓練。在這件事情上所以不得不特別努力，因爲敵對的經濟勢力已許其發展以策勵在革命初期所破壞的生產過程之復活。

公民訓練已成爲緊迫的政治後果。敵對的思想以這些暫時被解放的敵對的經濟勢力爲根據而滋長的危險，使公民訓練問題成爲急切與重要的問題。一切可能的捷徑與工具都被利用以達政治宣傳與公民的教育與訓練之目的。

自一九二一年以後的最初幾年中，蘇聯的公民在其生活的每一階段與每一形態中都處處正面遇到他的「公民義務」。爲促進與指導公民活動起見，發展了一種最深思遠慮與規模宏大的努力。這本會將企圖把用以吸引羣衆積極參加公衆事務的一切種類的無數機關一一述出。「鼓動宣傳組織員」與「政治教育工作人員」之全體的幹部人才都訓練與組織起來了。不僅「公民科」須在從幼稚園以至大學的醫科爲止的一切教育機關的課程表裏予以重視，而且各種「政治訓練學校」亦設立起來。列寧會對一般的教育說道：「我們並不以爲教育是我們政治以外的東西，而且要很坦白地把它隸屬於我們的政治目的之下。」

同樣的，司法上的行政亦與政治宣傳密切地聯繫起來，而且在每一機關的活動中，都注重於革命的「政治學」，藉以一步一步地把羣衆從被推翻的所謂「資產階級」制度的舊思想影響之下奪取過來。該國的全部生活已爲政治學所深入；在憲法裏，在法庭所交下的判決書裏，在自來火盒的招紙裏，在街道的新名稱裏與在電影片裏，都有政治學寓在其中。

在蘇聯，「無產階級獨裁」的政府，是高度集權的，且政治領導權亦集中於一個「統治的黨」裏。這個統治的團體——全聯邦共產黨——已製出一種確定的與詳細的公民訓練計劃，且以此種計劃訓練一萬四千七百萬人民。大多數人民都在不久前纔有政治活動的覺醒。在革命以前，俄羅斯的農民在他們的鄉村機關裏與藉參預選立的地方議會的政務，已獲得相當的政治經驗。自一九〇五年以來，他們對帝國的國會（Duma）有選舉權。工人在舊制度之下比較少獲組織的與階級表示的機會。在工農兩方面，受另一階級的官吏之約束的成分是很多的，以致這些受限制的政治權利還要時常在一種監視之下來執行的。在現制度之下，我們往後可以看到，仍有一種監視性質的約束。

但是這戰爭與革命的最後幾年，已在工人與農民的羣衆間，尤其在青年中，引起積極性的顯然增進。積極性的表現，現在有更多的可能性，並且視此爲革命的特點，加以鼓勵與促進。但是所鼓勵的祇是特種的活動，而某些活動形式是不受鼓勵而且甚至被強力制止的。其目的是在造就一種特別的公民；並且這種目的常能大半決定：

一個機關的性質，一個集團的可能活動中之着重點，或者一種綱領所需要的主要內容。本書第一章將論述這種特殊的公民觀念，這是蘇聯公民訓練方法的基礎。在「無產階級獨裁」之下，一種確定的公民觀念更易於實施。政府因為是革命的機關，能立即蔑視或直然攻擊傳統的觀念或習慣，並自由採用新的制度與觀念。現在要造就一種新式的公民，而且對公民訓練的工作與對公民活動的參加之熱情的來源之一，是經常稱在這裏，這方面的努力中要創造某些新奇的事情。

蘇聯的政治領袖直然反對過傳統，並時常承認他們的努力是試驗性質的；不論何時與何處，若遇所希望的結果已為經驗所證明顯然不能得到，則他們隨時預備變換他們的方法，公民訓練制度的本身規定對其進步與具體的成績應作常常的核査。這種定期的核査使搜集材料大感便利，並且本身亦足以代表此種制度之饒有趣味的特點。差不多在每個機關裏都可看到種種實施的辦法之遺廢棄；有些時候，整個觀念是否妥當，亦起了嚴重的懷疑。這種坦白的試驗，在這裏與在其他凡是為革命的要點之活動場合裏都是一樣的，使蘇聯成為研究公民訓練方法之饒有趣味的區域。稱蘇俄為大實驗室，現在已成爲老生常談了。

領導權的發展是蘇維埃制度特別供給有價值材料的各種公民訓練問題中之一。對領導權有特殊的規定，這不僅是特種集團所掌握，而且是法律上對這集團所保障的。蘇聯有無可爭辯的領袖——列寧；並有這一個人的生活與箴言可作極廣大的利用，以激發與增進公民的觀念及其活動。

所以雖在這初期的發展階段中研究蘇聯公民訓練方法之受限制，是顯然與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對現在已經演進到了一切述其概要，並指明已經以實驗的非常自由條件為基礎而起的變化，這不僅是可能，而且似乎是特別值得的。這樣的概要不得不在大體上限於中央指導的團體與軍隊，因為除了少數事例得隨便選述外，若要循着這些中央團體發出影響的途徑，以對一切枝節的瑣事加以詳述，實不可能。若要斷定其所用的各種方法效果如何，為時未免過早，但某種結論是可以做出的，並對所採用的某些方法之實效亦有懷疑。

俄文的繙譯是特別困難的。為要加重表明新觀念與新制度起見，共產黨人造成各種新的混合字，並時常給一個字以特殊的意義。新觀念的宣傳技術之一部分，即是對某些字句的不斷重複。為要標明附着於某一特定辭句的一定意義起見，不僅有依照其慣例對同一辭句作不斷重複的必要，而且須盡可能地直譯原文。「勞動者」(toлoтep)、「工作人員」(paбoчий)與「工人」(paбoчий)等字是時常遇到的，這些字須加仔細的區分。「工人」一字用在本書裏是指產業工人，而「工作人員」一字則保留之以用於各「黨的工作人員」一類的文句中。「勞動者」一字是從俄文譯出的，這原文的意義是包括一切恃自己的勞動謀生活而不剝削他人的勞動以榨取利潤者；所以這函義較廣的術語，可包括各機關的職員與農業勞動者以及產業工人。各種制度常被第一次採用時，都給以很長的名稱，以加重表明它們的新的與特殊的性質。因為這些名稱是用以博得某些階級的一定反應，所以用到它們時必須作不斷的重複。在某些文句中，俄文的 *aktivnost* 譯作 *activeness* (積極性) 以示

明一種心理的形態，而與具體的 activity（活動）相反。Burea cratism（官僚主義）一字的採用，是依照俄文的慣例。politygramota 一字是比較機械地譯成 political grammar（政治常識）政治常識的學校或教科書把歷史與公民的學科與社會道德學混在一塊。

這本著作是根據於許多蘇聯的報紙與書籍，輔以一九二六年夏季與秋季間的三個月參觀。作者於一九一七年夏季在所謂「克倫斯基統治」的時期，並於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年，都住在俄國。自一九〇四年以來，因研究俄國的各種事務，還有多次的考察，這些較早的考察可作為比較用的廣大背景，尤其是對蘇維埃制度成立九年後的一九二六年各種事態的比較。這本特殊著作裏所引的各種出版物材料，未能於引證每種事實或意見時處處加以註明；若欲於每次引證時都加附註，實無可能。至於較長的基本的引語來源，則時常於引用時隨手指明。在篇末的參考書目裏，包括與對該國革命有關的並為本書所特別參考的報紙與書籍。有兩種報紙是不間斷與細心閱讀的，選為對公民訓練問題特別重要的材料。第一種是「真理報」（Pravda），這是共產黨之正式的「指導的」機關報，這同時是蘇聯最大的與銷數最多的日報。第二種定期刊物是「農民報」，這是由該黨每星期出版的。這週報的銷數超過真理報，且是「羣衆報紙」的最好例子。這兩種報紙都在論定期刊物的一章中加以敘述。一般的刊物與特別這兩種報紙的官方出版性質，使它們對本書的論著特別有權威。

Samuel N. Harper 於芝加哥大學一九二八年七月

目錄

第一章	蘇聯之公民	一
第二章	共產黨（布爾塞維克）	一七
第三章	共產青年團（康沙木爾）	四七
第四章	共產兒童先鋒	七〇
第五章	蘇維埃之定期出版物	一〇一
第六章	蘇維埃的國家式範	一二七
第七章	蘇維埃職工聯合會	一六三
第八章	蘇聯的合作運動	一九七
第九章	蘇聯的公民團體	二二三
第十章	陳列館與參觀團	二四九
第十一章	蘇聯的紀念會與宣傳運動	二六七

第十二章 蘇聯的普通教育·····	二九〇
第十三章 蘇聯的政治教育機關·····	三二五
第十四章 文學藝術與劇場·····	三五九
第十五章 無線電電影與音樂·····	三八七
第十六章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四一一
結論·····	四四〇
參考書目·····	四五八

蘇聯公民教育

第一章 蘇聯之公民

在蘇聯裏，有一確定的公民觀念，由此，公民團體分成爲種種截然不同的範疇。公民之主要區分，規定於憲法裏及見諸立法上。所以政治的及經濟的各集團，都是界限分明的對立起來。公民觀念更因某種社會集團及經濟集團的選舉權及其他權利之被剝奪而有進一步的規定。凡此種種都是革命鬭爭之一部，這鬭爭要綿續到很長時期，至少有一世紀，直待新制度獲得最後勝利，階級區分消滅爲止。但現在，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鬭爭，都在明顯的及普遍的應用，在蘇聯的體制中，階級原理是公民權的決定因素，這是選舉權及其他一切蘇維埃制度的基礎。本書各章將在探討每種制度時對這個根本原理加以說明。公民觀念的普通性質，乃是根據俄國業已採用的所謂「蘇維埃制度」而來的，對此可作扼要的敘述。我們必須時常把這普通的觀念，記在心中，與黨和其他組織的特殊題目作等量齊觀纔好。所以關於這大題目的初步探討，洵屬妥當。

正屆組織訓練與教育的蘇維埃公民是「在生產中的公民。」蘇維埃選舉法的原理之一是職業代表制，公

民要在其工作場所裏，並以某種工人的資格進行投票。大凡進入某種機關及取得他項職位的許可，須以「生產資格」為條件，再補益以其他資格，如普通教育，或技術知識，候選者必須表示他或她在工業上農業上參加實際生產。教育制度裏各級的教學方針與方法亦必須密切聯繫於生產行程，從幼年起，兒童在學理上應於其能力範圍以內，指導其作實際生產的活動，即是休息，能利用之，亦是教育目的，這個意思就是即頑要也是屬於生產的。不論其為實際生產方面，或為生產訓練方面，務使一切活動為有目的的措定，這將在此書一再引證，僅能生產者纔是蘇維埃公民，而蘇維埃公民必在生產行程上，負有一定的職責。

此處注重生產，在一般說來是來自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學說，這是蘇維埃政治領袖思想的根據。至於現在的列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後來再行討論。大凡是共產主義者必為馬克斯主義者，必經過馬克斯主義的考核。凡非共產主義者獲得某種職務亦必須表示得有馬克斯的學說及著作之知識。高級教育機關數學教師須成為馬克斯主義者，而已成為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及歷史家，在寫作上與教授上都站在領導的地位。青年與兒童受着馬克斯主義的教育，新教科書根據歷史的唯物論的解釋而編訂。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在學校裏廣泛採用，並視為治學方針的基礎之公式中的一個名詞，其目的是在於訓育唯物論者的孳殖。

革命的現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程序建設的開端，是踏上共產主義的階梯，這並不是說這第一階段現已完成。在蘇聯裏尚存着資本主義的環境，約二千四百萬的農家尚帶有敏銳的個人主義傾向，國內貿易，甚至於工業生

產私人企業仍是存在，這些是敵對的經濟勢力而仍須加以鬭爭和克服的。在國內經濟生活因有二個成分，即社會主義的成分與資本主義的成分，還在競爭並要鬭爭到完全勝利為止，則階級鬭爭必致延續。雖然現在社會主義的部分步步超勝了資本主義的部分，但是持續與持常鬭爭的需要依然是政治口號中之一個。以此之故，組織的方式，日益發展與增進，鬭爭之一種方法，即是組織。公式裏第二個名詞是「組織者」，縱屬兒童也教以作有組織的行動，一如工人與農民因得扶助和甚至於受強迫而成爲各種組織的成員，至於各種組織的繁多與五花八門的名稱，將再述於下章。蘇維埃公民的義務之一即在參與各種組織，而各種組織亦足加強蘇維埃的公民觀念。

假使這兩個爭雄的原則鬭爭到了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時，則集體主義者的實施，必致發展。日常經濟活動中的集體努力，都用種種方法來獎勵，並有時授予特權。兒童在學校的作工與遊嬉，引導以集體活動的方法。蘇維埃式的身體鍛煉，似足以消除自私的個人主義。正在訓練中的未來蘇維埃公民必爲集體主義者。這是公式上第三個名詞。在經濟政策中，蘇維埃政府正以合作運動與私人營業鬭爭，在過去二三年間此種合作運動的復興與增長，便是在蘇維埃公民觀念上着重集體主義的很實際的效果。

社會主義程序的建設是革命的第二個目標，且是革命的偉業。現在所遇到的待決的問題是一般民衆每天作工與生產的實際問題。此種任務，不比奪取政權與鎮服或驅逐國內外敵人之饒有刺激性。革命轟轟烈烈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運動在進程上已到了更重要的階段了，雖然這運動不復那樣可歌可泣，但是熱忱及某種的英

俠主義都認為是兩個相反觀念間的鬭爭所必需的要素。爲革命原理而戰仍屬必要，不切實的憤慨是到處受人棄絕與斥責的。列寧有一次說道：「薄弱感情之在革命黨員，一如懦弱之在前線戰場中之兵士身上。」要使其成爲或必使其成爲革命黨員的熱忱——有時稱爲無產階級之熱忱——纔克有濟，並須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保持其敏銳。一班後起的青年，未曾帶有沙皇時代的傷痕，未曾經過秘密革命工作時期，且未曾參加過革命初期的積極鬭爭，則須浸漬以革命史上英俠的事蹟，因他們亦必須做別一種之戰爭人員，應具有勞工的精神與熱忱。從事於恆常的和積極的鬭爭，有些訓練使其成爲「革命的職業家」，能鼓勵，能指導。但是羣衆活動是最後目的，革命領袖主張任何活動成功的程度是以羣衆活動效果的大小爲比例，故民衆活動必須導入革命目標之指向。目前通行的公民觀念之第四個及最後的名詞，即「革命的活動家」是。

雖然信教自由仍存在於蘇維埃制度之下，而教堂已經與教育完全隔離。對於未成年者開班傳教，認爲犯罪行爲，宗教團體按法登記，但行政上權能的實施已在禁止之列，其意不外是宗教團體得爲信仰目的而存在，都不能從事於社會服務的活動，蘇維埃憲法上規定宗教與無神論宣傳的雙方自由，政府當局主張蘇維埃政府對於宗教信仰及無神論，宜取絕對中立的態度，在另一方面言之，握政權領導的共產黨員，必須爲積極的無神論者，且青年與兒童的組織在共產黨指導之下，亦必須爲好戰的無神論者。年輕的與年長的均已成爲唯物主義者了。同時，維持努力保守活躍的革命精神，革命的鬭爭積極性與英俠性是訓練公民及未來公民的基點。

爲了革命的積極性的發展共產黨領袖亦利用蘇聯領土以外的革命目標，他們自己祇是一個國際集團共產國際的一分子，別種組織亦因之具有國際的基礎，其黨員亦自視爲世界的公民，在理論上，關於革命的國際主義的本質與蘇維埃公民訓練方法之關於國際方面，以下各章幾乎都要述到。故此引論必須注意到，蘇聯領袖對於世界革命問題所取之態度。在十月革命的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希望即在於最近的將來，關於此層列寧壯語的結果使吾人無可置疑，當大戰開始的接續幾年中，在各國的革命可能性都用以激成俄國革命運動。後則承認革命巨濤的衰落。但是蘇維埃領袖，革命同志們，仍主張世界資產階級的穩定是暫時的，世界革命是歷史性地不可避免。現在各國對於蘇聯雖予以正式的承認，及恢復外交上與商業上關係，但完全的正常關係卻未建立，這種情況維持兩個對壘的形勢，蘇俄在一端，其他世界各國仍在一端，這種對立是不能調和的仇視。因此，援助他國的罷工或革命的民族運動，成爲一個革命者的公民義務。

他們對於蘇聯與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之意見既如此，勢必深信敵人將作直接干涉的威脅，並云蘇聯社會主義體制建設的成功將使這種干涉難以避免，因爲敵人不能允許蘇聯的成功，以此蘇維埃公民必須組織，而未來的公民亦必須訓練自己使足以保護「革命的戰利品」，一種民族主義的姿態就應運而生，並在蘇維埃的公民觀念中佔着重要的地位。

蘇聯公民的範疇，嚴格的與明晰的區分是直接的由於這種觀念。但是這種區分是革命時期的，暫時的，此須

記諸心中。要知現在社會革命的進展中，階級鬭爭還在繼續。經濟的集團已成爲社會羣衆分類的基礎。

在蘇維埃制度中及各集團的組織中，每個經濟集團有其特殊的地位，這些經濟集團在經濟落後，並以農業爲主的國家之較簡單的機構中可作較明晰的規定。「無產階級」本以產業工人爲主體，但是運輸工人亦在包括之列，有時我們看到「工人」一字，是指在實際生產中以手工工的勞動者而言，或稱呼得精密些：某人是一「做凳子的工人」。這工人選到蘇維埃或職工會裏任職時，還依舊是做凳子的工人。在另一方面言之，若他永久退出凳臺與機器的工作，他就進入另一階級，這另一階級以後再談。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數目，據一般的估計大概爲三百五十萬人。俄國工人過去的特點是密接於他所自來的階級，即農民階級，這種情形，即現在蘇維埃工人亦是如此，俄國雖相當近代工業化，而俄國工人仍接近他所自來的農村。在革命爆發的各年中，工業界發生危機，工人階級解體，各地工廠的許多工人，依然歸到他們從前的農村社會，現在大部分仍返至工廠工作。因爲現在農村裏缺乏工作，青年農民又掀起轉向城市與工業區域的新運動，這些人將使強有力的農民影響仍能及於工廠的工人。

農民可分成三個不同的集團，這種分化，是立法與行政實施的根據，最大的集團是「中農」，他間於「富農」——「古拉克」意即第一級農民——與「貧農」之間，農民分成於貧農、中農、富農三者是依據其合家耕植用畝的多少，和家畜的繁養，農具的設備，以及非農產品收入的補充而規定。概括言之，富農是雇傭他人勞力，以種植

其地上的所有物或作其他工作者，或從事於商業，或小工業生產者。富農被視為資產階級，剝削分子，因此剝奪其一部分公民權。在另一方面說來，此種農民的資產階級分子其政治法律的身分，又異於其在城市區域裏的資產階級分子，因為富農本身大部分也是土地的種植者，故亦常視為生產者。

貧農則列在鄉間無產階級一端，最低限度亦常稱為半無產階級，他是農民裏無產階級獨裁的柱石。但是他並不是毫無土地的人，他住居鄉村裏也有一點土地，只因為他缺乏家畜和農具不能儘量地與適當地耕種。他可以出雇農作勞動者於鄰人，或者每年有相當時間於國家或私人之非農業性質的企業裏找一暫時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被稱為農工，即農民中之日工工人，並以工資獲得階級，加入職工會。但是他的農村居民的法律地位和他的以農為主的經濟活動，使他仍歸入農民的總範疇中，而成爲這整個階級中各集團之一。

至於中農，顧名思義是一個中心的集團，他在農民中佔有大多數，「農民」一字，時常用來單指中農，因為就農業生產者的意思來說，富農還不止是一個農民，而貧農又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農業生產者，且在經濟上很多是同於工人階級。蘇維埃社會裏為政治集團的配置，要表示中農如何能代表一個特別的階級，同時要表示他們是如何足以代表農民的一個經濟集團，在其經濟利益上一面與資產階級有別，一面又與無產階級不同。

至於農民內部分等級的決定，則有客觀的標準，例如有耕牛幾頭、馬幾匹、農具之性質與數量如何，所有及種植的土地幾何，都可作標準，家庭外之雇工亦可作為分類之一種標準，雖然，這些固是具體的根據，此種分類在事

實上常有出入，而取決於統治團體，各村蘇維埃執行部與本地的共產黨人等。關於某一人是中農還是富農的分類問題時常發生辯論，如依凡諾夫出賣穀物，被人看見，他就要被列入商人一類，所以便視為富農，雖其所賣的穀物是其剩餘的產品。某報曾報告一個人的轉入富農的原因，為一張照片裏有他與一個華美衣服的同伴站在一塊，後來發現這個同伴非為商人，乃是蘇維埃高級官吏。

現在還不會找到一個簡明的字，相當於蘇維埃階級體系裏之第三個主要的經濟集團「勞動者」一字，常常遇見與「工人」一字，時用為包括此第三個經濟集團，這個集團，即是能做「社會上有用的工作」者。這個集體亦常稱為「勞動的知識分子」，並且以其是勞苦軍之一部，得享有公民的權利。這集體之最重要分子之一為男女的專門家，如教師及醫藥法律經濟以及其他技術的專門職業，在國有國家化的經濟企業中，其主任與經理都是「工人」。蘇維埃政府與經濟機關內的職員，即蘇維埃體制裏的官吏，亦稱為蘇維埃的雇員，合作社與職工會裏的類似職員亦如國家的雇員一樣的有政治與社會的身分。黨裏的專任行政工作人員及同樣在其他政治及市政機關專任的工作人員，都歸入這一集團。他們的經濟利益即在公衆與市政機關的公務，而與私人商業機關的事業相對立。組織家宣傳家在黨裏，在職工會裏，在合作社裏，及在許多公民的組織裏都是專門的「勞動的知識分子」。「勞動者」一字此處用來包括這許多集團，這些都不做手工勞動，但以雇員的資格附屬於生產或某種專業，而沒有為了個人利益而剝削他人勞動的可能性而已。

蘇維埃體制的第四種與最末的經濟集團是一切「資產階級」或資本家。地主階級後來完全消滅了。遲至一九二五年尚發現這個階級有千數或多於千數而擁有幾千英畝土地，而未歸國有的。最後這些土地也被沒收了，地主被逐出於舊有土地的所在地。一般人想來，從前一切工商企業的所有者，在革命初年，即已被沒收，舊有之資產階級亦已消滅。但在一九二七年尚發現約有十個小規模的製造業於莫斯科，每處雇用工人從四十人至六十人之間，經營其私人企業，而為政府所不及注意。若以經濟的階級來說，則老的資產階級在蘇聯境內可以說已經消滅，雖然在談話裏或在講壇上尚可聽見「未殺完的資產階級」是蘇維埃體制的社會集團之一。

在另一方面，所謂「蘇維埃資產階級」即新的資產階級復在長成中，一九二一年為求生產之復興，已准許資本主義的原則。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普通簡稱「納不」(Нэп)，這個階級就是從此發生的，因此被稱為「納不滿」(Нопман)。小規模的製造業，以租讓的原則轉入私人手中而為個人的利潤而工作。有時從先物主收回他的小工廠，這不是為收回物權，乃是租讓的嚴格條件所規定的新基礎上而復歸營業。私人將從事於商業及組織商品公司，小店主常在新的與嚴格規定的章程之下，得重整舊業。聽說最近幾年，曾有幾個私人得「攢到百萬」。誰都到處可以找到這些新興的資產階級，從小工廠、小工場及店舖中都可以謀到利益，在農村裏如上述經營商業與小企業的富農，也是一種新興的資產階級，私人的飯店亦已開張，私人的店舖與國家商店及合作商店爭相營業，農村裏情形如此，城市裏亦是如此。經過許可狀的發給與租稅的政策，這些資產階級的新代表就被

登記、監視與嚴密約束起來。他們必須遵照許多詳密的條規而行。關於選舉方面，他們必須另列一名單，而此類名單又須公開招揭。「階級鬭爭」的發動，就是反對這個經濟集團使這分子的存在，在經濟生活中成爲其他經濟集團的公民活動發展的基礎。

自力作工而不雇用助手的家庭工業勞動者，即手工業者，自非資產階級；他對於社會主義秩序的建設，是取輔助地位，他的製造品，得藉合作社助其推銷，我們可以相信他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他僅有他誠實的家屬人員助他從事家庭工業，但因常有隱名於家庭關係人之下，來實行雇工的事情，地方政府受命仔細監督手工業者，以防止這種弊端。

蘇維埃社會的政治集團，其明晰與確定不僅由於革命領袖所採取的政策，且由於蘇維埃的法律。在蘇維埃的公民觀念之下，政治集團的劃分是遵循經濟集團劃分而來的，茲在——細論各種制度之前，亦須在大體上對此加以扼要的敘述。

第一步先說黨，在蘇維埃制度下，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下一章將究討黨的性質，並且標出其與歐美政黨如何之不同。黨員的數目在一九二七年末大約有一百二十五萬人，這些可稱爲自覺負責的公民。他們獨享合法的特權，蓋是能有政治組織與機關報的惟一團體。同時共產黨員負有公民的特殊義務，並時爲任何團體的領袖；共產黨員至少須參加一些公民活動，所以共產黨員足以代表一種超公民，這種特點將爲此書處處所加重指

示的一點。現在黨員的成分，百分之五十是工人，百分之二十是農民，百分之三十是勞動的知識分子，不論那一類的新興資產階級，都不能充當共產黨員，黨員若成爲新興資產階級，要被革退。他的政策是維持工人在黨內的優勢，所以智識分子想握得行政權，是很困難的。至於中農則可以與貧農等量加入，紅軍兵士入黨則與工人相同，入黨的條件須經黨內詳加討論。

雖然一切共產黨員都被望成爲活動的公民，活動的程度黨內也曾注意到。茲有一個分類，將「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相對。我們可以看出「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的區分到處應用，而爲蘇維埃公民觀念之一個特色。黨的活動分子是黨的組織裏得到選任位置的黨員；在黨並有領導資格。但是二者都是黨員，黨員的身分都會記錄下來，以備不時的詢考。其他一切公民則稱爲「非黨員」。公民之黨員與非黨員嚴格的區別，是蘇維埃體制最重要的政治分化。

無黨籍或非共產黨的農民、工人與農工的勞動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都屬同一的集團，雖然我們往後將看見工人代表在蘇維埃中比較農民代表是有優先權。這些公民統名之爲「無黨籍的羣衆」。在這集團中，前已言及，亦可分爲工人農民及勞動的知識分子之活動與不活動的二個分類。「活動者」一字用於俄國係採自法國，這類人就是被選到蘇維埃的，選到女工人女農民之代表大會的，選到職工會與合作社或俱樂部與農村讀書室之委員會的，所以對於一機關一組織之指導與管理的參加都可稱爲「活動者」。此舉之最後目的就是領導一切

工人農民及勞動的知識分子走上自動的政治與公民的生活。現在所常聽到的話，就是在革命的初年列寧所說：「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廚子亦應學得到政府裏辦事的能力。」舉凡政治的經濟的公民的性質之各種組織都是以發展這個活動爲目的。選舉次數的多少與在每次改選中提拔新人物的政策，都足以助成這「活動分子」的不斷增加，對於較活動分子的饒有趣味的「推進」辦法，是工人農人的刺激品。因此，祇須加以時日，不活動者都會活動起來，以達到革命的完成。

最後，在蘇維埃體制之下，關於政治集團的劃分，尙有一小集團須待究討的，雖然經理主任及技術專門家正在工農羣衆間，訓練出來，以在行政機關與教育機關主持一切，但是尙有許多在舊制度訓練出來的職業的與技術的男女專門家，現在仍被雇用於國家的行政的與經濟的機關，並站在重要的位置。赤色主任，赤色教授，或赤色軍官各在工商業的大機關裏，大學裏，或軍團裏常常站在很高而有責任的位置，他們正如軍團裏的政治主任一樣，常是共產黨員，在這些「負責的共產黨人」之下是專門家，而這技術人材時常來自資產階級。現在通行的俄羅斯化的「專門家」一字，簡稱「專家」(spetsy)，其任務之一即是將出自工人農民，尤其是被派至特殊機關裏工作的共產黨人，訓練成新的專門家。以後，這老的專家就不再用了。

當十月革命開始的幾個月中，許多這種專家與知識分子實行怠工，反對新制度，但是現仍需要他們服務，他們被動員了，並間接被迫將他的專門知識與幹練爲新制度服務，因此發生了一種腦力國有化的形態。幾年之後，

政府相信此類出自資產階級的專門人材，業已自覺的接受新制度，乃允其有公民權利，得許其參加蘇維埃選舉，並得參加職工會及合作社，在雜誌撰稿技術上的文章，及積極參加社會上的一般經濟的與文化的的生活。但是曾受過舊制度教育的老些分子，和相當的較新的分子，在政治上多少仍是置於被動的地位。這些專家（*Prof.*）的政治行動之被抑制，或至少與一般無黨籍的羣衆一樣之被漠視，產生了一種雖有充分公民權而實際上任其或甚至迫其不活動的集團。在一九二六年一個會談裏曾聽到「被動的專門家」的名詞，即係指示那個流行一時的集團。蘇維埃政制的目的，就是要減少被動的羣衆，而同時創造此被動者的特別集團。

在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之間，黨內討論到技術人才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生的所謂煤礦案件引起了如何善後的問題。在這案內約有五十個在國有煤礦工業佔主要位置的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均以「經濟的反革命」判罪。他們的罪名是搗亂與破壞礦場，毀壞機器，及不信任蘇維埃政府，並在工人心目中是對工人建立不利的和不堪忍受的作工條件。煤礦裏的陰謀似屬一個與外界無干的不法行爲，但是共產黨員分析其環境後，認爲那些人的活動是有一個「思想的」基礎。有幾個被告者否認罪過，有些承認了叛變。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冬天裏，又有別的地方的與特殊的情形均足以表明專家的立場。在莫斯科有許多醫生在勞工介紹所登記以爲失業者，但同時各省正在找醫藥的人員。此種不規則的情形引起許多爭論，設法增良各省醫藥人員的物質條件，依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在介紹職業的名單與職工會會員錄中取消那些拒絕

到各省任職的人外，尙未加以行政上的壓迫。關於專門人員方面之爲躊躇不定的被動者，這倒是一個較爲明白的例子。

在蘇維埃制度下，專門技術人員的政治態度恰在於此。希望「專家」做工不是形式的及純粹官僚方法的，而要能有技術的創造性。因此再須承允他們以實現創造工作的可能之保條件，專門技術人員各視爲有不經濟的過失，及因此而受懲罰，必因他的行爲是有意妨害蘇維埃經濟政策，或由於自私的動機，再或是怠惰。工作之錯誤與失敗之遭逢如非出諸其有意，則僅足以影響對此專門家之評價，而不能視爲課罪的根據，這僅有威權可以解釋的，但是對這集團地位亦有同一的政治，在各機關或各團體內居負責的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團必須對「專家」抱健全的黨所應有之懷疑態度，以保障正常無產階級的管束，雖然，工程師與別的專家大會，也曾通過決議強硬反對煤礦工程師之叛變，並表示他們絕對忠實於蘇維埃的體制，蘇維埃的原則及黨的領導權。

最後，尙有一類特殊的人，不承認其一切政治權，而公民權利亦受了限制。這實在說來可以稱爲非公民。舊資產階級的代表屬於此類，特別如從前的地主及廠主皆是。他們如前「統治階級」一般失掉他的經濟地位以外，而且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從前官僚時代的高級官吏，及與警務有關係的各種人，以及各宗教的牧師，都與舊資產階級歸入一類。其數不多，但遇資產階級的代表被人發見時，則時時有公開的宣傳。一九二七年於列寧格勒有這類人六個試作投票，雜在一百三十萬選民中，而報紙對此即充滿記載，並作諷刺畫，其中有些人是以國家機關中

的技術家資格獲得蘇維埃公民權的。

在蘇維埃法律下滋長的新興資產階級，其公民權亦被剝奪，不僅大商人或製造家無選舉權，即村莊的小店主或從事於地方商業的農民亦不許投票，不許加入職工會或參加合作社。他們雖不能說為法律所不容的人，但在許多方面看來，他們是實際上立在法律之外邊。在一九二五年的選舉中，有許多這些新興資產階級者為地方政府允許得參加投票，故在一九二七年，關於選舉的新訓令就指出憲法條文須嚴格實行，並枚舉選舉權在法律上被剝奪的階級。這個訓令給憲法條文以較滿與較廣泛的解釋。因此得在蘇維埃制度下存在的這類非公民就受到一種壓力。共產黨領導任務之一部分，即在使這羣人在政治上仍處被動的地位，特別是當他們能達到某種經濟的地位，得藉此來發展政治的活動與影響時。不許參加選舉，不許加入合作團體，或至少不許在合作社裏作任何積極參加，這些辦法，都是要使他們站在被動地位的主要工具。經驗告訴我們要使這政策之完全實施，需要領導者時加壓力。

關於兒童及青年的政治的與公民的組織及教育制度之討論，乃是指示如何擴大階級原理之應用於未來公民，根據政治與經濟的分類而來的公民的類別也應用到青年與兒童，雖然不像那樣的嚴格。出自資產階級的少年，例如鄉村店主的兒子，得入共產青年團。兒童先鋒隊的組織則允許一切階級的兒童加入。雖然，蘇維埃制度的階級性質仍是十分確定，階級原理對於青年與兒童們亦是合用。

本章至此所舉之蘇維埃公民觀念的要略，差不多包括至一九二六年年尾的情形。一九二七年的開端有幾個較小而重要的新設施，都是關於身分的階級權利問題了，當對資產階級分子剝奪公權的實施，在一九二七年選舉中正屆雷厲風行的時候，在別的方面對於這個階級更取寬鬆的態度。在國家的勞工介紹所圖謀位置的人，已不復要他說出他或她過去的社會身分或階級。一九二六年黨的代表會議議決允許文字上的「涉獵者」即文學專家，得較自由選擇題材與自由作文學評判。末了，在工人報紙上曾有一種宣傳主張給技術專門家中的發明家以獎勵的刺激，即為早已實行於工人的發明家的那種辦法。這些事實指示階級原理之應用，漸趨放弛。但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間的冬季，在黨內領袖的爭論，經濟的困難，尤其在上述很有名的煤礦案件，又使階級的原理，更加主重，嚴正的階級區分的體系，實際在任何方面都是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並因此而生出公民類別的體系。這個體系使一方面有超公民的類別與另一方面有非公民的類別。非公民視如一種活動的敵對勢力，他們的活動是須減削的。超公民則在職責之下，必須為其當為的公民活動。其目的就是指導羣衆作持常與有效的公民活動並藉以建設新的「蘇維埃民主政治」。凡毫無階級覺悟和對革命的原理與政策漠不關心的人都稱為簡單的住民，這就算是極大的侮蔑。公民的意像就是「勇敢的革命的共產主義的戰士」。

第二章 共產黨(布爾塞維克)

共產黨不僅是在蘇維埃政府中惟一統治的黨，而且在蘇維埃體制之下是惟一合法的黨，獨享合法的特權。再則，共產黨都能維持其統一性，雖然，彼此領袖間會有數度激烈的爭論。將來黨內或能分成派別與發生如他國一般之政黨體制，但是在現在，共產黨在蘇維埃中總是「惟一而僅有」的政治組織，且「惟一而統一的」革命領袖列寧圓滿無疑的成就就是共產黨的創造與建設；這個黨就是「列寧黨」黨員即是「列寧主義者」黨的主義與行動的規律稱為「列寧主義」。自從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一般人對於這領袖的態度，將討論於本章章尾。依其創造者迫切的命令，共產黨堅持維護其合法內的特權與統一性。革命前一切之俄國社會主義黨中，只有它接受無產階級獨裁的原則，此即在蘇維埃體制之下實現的那種獨裁制。此絕對統一的堅持是由於革命尚在進程之中，革命的目的尚未達到的觀點而來的。

共產黨員因此享有特有的政治地位。他們在蘇維埃政府裏，主持一切負責的職務，實際上在一切國家經濟的企業中握着主持或經濟權，並在一切非政府的公民團體上站在支配的地位。他們藉這些公務的職位以控制一般印刷與出版的活動。該黨的特有地位同時使其負有相當的責任。在蘇維埃體制所生之公民範疇的敘說中，

我們已形容共產黨員真是一種自覺負責的公民，並在探討中業已提示共產黨員是一種超公民。在黨裏的黨員資格是不隱諱的，且在事實上時特予加重說明。當被告者或證人在法庭上時，先問其姓名、年齡、住所及階級身分以後，接下就是詢問「你是不是黨員？」至於日常生活的關係，亦常予以直接詢問，考核其是否與一個黨員談話。以後我們又可以看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Komsomol）亦是同樣地時予詢問及公開承認的事。共產黨的起源與發展，機構與組織，黨員所受的特殊訓練以及列寧在黨內的地位與職務都可以將其產黨人之身分在其他的公民方面區分出來。

俄國社會主義的傾向，接受之馬克斯學說，其最初具一般的與形式的組織的，是在一八九八年。在各代表秘密的小小會議中，成立了「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普通稱爲「社會民主黨」。該黨的領導權主要的是在俄國諸革命黨人的各集團之內，這些人都住居國外，是從俄國本地逃出，或從西伯利亞牢獄中逃出，或爲革命遭了放逐的。一九〇三年，該黨第二會議再於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召集，旋即遷移並繼續於倫敦。在這些會議中以某種細小論點的激烈爭辯，致引起根本問題的分裂。這二派仍繼續以社會民主黨自稱，祇以在會議中由表決的結果，各名其派爲「多數派」與「少數派」。過後，二派人數的勢力倒換過來，但是名稱根據第一次分裂時仍繼續保留下來。多數派叫他自已爲「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少數派名爲「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門塞維克。

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派關於組織及策略問題所取的主張確定了該集團的特質，現在共產黨的發即展由於此。在這次爭持中，布爾塞維克派的領袖是列寧，所以嚴格說來他實是黨的創造者。列寧主張俄國社會主義者審察俄國那時期的政治條件所形成的革命鬥爭，必須具有特殊方式的組織。列寧以爲一個革命黨必須以嚴格的紀律集中起來，結合起來，尤其黨員必須限定爲積極的工作者，不可僅爲同情者。惟積極的工作者祇是對其確定的指定的工作之完成能作經常報告者。所以對於黨員資格的限制與工作的必須積極，是這個政治團體從其即起時的顯著之特點。這些組織原則實是布爾塞維克派發展的基礎。至於策略問題，布爾塞維克派力主認真與嚴格地採用階級鬥爭的原理，同時對於別種政治傾向及集團應取不妥協的態度，尤其是對於非社會主義或非革命性質的。

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的革命時間，所謂布爾塞維克黨人與門塞維克黨人者時而合作，時而反對。從此又發生介乎這兩派之間的派別，其組織具有暫時的或局部的性質。二派後來決定參加國會的選舉，這就是一種收果；在國會中之社會民主黨人自一九〇七年以後時常公開自名爲「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派」與「社會民主黨——門塞維克派」。在被迫旅居國外的列寧領導下之布爾塞維克派仍一本其組織與策略的原則，雖該派在國會中的黨員亦無不時常與社會民主黨較大的門塞維克派共同工作及共同參加選舉。

世界大戰爆發時，布爾塞維克與門塞維克二派在國會裏及在其僑居外國的領袖之文字的與組織的活動上，其政策與策略的異點益形顯著。布爾塞維克派竭力反對戰爭，並不接受許多俄國社會黨人以這次戰爭為自護戰爭之主張。關於這一點，列寧與其同志攻擊那同為第二國際會員的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列寧看見在戰爭時各國社會主義黨的政策與行動是背叛馬克斯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因之益信他所站的及所奮鬥的主義之真確。結果，他再增益其自己俄國布爾塞維克派的主義並在各國社會主義隊伍中得到其左翼分子的附護。列寧是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在齊謀瓦爾德（Zimmerwald）與克立塔爾（Kienthal）會議之主要發起人，在這些會議的決議案中，他得以發揮對於組織及策略的意見。

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一次革命後，列寧得歸故國，與其同志相斂，距其放逐已十年多了。他的初步工作之一是糾正與加強他同志們的策略路線。他發現他們大大地離棄了他在瑞士精心苦構的與在外指導的布爾塞維克派的原則。他力主應當運用更嚴格的布爾塞維克組織原則的必要，而對此項工作他已專致多時，革命初起幾個月的言論與出版之絕對自由予以幫助不少。隨革命而躍出的新制度，即工人與兵士蘇維埃的代表制，給此種主義應用的場所比諸其實施於舊式沙皇政體的政治條件之下時，較為實際與範圍較廣。

列寧認為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僅是革命的第一階段，而再有第二階段為其黨的組織工作之對象。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他視為是十分重要的。他與他的同志時致爭論一如對於他的敵人一般。他反對在革命時期由於

羣衆對政治生活之驚醒所起的誘惑，且對於黨員資格並不離棄其原意，不專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違反黨員質的問題。在二月革命起初幾個月間，布爾塞維克黨員的數目不過三萬人。這些黨員是在革命前十年來於舊統治艱難條件之下訓練而成的，當時布爾塞維克黨人在同一時候是合法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的組織。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後，布爾塞維克黨人與其領袖們，連列寧自己，因為克倫斯基臨時政府阻撓其「深入與擴大革命」的策略，乃不得不再採取秘密方法。此種情形是使在這數月內黨員人數比較增加得慢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布爾塞維克黨員，在數量上較諸其他政治團體如門塞維克黨員與社會主義革命黨員很少增加的緣故，亦有由於布爾塞維克對於黨員資格的限制與管理取了審慎的政策。因此在十月，即布爾塞維克革命的時候，全體黨員尙未超過二十萬人。當領導十月革命奪取政權的時候，黨的名稱仍是以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派名之。雖然，有僅在布爾塞維克革命後形成的社會主義革命黨左翼也在參加之列，但在十月革命所產生的政府裏惟一有組織的分子，卻是布爾塞維克黨人。一九一八年四月，左翼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又退出一切政府裏的職位，同年七月，一切其他社會主義者團體即在蘇維埃實際上亦不許其參加。但是別的門塞維克黨人仍得繼續被選至蘇維埃中，並以門塞維克黨人資格參加爭論。一黨獨享合法的特權，事實上在第一年內即已成功，雖然在形式上尙未承認，直待後來始見實行。在第一年中黨的名號亦有更改，「社會民主黨的」名詞不再用了，一部理由是因爲這個名詞被其敵人繼續應用，且在俄國以外的反對布爾塞維克的理論與方法的社會主義黨也用這個

名稱，再則黨的性質與宗旨必須很明白地標出於黨的名稱上，所以新的名稱「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公開地採用了。在馬克斯著作中，有這個名稱的根據。「布爾塞維克」一詞用時，時常加一括弧，即在公文中亦如此，因為這字不論俄國國內或國外都成通行的名詞了。見到「布爾塞維克主義」一詞，就知為表明一種特殊的組織方法及一種特殊的理論，並且時常有提到各國共產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成立以後，此名稱亦改為「全聯邦共產黨」(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通行的名詞縮寫為「Voy-Ku-Party」，由其整個名詞的三個起首字合成的。又因其在蘇維埃制下僅有一個黨，普通只稱為「黨」。

奪取政權的成功，及革命新時期完全領導權的獲得，遂令正式黨員的人數得到增加。這兩要素又使許多人都想成為統治者集團中之黨員。在以後幾年中，新黨員比較容易進入，尤其是一九二〇年，即是內部激烈鬭爭最後的一年。那時黨員人數達到最高點，大約有六十二萬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採用時，黨內反對的空氣來了；並在大規模清黨與重行總登記以後，黨員人數約減少到四十萬人。各種分子凡以私人利益為目的而入黨或曾經加入而在戰爭年頭卻無適當證明的都被清出。既向敵對的經濟勢力讓步，該黨的政策乃在建立更有效力的共產黨統制於經濟領域中的「主腦部門」，要達到這個目的，對於共產黨員資格的限制自屬必要。再之，黨員的質量比數量實為重要。這個政策繼續採用到現在，在最近幾年尤為嚴格。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所謂「列寧特典」(Lenin Contingent) 纔開了例外，允許

二十萬在業工人加入黨裏，這是紀念纔死的領袖的；同時這特典是使黨內真正工人分子的比例增加。

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六年之後的冬季，黨內有反對傾向，主張工人可以比較自由加入，但是這種提議終被打消了。一九二六年年端，正式黨員共有六十三萬七千人，所謂「候補黨員」有三十八萬一千人，在這年中僅有十三萬三千新黨員進入。一九二七年全體黨員重登記後，大約有四萬六千人退出，或被開除。是年七月黨員人數連候補黨員在內約有一百一十萬人。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之交的冬季，工人之另一特典又蒞臨了，爲的是紀念革命之十週年的；此時有一鮮明的運動制定了新黨員適當的選擇標準。選擇第一個標準是看其政治的積極性，再則看其生產的資格。候補黨員須無「小有產心理」或不擁有財產。在訓令中且特別說明候補黨員必須參加於大規模生產裏。新來自農村而爲產業工人的新分子之農民，以及各機關的職員和勞動的智識分子，均不在新特典所徵黨員之列，因爲這一部分人雖能忠實於黨及主義，但是缺乏無產階級的鍛煉，以其沒有經年參加無產階級鬪爭，不曾密接於工人的廣大羣衆。一九二八年年端，以有這批特別徵求來的新黨員和照常規介紹進來的幾個黨員之加入，連候補黨員都在內的黨員總數大約共一百三十萬人。

共產黨的起源與長成，粗略的敘述，這不過藉以明黨的組織之某種特色（如對於黨員的限制與管理），此種組織從其起源與經過其發展均能表出此種特性。凡須積極參加革命工作與「鐵的紀律」的實踐都是由入黨的條件，重登記的辦法，及開除出黨的規定種種方面得到的。這是須加注意的；黨內的紀律與其說由於強迫，不

如說其由於自覺——「無產階級的紀律」是視為無產階級團體的特性，乃依據其由組織中工作的表現使其自知明覺的。此種入黨的條件，使要求入黨的人，當他或她做了共產黨人之時，即必須預為準備認清其義務之所在。

入黨以前必須經過所謂「候補」時期，此種時期按照要求入黨者的階級身分而有差別。在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分子，除紅軍兵士以外，進入黨中只要經過共產主義青年團即成。進入為候補黨員的手續可分別為三個範疇。第一個範疇是工人及工人與農民出力的紅軍兵士；這個範疇又可分為二類，第一類是經常作團體勞動的產業工人，他們必須有在黨一年以上的二個黨員作介紹人；第二類包括非產業工人的工人及服役於紅軍的農民與農業勞動者所謂農工（*Coltobs*）是，這一類人須有在黨二年以上的二個黨員作介紹人；第一範疇之二類中，候補的時期必須至少六個月。第二個範疇包括不實際服役於紅軍內的農民及不履傭別的勞動者的工匠，這些階級中的人必須有三個介紹人，而每人在黨資格須有二年，候補的時期至少需一年。第三個範疇僅為其他各種人（如雇員等）及上所說「勞動的智識分子」這些人須有入黨五年的五個介紹人，候補的時期需有二年。

對於工人的加入所以採用較容易的條件，為的是藉以維持這階級的優勢，因為他時常宣稱這黨是工人階級的黨。但是要維持這種優勢，由經驗所得到的頗覺困難。雖然實際從事於生產的在業工人僅百分之四十，黨員過半數都是工人或工人出身的，但是工人出身的黨員很多變成為永久的公務機關的雇員了，雖然他們不是時

常歸入這雇員的階級。介紹人對於他們的介紹應當負責，且有因介紹不謹慎而被開除黨籍。候補黨員必須學完特殊黨校——「政治訓練班」(Political Grammar)——所定的學習大綱，這層後當再論。他們在組織中的一切公開集會必須以候補黨員資格參加，亦可參加於黨內之會議，僅有建議權而無表決權。但在候補時期中他們須付經常黨費。

入黨並無任何儀式，不論要求入黨者成爲候補黨員時之第一階段，或在由候補期滿而進爲正式黨員時之第二階段。儀式的排場在共產黨人惟物的觀點上似不大合式的。關於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亦同樣地無任何儀式，然於兒童倒允許儀式的排場。當加入共產主義兒童團之際，則有淋漓盡致的表演，這層當再寫於後。象徵主義亦不適用於共產黨人，黨人沒有徽章或勳章。至爲宣傳起見地方的組織收入新黨員，有時得召集一公開的黨委員會，非黨員的工人與農民得以參觀人被邀入場。

黨的基礎組織是所謂「細胞」(cell)。這細胞的觀念不是以籌思可得想像的及合於實用的，這是由於自然程序發展出來的。不論在一個機關裏或一個地理上的單位裏，凡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黨員得組成一個細胞。在一個大機關裏，例如工廠，會有好幾個細胞，每個作場都有一個。在別一方面，全鄉區或全市區或者只有一個細胞。每個細胞要有一個辦事處及一書記。在一九二六年大約有三萬個細胞，其主要的分類如下：工廠共七千三百十五個，鄉區共一萬五千八百十九個，蘇維埃政府的及經濟的機關，共五千一百六十七個，紅軍共五百六十六

個，教育機關共五百七十三個。細胞的大小各有不同，有些工廠裏的細胞含有數百個黨員，而許多鄉區的細胞或僅有一打或多一些的黨員。僅僅約有四千黨員及候補黨員是「孤立的共產黨人」，他們因此在地的關係使其不能隸屬於特殊細胞。

若一鄉或一鎮裏有了三個以上的細胞，這幾個鄉村細胞就形成一個較高的團體，即是鄉委員會。在較大的城市裏這些細胞就組成坊執行委員會（Ward Committees）。各委員會按期召集，每二星期至少須一次。使這些委員會的工作得彼此連絡起見，定期的區大會議，因此召集，並選出區委員會，該會的工作至少須有三個黨員專任其事。區委員會的書記必須有三年的黨籍，他的選出須得其上級黨部批准。其上級的組織單位是省或是一個區域的單位叫做「特別區」（Region），這裏也有定期的大會及永存的委員會，大會須定期召集，委員會裏亦有專任黨務的黨員。省委員會書記須為在黨至少有七年的黨員。省委員會是地方的委員會中最重要的機關，它是組織與指導全省裏各方面的工作，例如任命省內之一切黨報及各種出版物的編輯人員等等。

凡黨的組織管轄一民族共和國土地或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內的自治區，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內的獨立區，均以同樣的根據稱為特區或省的組織，因此，在黨內捷克斯拉夫和烏克蘭的獨立身分無何歧異，雖然這些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均有全國代表大會的規定。這些全國代表大會等於上述的特別區代表大會。

一切地方的黨組織在大會，代表會議或全國代表大會指導之下，對於地方性質的各問題的解決有自主權。但是每一個組織單位均直接隸屬於其正在其上之一個。這就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是黨組織機構的領導原則。民主的成分是有伸縮性的，可狹可廣，依照各種情形而決定。至在劇烈革命鬭爭的時期，民主的原則必被犧牲。

黨的中央機關，尤屬特別重要；其最高權力機關是每年召集的定期的全聯邦代表大會（congress）。這大會又補足以由各地方的黨組織所選出的代表會議（conferenc），這代表會議通常是在這全聯邦代表大會之前。「中央委員會」由這代表大會中產生出來，委員人數七十，且有很多候補委員以在兩個全聯邦代表大會間彌補缺額。中央委員會指導一切黨裏的活動，分配黨內的人力與財源，及管理中央的財政。該會每二個月至少須召集一次，候補委員得列席建議。關於政治工作方面中央委員會組織政治部、組織部、祕書處理日常組織工作及執行方面的工作。政治部現有九人，事實上是黨內最高的權力機關。最重要政策的制定，實際上都取決於此。

全聯邦代表大會又選出二個委員會，「即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更爲活動，更爲重要，雖然「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必須在黨有十年歷史纔能選上，換言之，他們必須在十月革命以前加入的，這二個委員會的職責是厲行黨員應有的義務與規律。「中央執行委員會」須與政府的「工農檢察機關」合流協作。

由於這一種機構，黨的組織根本三原則——一元的統一性，民主集權制與鐵的紀律——得以實施。任何黨

內派別均被嚴格地禁止。所謂派別者，是一種在組織機構之外，以其在黨的身分來組織，來集會，並擬具其自己的政綱與實行其自己內在的紀律之一種小組織。雖有幾個機會致成分派的傾向，但是，直至現在，一切組織派別的努力，甚至尚未形成的派別，均被嚴厲地處罰了。現在以托洛斯基及齊諾維夫為主腦的新反對派領袖雖自行否認，現仍以他們在黨中試其組派的企圖而被治罪了。這種事情實表示大背列寧的原則，列寧對此站得非常固定而且爲此種原則而爭鬪亦不止一次。這種的原則的實施固不反對黨內的討論，此種討論實則加以鼓勵的。但是，一種政策既被採用了，則一切再要討論均嚴格禁止的，因爲容易弄到分派主義。這是說，假使沒有這樣來限制討論，則黨將成爲辯論會而已，不是一個革命行動的黨了。黨的統一受着最大的威脅，則爲新起的爭論，起自一九二六年，持續一年之久。對於幾個革命元始的領袖在蘇維埃中與在黨中權力位置的更動，實是黨的統一原則之偉大力量的最清晰的徵象。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已允不再作分派活動，但是因他們拒絕拋棄其既遭失敗的觀點，他們雖留存黨內，卻已降級了。後來，他們終致被開除驅逐出莫斯科。

黨內厲行的紀律之一種特色，當稱特別關於公民訓練的一方面。凡一個黨員可被分派至任何位置與在國內任何地方，他必須接受其指派。所以該黨得遣送新任的與訓練有素的工人於各種特殊工作，以提升其活動力。在革命初期爲了特殊任務實行了動員共產黨員是通常的事，現在這個方法不大多用了。但是爲應付當前的問題，亦常用此種方法，以運用一大羣有特殊訓練的與活動的分子，專從事於某地或某種的工作。在革命初期時共

產黨人星期六日組織成就，黨員利用星期六半天休息，來做些最切要的工作，藉以應付危機，及同時亦予羣衆以模範。這種特然的與偶然的努力之實際成績，常不甚大，但是共產黨人此種服務在道德上的效果是切實用的。在這方面，他們洵爲具體地實示其特殊的公民責任。

黨內紀律係藉處罰而厲行。其最嚴重的處罰是開除黨籍。被開除黨員的名字必公布於黨報上爲一般所共知。至於一社會裏非黨員分子對於被開除的黨員的態度如何則不易判斷，但是這種人似乎是不會被選至蘇維埃裏或其他團體裏的負責地位。其他的處罰是黨的譴責，公衆的譴責，及暫時取消其黨裏或蘇維埃機關裏負責的位置。這個最後處罰的方式纔算真正的懲罰，因爲每個黨員必須嚴守黨的紀律，且必須接受其任何所指派於他的細微工作。至開除黨籍及其他處罰的理由則甚多甚多，較普通的是黨的公共意見承認各種行爲，爲犯罪行爲的。因此形成一全組的視爲共產黨人失體的行爲。共產黨人道德的一種規範就此演變出來，在許多方面均現其特點。耐醉習慣與撻妻行爲可以使其開除出黨，常用種種步驟協助黨員改過。濫用法律以結婚及離婚亦須處罰。在職共產黨人威迫的或命令式的施政方法，現爲黨所積極反對，而黨的紀律又予以有效的制裁。如共產黨人在國家機關裏站在負責的位置發現有不忠實與腐化的罪過，他們必被較嚴厲的處分。至於共產黨人犯罪，司法機關課以較嚴厲的處罰，其根據何在，今尙未明瞭。當一個人帶至蘇維埃法官之前時，第一個問是問他或她是否爲黨員。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是共產黨人，幾無例外，以此，他依革命良心所指示，得依照普通公民會犯過的法

律的規定，課以較重的處罰，這藉以明一種自覺的責任心。凡黨員犯了特別的罪被黨開除，其事實必須公開地報告於行政的及司法的當局。

有幾種活動對於共產黨人須絕對禁止的。黨員不能從事於雇傭別的勞動以圖私人利益的活動；且明文規定並附以警告黨員不能在私人生活上太密接於資產階級分子。有些領袖並主張共產黨人須留心避免倣效敵對階級的服裝及態度。有一個作家這樣說：黨員的外表必不可表現出有似勞工的生活或致引起勞工的憤感；並說共產黨人的生活可能在可能中應似工人生活的方式，尤其不應妨害其自己因為精緻設備其住處而增加其經濟的負擔；他再說道又非謂共產黨人應穿污衣破服；最後說：共產黨人與別一階級的女人結婚洵為沒味的事。所以個人的生活不可離開黨的生活。革命的利益與黨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無節制的性生活與飲酒足以損弱革命的戰士。

黨員應有義務是至低須從事於公共事業的活動。每個黨員必須從事於幾種公民活動且將其活動報告於其隸屬的「細胞」並在此種活動中，對黨的組織負責。我們將能看一個黨員對於一切活動與每一活動的領導權是黨的目的。「細胞」組織的體制，使實現這個目的成爲可能，在各選舉的機關中組有共產黨團，這實是該機關裏惟一的有組織的政治集團。除了蘇維埃裏，職工會裏，合作社裏，及其他機關的一般領導以外，還有其他無數的任務，如學校裏及工人俱樂部裏的演講，組織政治的紀念會等等，都可算作公民活動。凡黨員如被選至特別

黨校內或黨的研究院內作學習上的訓練，他們必須負擔較重的公民活動工作，至於共產黨員如何完成這特殊義務的詳情，則將見於各種不同公民團體的性質及工作之探討，與共產黨人對這些公民團體所起的作用之探討中。我們時常見到黨員在經常職業以外時負其過重的公民任務。且時常在一個「細胞」內，黨員工作的分配每不相等，每每三個或四個特殊活動的黨員負擔了指派在該「細胞」內的或該細胞所擔任的全部的工作。各種會議與各委員集會其為公民活動的，已佔了很多的時間。所以近來有了一種運動，想減少委員會的數目與委員會集會的次數，藉以確定公民活動的義務之最高限度與最低限度。黨員必須許其晚上休息及每星期有一休息日。再則，現曾覺得義務的加緊施行已弄到這步田地，時將活動變成純粹機械式的。即是共產黨人亦僅計算消費時間的數量，而很少想到所做的工作的內容。有了這種趨向乃不得不改變方法，實行其特殊公民活動的理想。在慶祝革命十週年紀念日時，從「十月節特典」裏所吸收的新黨員得允許其在公共服務或社會服務中任其選擇活動的場所。

凡黨員與候補黨員必須繳納經常黨費，此種黨費按各人所得工資與薪水之多寡分爲四個範疇：最低級範疇的黨費，是按月得工資付百分之二分之一；第二個範疇付百分之一；第三個範疇付百分之二；第四個範疇付百分之三。農民分子的經常黨費則由省委員會規定。失業的有疾病的與無工作能力的免費。三個月不付黨費且無相當理由的則停止其黨籍。至於入黨費則均按月資抽百分之三，沒有例外，須於進爲候補黨員時繳納之。

黨裏每月最高工資或薪水在大城裏規定爲二百二十五盧布，在較小的城或省減少若干。假使一個黨員所指派的職位每月所得薪水超過此類的，他必須將其餘金充作黨的貯蓄。前已言及，共產黨人不許從事於圖利的事業。但是，工作於文學界及教育界的是受鼓勵的；黨員得允其保留由寫作及講演所得酬金之大部分，這種寫作與講演既非其經常工作又非含強迫性的公民活動。在這個場合上允許個人利益的因數存在亦可稱爲適宜而妥當的。由黨裏按百分法對此等收入抽來的資金則存貯爲黨員之特別補助金。

「黨的最高薪金 (Party maximum)」現在似乎有變更了，這種變更雖然沒有經過廣大的討論，卻已在通令中規定了。在一九二六年地方的黨部已接受訓令對於生產中的熟練工人不必實施黨的最高薪金。一九二八年的開端，此種訓令又應用到工場技工及技術專家方面。這個「黨的最高薪金」現似乎僅僅適用各經理及公務工作人員方面，即是對付官僚分子的。在這個原則仍應用於爲這類人員時，這實足以具體表明共產黨人自覺責任的觀念。共產黨人認購公債是所盼望的，這種公債大概具彩票性質，受獎的高額達二萬五千盧布。共產黨人如得中獎，僅可以保留其獎金之一部分，這是由黨部決定。

共產黨任職於某些行政職位得享受正當的徵貼費，如運輸費或旅行費，及有公務使命時的每天生活費等。然於黨嚴肅紀律之下，對此亦有濫用之可能；此種濫用揭破時，必須受嚴厲的處罰，雖許多這些實例似不爲人注意到的。無疑義的間亦有顯赫的共產黨人完全用了徵貼費沒有來干涉的。至於在外國有使命的人們曾有完全

利用一種口實謂在資本主義的環境與資本主義的使臣會晤中，必須予多用錢的允許，健康的設備與在外地及高加索的療養院，於社會保險制度之下，讓黨裏的領袖們與黨員羣衆，都可以儘量應使其產黨人享受，這種待遇比諸非黨員的工人或勞動者，孰多孰少，則非不能確定。

地方的黨部如費用超出了預算，則由黨員黨費、上級黨組織補助，及「別種財源」彌補之。其「別種財源」之性質則未明示。有由黨的出版工作所得的利益歸入於黨的財庫的。黨須付專任黨工作之黨員及委員會的書記的薪水。在工廠裏黨細胞所選出的書記的薪水亦由黨付給。工廠裏及其他機關裏不論以國家的或私人的，其黨細胞有他的辦事室，或幾間辦事室。各委員會都有其辦事處，中央委員會據有一最大的辦公的房子，正常克來林(Kremlin)皇宮的外邊。黨或不必付房金於其各部所佔用的房屋。有幾個蘇維埃黨校，其學生大多數是屬黨人的，亦是國家學校網之一部分，經費應列入教育經費方面的預算項下。在另一方面言之，凡嚴格的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均由黨裏供給經費的。黨對於各蘇維埃的統治的地位會引起多方懷疑，黨絕對脫離公家財政是否可能。關於此點沒有詳細的報告，可資依考的。

民族性的成分，在蘇維埃國家機構中由於自治與自主的原則而得認可，且加扶植，而另一方面在黨的機構中則使他化爲最低度。如先前所指出，雖然地方的組織，例如烏克蘭，說起來是「民族的共產黨」，有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但是其自主性質僅與一無民族性關係的區域內一般的地方的組織相當。黨是「全聯邦的共產黨。」

全聯邦的共產黨之「整體性」有略減這自治權，與聯邦中各單位的獨立性之傾向。黨內的著作固以各小民族的文字而出版，蓋此種文字的應用時受激勵。但是著作的內容則各版均須一致。對黨員作統計上的研究，可得各民族分佈情形的材料，尤足表示各民族領土裏黨細胞所含的當地民族性之強烈。當革命的初期，革命集中於及發展自俄國工業中心區之時，俄羅斯民族的分子有在共產黨組織裏佔優勢，且在非俄羅斯部分的蘇維埃機關裏亦佔優勢的傾向。例如在烏克蘭，此種情形尤為顯著，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烏克蘭戰爭來來往往經過了好幾次，同時在烏克蘭黨裏猶太分子也覺聲勢浩大。這些傾向在地方的集團裏即共產黨人亦曾彼此衝突。民族主義雖受到反對與攻擊，但是推引的自治的與自主的共和國或特區裏，各小民族的共產黨人前進，亦是計之善者。對於民族原則雖作策略的與因此是暫時的特許，而黨仍使此種民族性成分屈服於黨的機構及組織以內的。

入黨時必須條件之一，是要做成一個武裝的無神論者。共產黨人之不作一切宗教的信仰或不接近教堂尚是不夠的，他必須積極反對宗教信仰條，據他們的意見，「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用以愚弄人民的。無神論是馬克斯主義者唯物論最主要之一部。黨員時因其參加宗教的儀式而被開除。凡家庭裏繼續宗教禮拜的農民黨員須接受一個條件，即要克服家人的宗教信仰。在反宗教的活動中，共產黨人曾受到嚴格的訓令，須採用一種應變的機智，以免增強信仰者的成見；早先直接攻擊一切宗教的方法已改為用科學解釋之間接方法，以除其所謂成見。

除了這個爲方便起見的訓令以外，更希望一切黨員都能作反宗教的宣傳。

共產黨領袖們主張：雖然黨的機構內有高度的集中原則及實施嚴格的紀律，而黨內真正與不可缺的民主制，仍是具有的。黨內的民主制在以下三形式表現出來：

第一黨的組織從最下層以達最上層現在都是選舉出來的。從先由高級指任其下級的書記的辦法已完全廢止了。再則，現行的政策是在改善選舉者的地位以增加黨員的活動力及自覺心，並有系統的使黨員羣衆不僅參加討論問題而且參加實際的領導工作的。

時常舉行選舉，欲藉以防止黨內官僚主義的發展及黨員之上層與下層羣衆的割開。雖然，黨內之常任執行人材多少是存在的，即所謂「負責的黨務人員」、「技術的黨務人員」與「細胞」及各委員會內的有薪書記。在一九二六年際，此種人材全數共有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人。同時，每個黨員入黨的日子是要精密記載的，因在黨的歷史，就是在黨內站着某負責職位的資格。革命以前的黨員稱爲「老先鋒」。最初凡一九一七年以前入黨的黨員，在黨裏都得有高崇的位置。凡革命以前已得黨的中央委員者，在過去都有重選的權利，這在實際上已成常規。這種實效曾經公開的宣佈。近來領袖間起了爭論，革命以前的黨員，如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排出於中央委員會的問題發生了，在辯論會上，有一發言人宣稱黨不會需要且不應承認其隊伍中尚有「貴族」。

第二個民主的原則，是被選的一羣人對於其所選出的集團應作經常的與屢常的報告，這是黨機構的基礎。

任何特別集團的「活動分子」均視為事實，但是這種分子不是可以替代該總集團裏的大會的。

第三、充分自由的討論，不僅允許，而且有系統的加以組織，這是該黨所主張的。但是關於討論須有一種限制，即是一種特殊的政策，如已為中央委員會明確決定，必須接受，一切對此題目之繼續討論均被禁止。但在每個全國代表大會之前，所印發的大會議題，得在一切「細胞」內與各委員會內於大會的籌備時作自由的與有組織的討論。如此討論，必不致分裂成派別或集團。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規定與實行領導者之負責，致在初起時共產黨人中曾發生傲慢與居上凌下的危險。列寧時常責備「共產黨人居上凌下」的表現。晚近，關於這個問題則很少討論，不過在各個人間居上凌下的持續可於現在恆常的努力革除所稱為「命令式」的惡習見之。黨員的重登記，監察委員的檢查，以及黨對於黨員厲行紀律的措施其一部分的原因，即在防止領導權之僭越與其命令的方式。當其他各機關及團體發生討論時，與對共產黨員的作用加以說明時，這個關於共產黨領導的性質問題，必須每次加重提及。

概言之，在實施的領導權時，時常宣稱黨必不可失卻民衆的聯繫而變成官僚的機關。此種事情發展的可能性大約在去年更明白表示出來。因怕批評將認作爲反對此種領導，民衆乃丟開理論不敢毅然對於這種傾向予以批評。茲有幾個顯著的實例，足以表示對黨內上級的專橫完全失掉了制馭。在一個例子中，凡有二年半時間，黨的官僚主義，武斷鄉曲，破壞了蘇維埃法律，並破壞了黨的一切規程。後經中央委員會成立了特種委員會繼將地

方的黨部非法的事情予以清除。這不僅是必須予以經常打擊的「命令式」或「共產黨人傲慢」的即曲解領導權的一個例子；這是再壞的「流氓主義」(Hooliganism)，不過在黨的領導權掩飾之下行之耳。因之發生了訴苦的案件要將這些當時人處罪，即或這些人是黨員，這是表示黨裏的羣衆要試行黨內民主制。這些羣衆到不得已時則召集秘密會議，並邀當地政治警察蒞會，藉以免除政治陰謀的處分。這事是局部的，且在大體上是較小的事。但是如將此事件在本省或其他各省中心區作廣泛的探討，則對此領導權的曲解，黨紀律的破壞，及黨內民主制的失墮，並不歸咎於地方的特殊環境。要保持黨接近羣衆，地方的監察委員會接到命令，凡在工廠中與各機關中於假日與星期日須規定經常辦公的時間，以接受此種訴怨的事件，此種申訴可以口述不必用正式公文。

雖有反官僚主義，反「命令式」的領導方法，及反共產黨人的傲慢各種運動，而於領導權實施時護短的成分仍似乎不能避免的。護短的結果常成爲一個顯明的消極，且有時則成了積極的同盟不合作。同時有些分子則顧全紀律，用了間接的方法，以逃避共產黨人的護短罪。在選舉時或集會時之不出席主義(Absenteeism)即是消極的表現，因爲選舉的數數及集會次數的頻繁，到會人數的百分率在旁觀者表面上看來，似仍很高，但是從這機關或團體，是否適當運用來觀察，特別是從一切活動中他們領導權之實施來觀察，他們對於共產黨人領袖們頗致不滿。此種選舉，大會會議及集會——詳情再述於下幾章——當視爲常軌通路，由於這些常軌通路民衆裏活動的各種式樣得以發展，與在蘇維埃體制下之惟一合法的黨得以互爲作用。同時，共產黨人不可「隨波逐

流。」抱着「純粹住民」(mere inhabitant)的觀點是最嚴重地離開「列寧路線」之一。

自我批評是該黨在最初即已實行之一事。就自我批評到近來構成通行的口號的事實看來，足知此事尚未得有效的實施。因為對於黨的威信及黨員間必存同志關係的顧慮，自我批評致受到挫折。但是自我批評已通令認為絕對不可缺的了，假使有人反對此種新口號，則被稱為「塗了顏色的共產黨人」，即是失掉了黨的精神。凡足以強固而不削弱蘇維埃制度的批評，黨裏規定為建設的批評與有用的自我批評，任何人在此批評的立場裏應用該黨所享的合法特權，亦是可能的。因為自我批評始於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間的冬季成爲一種口號，須使其有真正廣大的，且具有組織模樣的發展，則要決定它的性質或它的真正效果爲何，爲時尚早呢。例如對於拒絕「一個純爲住民的申訴」已很小心地決定了。

黨的領導作用達到一切經濟生活的領域。各個黨組織必須對於經濟活動每一路線予以研究，指導及調查，執行指令的成績。故各黨部應負艱難徵收，大規模建設，或農業合作各種計劃的適當執行之責任，這是舉其幾件重大的任務而言。各黨組織是權力機關之一，應接受工廠委員會的報告，例如工廠的管理部有排斥工人的行爲時。黨所規定的經濟領導權的全義，是當經濟的危難發展時，在使領袖們親切關注。在每個事件中，所定的作業，均需要黨的指導；各種危難問題大部分是歸咎於領導權暫時的羸弱。例如黨員在黨內專從事於鬭爭，則不能實施其必需的領導。這不僅使「敵對」分子擡頭，即重要的經濟計劃亦遭着嚴重摧毀，馴至擾亂了整個的經濟生活。

共產黨人領導權的觀念對於一般經濟活動的關係之認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的一個重要的黨的會議上，布哈林解釋得很清楚，他說：「若比諸資本主義的國家，它的政客們雖然鬭爭，而托辣斯的大人先生們與政府的機關仍是繼續工作，至於我們，一個黨內的鬭爭，將使國家全部的經濟組織感受到很大「威脅。」」

黨員的特殊訓練與教育的設備，則有各種學校各大學各研究院及各學社的設立。「政治訓練班」這一類的特種黨校之首要目的是為候補黨員造成正式黨員的。其相似的學校之高級班也給黨員在領導方面與辦事方面以更進一步的實地訓練並給以較廣大的理論基礎。此種學校之目的又為保持活動的共產黨人與習常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各問題發生接觸，使其克盡公民義務，在指導上更生實效。更高級的研究院是為富有實際經驗的老黨員而設的，命名為共產主義高等學院或大學。為造就共產黨人為大學教授的，則有特殊的學院。此外還有工科學院之設置，以供給各企業的共產主義的指導者，及紅軍裏的指揮官，再有共產大學及青年訓練的共產主義大學。又有較非正式的名為馬克斯主義者列寧學社，而以灌輸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學說於共產黨人為特殊的目的。

在一九二六年幾處地方，竟有百分之八十之黨員受登記並在這些教育機關裏學習；至在國內其他較落後地方，僅僅百分之三十的本地黨員，受這些機關訓練，以增進其黨員資格。測驗「政治訓練班」裏的團體或個人是各監察委員會工作之一部。黨的政綱與規程及其定期代表大會之決議案，是這些學校裏研究的主要題目。至

於此種政治學校及其他主要為黨員而設的教育機關，將在下面的專門題目下作詳盡的敘述。黨員資格受限制之一種原因，是注重每一個黨員必須有理論的基礎及對於列寧主義根本原則有明確的了解。入黨後黨員須繼續研究。因其計劃，本為繼續訓練用的，所以能受適當訓練的新黨員尚屬有限。

共產黨有他自己的出版物；各種機關報及其他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由黨部刊行，其數量與重要實過於蘇維埃機關所刊行的，黨報及定期刊物是蘇維埃最良的出版物，並有最大的銷數，並在定期出版物的總題目下，時加研討。我們在此祇須指出：此種廣大的出版物有此成績，是因為黨員能一致有紀律，有訓練，及受集中的指導的結果。在黨報內黨裏的工作人員及黨員羣衆不特得到他的消息及新聞，即他們的普通訓令亦在此得到。尤其在革命初期常有這種事。現在黨的組織已進至金字塔形的結構，所有一切報告與訓令得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地互相交換；而必要的會議與大會又時時補足其文字所寫的報告與訓令之所不及。省委會所出的日報，尤其是中央委員會所出的日報與各種刊物，時予黨員每日工作的暗示。且黨報又劃出一部分，或開出一欄，名為「黨的生活」，將各監察委員會關於各地方組織的特性及活動，據調查所得的報告予以發表。在此欄中各黨員亦可發表其關於黨工作的感想與創議。

黨又印行許多小冊子，廣為播散。每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這一串小冊子之所由生，大概是由著名的領袖或以史太林為首的秘書處委員所寫的。最後，中央委員會的「鼓動宣傳部」又出版黨史及黨的建設之教科書。含

紀念性質的黨史亦在編纂中，由老黨員組成的出版部已經成立了，各檔案正在搜集之中。按法律規定所有一切機關均須在其行政工作中連帶搜集，統計與其他的材料歸入黨的檔案中，以防萬一之損壞與散失，並特別使黨史尤得有詳盡的材料，以爲訓練未來的黨員之用，黨史的教本與其在各種教育機關的教學大綱中所站的位置，當於下幾章再行討論。

列寧是黨的創造者，是黨的領袖，前已扼要言及，但是此處必須申言的，是列寧的人格及其著作影響於共產黨人的力量，以及藉此對於一切思想與活動的影響。自從列寧死後，發生了對於這個爲該黨矢言進行的運動之公認的領袖作真正的崇拜。該黨時名爲「列寧黨」，且其他各種團體，如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共產主義兒童團等，將列寧的名字也排入其正式的全銜之內。革命發生的都城改名列寧格勒。黨的理論是根據馬克斯主義，但是列寧主義漸漸替代了「馬克斯主義」一詞。「列寧主義」又來逐漸替代革命初期之「布爾塞維克主義」一詞。這並不是言過其實的；在不論任何題目上，要招一個重要的陳述，而沒有引證「列寧同志」說幾句話語的，實是難事。在大約一千字左右的短文中，差不多有十次引證列寧關於所討論的問題曾說過的與曾寫過的話。最近黨裏的爭論大部分都是關於列寧著作正確的解釋問題，這種著作已視爲黨內的箴言了。這種箴言時被引證到與引用到的。要將這一個人的意見與判斷如何影響及一切黨員與候補黨員的政策與判斷詳加說明，則本書未免過於繁雜了。在「政治訓練班」學校之一級裏的教學綱要中，叫教師注意於尋找對於討論過程中所發問

題的答案應在列寧著作中或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案中。列寧在世時，黨的決議案在事實上是由他起草的，自從他死後，黨裏沒有一個重要的決定，不從列寧關於這問題所發表的意見詳細審查的。

列寧的著作包括其許多演說詞有許多種版本發行。新的完全的版本正在印行中，這個版本當能完全搜集他所有的著作，其較小的版本，由他的論文及演說詞選集而成，足為各種教育機關之用。他的著作及公衆的演說的總集曾以各種特別標題編集，譬如黨的組織就是一例。工人與農民閱讀的定期刊物時常按期留一部分或一頁將列寧的學說扼要地載下。初級小學的課本編入他的生活之故事及其學說之要略。「列寧學院」是一座形似工廠的大房子，是對此領袖所有著作的搜集與研究的中心。論列寧的詩文散在各國文字上已大足可見了，該學院亦加以集成。大小不等和語言不同的版本之編印，是這學院之一種職務，該處將為統制這領袖學說的銓解之中樞。在為共產黨人作辯護的場合上，列寧就即刻取得從前馬克斯所有的地位。

共產黨人自始即承認領袖個人作用的重要；並以此使他們的宣傳工作更得實效。領袖們的畫片與革命的事迹，在肖像上與在招紙上，廣為應用。在藥舖上通常都可找到「公衆衛生人民委員」的肖像。領袖們的肖像與半身像廣闊的分佈已視為常例，而其中列寧的畫像自始尤為特出。自從列寧死後國中真是揚溢着他的肖像、鑲像、印像，或為素描的，或為着色的——以及人體的大銅像，與大小不一的半身雕像；雖然他的夫人克露斯卡爺會發表談話說列寧寧願在建設上努力不在對他的紀念，但是仍是無效。在每個機關裏列寧的面容對人俯視着，在

農舍裏都可以找到他低廉的印象與神像排在一塊。

在各機關裏，列寧的全身肖像與半身雕像是「列寧紀念處」的主要裝飾物。「列寧紀念處」的設備是崇奉列寧最普遍的現象。有幾個「列寧紀念處」含有歷史上的意味，用一種很精緻的方法設備。「列寧紀念處」能表示這個機關對於領袖在個人上與職務上的關係如何，有一個學校，列寧與其夫人曾在此度過一個短時間的假期，其夫人即是該校董事之一，以此該校學生就將他的私人有趣味的物件設置於「列寧紀念處」中。在一個工人俱樂部中，表示該俱樂部的工作性質的統計材料，同時亦能指出列寧對於此種特殊工作之重要性的觀察。又一個鄉村學校裏誰都見得到「列寧紀念處」是由該校學生得其教師之幫助所造成，其形式與在室內的位位置正好似教堂的神像所設置的情形。一切宗教上的徽號與儀式在政府的機關裏及學校裏均受禁止，所以在另一意義上說「列寧紀念處」就是以前的神像之代替物。拘留所與感化院中的「列寧紀念處」是由犯人設置的。在每一俱樂部中與鄉村讀書室中「列寧紀念處」是該團體裏政治活動的中心，故「列寧紀念處」的制度，利用之足以增進政治活動並是公民教育最普遍的方法之一。

現今「列寧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合成一處，此種「列寧博物館」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為中央的「列寧紀念處」。該館收集了領袖許多私人的所有物，如其衣服及黨員證、職工會會員證與蘇維埃的公民證等。在一玻璃箱內藏有一九一八年他被射擊的手鎗，已取出的子彈及醫生施手術後所附的報告亦陳列着。在另一

箱裏放着列寧於一九一七年的夏天化裝與隱藏時所穿的衣服。

列寧墓真是虔敬這領袖的中心區。一種暫時的簡單而稱心的建築設置於含有歷史性之莫斯科的紅場上克來林宮牆之下。在「列寧墓」的後面並在克來林宮牆之下，有一狹小的花園路是其他著名的領袖埋葬的地方。美國的共產黨人約翰利特（John Reed）已死於莫斯科，也葬在此處。在克來林宮之內，正當列寧墓之後面，是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在的地方，這是蘇維埃政府最高級的機關。一面紅旗在夜間照耀着探險燈，時常掛在圓穹屋頂的旗桿端上。在熱天晚上八點鐘時候，在寒天下午五點鐘時候，幾千人成行步入墓中，瞻謁列寧的遺骸。這行人兩兩並肩而入，降自一狹狹盤轉的階梯，到了一個凸出的平臺，在屋中心環行一匝，列寧的遺骸就是躺在其中，透過了非常潔淨的玻璃，誰都能俯視到舉世聞名異香薰裏的身體，至此已無憎惡的情感了。即是純粹的旅行者出來也深受感動。這個人的健堅的面貌，視之好似一個簡單的工人，其對於俄人的感動力似乎更大呢。在共產黨人看來，這是偉大的領袖，他的遺訓，他們正在遵循與實踐中。

莫斯科一切革命慶祝典禮均會集於「列寧墓」的週圍，這墓成爲演講者之演講臺，通過了揚聲器與播音器，對於這領袖誓言的申說遠達了無線電所能到的地方。故「列寧墓」是一政治的中心，亦是謁陵者之中心聖地。後來，永久的建築當來替代現在暫時的陵墓。

「列寧墓」是所謂「崇拜列寧」之最顯著的象徵。許多共產黨人無疑地不喜且反對這種對個人的態度。

的發展。共產黨人憤恨旁觀者與學生們常用「宗教」一字來描寫這種運動。革命的真實領袖實是惟實主義者。但是他們時用革命的熱忱來煽動與興奮活動分子作較大的活動。以此，這些活動分子得藉黨的作用以號召一切機關及團體。這種活動分子認列寧是其先導者，——研究之，遵從之，要把他的遺訓獲得忠實地實行。黨的實際領導權在已死領袖人格之下受到掩護，在此意義上，發生對領袖一種虔敬，即以此種虔敬得以將在組織中的後進分子統一起來，同化起來。爲了這些認識不甚清楚的羣衆計，在政治宣傳上利用列寧的人格實足以將他們推前一步。因爲他們尙未信服辯證唯物論的原則，尙未曾表明具有入黨之應有的革命熱忱，則列寧虔敬是較爲直截了當的辦法。對於青年與兒童，列寧是個老同志，總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暗示。在共產黨人的大教育家勃朗斯基（Blansky）所編的初級讀本中，述列寧之死，凡有二種選品，第一種是敘述一個小孩走到車站上守候運載列寧遺骸到莫斯科去的火車的故事。這個小孩子要求一個工人當車經過時將他抱起，使他能從車窗中看到，並得向他說一聲再見。第二種是一首短詩，描寫在紅場上的葬儀。當喪殯隊悽然前進的時候，在北方寒冬的一個下午，天色陰沈，慘雲密布，但是恰當遺骸到達克來林皇宮時，紅日忽開，皎麗的光線直透層雲。

共產黨的組織與活動之關於蘇聯與蘇聯之內的情形，此地已予論述了。該黨是共產國際之最大的與最重要的部分，他在蘇聯之外也有其活動的場所；且其黨員時被引到注意於他們的國際革命家的義務與活動。因爲黨是「人們的集合體」，這些人們決意爲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而戰，奮鬥到底，不顧一切，而且絕無猶豫逡巡。

共產黨對於國際事情的注意與活動，將於討論蘇維埃體制中之其他機關及其他團體的國際性質之一章中再行論述。

第二章 共產青年團(康沙木爾)

在蘇聯裏，主要的政治組織是聯邦列寧主義共產主義者青年團（All-union Leninist Communist Union of Youth），團員總數超過二百萬人，約分爲二萬三千個細胞。這個組織的名稱通常省寫爲「康沙木爾」（Komsomol）——共產青年團，茲採用此種簡名。共產青年團概爲共產黨作訓練的場所，在名義上雖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但是受着共產黨的指導與實際的支配。它自謂是共產黨的首要後備軍，或爲「少年前衛」以備接替黨的「老前衛」。教育的與一般文化的工作在共產青年團的活動上固甚着重，然該組織亦有政治上的目的。其團員不僅努力於求政治的知識與政治覺悟的增進，而亦應積極參加公衆的生活。青年人在十四歲的時候得許加入，並到二十三歲止得留居於團中成爲活動的團員。所以許多團員都已爲公民，且大多數均已從事於生產。其有參政權及已爲獲取工資之較老團員，與共產黨員一般，均爲自覺負責的公民。共產青年團較年輕的團員，即在十八歲以下的男童與女童，亦自覺地作未來公民的準備了。

在青年中，此種政治運動的提創與發展，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共產黨人已在其政綱中載明。列寧從他握到黨的領導權之起首幾年，即以加重說明宣傳青年工人與農民的重要。他在一九〇三年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

提出該黨在青年中工作的決議案。在舊統治裏所有經濟與政治的特點，實為構成此種特別注意該國青年的提示。俄國未成年者在工業界廣泛的雇用，使男童女童與年大的男工女工得獲密切的接觸。俄國的中學生與較高級教育機關的大學生共同參加了政治的組織與活動。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大戰期間，未成年的工人廣泛地雇用於工廠裏及礦業裏，代替了成年人的位置；據一般估計，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前夕，凡有五萬的兒童與二十四萬三千未成年者發現於俄國產業工人階級中。

因為與實際生活這樣的接觸，俄國青年的大部分便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第一次革命而發生了羣衆政治的覺醒與活動。在各種組織的形成之幾個月中，青年們尤其大城市的工人階級，集成為特種的集團。此種運動的支配權成為布爾塞維克與其他各社會主義黨激爭的問題。非社會主義者，如各自由黨，在其組織的努力上亦不忽視青年分子在革命時期中之特殊重要。青年學生與青年工人在一九一七年的幾次革命參加示威運動與遊行中均甚踴躍。這時期赤衛隊(Red Guard)的組織，亦足以吸引青年羣衆；以此布爾塞維克黨人得能籠絡許多的青年組織，在他們一邊。在十月奪取政權以後，如初發矖的青年運動之大部分羣衆羣向赤衛隊，以此得直接參加革命的鬪爭。

不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各地方的青年組織終於互相連絡。由莫斯科與彼得格勒各團體發起，召集一個代表大會，出席各代表係代表約有二萬二千有組織的青年。在這個大會中，俄羅斯的共產青年團正式成立。此時內戰

正入劇烈的時期，參加革命鬭爭的路徑與方法是該會討論的要點。次年，有組織的青年分子在新成立的紅軍裏面佔了很多數目。偵探工作，在政治上與在軍事上，每有青年民衆擔當，且收得成效。一九二六年夏季有一通行的影片名爲小紅魔鬼，描寫一個俄國小孩與其姊妹的冒險事情，後來加入一小黑人，他們三人附入蒲仲尼（Benny）的紅色騎兵隊盡了有價值的服役如間諜偵探等。

一九一九年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各代表係代表九萬六千的團員。軍事上的鬭爭與青年民衆在這鬭爭上的作用仍是時的論題。該會議決全體團員百分之三十由其自願動員到紅軍裏去。間有幾處地方的組織竟提高了此種比數而動員到百分之八十者。同時，新團員的劇進運動亦已開始，隔年所有登記者增加到了四倍以上。一九二〇年十月的第三次大會就代表到四十萬左右的團員。一九二〇年農民中的青年分子服役於紅軍中的，也參加此種運動，但是各處地方支部的領導權仍以工人階級的青年爲核心。

一九二〇年的代表大會，代表新時代的開始，在此共產青年團現出稍具不同的特性。在軍事與政治的陣線上已獲得了勝利，邇後的注意則轉移於經濟的復興與文化的推進之各問題上。列寧曾親臨這次大會，他對各代表的演說詞已成爲共產青年團方案之一部分。領袖給青年們的一個要語是：「學習，學習，保持繼續不斷的學習。」共產青年團的團員亦可稱爲青年共產黨員，必須學習以成爲共產主義者，他們必須學習，但是亦必須參加工人階級實際的鬭爭。列寧給青年們第二個的教語是提及參加生產的實際工作的需要。該會議決教育的方案，補之

以公民訓練的申述。在上一大會上，對於兒童特別訓練的問題亦曾議及。對兒童作共產主義的訓練是該會所探討的另一個議題。因舉出並分派共產青年團團員在兒童中擔任工作。訓練班與自修課程的設立，就是為這些團員準備擔任此種工作。因此曾認為此種運動之一個弱點之團員的「政治文盲」(political illiteracy)當能減少。這都是學習成與訓練成共產主義者之一部分工作。兒童運動發生較晚，即所謂「兒童先鋒」但在革命初期，共產黨領袖在諸項工作紛忙之中，尚抽出時間，認為不僅要在經濟危難之中關護兒童，且要給兒童們以共產主義的訓練。這些青年共產黨人被選出在兒童運動中擔任了重要與負責的工作。

一九二〇年年尾共產青年團，所採取政策的新路線之最具體成效是建設附於工廠的學校，使青年工人獲得政治的與技術的訓練。一九二一年一月「工廠學校」(factory school)的數目有二百四十九個，註冊的學生約有三萬人。這些學校就實行列寧所提議的兩種活動，即學習與參加生產之同時並進。這些學校正切中過了入學年齡不能入學校的一班青年工人的需要。青年工人亦正需要更切實用的教育。最後，與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所俱來之工業界的情形，使工人階級的青年之地位受到逆勢的影響。依據生產給資之施行，雇用人員的減少與國家合理化制度的廢除，使初被開除的青年工人實予以困難的物質的遭遇。同時，以全工資付給十八歲以下的童工從四時至六時的短日工作之辦法又不再繼續施行。所以技術的訓練須予力行，以便幫助年輕工人在工業界中獲得穩固的位置。再則，革命的「戰線」現是在經濟的領域，在生產的行程上技術的改進已成爲新

時期的各種任務之一種。

新經濟政策又引出各種制度，如咖啡館與別種娛樂所等，他方面又須發展學校與俱樂部以免除市塵影響及青年。

雖然有多種方法之採用以圖挽救青年由新經濟政策所造的情況，但是尙不能防止共產青年團團員人數顯著的低落。後經過一九二二年十月第五次代表大會，此種危機纔行過去；該會議決團員年限從十八歲擴張到二十三歲，此種運動就得到迅速與重要的發展，在一九二二年的大會裏，特別注意對國內青年作共產主義訓練的方案之詳細辦法。在俱樂部裏，與在戲院及電影場上的各種健全的娛樂方式，均包括入共產主義訓練方案以內。該會再討論到在後起青年中關於社會行爲的標準之建立與增進。在青年人中，關於酗酒與縱慾的情形應予以有系統的攻擊，青年人中此種情況由來已久，又有許多年紀較大的發言人主張應有階級的自尊心與共產青年團的操守規律。這個時候，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共產主義運動者，即所謂「共產兒童先鋒」(pioneers of communism)已開始形成各小集團。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關係更嚴格予以規定。最後，共產青年團在這時候承擔紅色艦隊的「扶護」與執役。此種在船員中的特殊工作成爲共產青年團各種重要公民活動之一種。

一九二三年沒有會議；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二四年召集，以前的團員資格重行確定，總數達到六十二萬三千三百人，內中五十二萬人是正式團員，十萬三千三百人係候補團員。在所有正式團員中，四十四萬二千人是

男青年，七萬八千人係女郎及少婦。因爲一般的政策注重到農村，青年農民參加這個運動的亦大形增多。次年這種迅速的增長益加顯著。一九二六年全體登記共有一百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二人，內有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百二十五人是正式團員；其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人是男孩及青年男子，二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六人是女郎及少婦。在階級上，此種全體團員的分配如下：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五·八；農業勞動者佔百分之七·八；農民佔百分之四十五·一；其他佔百分之十一·三。故知農民分子佔大多數。這自然因爲農民是較大的集團故有如此成數。至就一單純階級而言，最大比數仍屬工人階級，他是該項運動的創始者，並仍保持該項運動領導權。在一九二七年團員總數愈見繼續增長，達二百二十五萬人；邇後雖有退落，但在一九二八年人數尙超過二百萬人。蘇聯人口的統計在十四歲與二十三歲之間，一九二六年的數目如下：工人七十萬人；農民二千五百萬人；其他三百五十萬人。此種運動數量上的造詣可以想見了。

在第一次大會時，此種青年組織關於適當名稱的採用，曾經議及，引用「共產主義者」一字是否妥當，當時成了問題。有的主張以此字會嚇跑非黨員分子，尤其在農民方面；但是決議指出稱呼此種組織以「共產主義者」更爲確切，因爲該組織是密接於黨的。此項運動迅速的滋長就可以見出該組織具共產主義者的特性並不會嚇跑青年農民。後來就有一種提議：須組成一個純粹非黨籍的、較大的青年羣衆的組織，以輔助共產青年團，其中一個意見就是職工會中之青年另予組織。但主張共產青年團應有自己主張與生長的充分權力，且具備容易入團

的條件。在許多工業中心區，共產青年團關於領導方面在事實上已成爲羣衆的組織，吸收當地青年工人，人數之多竟到百分之九十，所以決定共產青年團在蘇維埃青年運動中應保持其專斷權。

進入共產青年團的條件比較容易。青年工人及青年農民不一定需要政治的訓練與經驗；這二階級中的青年要求加入亦不需要介紹。僅對於來自中農的青年，則多少予以注意，因爲中農不容易在「古拉克」或富農方面分別出來。非農民及非工人出身的青年要求加入，須有在團三年以上的團員二人及在黨二年以上的黨員一人的介紹。這些青年就是僱用於蘇維埃的機關裏或此類人的兒童，即所謂第三個主要範疇的分子是。由「資產階級」父母撫養的青年頗難加入。聽說有一個村莊的店主的兒子要求入團，曾被毅然拒絕。但其政策則對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之加入須經過介紹手續與候補時期。工人與農民出身的青年要求加入，則沒有候補時期。至於其他一切分子要求加入者，可列席各種集會及參加該團的活動，惟沒有選舉權，並被監視且分配工作在公民活動上與普遍行爲上，這樣須經過六個月的時期。

階級原則的實施在共產青年團裏不比在共產黨裏那樣的嚴格。同時，工人分子數量上的優勢尙未達到。然「指導的核心」(Directing Kernel) 必須是工人階級的青年。此種工人領導權的獲得，一部分由於選到高級委員會充當委員與充當書記職務須有一定的資格。假使他是工人的話，在團裏與在黨裏只要一年就可以充當區委員會的書記；農民則必須二年在團與一年在黨的資格；至於勞動的智識分子的青年要得到書記位置，則

在團須三年在黨須二年纔爲合格。選到省委員會去的資格條件更高，但亦依照同樣的比例。黨齡的限制是使黨對於團的領導權怎樣發生實效之一種方法。黨員兼團員的用意，亦是顯然了。

團員可被與時被開除。從團裏開除出去比諸於黨更爲屢見，但其重要性則有不同。從團裏自動退出是很通常的事。我們往後可以看到退出幾個主要的理由。被開除的原因很多是同於黨的。不付會費，不出席會議，不參加團的活動，都是必然地弄到團員的革掉。破壞團的政綱、章程與紀律的事件，是開除的主要理由。團裏的紀律比諸用之於黨內的不甚嚴格。酣醉、胡鬧與「行爲失了團員的人格」時致開除。

共產青年一如共產黨人，務須有相當時間作公民的活動，但是此種義務的實施不比共產黨人一樣的嚴格。雖然，共產青年必須求學於特種學校與「政治學社」(Political Circle)使成爲具有政治常識者。此是一個例子。假使團員在團三年後尙不能得到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之知識，則被開除；而最低限度的公民活動亦須嚴格遵行。在二十三歲時，該團員必然地成爲「不活動的團員」。假使在二十三歲時，一個團員經過共產青年團的訓練與活動尙不能進入黨裏，他必致失掉團員資格。

共產青年團的組織與黨一樣橫過一切民族的界線，是「全聯邦」單一的組織。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有一個「烏克蘭青年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分離的組織，到這年纔併入較大的俄羅斯的組織單位中，而將它的名稱從「俄羅斯」改爲「全聯邦」。至共產青年團的印刷品則以蘇聯內多種的文字印行以便給各種民族的青年

閱讀。雖然宣傳上文字頗注重各地方的情形或風俗習慣，尤其在較落後的民族，但是在團的章程方面，各民族的集團都是同樣的。民族主義的傾向則力予攻擊，尤其對於俄羅斯一部分的團員，這部分人時常受到訓令，應以圓通的態度對待各個在舊時期時受到俄羅斯化政策的壓迫與限制之民族集團的青年。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間的冬季，共產青年團工作中應特別注意的任務列成一表，而將攻擊「反閩族」傾向，亦包括在內，此種傾向其時正明白地顯現出來。

在共產青年團內的女孩與少婦之比數比較地低小，此種現象在鄉區尤形顯著，現在費了很大的努力想增加此種比數。此點在後來討論增進婦女公民活動力的方法時再行論述。

共產青年團團員繳費的數目比較低微，應繳之費且係個人性質的。繳費的等級與所收入的比例較諸共產黨員更不易定。許多青年都不能自給或在經濟上不能自立。基本的比率是依照每月工費付百分之二分一，且很多得以免費。若團員同時是黨員則僅付黨費即足。

共產青年團在機構上類似於共產黨。在每個工廠裏或蘇維埃機關裏時常有一個團細胞，在每一鄉區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細胞。團細胞的數目是多於二倍黨細胞的數目，此種超過的情形在農村裏與在教育機關裏尤形顯著。在城裏，一個團員是隸屬於他或她所工作與學習的機關之細胞。各地方的委員會依照蘇聯的行政區以級遞升，正與黨的委員會一般，且中央委員會亦並列存立於莫斯科。其章程在主要方面亦與黨章相同。組織的原

則是統一性，民主集權制，紀律。細胞辦事處與一切委員會均成自選舉，凡下層的組織單位直接隸屬正在其上之一個。每年全聯邦代表大會按期召集，且先之以代表會議。最後，與共產黨具同一情形，團員在非黨員羣衆的機關裏或團體裏成一個「黨團」(fraction)在該機關與該團體所轄領域裏對當地團的委員會負責。

共產青年團有一種徽章；對於青年人得稍許採用象徵主義。這個簡單的徽章佩帶之以爲稍示識別。在另一方面，沒有入團的儀式，新團員的加入，在細胞常會中通過之，沒有特殊的手續與表示。

共產青年團與共產黨的聯系在其彼此幾種關聯上可以見之。此種聯系的組成是間接的表現出來的。有許多團員同時又爲黨員，在二十歲以下的一切黨員必須爲團員，且沒有一人在二十歲以下可以成爲黨員，除非他已是一個團員。以此，這些分子於二個組織中，一邊是黨員，一邊又是團員，故能將黨的強有力的影響及諸於團而得奏實效。以同一成員參加二個組織的會議，並在一個組織裏完成其一部分的公民活動的義務，即對另一方面完成了工作。此種連鎖黨員主要的目的是在支配團的領導權。這個黨的核心之在團裏，原來人數的比例是超過百分之十，但是因團的總人數加速的增長，這個百分比降到約近百分之八。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有十五萬以上的黨員同時是團員，其在團中的活動可想而知。

在同一的機關與企業裏，若黨與團二者都有細胞，則二者更得密切的合作，甚至時有同一辦事處的。共產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是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同在一所的房子裏。最後，爲表示團對於黨的更正式關係起見，在黨

的全體大會上團的工作總是要報告與討論，且通過「指導的」決議案。

此種對於統治的黨密切的聯系，實予共產青年以重要的意義。共產青年的組織時被稱為蘇維埃制度柱石之一。黨的威權與聲望與它至有關係；黨的光榮亦即是團的光榮。當黨的政策問題公開討論的時候，團的細胞對於這些問題可以討論及發表意見。共產青年團集會時或全體大會時，黨的領袖時常蒞會發表黨的政策。因為團主要是黨的訓練學校。但不希望共產青年團與黨的組織並列，同等行動，當團中發現有自主動作的傾向時，雖然其出發點在其時無關要旨，但是過於專斷的行動，時惹起黨的權力機關的譴責。在另一方面許多地方的共產青年團的團體曾經驗到黨的過分支配，則會喪失其一切創制權，並限制其活動，而僅執行黨所分配的少量工作而已。至在黨員人數很少及黨員負擔過多蘇維埃職務與黨工作的鄉村裏，則黨的領導權較少有實效，共產青年團有較大的獨立性與真正的權力。

共產青年團有其自己的報紙，其組織與黨的報紙很相似，不過規模較小耳。中央的機關報由團的中央委員會與莫斯科的委員會共同刊行，名為共產青年團真理報。在版樣上，它有些像黨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是一種與蘇維埃普通報紙同大小的日報。它與黨的真理報一樣，登載團所採的政策及其運動上的發展情形，使團員時時得到此等消息；同時它又是一種普通的報紙，很注意國外消息。關於重要的與投稿的各種評論，大都似為老資格的團員所撰擬，因此等文字與其他報紙的同類文章相較，在內容上稍無遜色。若就其為青年報紙的事實說

來，則其對於目前政治的與經濟的各項問題的探討所處進攻的態度洵足驚人。共產青年團真理報，在公共事務上負有很真實的責任。在共產青年團報紙中，亦可以找到如在一切蘇維埃與黨的機關報一樣的關於理論上與主義的許多論文。

其他通俗的定期刊物，亦由共產青年團中央機關報社正式刊行。各地方之省委員會則沒有其自己的日報，但是用該地方的黨報的篇幅另開一欄。有插畫的週報與月報，有些是技術的，有些是較普通的，使共產青年團的出版規模更爲宏大。此外，共產青年團的出版部，即所稱「少年前衛」更出了多種小冊子與書籍以便青年人閱讀；在性質上主要是屬政治的，但是亦有屬於專門技術的。共產青年團員「兒童先鋒運動」的出版的責任，團委員會編輯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這是爲此種兒童運動而印行的。

「通訊員」(correspondents)的制度，共產青年團的編輯者推行起來的。凡各條新聞消息或理論文章的投入，慫恿團員去做，並認此爲公民活動之一。有許多工人農民或紅軍各報紙的通信員都是團員。用同一的辦法，一個機關裏或一企業裏的團細胞亦時常共編「壁報」，此種壁報，我們可以看到是一種常用的溫和而有效果的公民活動方法之一。所謂「藍衫團」(Blue Blouses)的「活報」(Living Newspaper)運動實予青年分子以特殊的力量，並給以別種政治活動以道路。此種「通訊員」「壁報」與「活報」的組織下章將再予討論。

一切團員之應從事於某種公共的或公民的活動的義務，已在敘述蘇維埃青年運動的起源與共產青年團的機構與組織時略述其大要。至於共產青年團在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學校及其他機關與團體中的作用，則在討論此種題目中將再予詳述。今將此種團員活動的範圍述其概要，以示這類公民一般的情狀，這類公民與共產黨人在任何集團與社會中同是傑出的政治勢力。因對於共產青年團所期望的是要它時常成爲一個武裝的政治組織。

在團裏，一如在黨裏的情形，亦有「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的區別。此種判別在該組織最近的迅速發展上視爲必要，不過僅是暫時的。在理論上，一切團員都須成爲「活動者」，且共產青年團具各種不同活動的組織，就是要引導各個單獨團員，使其作有效參加幾件公民的工作裏面。在團的歷史之初期，即在革命時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團員的任務是具體的。這些任務被稱爲「突擊」(shock)的任務，此種熱忱當時易爲煽動所引起，在那時有武裝的敵人須予之戰，有祕密機關的陰謀須予探出，有暴徒強盜須予截擊，又有簡單經濟的短工須於休息日以集團去做，如清潔街道與馬路等。在革命戰爭時期結束的時候，此種工作成爲較無趣味，有系統的計劃與宣傳乃用以保住青年的熱忱之存留。年紀較大的分子已予以吸收，自在團年限從十八歲擴張到二十三歲後，而要將從十四歲到二十三歲年限依次不等的團員形成有組織的活動實爲難事。如此廣泛的組織產生了權宜的工作方式。同時共產黨人對此運動的指導又傾入限制個人與集團的創造力；共產黨在團裏的

領導者，傾向於專斷與抑制的方式，以保障一切活動能嚴格遵循共產主義的路線。

團員與候補團員先須注意其政治意識的啓發，且此種政治的研究亦視之爲公民活動。有「政治訓練班」一類的特種共產青年團學校，此類學校在宗旨上與課程上很似黨的政治訓練學校，二者後來常合併討論。在非黨員的民衆機關裏，則如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等，在這些機關中之形形色色的「學社」中，亦時有政治學社。對於此種特殊活動的創始，參加與指導，是團員的義務；此即是共產青年表示他或她所負的公民或未來公民的責任，此種責任是跟團員資格而來的。團參加黨的政策之討論，上已言及，由於此種討論，青年即在有選舉權年齡以前，亦已將他引導到實際政治生活的路上了。一切團員均準備自己變成爲未來的黨員，每個團員大概都有這種志願吧。

青年時常參加一般的革命慶祝會與紀念會，或則自己來組織。共產青年團是負籌備與處理工廠青年工人、青年公務員、青年農民或教育機關的學生與學童之各大集團的責任。一九二四年反宗教運動是由共產青年團發動、組織與指導的。際此機會，共產青年集團在準備小旗與標語布的工作裏表示出最大活動力與最活躍的想象力。雖此種活動含有娛樂與玩耍的成分，亦足以消耗工作與需費。革命慶祝典禮如此之多，一切又均儘量的與精密的佈置，此種預備與參預已成爲頗大的負擔了。

紅色艦隊的扶護制會由共產青年團擔任。此種扶護制度，即是一個較有政治意識的與有組織的集團，對於

以生活條件所限制而較少政治意識與組織的集團的扶護，在蘇維埃公民教育制度裏面用得很廣遍。在海軍裏長期的服役及在該處生活的條件需要彼等特殊努力，使紅色艦隊中的青年得接觸公民生活與自覺其在新制度中的地位。此種特殊關心於紅色艦隊的船員之物質幸福與文化發展之職責，因之整個負在共產青年團身上。印刷品的分配，組織政治研究會與討論會的幫助，旅行各集團的互相拜訪，以及船員給假的酬酢都是「扶護」制所應有之較通常的方式。

其具此種相似性質的，則為共產青年團在鞏固工人與農民的關係上所起的作用。此種工作太具一般性，難以包括所謂「扶護」制度之範圍以內。自從一九二一年以來，各種政績之一，即是「工人與農民的黏合。」在這種欲在工人領導之下保障工農聯合的努力中，主要成分就是這二種分子的共產青年團當然是極便利的工具。比諸「扶護」制更具特性的，則為共產青年團在十歲與十六歲兒童中所負的兒童先鋒運動的實際領導權。此種在兒童間之共產主義的運動，下一章將予以討論，在下一章裏將把共產青年團在其自己的「後備軍」(Reserve force)中之領導與訓練的作用予以說明。分派到兒童先鋒隊裏去做領導者亦是許多團員之必需的公民活動。這也是共產青年團之最實際的最具體的任務之一種。

在此後將加枚舉與討論的各種自動的組織中，共產青年團團員必須加入而成為該組織的成員，積極參加其定期的徵求會員工作，並散佈其宣傳品，此種自動組織概屬政治性質，如國際革命者「互助會」「中國自立

會」(Hands of China)或「航空化學協會」等，此其例也。會員有納費之義務，例如「國際革命者互助會」之主要目的即是籌款。共產青年團團員加入此種團體常認為是一種義務，因為一個集團裏的活動公民，必定不好意思推卻捐款的。雖然應出之捐款時為少數，但是集合起來，為數亦屬可觀。每一個會員至高限度的負擔亦要把它確定的必要。

許多共產青年團的團員，是中學大學或其他教育機關的學童或學生。在這些地方他們必須為模範學生，及負集團中的領導權。因為在兒童運動中的工作關係，共產青年甚至擴大其領導權，到低年級的小學生，在工廠學校中及在新近為青年農民所創設的學校中，所有學生大部分都是共產青年團團員。至在特種蘇維埃黨校裏面，團員得與黨員同享取錄。在一切這些教育機關裏，團員特種領導權的性質，將在討論蘇維埃學校制度的各章中再行討論。

一九二六年，在紅軍裏面，共有十萬個團體。許多人後來必須服軍役。所以兒童與青年人的一種義務是準備為蘇維埃軍事的服役。因此各種能力必予以保存而不可消失，體育的與初步軍事的訓練，亦加以有系統的實施。運動團體與運動場近幾年來在蘇聯中有值人注意的發展，在這個場合上，大半都由於共產青年團的團體努力的結果，共產青年團的指導，以創造一個所謂蘇維埃式的體育為目的，此種體育在力求競技與運動成為有目的之行為。在體育界創立相當的風氣，即是共產青年團的職責之一種。直待最近，正式軍事訓練尚未包括在共產青

年團活動裏面。在一九二六年蘇聯國際的關係發生傾軋之時，使蘇維埃軍事準備計劃日進具體與積極。操練，射擊的實習與救護的訓練，在團員的活動上均十分着重。女郎們與少婦們或學習看護或參加操練，得自由選擇。在保障反抗資本主義敵人的運動與示威中，共產青年團本其傳習主張與宗旨必然地是站在前面的。

反宗教宣傳是政治活動形態之一，這種活動，共產青年團的團員，必須對此有所表示。共產青年團裏的團員，一如共產黨裏的黨員應含有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於任何宗教儀式參加的禁止，團員不如黨員限得那樣的嚴格；但是共產青年應為反抗宗教的觀念與信仰而戰，尤其在於他自己的家庭裏面。從先共產青年在反宗教運動上所用的攻擊方法，現為領袖們所禁止了。但是在共產青年團的印刷品與公眾活動上，則時常力主應「推廣科學」以便取消「宗教的成見」。

共產青年團團員欲在各集團中成爲領袖，則必須在其私人的日常生活中，遵守普通一定的規律。當革命時期，會有許多報告，說一般青年的道德日趨敗壞。革命運動的領袖們曾用種種力量來挽救此種頹風，此種頹風不但屬於個人，甚至於整個地方的各集團亦犯着。團員在理論上是不得飲酒、吃煙及性的放佚的，因為這些會空耗青年的精力，此種精力在未來新制度的建設者之責任上在所必需的。共產青年團發出一種小冊子，根據這個革命的實利的觀點，激烈地反對飲酒、吸煙及性的放佚。

共產青年團團員宣稱他們做學童或學生，做工人或做職工會的會員及在其他非黨的羣衆組織裏，均不享

受任何特殊的待遇，並宣稱共產青年如同共產黨員，在理論上只有學習與工作的集團中負有領導者特殊的責任。但是居上凌下與命令式的領導方法在團內甚為顯著。因之領袖們如在黨裏一般，時常發表文字與演說攻擊這種傾向。胡鬧主義在團員間亦甚盛行，在俱樂部裏選舉會裏及在街頭上都可見到。此種胡鬧主義或「流氓行爲」有時或僅是團員之一種，不正確的而尚屬無害的活動方式。但團員參加頑惡青年的集團，來進攻與摧殘女性的事情，使團員間起了一種新運動，攻擊普通所稱的「流氓主義」。

在革命的初期，共產青年團與家庭發生很厲害的衝突。他們在公民事務的活動上之勇往直前，致青年人在家裏紐帶的束縛之下脫離出來。又當革命的初期，家庭制度正被許多傑出的領袖們所攻擊，至少在學理方面如此。在這時期中，每個父母對於共產青年團的態度是消極的，尤其在農家庭裏面，並有許多家庭的慘劇是由與共產青年團裏面的團員起了衝突發生出來。可是現在，父母與青年二方面的態度，在此運動較有建設性影響之下漸成融洽，團員現在爲其領袖勸導儘可能地來避免家庭的危亡；但若一個團員覺到欲保存於家庭氣氛和氣之中已不可能，則在此種環境之下，應勸這青年離開家庭。曾有人所共知的幾個事例，團員遇到父母或家屬有「反革命的」行動時，認爲報告當局是一種應爲之事。雖然他們的領袖沒有直接褒獎這些報告者，而反對者即根據這幾個事例來作概括的結論。階級鬭爭的原則，是共產青年訓練的一種基礎，這原則纔能在理論上解答此種事例呢。

公民活動的責任雖已確定，但是引導全體團員作實際工作的理想尚未實現。關於全體黨員在這方面的統計尙未見到，而在一特殊集團中的情況到時常可以得到報告。在一個工廠中共有八百十四個團員，僅有二百二十四人參加實際工作。這二百二十四人要負擔全部三百四十五件的單獨職務——內中有一百三十九人每人僅有一件職務，五十人每個負擔兩種工作，二十七人每人有三種任務，其餘五人則每人分得四種不同的實際工作。在另一工廠中，看到八個團員每人擔任六件任務。

一般團員與特別團員負擔事務的繁劇曾爲人所承認。列席各種集會的無聊，或參加示威運動未能收得良果，均足標出興味的低減。團員於是紛紛自動辭職，有些以團員負責太重爲理由，有些是以各種活動不能予他興味爲理由。此種趨勢一部分是由於團員人數的增加太快或組織的容量擴張得太速，但是政策上的錯誤亦是此種傾向的明證。公民活動的負擔於是減少了。較少政治意味的新活動路徑於是產生。「政治訓練」如青年已覺過飽了，不必強予以講解；而在一般文化發展的興味上聽其自然表現。雖然共產黨領袖主張政治運動與文化啓發二者應錯綜而行，但是現在團員在其興味與活動上，得有較自由的選擇。共產黨人自己亦說，近幾年來許多共產青年團的集會專事「政治上的喋喋不休」，以致妨礙青年每天生活很關切要的實際問題的討論。如火如荼的集會與盛大的示威運動，不再如以前幾年能滿足青年的要求。後起青年明白表示出來的需要是教育與有用的實際的訓練。形成胡鬧主義的趨勢，就是表示出共產青年團不能滿足青年的需要，雖然該團有許多活動的範

團來指導團員，實是無補於事的。但是此種運動的領袖們仍堅持說這些劣點是組織發展的徵象不是衰落的徵象，並修正方案與辦法以適合其現狀。

至於青年人對於社會與政治諸問題稍有漠視則不能予以允許的，祇是對「政治上的喋喋不休，」青年得作反抗而無錯誤，蓋在團的工作中，自來過於僅作政治煽動的事是在言論並予以承認的。政治的工作是應予繼續的，但必須密切聯繫於增進青年的經濟條件，置教育工作於更有組織的基礎上，與提高革命的後進青年文化的水準等切實的任務。再不會有人試其匯集青年多方面的興味於「政治訓練」的一端。在俱樂部與學校裏，在學社的組織裏，得允許少年人發洩其非政治活動的興趣而成立自然科學學社、手琴彈奏社等等。此種學社不是由上級規定，或受限制於固定的名表。實際的活動應受鼓勵，而「活動分子」一詞，不再只適用於坐在辦公室裏寫傳單發指令的團員。茲直接從會議公報中引下一段文字：「如共產青年團轉變其工作，而走上鼓勵青年創造力的自動路線越快，則為新生活及清除酗酒習慣與胡鬧主義而奮鬥之成就越多。」

一九二八年共產青年團全體大會時，不健全的情形存留於青年運動中仍覺很多。在新團員增加的比率上有顯著的減退，並有許多團員自動退出。這類事實會指為因該國青年反政治態度有發展的傾向。於是發出各種測驗題，以期共產青年對於該團體的活動性質能自表其意見。各答案中有一個表示這青年對於共產青年團僅為政治的集會，而他的興趣則在研究數學。由共產黨人看來在他們的工作方法中，有一個明顯的失敗，就是在青

年中發生了宗教的興味與信仰。因為在這次大會上，發現共產青年團此種情形，有幾個發言人鄭重地指出這個普遍的事實：許多共產青年團的新團員，不會親身經驗到「沙皇資本主義的」(Tsarist-Capitalistic)統治，又不曾經過十月革命的烈火與內戰，這是誰都看到的。因此他們不能得到革命的鬪爭與新時代建設工作確當的透視。青年們，甚至於共產青年團團員，僅僅看着「向社會主義路上」過渡時期的矛盾與缺點，因此不能把握住恰當的布爾塞維克態度。他們又解釋說，反動的勢力正極力想籠絡青年的思想。

布哈林在這大會上曾有中肯的演說，他亦重視上面的事實，即以此種事實為根據，主張有着重政治教育之絕對需要。他認為理論的政治的研討，應當與文化及經濟領域的實際工作同一重視，並認為整個的革命程序，必須時常放在青年面前以為青年訓練的要素。他說：假使每天工作對於最後的目標沒有一個有系統的聯繫，則青年對所投效的建設程序不會得到有系統的觀念。所以必須時作完全無缺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宣傳，並對如何達到這目的的門路亦作宣傳，以使每個步驟與各個口號——例如工業合理化——發生充分力量。此等宣傳必須為共產青年團全部工作的樞紐。而其只有這樣，纔會在青年人中啓發一種熱忱。他並說到「能策勵建設努力的憤慨。」

布哈林並詳陳在其共產主義的訓練中及經濟的與文化的改造之日常工作中，應着重階級鬪爭的原則，再則他列舉共產主義的敵人，以便選為青年領袖的這個集團，更能認清他們的共產青年團所負的責任。「公開的

敵人」在其表面上即可看出的，是富農與私人企業家。次之，幾個「隱飾的敵人」則在合法的現存組織與思想的傾斜之形式下存在着。宗教的團體可以說是此種集團之最要者。第三組敵人則在受青年維護的種族民族主義的趨向中見之。舊時代「大俄羅斯國家主義」(Great-Russian Chauvinism)與「烏克蘭民族主義」(Ukrainian Nationalism)再行擡頭。「反閃族」即其表現的一例。布哈林並說及「我們內部的敵人」且指出這種敵人爲官僚主義與酗酒主義。共產青年團在組織裏如有官僚的習氣與行徑，則不能接近民衆，並損失自己。黨及蘇維埃制度的威信。酗酒主義在共產青年團間必致弄成「胡鬧主義」或「流氓主義」，此種主義在青年農工中足以隔離許多最優秀的分子。因爲「小資產階級的環境」能釀成這許多不健全之趨勢，故亦必須重申階級鬥爭的原理，及發展正確的階級意識與執行一切任務之正確的階級態度，以克服此種敵人。

蘇維埃青年運動於其發端時即與國際的運動發生聯繫。十月革命之前夕，青年國際邀請莫斯科青年團體來慶祝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以爲國際青年紀念日。那日莫斯科有數千青年羣衆整隊遊行。青年共產國際成立時，蘇俄代表曾出席在柏林所召集的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這個團體之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於莫斯科，該團體之執行委員會成立總機關於莫斯科，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開始工作。青年共產國際的組織與活動後來再行討論。此地應加注意的，即共產青年團在國際上的立場時加重視。對於他國青年的密接日益發展，俾蘇維埃運動所得較廣博的經驗可供他國之採用。同時對於他國青年的組織之聯繫日益增進，則蘇聯青年可以體驗到青年

工人與青年農民在「資本主義苦厄」下之條件與艱苦，而此種情形共產青年團大多數的團員所未親身經驗到的。

第四章 共產兒童先鋒

在蘇聯普通所稱的「兒童先鋒運動」(Pioneer Movement)其全銜爲「列寧同志的少年先鋒的兒童共產主義的組織」(The Children's Communist Organization of Young Pioneers in The Name of Comrade Lenin)在此，我們獲得第三種的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兒童先鋒與共產黨共產青年團相同，是一個政治的組織，代表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之第一個階段。這個在兒童間的共產主義運動要視爲整個革命運動之最重要與最基本的工作之一種。兒童先鋒是蘇維埃制度之一個產物，而亦是蘇維埃制度之一個特點；同時，兒童先鋒運動在蘇維埃公民教育體制裏，是一種最特異的制度。

列寧夫人克露潑斯卡爺在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方面，是一個最積極的工作人員，並特別注意兒童與青年的工作。關於兒童先鋒運動的特性與宗旨，她曾發表過以下的話：

「兒童先鋒運動之及於兒童，正當他個人的人格尙未完成的時候，它增進兒童的社會本能，助其發展公民習慣與社會意識。它以奇異的目標放在兒童面前，此種目標是其所處的時代提給他們的，此目標是全世界工人階級正在奮鬥的。此即是勞動者求解放的目標，亦即是達到無階級區別無壓迫無剝削與全人類生存於

圓滿和愉快的生活之新制度組織的目標。」

兒童先鋒運動雖在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而共產青年團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但是兒童先鋒運動在蘇維埃術詞裏，則稱之為一個「民衆」的組織，以十歲至十六歲之間的兒童為活動之目標。雖然它是羣衆的性質，但階級原則，在此組織的機構裏與活動裏仍是存在的。現在農民的兒童雖佔據了大多數，可是工人階級的兒童是握着領導權；新資產階級的兒童甚至於牧師的兒童，亦可加入兒童先鋒隊（pioneer brigade）中。這運動的「個格言就是「後備軍的後備軍」（the reserves of reserves）；兒童先鋒是訓練他們自己以補充共產青年，而共產青年亦訓練他們自己以便繼負共產黨人的工作。所謂「階級性鍛鍊」一項，是此種訓練在共產青年團中所重視的。

在俄國革命以前，小規模的兒童運動業已開始。日俄戰爭後，曾有一個運動叫做「波塔雪耐」（Potashny），此種運動很明顯地是一種軍事的性質，並在守衛派與國家主義派的分子指揮之下。它是着重於未來軍事服役的訓練，且「波塔雪耐」穿着通常的兵士軍服。此種運動壽命不長，在一九一〇年實際上即已消滅了。

同時歐美的童子軍介紹到俄國來，一部分是反抗「波塔雪耐」運動的。是時正當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反動的時期，當局對於此種童子軍以受着自由派主持與推進，微示不滿。至於共產黨人，以最初的「童子軍制」（scout-system）後來有影響於其自己的兒童運動，承認它有許多積極的特點，例如對於兒童勇敢的鼓勵，合作習慣性的

養成，有創始力，公民的精神與須實踐所指定的目標等。在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又視童子軍以爲資產階級的產物，因爲它注重愛國主義與宗教。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成立之臨時政府，曾給童子軍以充分組織的自由，並甚至積極地予以提創。及至十月革命的時候，此種運動成爲廣大的組織，隊員約有五萬人。工人的兒童加入俄國的童子軍，再沒有其他相似或相競的組織以供他們參加。雖然，隊員的大部分都來自中層階級，故就共產黨人的立場看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之頃，此種童子軍，卽或實情不是如此，也是一種資產階級制度的潛力，在革命的過程上應予以清除的事實上，在布爾塞維克統治前幾個月的衝突與混亂時期，童子軍的組織亦起分化；有一部分會合於布爾塞維克的青年運動，後來成爲共產青年團；另一部分參加反蘇維埃運動，後組織了所謂「白色警護隊」(White Guard)是。其中間一大部分，則取一種中立非政治的路線，企圖在內戰期間保存其運動之各種原則。

當革命的初期，對於兒童甚爲注意，一方面是爲了主義的關係，同時亦由於戰爭與革命產生了巨數的無保護與遊蕩兒童。兒童寄養所因此設立。對於基本教育採取了廣大的方針。在初期的學校裏，兒童時常喂以當時主要的食品，以此，此種學校有兒童寄養所許多種的特點。男工人與女工人充作學校裏的職員，在兒童養育所中更多，目的是防止受各教師的影響，因爲有許多教師不同情於十月革命的。級階與共產主義的訓練，以此引用到兒童寄養所裏及學校裏。在這時候，學校的數目大大地增加，且其增加的比率，似允許已屆入學年齡的一切兒童得

早日進入改組過的「統一的勞工學校」中。所以共產黨領袖視爲在兒童的各種機關與學校以外無需乎一種特殊的兒童組織。共產青年團在一九一九年，即正式組織之後一年，提起了分派團員到學校裏與兒童寄養所裏充當兒童政治訓練與活動之特種指導員與教師的問題。但是一個分立的兒童組織尙不曾想到。

際此之時，舊式的童子軍開始復活，單獨的，與任其自生自滅地存在着。在理論上，它是中立的與非政治的。按諸事實，根本是反革命主義的。從共產主義者的觀點看來，它得領導權無疑地是屬於「資產階級」，它誘惑「無產階級」的兒童，使歸其勢力範圍之下，致與共產青年團相頡頏。或者即此之故，有幾省局部的共產黨人起始其「幼年的共產主義者」(Youthful communist) 的組織，或如後來所稱的「榮克斯」(Yuk)，雖然這種也不過一般的政治活動之一部而已。此種「榮克斯」具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相似的組織，並任其發展，沒有加以指導。此種稍具獨立性的少數地方的共產黨人的活動，雖未擴大，但亦有列次的大會，在大會中童子軍各領袖的較激進分子亦來參加。時人民衛生委員會，在兒童間正轉注意於體育訓練的問題，並與教育委員會同派代表參加於此種大會中。以此得到一種妥協的辦法，「榮克斯」得蒙許可，在「榮克斯」的組織中，尙有許多童子軍制的特點，亦被採用。在戰爭期間存在着童子軍諸領袖於此新運動得佔有位置；許多童子軍團僅換了名稱即成爲「榮克斯」。此種運動的理想雖屬模糊不清，而童子軍的法則與訓練則諸多做效。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接受了這個妥協辦法，因爲他們沒有工作人員，可分派到此種爲他們所重視的場合。

但不久後，判定此種妥協辦法是錯誤的。共產青年團決定：取消「榮克斯」運動，代以發展青年間體格的工
作，且以無產階級分子爲其成員。加入共產青年團的年齡資格由十六歲減到十四歲。同時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共
產青年團代表大會中議決：一切運動會與運動團體應加以審查，假使發現到有「反革命」的性質，須予封閉。共
產青年團所以特別注意體格的訓練，是由於這個非常時期軍事訓練的需要所招致。一九二〇年間，紅軍人數增
加到很大的數目，超過了五百萬以上，此種隨軍事服役的準備而起的發達體格的計劃，就及到參加童子軍的青
年們。

一九二一年，新時期來到，給予兒童工作以新的發展。新經濟政策與其必須採取此種政策的經濟條件，爲兒
童們創造了新環境。各學校及兒童寄養所的數目大大地減少了。市區的生活條件對於工人階級的兒童尤感困
難。內戰、飢荒與家庭的破壞致成一大批的孤兒。後來共產黨人恐怕在經濟生活中「資產階級」的原則與方式
之復現會影響及於兒童。當資產階級再擡頭的時候，兒童的「思想訓練」(ideological training)已被放至危
急關頭。共產黨尤其是共產青年團在他們完善組織的隊伍中反抗新的敵對勢力的影響。共產青年團決定必須
同時注意到兒童們，以便保障新環境中共產主義的訓練。

在以先共產青年團原不想發起兒童的羣衆組織，以其本身的力量與財力尙不夠此種組織的計劃。它就開
始增強在各學校中與各兒童寄養所中之共產青年團的力量。爲的要達到此目的，團員被分派去向兒童演說，爲

他們主持討論會，及組織參觀隊演劇等。又引導兒童去慶祝革命紀念節與革命的事蹟；革命正在慶祝勝利與完成呢。「禮拜六作工」是這時期常例之一，用以強化共產黨人的理想與領導權，同時亦應用到兒童方面。體操與競技亦着手舉行。最後，又有各種報紙與各種小冊子爲兒童們而印發。這些活動就是表示此種計劃，在經濟條件與物質來源所允許範圍以內，予以最有效的提創。抵抗新經濟政策的「類惡的」影響，是其直接的目標，但同時給兒童以積極的政治訓練，尤其是引導兒童以實際政治的活動與階級鬭爭的觀念，亦在此新的與完全的共產主義的兒童運動之最初的階段中存在着。

在莫斯科兒童間，循着這種路線的工作，慢慢地進展起來了。工作上零碎的研討，在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報紙上可以見到。後來，召集一個莫斯科當地的大會，對於共產青年團稍具同情的童子軍之代表，亦被邀到大會中。會中曾有決議：不論何種運動必以共產青年團爲始創與必在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但是共產青年團亦願採用幾種童子軍的理想與法則，這個會議又決定在工人區域中發起一種獨立的與在學校及兒童寄養所之外的兒童的組織。此種集團的人員叫作「兒童警探」(Young Scout)，計有三隊成立起來。

「兒童警探」的章程與綱領，於遲緩與困難中產生出來；且在童子軍與共產青年團二種原則之間又生出另一個妥協的辦法。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組織之間應持嚴密合作的計劃，僅得童子軍左傾的領袖所贊同，而此種兒童的組織，尙不是成爲共產青年團的主要部分呢。再則，此種運動在性質上顯然是屬於政治的，與半黨的，總

之無論如何不會是「非黨」。領導權是由共產青年團來承乏。有幾個反對由共產青年團領導此種運動的童子軍領袖欲召集一個獨立的會議。他們被逮捕了，同時這個會議之被禁止，似即為前次的童子軍作最後之清算，亦為反對共產青年團團員與共產黨在蘇聯獨霸兒童組織作最後之清算。不久，新名詞被採用了，用以代替「警探」(Becont)之一字，而既成的各集團，從此更名為「兒童先鋒」。

在烏克蘭，當一九二二年的時候，很明顯的有其不同的地方。在該處的共產黨人於兒童工作中不用童子軍任何的理想與方法。他們對於兒童很機械地轉用了黨的機構與組織之體制，也有細胞辦事處與代表會議等。他們限制其實際活動範圍於各機關裏面，他們的努力終不會在兒童間成為羣衆組織的指導。再則，他們以政治的與一般的大問題為其興趣的中心，對待兒童好似他們對於共產青年團裏的青年甚至於對於黨裏成年的黨員一樣的辦法。一九二二年十月共產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反對烏克蘭的辦法，因為這是通常的兒童所難做到的，在另一方面，該會採取了莫斯科的方案，這方案就是在那時候詳細規定下來的，這個大會議乃作為蘇維埃兒童先鋒運動真正的開始。

一九二三年十月，約有四千個兒童先鋒，至一九二四年年端即增至一萬人。經過開端時不可避免的長期探索和探討及較常態的經濟條件恢復之後，此種運動開始擴大起來。政府當局看到此種運動迅速的高漲與該項工作內容的重要，乃儘量予以物質的幫助。一九二四年共產青年團與共產黨的全體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很長的決

議案，將該項運動的工作扼要舉出，黨對於團允許儘可能地予以幫助，現在，團已負擔正式指導的責任了。一九二五年年端隊員總數超過一百萬數目。此種組織正式的全名亦於是採用了列寧的名字。

一九二五年此種運動的範圍亦趨擴大。此種運動甚至於及到年齡最輕的兒童，年輕到八歲的亦可加入。兒童先鋒在其幼年的弟妹間予以工作的任務，而將他們組成爲「小十月革命兒」(Little Octoberists)的集團，用以紀念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塞維克的革命。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兒童先鋒隊的人數雖有一百八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七人，「小十月革命兒」的人數有二十七萬三千九百零九人，總數共有二百一十萬六千五百零六人，而隊員人數增加的比例在一九二五年年尾與一九二六年年端都有些減退。若較諸同時間共產青年團團員的人數則大得多。據一九二六年一月第一次的估計，參加此種運動的兒童之人數，約佔蘇聯裏合於先鋒年齡（十歲至十六歲）全數兒童百分之六〇，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所有隊員組成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隊，約有百分之六十三在於鄉村，在全部隊員中，百分之五十一，一，出自農民的兒童；百分之三十三，四出自工人階級；百分之十五，五出自其他分子，即是包括勞動的知識分子，公務工作人員及新資產階級等。在起始勞動知識分子的成數比較的大；供職於行政機關的共產黨員之兒童先引入此種運動。後則注意工人的兒童。最後兒童先鋒隊亦遵循共產黨人與蘇維埃當局人員在一九二五年所採用的「面向農民」(Face to The Peasants)的格言進行工作。在全數隊員中約有五分之二是女孩，不過女孩的成數在全體人數增加最高的兩年中都稍有減

退。

不少隊員退出的事亦曾有發現。此種事實將與其所表現的弱點同行討論。並認為其組織發展太迅速的一種結果。雖曾決定對於因學校地方不足，致未受到教育之工人農業勞動者與貧農的兒童須加以特別注意，使他們能加入此種組織，但是設計要想將隊員增加的比率取呆板減少的辦法之提議終遭拒絕了。將新隊員限定於一定的範疇——例如共產黨的兒童，或女孩，或農業勞動者的兒童等——的創議，洵失妥當。此一政策實是抵觸兒童先鋒是一個民衆組織的宗旨。

兒童先鋒運動的組織原則，是經過共產青年團的作用，由共產黨作最後的決定。在城市裏每一兒童先鋒隊在可能範圍以內應以一工廠為根據地。一個兒童寄養所或一個工人俱樂部，如要將它作為組織兒童集團的中心區，則僅當其不能用工廠作中心區的時候，因為工廠可受無產階級的影響。但是無論如何，學校或地域的單位，則終未被用。在鄉區因為沒有較好的根據地，則鄉村學校反要用到。在城市鎮裏對於不在學校的兒童，一個學校亦可以為組織的根據地。在此種實例中，可知隊的指導者必須為一個工人，不是學校裏之一個職員。

以此，組織的根據地儘可能地應為一個「生產」的地方，以便生產的原則得以早能引入兒童的生活中。無論如何，先鋒隊總是歸於共產青年團的細胞指導的，團細胞中之一員成為先鋒隊的指導者。許多共產青年團團員完成了他的公民活動的職責，即視為先鋒隊的指導者。共產青年團的地方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中有一兒童

先鋒股」(section on pioneers)以便監察與指導各隊指導員的工作。以此，先鋒隊的領導權是在一個積極的體格上饒有動力的青年手中，他的生活圓滿，生涯愉悅，而且屬於無產階級的，這是引了一個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運動裏負責的工作人員所說的話。此種領導者雖未經師範的訓練，但確密接兒童的生活。有許多領導人員生經革命種種大事變，已在兒童時體驗到革命進程的意義。即此之故，他們纔能成爲兒童的每一集團中之實際工作的與負責的指導者。

各隊隊員限於從四十至五十，再分爲四「組」或五「組」，每「組」十人。每組亦有一指導者，由其本組內的隊員選出。組的指導員與隊指導員及隊所附屬之共產青年團細胞辦事處之代表成立「隊公會」或隊蘇維埃。每一隊是以革命領袖或團體的名字名之，而各組則以工作的工具或生產的領域名之，例如「鐵鎚」或「木匠」等。隊與組二者均有會議，如各種活動的討論與設計，負責者的選舉，新分子的進入及其他日常的事務等，均由該會解決。此種細小組織單位的採取，用以增進紀律而亦以之增進創造力，同時組織單位的細小，纔能防止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相背道的發展，因爲一切兒童先鋒組織的隊員，如共產青年團裏的團員一樣，必須爲活動的。這是可以置信的，此種組織方式之有收縮性，簡單、經濟、與容易明瞭，實給兒童爲其自身工作，發展自動的組織與表示活動能力之充分機會，但是同時亦必須有持常的與穩固的領導權的準備。

一個「小十月革命兒」集團的成員，則限於二十五人，分成五小組，每小組五人，而每個集團屬於一兒童先

先鋒隊組織之下，並由一兒童先鋒隊予以組織。在每個小組中，有一兒童先鋒隊的指導者，而整個「小十月革命兒」集團，又在一個特殊的指導集團指導之下，指導者由兒童先鋒隊組織單位所附屬之共產青年團團細胞揀選出來。「十月革命兒」集團是兒童先鋒隊總體的構成部分。每一小組的成員並選出一個輔導者，與小組裏的兒童先鋒隊指導者及集團裏之共產青年團的指導互相合作。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人的黨齡限制與共產主義訓練團體的年齡限制是遞相疊置的。「小十月革命兒」由八歲到十一歲，兒童先鋒由十歲到十六歲，共產青年團團員由十四歲到二十三歲，而可以入黨的年齡則在十八歲。成了兒童先鋒的「小十月革命兒」在未及十一歲之前，則須仍為「小十月革命兒」，非到滿了年限不可脫離。同樣的，雖然不是那樣的嚴格，共產青年團團員若不是滿了兒童先鋒的年限，則仍留在兒童先鋒隊中；共產黨員若不是滿了兒童先鋒的年限，則仍留在兒童先鋒隊中；共產黨員若不是滿了兒童先鋒的年限，則仍留在兒童先鋒隊中；共產黨員若不失了共產青年團團員在年齡上所限的資格，則必然地仍繼為活動的團員。如此，在每種組織中，都有其上一級的組織之核心，並有其領導的責任。

在兒童先鋒的指導書中說，此種組織對於勞苦者的兒童是開放的，尤其對於工人及農民的兒童。階級的原則比較不甚着重，然在加入的手續上卻未予以放棄。在實際上甚至更為寬容，且其所定政策甚至使新資產階級與教士的兒童亦可進入，他們祇要能證明這些兒童亦會做成好的兒童先鋒。此隊員由「組」向隊蘇維埃提出，但必須得隊之全體大會的通過。新隊員加入至少須經過二個月的候補期間，在候補期間中，男孩或女孩必須學

習兒童先鋒的規律與慣例，並須表示他或她是時時遵守的。經過此種試驗——且時常補充以各種規律與慣例正式的試驗——以後，新隊員纔得行兒童先鋒的宣誓，並佩帶徽章與隊員證。隊員如違犯了兒童先鋒的規則與慣例或不服從兒童先鋒的紀律會被開除。

在兒童方面，共產黨人允許佩帶有用的與必需的裝飾標記。但是亦有幾個共產黨人對於此種方法曾表示反對的，不過大多數的見解，以為在外表裝飾上求適兒童的需要是必要的與合法的，即或他們是共產主義的兒童先鋒，但是兒童總是兒童，他們喜歡緞帶並喜歡打扮，這就是立論之點。因此，除了正式加入為隊員的入隊儀式並以「宣誓」為儀式之一以外，特別的徽章，素樸的制服，致敬的禮節與象徵的方法均予以採用。對於兒童的想像力與其智力必須並重，是不可偏廢的。象徵主義須為具有充實內容的革命象徵主義。有一位作者寫道：「兒童先鋒的象徵主義的目的，是在激動『對於壓迫者火一般的恨，對於被壓迫者熱烈的愛與同情，以此發展革命的熱忱與精神。』」

兒童先鋒的徽章是一面紅旗，在旗上是蘇維埃的象徵——斧與鐮刀及五塊木頭，燃燒着三道火燄的營火。旗徽上的格言是「時常準備着。」五塊木頭代表地球上的五洲，其意即是兒童先鋒必須時常想着是一個未來國際革命家。三道火燄代表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扼要寫於旗徽上的格言之全文係含有勸解的形式：「要為工人而鬪爭，準備呵！」與其答語「時常準備着。」「小十月革命兒」可不佩徽章，僅有一粒紅星綴於其襯衫之前。

覆蓋着他的心。兒童先鋒除了徽章以外，在頸上繞着一條紅巾，在胸打一個結。在放上之前，紅巾先摺成一個直角三角形；這三角代表三個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即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是。當巾結了時，兒童先鋒即去向着嚴肅的誓約，由此誓約，他或她必須緊守兒童先鋒的規則與慣例及列寧的遺訓。巾的紅色亦足提醒兒童先鋒放在他們面前之方案的爭鬥。在隊時所穿的制服大概係半式運動衣，男的下面着褲，女的穿裙。爲經濟起見，因而儘可能地採用最素樸的制服。在寒冬，制服外自然披以外套，關於此不能復作一律的企圖。每隊的各組各有其旗幟，繡以兒童先鋒的標記及其組名隊名，誓約點綴旗面，遊行與示威時，及參觀與旅行時，此種旗幟必須帶着。

致敬的禮節是舉手，各指緊合着，恰放在額前額上的位置，是一種很愉悅的與優雅的姿態。共產黨人極力否認此種敬禮是同於舊式軍隊的敬禮。五個指頭像營火之五塊木頭，代表五洲緊密結合在一個共同運動之中。把手放在頭上的部位，意爲兒童先鋒應放下他個人意志附屬於該運動之目標。關於象徵的解釋，雖然兒童先鋒隊預備了印刷品予以很詳盡的詮述，其主要意思不過如是而已。

要獲得佩徽章佩領巾與行敬禮的權利，必須於舉行兒童先鋒的「宣誓」之後。國際兒童紀念日時常用作舉行隊員宣誓儀式之時，凡受過特殊訓練而於八月間次學年開始前加入的兒童以此時爲宣誓的一個節期。在莫斯科此種儀式是在紅場「列寧墓」前面舉行，到有蘇維埃高級公務人員。普通此種儀式是舉行於隊全體大會，到有共產青年團的代表，共產黨在可能時亦有代表蒞臨。誓約簡短而精要：

我們是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兒童先鋒，在我的同志們面前，嚴守下列誓約：（1）我要站在工人階級穩固的立場，為全世界工人們農人們求解放而奮鬥；（2）我要忠誠地與恆久地實行「列寧」箴言，即兒童先鋒隊的規則與慣例。

參考列寧的意見，採用了農人所習用的略改祖名的命名慣例。列寧的箴言在兒童先鋒指導書中曾予扼要的敘述，內容如下：

共產黨人全部的任務，是知道如何纔能覺悟一班落後份子，如何纔能工作於這班人裏面，並如何纔不致將他們在這班人方面隔開。

學習工作——這是全部的任務，蘇維埃當局應把它放在人民之前，少尚熱烈的空言，多做每天切實的工

作。

我們共和國的命運依最後的分析，是以農民羣衆是否與工人階級站在一道，是否尊重其與工人階級的同盟為斷。

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任務，恰在當今青年的面前了。

假使沒有生產的工作與實際的鬭爭，則從共產黨人的小冊子與宏著所得的共產主義之書本上的知識絕對值不了什麼。

假使你所作的結論以為做共產黨人不必吸納人類智力業已積蓄的成績，則你犯了極大的錯誤。只有在與工人及農民一道的實際工作中，纔能做成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

至於「規律」則有五種，而所謂「慣例」亦有五種。各種規律當訓為所負道德上的責任，以此，兒童先鋒能將其個人生活歸屬該運動宗旨之下，這五種規律是：

- (1) 兒童先鋒應對於工人階級的主張忠實，與對於列寧的箴言忠實。
- (2) 兒童先鋒是共產青年與共產黨人的小兄弟及扶助者。
- (3) 兒童先鋒應把別的兒童組織起來，並與他們在生活發生聯繫，兒童先鋒是一切兒童們的模範。
- (4) 兒童先鋒應與別的兒童敵愾同仇，且與全世界的工人及農民的兒童敵愾同仇。
- (5) 兒童先鋒應努力於求知識。知識與理解力在為工人鬭爭上具有甚大的力量。

五種規律外復補益之以五種慣例：

- (1) 兒童先鋒保護其自己之健康與別人之健康，他是忍耐的愉快的。他侵晨早起並做早操。
- (2) 兒童先鋒愛惜其自己之時間與別人之時間。他做他的工作迅速而敏捷。
- (3) 兒童先鋒是勤奮的與堅忍的，知道在一切與任何條件之下，如何去作正確無誤的工作，並在一切環境之下找出一個辦法。

(4) 兒童先鋒節省民衆的財產，愛護作工地方的書、衣服及器具。

(5) 兒童先鋒不咒罵，不吸烟，不飲酒。

「小十月革命兒」亦有其規律與慣例。他們的規律是：

(1) 「小十月革命兒」應幫助兒童先鋒、共產青年、共產黨人、工人與農民。

(2) 「小十月革命兒」應努力做成兒童先鋒。

他們的慣例爲數亦有二，是同樣簡單的：

(1) 「小十月革命兒」在身體上與衣服上應注意修雅與清潔。

(2) 「小十月革命兒」愛作工。

此種特有的行爲規律是爲兒童而設的，並構成兒童先鋒一種特殊的法典。這些規律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共產黨的章程與綱領相當。只因其在兒童，故對於社會行爲表之以形式，組之以規律，也屬妥當與容許的。

所謂兒童先鋒的工作，得按兒童參加此種運動的活動種數以類別之，一切這些活動的共同宗旨，就是在特殊路線上去訓練兒童。茲從兒童先鋒隊工作內容的一個很好報告辭中看到一個定義，足以反覆說明，在關於此問題的書本中，到處都可以找到的一般公式。

「我們知道兒童的訓練，是爲未來公民活動而準備的。蘇俄兒童未來的公民活動，以及其他一切各國無

產階級兒童未來的公民活動，主要是在於繼續列寧所創始的偉大的鬥爭，反抗一切壓迫者，爲全世界勞苦者謀解放，爲共產主義的社會謀建設。準備這類人民，即共產主義者，實是對他們作共產主義的訓練。」

先鋒隊的活動每週均有計劃。計劃的決定，由於三個每星期一次的會議，一個是全隊的會議，兩個是組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上，須作工作報告。此種報告的責任視爲十分重要，而且必須一致厲行的。以下規則常爲活動之至；一切隊員務使其去做有力量的與有用的工作。在兒童先鋒間，無所謂活動的與不活動的區分；一切隊員必須爲活動的。兒童先鋒假手於報告的責任，對於每個組員或隊員行集體管束。彼此互助以履行其義務，我們已知爲兒童先鋒規律之一種；而時間、精力與金錢的經濟亦時予重視。此種方法深信其確能發展創造力、自動力、堅忍力、以及對於環境與各種任務之適應力。

先鋒隊的活動有一部分是在於隊裏，而且限於隊裏的。如參加各種活動與各種紀念會，是其例也。每項遊行或紀念會之政治的與經濟的意義，由共產青年團指導員以簡單辭句報告之。兒童政治的知識以此得獲啓發。隊的集會亦舉行實際問題的討論，此是隊員的隊外各種工作問題，如在兒童寄養所裏、工廠裏、或鄉村裏之各種工作。他如世界及宗教的起源之各大問題，若在事實上可以辦到亦時予討論。據說兒童在討論此種大論題，表示出特別敏銳的興味呢。兒童先鋒的規律與慣例時予研討與分析，尤其在於新隊員的加入與不良分子的開除的時候。在一切研討的時候，關於設問與答案的演習時被用到，而且適用的範圍似頗廣泛。參觀與旅行，藉以證實其所

研討的實題，在特種機會裏，非隊員、閑遊者、父母或隊根據地的工廠之工人，都被邀至參加隊的集會。此種大集會固然免不了討論，卻是變為表示（由於報告）其所成就之工作的會了。

兒童先鋒隊組織各隊員的學社，以為學習或手工訓練之用。例如有些學社為研究外國語而設，有些則設於頗小的工場裏之工作學習團。此種小工時予特別的設計，以便供給先鋒隊以簡單器具，得成立辦事處，並供給以小旗標語等。有些學社對於各種工具與機器的研究饒有趣味。但是一切這種隊內的教育工作必須與該隊之社會的與政治的活動發生聯繫；產生的原則，即做社會上有用的事物的原則，亦時加重視。在大城市裏設立兒童先鋒俱樂部，以供各隊的兒童共同享用，學社的工作在此沒有較完善的設備而得規模較大的發展。

每隊應有它的「壁報」，在兒童通訊社指導之下。一切學社都以自動原則來組織，兒童通訊社尤為其最佳者。兒童們可在此了解報紙的一般意義與其自己的兒童先鋒報之特殊的意義。通訊員的制度——此層後當再論——亦廣佈於兒童間；兒童先鋒隊的報紙與雜誌，大部分都是由兒童通訊員投稿。為了指導通訊社起見，一個受過新聞學的理论與實際訓練的共產青年團員，被派為一個特殊工作的主持者與指導者，這些通訊社視為尤關重要，因為他們建立與他國兒童或在蘇聯裏遙遠部分與不同部分的兒童各種聯繫與互通信札。

在隊的「辦事處」裏，每組各有其「紀念處」，對於該處的設備與整理是其工作之一。各組以其所採用的特殊名稱為「紀念處」裝潢的主要動機。組與組間舉行競賽，以提高此種工作的興味，這種競賽的實際意義，那

在對於太不修飾的各處起較大的吸引力。若組名取自政治與經濟的領域，如我們所見的那樣，則此種活動之目的，又在增進政治的與經濟的各問題之研究。在一個兒童先鋒俱樂部中，「列寧隊」負有裝置「列寧紀念處」之各種肖像、標語、格言及其他所應具的物件。

附屬於一個兒童先鋒隊的「小十月革命兒」要使之導入兒童先鋒的活動。但是，需一個醫士，或一個教師加以監督。特殊的討論會時為這班年少的兒童召集；他們並將允許參加隊裏的大會及參觀。「小十月革命兒」的活動最多的時間，規定每星期只能從三時至四時。

兒童先鋒在隊外最重要的活動是在學校裏。一個學校的兒童常編入不同的兒童先鋒隊中，全校兒童成立一個「先鋒隊前哨」(pioneer forepost)，此「先鋒隊前哨」為學校行政組織之一部。在蘇聯勞工學校裏的自治體制之探討中，將對此「前哨」的地位，作更詳盡的敘述。以其為前哨的隊員，故該兒童先鋒關於學習方面必須示其他兒童以模範。至於一般學校的活動，其作用多誘諸兒童運動。克露潑斯卡爺這樣寫着「學校協助兒童運動的深入，同時兒童運動是建立學校新模範的要素。」兒童運動於一九二三年由共產黨人提倡，一部分原因是想將他們的公民教育的觀念介紹到學校中。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人民教育委員會密切合作，以規定兒童先鋒在學校中的任務。

發展學校裏一切兒童的社會政治的活動是兒童先鋒的特殊責任。他們在學童所維護的與組織的一切場

合裏，必須爲很活動的分子，兒童先鋒必須勸說與推進別個兒童去研究學問與求得知識。總之，「先鋒隊前哨」是保障共產黨人在學校裏的勢力之核心。兒童先鋒應留心全校之參加遊行，示威運動與革命的紀念會各種事情。他們引導別的學童來做一些簡單工作，這些工作是兒童先鋒爲共產黨共產青年團及職工會所做的。他們建立學校與工廠間或與其他生產集團間的聯繫。兒童先鋒對於編刊學校的壁報與學校中的學童所成立之學社都是很積極的，每種學社之每一個概有一個隊員在於其中。他們組織演講會、討論會，並設立與配置各種紀念處，尤其是學校裏的「列寧紀念處」。他們爲其自己的運動作宣傳，並爲共產青年團作宣傳。兒童先鋒在學童「自治」方面應爲超羣拔萃的，努力於各種學童委員會領導位置的獲得。他們翼助「進步的」教師，同時攻擊尙在實施的舊式教學方法。最後，他們在其他學童間繼續進行反「宗教偏見」的運動。至於在兒童先鋒運動中之乾脆無神論的，反宗教的成分，當再論於後。

對於每個「前哨」都有一個共產青年團團員與之發生關係，他每星期到學校裏來一次，大概是爲隊員們計劃星期六或星期日的參觀與旅行。這個共產青年的分派如屬可能，應是一個工人。他在許多地方雖常與教師磋商與合作，但是對於學校行政應站在外面與不作干預。以整天不懈負兒童專責的青年領袖，實有很大的影響於兒童的可能。曾有聽到幾個教師對於這些訓練未馴而事本良心的共產青年團領袖的稱揚。在另一方面，關於把兒童託付於此種領袖，是否得計亦有表示疑慮的。兒童先鋒以外的學童亦可加入參觀隊中，此種參觀有一般

教育的，尤其有政治教育的目的。以政治訓練爲目的而參觀之廣大與機變的應用，已經自成一個單獨的問題了。在一般說來，參觀是以引導兒童密接現代生活與時事爲目的。參觀或僅是一種郊遊，其最習常的是參觀博物院，而工廠、農村與兵房亦爲籌劃參觀時所重視。

兒童先鋒在學校裏一切的活動，必不可以成爲有特權的集團，即成爲脫離羣衆的一種派頭。兒童先鋒正與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的情形相似，負有特殊的責任，卻不享有特權。自全體觀之，事實似與理論相符合，在少數零散的實例上，當兒童先鋒之作用的問題，與教師同作研討時，教師的態度總是贊助此種運動的。同一個學校裏的「前哨」的少年領袖作幾次談話後，所得的印象是：兒童先鋒的位置已達到負責的真義，而無傲慢的成分了。

在兒童寄養所裏，兒童先鋒的作用在性質上頗多與在學校裏相同。在兒童寄養所之一個較小的集團裏，會有兒童先鋒較大的比數，因爲是種寄養所，從起始時即集中注意兒童政治的訓練。此處已不是大約十二人組成的前哨，而時常是一整個的兒童先鋒隊。兒童在這些機關裏，普通都是屬於一階級——工人階級。再則，共同的生活，足以助成集體主義的活動，團結的意識，與密切的同志關係的發展。在某一意義上，兒童寄養所的自身，就是共產主義訓練的兒童先鋒之機關；在兒童寄養所中，可以見到兒童先鋒運動特別強固與發展。

至對於住家與家庭的生活，兒童先鋒須有積極的作用；兒童先鋒活動之在於家庭集團裏有使命性質的，因爲家庭裏與家庭生活的條件，普通不能與其他例如在學校一般的——場所之革命運動保持同等的發展，故由

兒童先鋒隊而獲得新觀念的兒童，是成爲介紹新原理到家庭裏去之一種主力。最先兒童先鋒應成爲清潔運動的戰員，尤其是空氣新鮮。他或她監督小孩食前的洗手與洗臉，以蘇俄工人農民生活標準的低微，此種家庭的任務實爲重要。再則，遇着家庭有病的時候，兒童先鋒力主去請醫生。若父母給小孩喝酒，兒童先鋒必須反對。

當助母親處理家政的時候，兒童先鋒須談些如 *Order*，公共洗衣處與公共食堂等制度，此種制度他是由於隊的討論會與參觀時學來的，若父母是不識字的，則助之使讀書與寫字。他又教他的小兄弟與小姊妹讀書，並不時帶他們到兒童先鋒俱樂部去，或引導他們加入「小十月革命兒」運動。兒童先鋒帶新聞報紙與小冊子到家中，以鼓勵按期定閱報紙與購買書籍。兒童先鋒試說其父母捐助各種自動的公民團體。最後兒童勸其父母時常參加革命慶祝會及紀念日，爲發揚此種活動起見，兒童先鋒須於其家內設立一個小小政治紀念處，備有新聞報紙、小冊子、標語及格言等。如屬可能，兒童先鋒應放一個列寧肖像於神像旁邊的壁上，兒童先鋒藉這個辦法，與藉着重革命的紀念日來反抗宗教的節目，以在家庭生活裏應攻擊「宗教的偏見」。

在隊裏的集會上關於一切活動，尤其家庭裏的活動，兒童先鋒應作經常的報告，隊指導員必須熟悉每個隊員的家庭生活，以便予以較好的扶助與忠告。如一個兒童先鋒遇到反抗，尤其遇到一個喝酒的父親之反抗，而需要保護與援助時，此種事件可以提交雇用其父母的機關之工廠委員會。此種手續用以避免引起父母之惡感。在家庭裏及在學校裏，對於兒童體罰的施用，應注重絕對禁止的，俄國鞭撻妻兒的習慣，即是這個法律所由生之背

景，而兒童先鋒則受督促與輔助，以便厲行此種法律。父母們，尤其是農民的父母，曾對此法律訴不平。但從能找到的證據看來，他們在事實上已被逼必須遵守了。在另一方面，兒童先鋒以及共產青年亦受命須承認其對家庭所負的責任與家庭關係的重要。僅當生活在家庭裏確成爲十分難受時，則兒童先鋒得擺脫與拋卻家庭的關係。我們以後隨處可以看到家庭影響正在如何探索與使其作有組織的表現。但對兒童先鋒所希望的，則是藉他們以發展家庭中的新生活。

兒童先鋒隊在隊裏，在學校裏與在家庭裏，所做的工作均有實際社會的與政治的成分。由很實際的工作，引導兒童常常參加其環境的生活，是共產主義訓練的要素。兒童且在其極幼稚的時期即自行準備以作實際參加新制度的建設。所以，兒童先鋒「幫助他們較年長的同志——共產青年與共產黨人。」例如他們幫助裝潢工廠委員會的辦事處。在準備與舉行遊行或紀念會時，他們分散印刷品，並奔走接洽。他們替自己發起自動的團體募捐，並爲此種募捐運動而準備標語。他們分售工人俱樂部的入場券。他們服務於俱樂部的嬰兒寄留處中，因爲女工人蒞臨俱樂部的集會，將她們的小孩寄留在那邊。他幫助工人俱樂部圖書館館員登記，並拿出書籍與雜誌，這些工作固不是單分給兒童先鋒做的，而兒童先鋒必須自告奮勇以任其事。

兒童先鋒應特別參加工廠俱樂部或共產青年團委員會之扶護委員會，或扶護部的工作。此種扶護委員會或扶護部是代表工廠或工人俱樂部擔負幫助特別的鄉村或鄉村的集團之責任。組織參觀隊的作用，或爲分散

印刷品，或爲參加革命紀念日的慶祝會，或僅爲與外界普通的接觸。兒童先鋒又去教農民的兒童遊戲，並將城市兒童先鋒隊在組織上與活動上較進步的優點，補益鄉村兒童先鋒隊。城市的兒童先鋒隊對於鄉村的兒童先鋒隊，實已施行了一般的扶護制，此種扶護制之切實的形態，即爲各參加其所屬之工廠的扶護工作，與舉行他們的夏天露營，關於露營方面，後當再論。

這些兒童都帶去參加其年較長的同志之集會及討論，如工廠委員會，或工人俱樂部，或甚至黨或團細胞的集會，以使兒童在實際上能自動幫助其年較長的同志。凡地方上表現一個遊藝會，常爲這些兒童佈置一排座位。這當可回憶到：兒童先鋒隊的根據地是一個工廠或作坊或其他生產中心區，故其所附屬的兒童先鋒隊之加入遊藝會或集會是很自然的。至於年較長的工人，藉允許兒童於會場上詢問各種問題，甚至於允其參加討論，以使這些兒童做成工人階級真正的「家屬」之政策，採到如何程度，洵爲難事作恰當的判斷。工人分宜鼓勵此種聯席會，並利用此種集會對於兒童說明生活行程的經濟原理，合作社的組織，或俱樂部的原理與機構。共產青年團第六次全體代表大會所取的兒童青年團工作方案，對於爲其年較長的同志工作，與同其年較長的同志共同工作之種種活動甚爲重視，其論據則爲他們

「啓發無產階級的意識，輸送兒童以若干確實的知識，俾其得以領悟現在社會生活基本的事實，並給予兒童以評價此種事實的方法，與對於眼前現實的根本事實，養成一種判斷的能力，教導兒童關懷共同的目的，

啓發共同的無產階級的全世界休戚相關的精神，鼓舞與發揚其集體主義的創造的才能。」

很多的城市兒童先鋒隊，或於夏季到鄉間去露營，或時去其鄰近的農莊參觀。此種旅行原在使兒童獲得新鮮空氣、運動與休養，而兒童先鋒亦必須做一些有限定的公民職務。在按時實行的工作日程中，大約有二時或三時應作社會政治的活動。城市的兒童先鋒在露營時或在參觀時，認識農村的兒童並與之玩耍。他們在父母與兒童間作有利於學校之煽動。他們裝飾鄉村的校舍，或甚至於助其添設幾件簡單的校具。爲要獲得鄉村父老的敬重與好意，他們助之以鄉村間小小的任務。藉與農民兒童組織討論會或談話會，在營裏的兒童先鋒隊能助落後的鄉村之文化發展。革命的概念，農民與工人運動的概念，尤其是農工同盟的概念，亦同時予以提示與解釋。他們必須助農民與工人的同盟，城市集團與鄉村集團的同盟之增強。他們切不可對於文化較低的農民兒童表示自大的態度。

城市兒童先鋒，如其年較長的共產黨人一樣受到提示改造農民本性的訓練過程是一個悠久的過程。其常爲最先的與比較簡單的任務則爲識字運動。同時希望來自城裏的兒童先鋒會「與由不懂自然律而產生的成見作鬭爭」並在此種口號之下，不僅向迷信宣戰，並實行積極作反宗教的宣傳。最後，城市的兒童先鋒隊又須發起與引導農民兒童到城市裏參觀工廠與博物院，或參觀按集體主義之原則實行的鄰近蘇維埃農場。據說此種參觀的意旨，在使城市兒童授予其較覺悟與較不活動的鄉村同伴之新概念，得更切實的了解。

因此，城市對於鄉村的領導，亦可成爲兒童先鋒運動的要旨。種種條件說明此種領導之得體。俄國鄉村的兒童，是著名的不活動的與落後的。我們前已看見兒童先鋒運動是起自城市，但在運動迅速高漲的年頭，在鄉村亦有特異的成就。在農民兒童中，徵導之以愉樂與興趣，確是重要不過的。運動伸展到鄉村大眾，對於城市兒童先鋒隊，實予以實際社會的與政治的活動之場所。兒童先鋒在指導與激動鄉村間成年農民與農民兒童的政治思想與活動上，所發生的影響已是很大。

鄉村兒童先鋒隊的活動必須適應鄉村的條件。在某種場合上，因爲鄉村生活的簡單與穩定，此種活動較易組織起來。鄉村兒童先鋒幫助裝飾蘇維埃的房屋、學校與鄉村讀書室。他們如在城市的學校裏一般，必須爲在校內校外的兒童中之活動的分子，並幫助與在兒童某種意義上監督教師，在家中，他們必須攻擊把酒給兒童喝的通行習慣，同時又反對「宗教的鴉片」的應用。他們與其城市的兄弟姊妹們相同，鼓勵定閱報紙，並以政治宣傳爲宗旨，鼓勵各種社團定閱。鄉村兒童先鋒隊循着實際生活的路線，要有其小花園或植物園，組織看養動物競賽會，或設立小工場做農家所要用的簡單物件。他們實行協助其防護疫害或修理不好的道路。由於此種活動，兒童先鋒理應獲得社會的敬仰與維護，並足克服老年保守的農民對此運動之非友誼的態度。

兒童先鋒的活動不是「只有工作沒有玩耍」。遊戲與競技於共產主義的兒童運動上，站在很重要的位置。共產黨人承認在體質訓練上必須有頑要的成分，他們堅決主張要使競技與遊戲，成爲實用與有利而不傷他們

的興趣是可能的。紀律與團體動作的增進是競技與遊戲之特點，蘇維埃領袖對此當然是歡迎的，但是共產黨人亦注重插入政治的與社會的宗旨，與純粹健身的辦法並重，並試作將特種問題的準備，寓於遊戲中，此種問題為蘇維埃公民後來會碰到的，並試作設立幾種規則，這些規則會適用於新社會制度的。

各種遊戲的內容必須根據環境的配置，並須符合無產階級的理想。假使玩戰爭的遊戲，則必不可為民族與民族間的戰爭，而應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戰爭，或紅軍與白軍的戰爭。在一個兒童先鋒省報裏，其國際兒童日到臨之專號，曾為蘇聯兒童創有一種新遊戲，此種遊戲有些像美國的「捉迷藏」(Prisoners Base)，但它卻是名之為「踰界獲取革命的羽書」。在另一邊設防謹慎的邊界裏，有一個秘密的革命委員會。這就是此種遊戲的特徵。

兒童先鋒運動會進行到解決遊蕩兒童的問題。在兒童先鋒隊的進展中，對於有些兒童以其父母出外作工遺置街頭任其遊嬉的，曾予以特別的注意；因為此種兒童是小無賴隊的新補充者，這種小無賴雖有種種方法予以挽救與遏止，但仍有在城市馬路上亂跳的。兒童先鋒急於組織遊戲隊的，或即為此種兒童而非為那些習以為常的小無賴。兒童先鋒必須聯合此種兒童，並助他們玩建設的遊戲，藉以代替僅會引至打架的遊戲。同時這些有無賴潛性的兒童，應以來賓資格邀來參加兒童先鋒隊所召集的公開集會。

兒童先鋒運動有其自己的報紙與書籍。各種報紙與雜誌均由共產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或地方委員會刊

行。此種報紙，載有關於一般政治經濟各題目的論文，其題旨大概都是根據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報紙信箱。對於「中國的進展」，「英國的罷工」，「波蘭的現狀」或其他世界各大事件均甚注意的。兒童先鋒時聽取黨內討論事項與當今主要政治問題的報告。以此，他們的報紙應引導兒童作現在政治的討論，並注重以共產主義者的立場，分析其他各國政治的趨勢。報紙上給政治問題尤其是國際的時事所佔的篇幅與注意均為可觀。兒童運動本身問題的討論，則另佔報紙其他主要的部分。藉兒童通訊員的作用，在此有真正的討論，並在這方面，兒童先鋒的報紙時覺成績斐然。報紙與雜誌，尤其是雜誌，給兒童先鋒隊各種活動路線以切實的提示；新遊戲的介紹，上面已曾說過了。正如蘇維埃與共產黨一切的定期出版物一般，兒童先鋒報紙與雜誌，留出許多空白以披露各種書籍與小冊子。

含有理論與實用二方面性質的書籍與小冊子，均為兒童先鋒而印行，許多書是討論政治的姿態，此種印刷品由中央兒童先鋒處予以分類，並備有介紹書籍的目錄一種，是為兒童先鋒隊自己的圖書館用的，另一種是為共產青年團的隊指導員用的。其饒有奇趣的則為年少兒童先鋒之許多種指導書。茲將各種指導書中之一種予以扼要的敘述。該書的封面冠以如下格言：「要為工人而鬥爭，準備啊！」並在第一頁上，列以別種格言：「第二隊後備軍來替第一隊後備軍調班了！」以俄文表之，則是這三個短字：Smena, Smene, Idyot。這第一頁並由兒童先鋒自己去補空白，把姓名、年齡、隊名、體重、身高填入，並由隊指導員簽字。繼之，則為列寧肖像，並寫有「我們的道

路就是列寧的道路」等字，接以他的傳略。以後纔將列寧的八條箴言寫上。以少數的辭句將其他共產黨領袖，起自馬克斯與恩格兒斯描寫其特性，並示以其肖像，再則主要的無產階級的週年紀念日與例假節扼要寫上。在「我們的朋友遍世界」的標語之下，略述其他各國共產兒童運動的情形。例如挪威說「現在有五千兒童實行革命的鬪爭。」美國說亦有五千兒童在「兒童先鋒大同盟」中，具有月刊流行到八千分。

指導書中後以短章述「我們的兄弟，共產青年團團員」與「我們的前輩同志，共產黨人。」下一章略述兒童先鋒在軍團裏、學校裏與鄉村裏活動的情形。章程與各種細則的精要，隊裏的標識與敬禮的敘述，以規律、慣例與誓約的全文均被載入。另有一節關於雜誌的，附有兒童先鋒的日曆，將各種紀念日舉出，例如列寧的生日與死日，「巴黎公社」五月一日等等。對於兒童通訊員的提示，亦列入其中，又有健身規則與運動規則等。在此節之末尾，略述蘇聯的特質，即組織與人口。另有幾種簡表，將近幾年來關於工業上農業上的生產扼要表出。並有「國際歌」與最普通的各種兒童先鋒歌，例如「少年先鋒歌」的全文。最後幾頁以記錄別的隊員的姓名、住址及應做的與報告的工作，介紹的與已讀的書，以及每時與每日的學校工作時間表。

兒童先鋒運動與共產青年團一樣是全聯邦的組織，經過共產青年團各委員會的作用，二者事實上是互生聯繫。其章程與綱領，對於全蘇聯之各獨立的自主的組織單位均一致適用。民族性的成分僅在方言的應用上，及在地方區域對兒童先鋒的活動方案的研究上，纔注意及之，否則，民族性是隸屬於國際全貌以內的。兒童是共產

主義的兒童先鋒，並不是俄國的兒童先鋒。蘇聯兒童先鋒之參加國際的運動，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國際青年週」利用爲新隊員加入時舉行儀式的機會。與其他各國在共產黨人或左翼社會主義者組織下之兒童通訊，亦是兒童先鋒活動工作之一種。兒童先鋒參加第一次政治運動是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這時候正是德國革命運動進展之時。蘇聯兒童先鋒開始給德國兒童以精神的與物質的幫助，兒童先鋒的集團，通常都參加歡迎從他國來的工作人代表之遊行。

兒童先鋒是蘇維埃兒童的活動分子。當戰爭與革命的期間，在兒童間，尤其在農民兒童間，曾有較大的活動，此種事情正是那時俄國所缺少而且切要的。但此種活動的劣點，共產黨人自己亦有看到。對兒童與對青年一樣，一種繁重的公民活動放在兒童的身上。繁多的正式會議及固定的與希望做的各種工作，都使消耗隊裏的時間，弄得兒童的心力兩相交瘁。兒童到隊裏有固定的時間，並視如一種義務，同時當他們在那邊的時候，必須遵從一種慣例的與嚴格的綱紀。以此曾有人提議：集會的形式，在次數上應予減少，隊員之蒞會是由他們願意與當他們願意之時。兒童參加革命紀念會節整隊遊行亦受限制。總之，注重政治問題已予減輕了，因爲兒童顯然爲這些討論弄煩了。在該運動中有一個積極的工作人員，說出他們的訓練方法失敗的事例。有一個十二歲的兒童先鋒，被選出列席於一個工人集會，作激怒的演說，其要旨是「我們工人被剝削得厭倦了。」

負着先鋒隊的責任之共產青年，他所表現的工作，時常不能與分配於他的任務相等。他們已經弄成「命令

式」的習慣，並對於兒童運用其謙卑的毒素。又可看到兒童先鋒自己，對於其他兒童望其來作領導的，亦趨向到傲慢的表現。客觀的條件增加了指導者的問題。該項運動迅速的進展，使其房屋設備，尤其是指導者，遇着難題。年齡限度從十歲擴大到十六歲，而其活動則不能按年齡大小予以適當的區分與組織。自從一九二六年以來，隊員人數增加的比例似漸漸減小了，而隊員更成爲遊離不定，許多兒童相繼脫離。今者，對於加入此種運動者至少暫予以限制之一切提議，終遭否決了，蓋兒童先鋒應爲一個「羣衆」的組織。同時該項運動的增長是必要的，因爲兒童運動的增長足以表示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在工人農民間的威力之增長，表示工人農民願望付託其兒童之公民教育於共產黨人。

第五章 蘇維埃之定期出版物

革命前俄國的定期刊物，一方面大概是官廳的刊物，另一方面是黨的刊物。有幾種新聞報紙或定期刊物，是由政府的各部處刊行的；另有幾種則常稱為特殊政治部分之「非官廳的」機關報。凡較重要的政黨都有它的機關報，通常悉以政黨機關報稱之。至在莫斯科所印行之最大新聞報紙，則有其顯著之例外；該報無一定的政治淵源，且內容的記載主要是新聞消息，不大注意社論或政治的探討。以其較諸該國其他的報紙，具有特性與版子大及銷數多，此種莫斯科的報紙，時被稱為俄國的「美國報」。各種最重要的新聞報紙與雜誌，係在莫斯科與彼得堡二城印行，讀閱者大概是屬於城市的人，與各知識分子，及官吏階級。合作運動的報紙與雜誌，已開始及到工人甚至深入農村，但是一切新聞報紙銷行的總數，在超過一萬七千萬的人口，尚不到三百萬。各種省方的新聞報紙，除了基輔 (Kiev) 華沙 (Warsaw) 或敖得薩 (Odessa) 幾個大城市以外，其刊行大概是規模很小，且無色彩的。

在革命以前，一切出版物受不同程度地檢查。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出版的條件，尤其是各種定期出版物，在刑罰的檢查制度之下，有些地方較自由。初步的防範的檢查，僅在間接方面仍被用到，且主要的是對於書籍。一

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之時，檢查法復呈嚴格，尤其正當戰爭的第一年，反抗運動高漲的時候。此時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之行到工人與農民方面去的，都嚴加防範，且有許多種被罰款與受防範的檢查法接洽。在軍事檢查掩護之下，最嚴格的總檢查予以厲行。不過，革命以前的出版界，對於政府政策，表示批評的態度是可以的。同時它可以很坦白地討論經濟與社會制度之顯著的弱點。國會設立了一個講演台，得以自由發表意見，在這地方的出版物，得免檢查。但在國會中包括社會民主黨之布爾塞維克派的一切政治派別，都有發言人參加的演說與辯論，檢查當局不許在報紙上發表，此事不過不大多見而已。

出版之絕對的與無限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得以達到。在舊統治崩潰以後，當前幾個月的大混亂時期，即軍事檢查亦停止施行，以前官辦的與半官性質的新聞報紙與雜誌，以失卻維持隨舊統治而消滅，以此，實際上沒有各種政治報紙與新統治站在敵對位置的。在革命時，於民衆間所顯現出來的與負領導位置的新制度——蘇維埃，時常承辦了從前官辦的與半官性質印刷物，同時守舊黨與守舊人物所有新聞報紙印刷機亦同承收，並用此以印刷其自己的機關報。蘇維埃第一種機關報是消息報（*Izvestia*），屬於彼得格勒的工人與兵士代表的蘇維埃。各社會主義的政黨，亦得到各大印刷所的管理權，有時由於排字工人或管理機器者用簡單手續估領之，故對於出版完全自由，得有實際的便利。當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之間，及各不相同的社會主義集團之間，相互的鬭爭日益發展的時候，每種特殊的報紙之黨的性质隨之益形顯著。

一九一七年中夏，以革命運動中各黨相互的傾軋，致臨時政府方面，試予言論界以某種的限制。代表溫和社會主義黨與非社會主義黨的克倫斯基政府，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反對繼續戰爭，與主張推翻臨時政府，封閉了好幾個布爾塞維克黨的報紙。但是幾個日裏，這些報紙復行發現，並因為臨時政府的薄弱無能，與工人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採取了直接行動的方法，這些報紙得能繼續刊行。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初期，出版的完全自由實際上是盛行的。再則，各社會主義黨以民衆的名義，在各蘇維埃中亦能得有國內好幾個最大的印刷所，並此，使他們在實際上得以利用此種新自由。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差不多立刻引起出版界新條件的產生。蘇維埃政府首先頒佈的命令之一即是出版法，此種出版法實是正式檢查之重立。新統治之收歸國有政策，直進入出版界；工人與農民要得最重要的「生產工具」，以便保障他們所奪取的政權。一切廣告事業歸國家管理，是出版與一切印刷企業國有化的先聲。各種非社會主義的與非布爾塞維克社會主義的報紙，在起初幾個月間得能維持刊行者，由於屢更其名，與屢易其編輯及得黨委員會與私人特種經濟的幫助。但是到一九一八年夏季，一切反對黨的出版工作，與即屬於純粹商業性質的，在蘇維埃政治管轄的區域內，均被禁止活動。其非社會主義與反對社會主義之各黨，正式拚諸法律以外，作為「民衆的仇敵。」這時候共產黨在政治組織的場合裏，已建立合法的特權，且此種特權伸展到出版界裏。同時，蘇維埃政府國有化的計劃迅速進展，對於出版物實際上已完全達到實現，甚至於及到一切印刷物之分散方面。

在革命激烈衝突的時期，共產黨人視統制印刷物是鬭爭最重要的目標，並在此得以先成其勝利。其淨得的效果是：政治印刷品之國家的或共產黨的壟斷權之建立，對於一般出版界行實際上的壟斷權的國家出版部之組織，與檢查機關之設立。在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採用之時，出版界之組織雖有若干變化，但在初期的革命鬭爭佔着重要的各種原則，仍視爲現行的「革命原則」。

革命的出版物要特別重視宣傳。當激烈鬭爭的初期，此理尤爲真確。按革命的領袖們之見解，革命仍在繼續進行印刷品的宣傳作用，共產黨人絲毫不肯放鬆。報紙上於純粹消息的記載，雖佔了很大的篇幅，但是對於評述的與理論的探討，依然十分注意。分散的方法視爲革命行程上之要素，而特別加以注意。此種出版物之作用，不僅足以增進革命的熱忱與意識，而且是政治活動之得能具體的與實際的表現之媒介物。在蘇維埃公民訓練之總計劃與大綱中，對出版物有特殊的任務規定出來。在此有幾種新奇的現象發生以應付目前的情況，同時亦爲革命運動之要素。各種「活報」，「壁報」與工人農民及紅軍兵士的「通訊員」之饒有興味的制度，均是蘇維埃報紙的特色，且爲一般蘇維埃體制的特色。這些特種的報紙，與由閱讀者經常通訊之有系統的組織，將加以詳細敘述，因爲這些都是以公民訓練爲宗旨的報紙之有意的與直接的利用。各種小冊子與傳單均得廣泛應用，以補報紙雜誌等之不及。上述幾種出版物形式的發展，是由於各種情況所招致，例如不識字的衆多與交通工具的不良，亦有由於他門便於宣傳之故。

蘇聯各種新聞報紙得分爲很確定的範疇，這些範疇可以一一規定出來，首先是蘇維埃機關的出版物或爲每天的與普通的，例如伊斯維斯太意即「消息報」或爲每週的或爲每月的，例如政府對各部處之較專門的出版物。有幾個人民委員會，亦以新聞報紙形式發行日報或週報，這些報紙都是政府的各部處的機關報紙。這類中最重要的新聞報紙，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消息報。每省的地方執行委員會亦間有其消息報。他類最重要的新聞報紙，則是真理報（Pravda），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行。黨的省委員會或有其地方性的報紙，而亦稱爲真理報的。共產黨採用這個名字以名其機關報，是早在當它僅爲較大的黨組織以內之一個集團的時候，後即保留此名以爲一種商標（俄文義爲真理）。在省城裏時常僅有一種報紙，合蘇維埃與黨二方面而爲一種的。政府機關報與黨部機關報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且黨報總館是在政府裏佔統治地位的黨之機關報。除了黨的真理報以外，還有共產青年團的真理報，由共產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發行。最後，共產主義者第三種組織，在兒童間之兒童先鋒運動，亦有它的真理報，其形式與編製雖同新聞報紙，但是一種週報。

這些蘇維埃的與黨的機關報，被稱爲蘇維埃體制中之「指導」的報紙。經過這些報紙的指導作用，「共產主義路線」得行於其他一切蘇維埃的或黨的報紙。此種報紙有很大的銷數，只有一個例外，現在得能看到黨的真理報銷數超過六十萬分，多於蘇維埃主要的機關報在莫斯科印行之消息報的銷數。因爲黨在蘇維埃裏所站的位置，則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在事實上是蘇聯裏最重要的政治出版物呢。

第二種大範疇是「羣衆」的新聞報紙，並可按工人與農民二階級再分爲二類。此類新聞報紙同時又是黨的出版物。但是這些報紙不稱爲黨的「機關報」(Organ)而稱爲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或地方委員會的「新聞報紙」(Newspapers)。這類的新聞報紙時附署爲「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行。」這類新聞報紙的名字，通常表示其所擬定之特殊刊印的門類。這類最重要的標準報，是工人新聞 (Workman Newspaper) 與農民新聞 (Peasant Newspaper) 二種。

莫斯科的工人新聞較黨的指導機關報，版幅較小，而編法較爲通俗化。對於革命的理論與主義的文章所佔的部分較小，而各項新聞的記載較多。工人通訊員的通信，是刊印於或摘印於此種報中。此種指導的大報之閱讀者，概爲各俱樂部與各委員會一類之各機關中的工人或爲黨員的工人。此種較通俗化的報紙，是以由私人定閱達到工人民衆爲目的。莫斯科的農民新聞亦稱爲「新聞報」，但是每星期纔刊行一次。該報在每個定期出版物中爲銷數最大者，其通訊員的設置收到甚好的成績。通訊員的組織，將於討論「工訊」(Nabkor) 與「農訊」(Selkor) 中再行細述。這二字是工人通訊員與農民通訊員二字的縮寫。有一種新聞報紙叫做極窮的農民 (Poorest Peasantry)，由莫斯科的真理報館印行，是共產黨人所依託的這部分農民之具地方性的省報。在最重要的省區裏，爲工人與農民而刊行的地方的報紙，與中央的機關報時而頡頏或時而輔翼。莫斯科中央的報紙與省方的報紙的關係現在將予以探討。

職工會所印行的各種新聞報紙，似可包括在指導的報紙與羣衆的報紙二個範疇之內。有一個著作家將這些報紙歸於「職業的」一類，而事實上這些報紙對於自己的一羣閱者之職業的利益確予以注重。我們的新聞報 (Our Newspaper) 係職工會的全聯邦中央蘇維埃在莫斯科印行，就是這機關的機關報，且是這類報紙最重要標準報。教師的新聞報係教育工作人員的職工會之中央機關印行，是另一種職業的報紙。這兩種報紙廣有銷路，並包括一切政治大問題，故對於某種職業團體，能供給一般的消息。

「合作社的」新聞報紙，係合作運動的中央或地方的團體印行，它自己成一範疇。供紅軍兵士閱讀的新聞報紙，係軍事人民委員會設立專門機關編印與發行。莫斯科的紅星 (Red Star) 就是軍隊中最大而最重要的報紙，同時如工人的農民的新聞報紙一樣，對於兵士通訊的披進與利用亦特予注意。

僅有少數的定期出版物不能歸入上述任何範疇。此類的大報顯然是沒有的。莫斯科晚報 (Evening Moscow) 是近似西方各國的一類報紙。此是莫斯科惟一的晚報，而比諸各種晨報紙張爲小，共產黨人鄙之爲「路畔的報紙」 (Boulevard Sheet) 在政治理論上與消息記載上都不甚重要。再有一種微妙性質的，幽默的週報與月報。這些都是針對政治問題的，並大部分是插畫。最後，所謂「無神」的運動也有它的出版物，其最重要的是一種諷刺的與廣告的圖畫週刊，文字很少，供青年與兒童閱讀的印刷品，是一種「羣衆」的印刷品，且與工人的與農民的新聞紙及週刊一樣，也是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印行的。

關於技術與政治各命題之單本與成組小冊子的應用，曾大規模地特別進展於農民中間。由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黨或團的委員會，兒童先隊，職工會或合作社所刊行的各種小冊子，都可歸入上面關於新聞報紙所指示的幾個大範疇。在各種報紙與書籍剛着手行到的地方，各種小冊子較容易散佈。流行的政治諸問題，均以小冊子的形式予以說明與研討。所以有幾種成組的小冊子，亦是屬於定期刊物之一類，以便廣大羣衆得予消納。

在莫斯科所印行的新聞報紙佔有優勢，前已言及。從前列寧格勒的出版物與莫斯科的出版物本具同等的威權，但是後來因為政治勢力集中於莫斯科，並鎮壓列寧格勒黨組織之反對運動，致形成在列寧格勒蘇維埃與黨的機關報漸漸失卻重要的地位。在蘇聯裏，其獨立組織單位之政府出版物，例如烏克蘭，甚為着重，以便尊重蘇聯裏其聯邦的特質。在提創小民族文字的應用總政策之下，所謂「民族的出版物」業已發展。許多地方性質的新聞報紙，曾以該地主要民族的文字印行。一九二五年年尾，在蘇聯五百九十七種新聞報紙中發現有一百七十種是以非俄羅斯的文字的。雖然莫斯科的新聞報紙，尤其是真理報視為蘇維埃黨、職工會或合作社之全聯邦的機關報，具有最大的權力，但是民族的出版物，亦有其自己指導的新聞報紙。

地方的與省方的出版物，在大體上是柔弱的，且時為無色彩的，雖比在革命以前好些。為的力求地方的新聞報紙質量的提昇，例如有政府所辦的「塔斯」(Tass)電訊社，為之廣播各種消息。「塔斯」每天約貢獻二千字，由無線電發出，將當日莫斯科各新聞報紙的內容扼要摘出。因為是政府所特有，故「塔斯」得以無線電供傳

播作用。關於國外消息，由郵件送遞到省方的新聞報紙，亦由「塔斯」予以主持。聯邦裏每個共和國裏消息的輸送，有其自己的通訊社，此種通訊社供給中央指導的機關報以地方的消息。但以地方新聞報紙技術上設備的缺乏，不足以任其調遣，致他們與莫斯科新聞報紙的爭競成爲不可能。莫斯科一切範疇之中央機關報，所以得與地方的報紙爭競者，大半由於其具最大的威權，精良的排印，與最有效地握住敏捷散佈的問題。政治上的顧慮，亦使莫斯科的報紙得從容進展，而地方的出版物則受損失。有些共產黨員竟主張用最積極集中出版事項的政策，以便更明顯地厲行「共產主義的路線。」關於技術上的與政治上的最重要週刊與月刊，都編印與發行於莫斯科或列寧格勒。

不論那類性質的一切出版物均須受檢查。至於各種書籍，須經過初步的檢查，且該出版物在其封面上須標出許可證的號碼，以此，該出版物得以付印與出售。同時又須標出冊數若干，經檢查認可以後得以印行。此種檢查制之所以繼續施行者，其所持的理由，以爲革命的鬭爭，在蘇聯裏與在其他各國裏尙在進展之中，並以爲受內部的檢查可以防備「敵人」階級，使其藉印刷品以爲有力的武器，付之徒然。新經濟政策施行後，予這些敵對勢力以讓步。但是此種讓步是屬於經濟的，並不是有同樣的政治讓步。對於各種定期刊物，檢查權是藉選擇的方式與各編輯及其他館中人員之支配而實施。沒有未經登記過的印刷所得許存在的，並一切印刷機關之出品，須加謹慎的與詳細的查照。在共產黨內，檢查權是藉黨報或其他出版物之編輯部而實施，該部是由高級黨部之選定與

支配的。最近二年來（按係指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反對派的領袖，以黨報報欄受黨檢查不許供彼等之用，曾組織一細小秘密的印刷所。此種破壞黨的紀律是嚴厲處罰該派著名領袖如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主要原由之一種。

一切指導的機關報之編輯都是共產黨人，並由蘇維埃或黨部任命。由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印行的新聞報紙與週報，其編輯人員是由黨所選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黨的支配，保障任命共產黨人為政府的機關報之編輯。地方的黨報之編輯部，則由該地的黨委員會所選立，但須經過中央委員會核准。羣衆的新聞報紙與技術的出版物，有幾個負責的編輯，得以在黨外的人來充任，因其具有技術上的資格。在此處，正與在他處相同，在舊制度所訓練成的專門家，其引用洵屬必要，直待新專門家養成之時。加之共產黨人亦有在編輯部裏，故這些出版物亦是在共產黨人指導與支配之下的。

在消息報與真理報一類新聞報紙中，由非黨員所投的稿件很少發現。有一個前消息報的編輯說道：假使採取此種辦法，則欲保持這些領導的機關報適當的論調成爲不可能。至在科學或技術性質的定期刊物中，非黨員的投稿是接受的，且有時該刊物內容的大部分充滿這種稿件。非共產黨員的經濟家或教育家，不能發表意見直接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政府之經濟或教育政策所根據的原則；這是一個例子而已。這些政策實際工作的批評必須限於「機械主義的缺點」之討論以內。以此，在非政治性質的各種出版物——包括技術的與科學

的定期刊物——共產黨人亦有指導力量的運用。關於文字方面，共產黨人得受有與保留超過固定最高額酬金的規定，一部分理由是希望對於出版物能保障與增強一些共產黨人的力量。

一黨壟斷政治的出版物，許多共產黨人承認爲有相當的缺點，例如反對派有用的刺激被其謝絕。在討論此點時會有人辯護說，國外「資本主義的」世界之出版物支持着這種反對派。蘇聯各新聞報紙之共產主義的編輯者，明顯地很仔細接閱俄羅斯羅政治逃亡客所辦的新聞報紙。革命以前俄羅斯之一切政黨，曾於西歐各首都組織有中央委員會或國外代表團，並刊行機關日報與週報。蘇維埃新聞報紙對於這些「僑民」出版物之評述與記載，時予以收集與答覆。

大家公認：蘇維埃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之公辦性質，實予其真正統制的影響與力量。特種法規規定此種統制之如何運用。蘇維埃機關不論爲行政的或經濟的，必須注意報紙上關於它之記載，即或該項記載僅由於一個通訊員的通訊亦不可疏忽，在此種記載中所含的批評必須在同一報紙之報欄裏，予以答覆。最近，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訓令一切國家各工商業大機關：注意並答覆各種出版物上代表蘇維埃公共意見的批評，不必待中央當局再度的訓令，應即對該報紙上置疑各點致函予以答覆與解釋。如要將這種形式上規定的通則之實施的實際情形，予以研究與分析，卻是不可能。莫斯科真理報幾乎每天都有一欄，標題爲「真理報所得的幫助。」在這地方報告從前有人在本欄提出抗議的政策或實施，那些修正了，那些完全廢止了。有幾天標題改爲「真理報尚未

得到幫助，「再在此欄披露反對特殊弊端的申訴。

蘇維埃出版物的公辦性質，義指該出版物不是純為商業性質的。但是編輯的技術問題引起專業的新聞記者發生。同時各編輯的揀選方法及其約束的規定，使他們成為蘇維埃機關的或黨的一種公務員。為要打擊公務的新聞記者集團裏官僚化的傾向，與要利用出版物以為公民訓練之一種工具，出自工人與農民的「通訊員」因予以錄用與加以組織。同時對於「壁報」正在積極提倡，以為補足與某種意義上以為補救正式印刷的新聞報紙之所不及，並且供給任何人以容易發表其公民活動興趣的機會。個人參加其所屬之機關的「壁報」之編輯與推進，當視為公民活動最先的表徵。

壁報與通訊員在其宗旨上與組織上是密切聯絡的。參與壁報時能表示出與訓練成一個通訊員的活動。「工農訊員」(Работник)——工人農民通訊員——的全聯邦會議，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召集，該會報告經常刊佈的壁報數目全聯邦達到四萬，在這個數目中，約有一半是在於農村裏。通訊員的總數約二十五萬人，其中農民約有十五萬人，工人約有六萬人，紅軍兵士約有四萬人。在一九二八年通訊員的人數，增加到超過三十萬人。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新聞報紙與雜誌，亦起始從其閱讀者來組織通訊員。這些數字，表示羣衆參加新聞界的這兩種形式之廣播，而「工農訊員」運動，堪稱在蘇維埃之下正當發展之一種「勞工的民主主義」(Workers' democracy) 的表現。

壁報在一切現實的蘇維埃制度裏面自成一種制度，最少在政治最活動的市區裏是如此。例如一入進一個銀行裏，委員會裏，工廠裏或俱樂部裏即能在其走廊之下或其同樣顯著的地方，找到該機關集合的壁報。在鄉村裏壁報亦甚盛行，於鄉蘇維埃辦事處，或鄉讀書室與甚至於鄉村學校中，也會看到這種壁報。有幾個壁報在編排上堪稱精構，即其最遜者在表面上亦修潔而能動人的。有些是以手寫成印體字，但是大多數是用打字機的；用印刷機的則沒有。標題與框格概用彩色；剪選的或原畫的插圖亦時常是着色的。莫斯科農民新聞報發出具彩飾的欄邊的大張報紙，以備人作壁報之用。這大張大部分都由該報編輯部準備好，以便易於黏貼。大的壁報廣有五呎或過於五呎，高有三呎或四呎。其最大的報紙須加懸掛，且尤其笨大得難以閱讀。有時壁報稱為特殊機關之共產黨之細胞，或共產青年團之細胞之機關報，或一學校之兒童先鋒前哨之機關報。這三級「活動分子」均被望在壁報上能站在主動與領導的地位，時常成為編輯部的當然參加者。但是，壁報應作為其全集團的機關報，不是共產黨人，共產青年團團員或兒童先鋒在該集團內各分子之機關報。對共產黨員所期望的領導權的實施問題，及避免對於羣衆實行護短的問題，即在此蘇維埃公民活動的雛形亦是存在的。

壁報不受正式的檢查，但是小地方的共產黨與蘇維埃當局者，對於壁報施行檢查的事例則時有之。此種事情受了禁止，且似有漸漸減少的情形，雖然現在尚有壁報題着「查訖」之事例的。壁報報欄的投稿者，得享有完全的自由與受黨完全的保護，但是報紙又載稱投稿者，有被發現或至少被懷疑行使這種自由而被機關解雇的

事例。這些事例會予公揭明佈，以爲力防此種事情之效尤的一部分工作，蓋此種事例洵足減低壁報之效能。在這些平凡的報紙中，亦足以見出蘇維埃各實驗制度實際工作之原委。由於這些報紙的評論，負責的領袖們得定下他們「蘇維埃機關合理化」的計劃。

壁報在其批評上是非常坦白的。有時它是所批評的機關一般精神之所在。各個人將予以指名，而他們的態度或行爲將予以探討；書記則將攻訐其裝假病，主任或各部處之主腦則將攻訐其凌弱或錯誤。所以共產黨人主張不僅允許而予以鼓勵的自我批評之自由，得在這些被雇用且在內部工作的人員，對於一個機關日常工作之不受檢查與不需簽署的批評中，予以極充分的實現。要防壁報不致於成爲暴露私人的憤懣與發洩個人的怨恨，則是編輯部的責任。編輯同時應受忠告，不可在壁報中開出一定地方，作一般政治的討論以代替印刷的報紙。壁報所涉的範圍是其所代表的機關與團體的生活與工作。凡特殊集團參加到各種大活動如扶護運動或政治慶祝會等，則由壁報予以討論與若干的指導。所以這種壁報的制度之政治作用亦是很大的。黨人與團員的參加決定了應予遵循的政治路線。此種事實是自由批評的限制，務須注意。

此種壁報笨大的紙張，拿動雖甚困難，但是夾訂成帙普通仍予以保存的。有一個新聞報近來組織一種壁報展覽會，用以對此饒有趣味的報紙作詳細分析的標準。縮小珍本編印出來，以對壁報的編輯與裝飾的技術問題作實際的提示。共產黨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甚至於兒童先鋒，在其固定責任上負有維持與推進壁報的義務，

學校的教師，尤其在鄉村以內，受令幫助其當地的編輯部以此種工作。代表農業人民委員會的地方農業專門家，同樣地受命與這個密接的與宣傳的重要工具合作，且應用此種工具於其工作之中。壁報在廣大羣衆閱讀報紙剛剛開始的地方，實是一種報告消息之重要工具。壁報不僅爲代替通常印行的報紙；它並提創與表現公民活動。壁報之饒有興味與輝煌揚麗，外來參觀者對之當一目了然，此種人的注意時常爲該制度活動方面所喚起。壁報最大的功用有在於能鼓勵與訓練寫作一端。學文學的學生正轉移其注意於這方面，並說壁報正產生許多表現其真文學天才的作家呢。壁報常置人員的平均數從五個到十個。上面所估計的四萬種壁報，通常每二星期發現一次，是巨數作家大衆之一個簡單的公民活動的方式。

爲分散於小集團中用的以複寫版印成的報紙，也有刊行，不過爲數不多。若着手進行此種事情，該集團則設立一出版部，不過其負責的編輯是由黨細胞任命的。以此，這種出版物也受相當的檢查；因爲複寫的報紙有似通常印刷的新聞報紙，不比那些壁報，則對於這種報紙規定統制方法尙屬妥當。

工人通訊員與農民通訊員的制度，齊諾維夫在該運動一個全體會議上釋爲「實踐的列寧主義」(Practical Leninism)。這種制度實是革命的產物，它大概是自然生長的，雖然早到一九〇四年的時候，布爾塞維克派已發展其自己的報紙，列寧主張應努力使工人實際參加於黨的新聞報紙方面。另一領袖在描寫特別注意鄉村通訊員的提創與利用的首要農民新聞報紙之成績時，對該報紙的閱讀者述稱他們是「在人類史上初次以

其自己的手來設立自己的報紙的勞工們。」通訊員制度之開始提創與組織，初由於中央黨報真理報的編輯機關。在一九二三年，此種運動纔真正具活動的與有組織的性質。及一九二五年，這些通訊社曾成立有一千個以上，而以合作與自己訓練為目的。

通訊員的組織是以編輯人員為中心與由於編輯的人員來組織，尤其是在於民衆新聞報紙方面。在鄉區，學校的教師與醫生可作通訊員，但是大部分是工人與農民。且厲行階級的原則；富農不可以作通訊員。並特別努力要鼓勵貧農來作通訊員。這些通訊員不受報館的正式任命，即稱他們為代表該報的卡片亦所不受。此點之被重視，以示這些通訊員在其原來的社團中，不致再有別種的「權威」，而仍以原社團的代表資格與其他各機關來往，其與報館來往也是一樣的。通訊員對於蘇維埃機關，黨與報館，都要成為「敏銳的試探者」(Pulse-takers)。全體通訊員之半數大約是黨員或團員。雖然黨員與團員受命幫助與促進此種運動，同時他們又受命不可把通訊員隸屬其地方的組織。地方通訊員集團之活動中心當為地方的壁報，但是又主張該運動所具組織的性質，祇能是繞着另一新聞報紙的編輯機關以為中心。黨的力量設施必須為因地適宜的方法，不能有任何行政上的壓力，且各通訊員成為黨員與非黨員羣衆之間另一種聯繫的方式，共產黨人利用這種聯繫來左右與引導非黨員羣衆之活動分子。

「工農訊員」運動，在加重個人工作負擔的鬪爭的大氣壓之下業已發展，有許多農民通訊員，曾發現了他

們的活動惹起身體上的危險。一九二六年在革命藝術家聯合會的展覽會中，有一張畫名為新戰線，引起特殊的注意。該畫表示一個中等農家，他的家主死於地板上，他的寫作的材料零散着。當子彈正從窗口射入時，這個農民的通訊員正從事於預備他的報告。當一九二五年間，曾有二十四個農民通訊員遭暗殺，有十件截擊未遂。報紙對於此種事件十分注意，且是年在各種付諸審判的案件中，農民通訊員的兇殺案成爲一種。當截擊通訊員在幾個地方幾成爲流行病時，司法人民委員會通令其檢察機關，凡此種一切的截擊當歸入反革命行爲一類，在刑法條文之下應處死刑。通訊員遭遇着二個敵對的集團。因爲暴露了地方蘇維埃當局與黨部工作人員腐敗與專斷的事實，這班通訊員成爲這些分子截擊的對象，而這些分子黨方向未予以廓清的。通訊員又要報告其敵對之富農分子，尤其是當他們在合作社中，甚至於地方蘇維埃裏，得能獲得立足地時，於是便有報復的事情。

共產主義者的敵人，解釋此種對鄉村通訊員的截擊是整個農民的抗議，他們視通訊員，以爲一種很好險的新權威的代表，扮演其偵探的伎倆。通訊員所表的特性，據共產黨人自己所給予解釋的根據，以爲是蘇維埃政府的「眼線」(eyes)他們以爲通訊員的功用主要的是偵探與報告的功用。黨的監察委員會與工業監察委員會廣泛地利用通訊員以報告當地的情形，且此種慣例使通訊員是偵探的意見益加明顯。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通訊員的地位較少危險，但是，即屬現在，幾處地方，地方的通訊員覺得公開工作洵非妥策，乃小心翼翼地隱藏其活動的事實。他的通訊不簽名，且報紙欄內與他通信是用暗碼。但是農民通訊員日見其承認對於某一新聞報紙的關

係；他們的主任編輯要求如在公開工作可能的地方，應公開工作。一九二六年秋間，在一個鄉村社會裏，有一個記者得以悉心研究，而鄉村通訊員仍是「在掩飾之下」來工作。所以要與該運動真正的代表談話是不可能的；同時，若試作恰當推斷，在社會裏那種成分，以致通信員必須隱飾其表裏一致，亦似乎無濟於事的。通訊員現受報紙的編輯之勸告，他們在寫稿時少注重於暴露個人的弊端，而關於制度上之功用之積極的提議，應多注重。此種勸告或可以希為減少通訊員之必遇的危險吧。

通訊員時常召集會議的習例正具組織化。在莫斯科，工人通訊員按例召集晚上討論會。一九二六年五月，該運動第三次全聯邦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真理報與其特種雜誌工人通訊創導之下，召集起來。這些集會稱之為「代表會議」(conferences)，不是「代表大會」(congresses)，因為他們沒有強迫的威權，而僅有磋商與報告。同時此種會議的參加者，黨員沒有高於非黨員的權力。這些會議之慎重限制的性質，是按已揭示的政治路線，要使通訊員運動不致變成太機關化與附從於黨。

為通訊人員而編的特種刊物，由各報刊行，這些報紙對於推進此種運動是最積極的。此種定期刊物大概有二十種，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真理報的工人通訊與莫斯科農民新聞報的編輯機關所印行的鄉村通訊。這些刊物列論一般的政治大問題，作為各通訊員的指導，但是對於該運動的理想與原則特予着重，並在工作方式上，予以實際的提示。再則，一般的通訊之特種指導，亦刊出以為通訊員的應用。這些刊物與指導書，與其代表會議一樣，以

給通訊員特種訓練爲目的，視這些通訊員爲一種已表現出具體的公民意識之集團，各通訊員研究組的設立，是以工廠委員裏或工人俱樂部裏的壁報爲中心，這是僅述其較重要的幾個地方，而其主要目的在於訓練其社員以成爲公民的通訊員，論出版事項之歷史與組織的教本，會備以爲此等研究組之用。更專門的共產主義的訓練，則得之進入「政治訓練班」一類學校，或做馬克斯——列寧學社的社員。在這些學校裏，通訊員不可以分成爲一個特殊的有特權的集團。這是希望該運動會，有裨於蘇聯出版界職業新聞記者人材的養成。要加入最高共產主義教育機關，以養成新聞界之黨工作人員，則得有活動的通訊員的證明之工人或農民較爲容易。

大號的農民新聞報在莫斯科由黨部印行，在握住地方之廣大通訊員上，特著成績。據說銷數超過一百萬，這個週報具新聞報紙同樣編排，銷行遍於全蘇聯。在作者訪問過與查考過的鄉區裏，此種莫斯科機關報，比諸農民所刊行之地方的新聞報紙，流行更廣。據編輯員的報告，每月約有五萬封信從其農民通訊員間接到。這個大量的材料分發於十個編輯來整理，他們除了審閱及類次由農民所寄的信件外，沒有其他的責任；前充省報的編輯時被選來擔任此種工作。因爲他們熟悉鄉村間的情形，每件收到的信都承認有效。從農民所發的通信函件，有許多是屬於個人訴不平的；該信件乃轉遞於訴不平者，所屬之裁判機關。假使該信件是討論一般的情形，與表示作者方面自覺的「社會的」態度，則該信件的作者，受邀爲一位通訊員。送給他通訊員的工作與責任的說明書。以此經常通信人員的幹部得以造成；在一九二六年有五千以上農民不時送發通訊稿件，並編入地方的通信學社。

特別完善的信，表示出公民意識之最高度，與把握到農民生活主要問題，乃選出登載於新聞報紙上。此種材料若被採用，則該通信員以固定篇幅的比率而受酬金；平常支付大概從三盧布至五盧布，這個數目在俄國的農民看來已是不少了。其不合於發表的信件，則用作標準的論文材料，而原稿作者也受報酬。在審閱程序上，各種信件均按題旨仔細加以類別，一月凡一次從這些信件中，將農民的「意見」提綱歸納起來，並送給政府各部處與黨部，此種按月報告不是公開發表的；而僅為行政上的目的。曾有一種批評，以為這樣運用通信稿，使報館變成另一政府的團體，而非公共意見的喉舌。這些信件作各種利用以後，則予以編次，以為特種研究及未來查考之用，這些信稿多多益善，據說當時編訂成帙的冊子含有一百五十萬以上信件。

雖然活報在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的文化與政治活動的題目下論之較為妥當，但是此處亦必予提及。這些機關的各地方團體，在叫做「藍衫團」的專門家團體指導之下，按當時流行的題目，表演諷刺戲文，混合音樂、舞蹈、演劇與一種體操技術的表演等。雖其佈景與服裝力求排演的便利，但是在該運動裏的專門職業家，時被人批評為傾向於「資產階級消閑」(bourgeois cabaret)的方法。「藍衫團」的諷刺戲文雖受檢查，但其描寫實際情形是很諷刺的，且時常調笑革命的根本原則。他們馴致將革命初期的口號作笑話。「活報」所應具的開玩笑部分，對政策與實施時常作可驚異地直率的批評。青年工人、工士與農民的串演集團所表演的「活報晚會」是由於該運動的專家分子所激引，且有時為其所訓練。這些串演的表演者，缺乏「藍衫團」所能做

到之雍容的優美與藝術，此種表演之不雅馴，足以減低效能，且有時弄到所希望者適成相反的印像，致招共產黨領袖的抗議。但是活報是公民教育最有力量的工具，尤其是在農民裏，該處讀物仍是有限，而戲劇的意識則加強發展。此種表演有傾向到刻板化的趨勢，而如一個批評家說：要成了一種雜誌不成一種報紙了。其題材變為普及的，而非當日切近的時事。理想上，地方串演集團每星期須有二種或三種不同的表演，使活報在事實上成為煽動與宣傳的有力武器。參加表演者，於表演的準備中須有特種的政治教育，這當認為是該報制度之重要形態。同時由活報裏，在革命初期不能看見的幽默意義，得以自己表現出來。

新聞報紙分散的方法，曾予以特別的注意；且關於銷行問題，具饒有興味的試驗。在革命的初期，當新理想須作極廣大宣傳，與共產主義的原則正當更予廣泛應用的時候，印刷物的分散成為國家服務之一種。在那時，一切印刷物由政府或黨部各機關印行，完全沒有商業的成分。當時正屆設立的新機關與團體，接受新聞報紙與其他印刷品須視為例行的事。付價一項在機關與機關之間，僅以貸與負方存記。乃以紙張的缺少與印刷器具的窮乏，致產額減少，不能達到此種方法所屬望的廣大分散的標準點。另一種理由使在分散上遭受初次試驗之失敗的，則為政府各機關證明其不是善於分散者。各種印刷品積堆於蘇維埃或其他團體之金字塔結構之上層，而不能及到下層或以此不能再進展到廣大的羣衆。

新聞報紙與出版物的活動，隨着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在大體上被放在商業的基礎上。此即是付定閱費原則

之重立。在現時，中央各大報正在商業的基礎上進行，由定閱費來維持；雖然這些報紙因是蘇維埃與黨的機關報，能享不少的特權。有許多機關必須備有此種報紙，視此爲當然之事。廣告事業重新採用，大抵是登國有化企業的廣告，這是各報館收入之最重要的來源。省報在經費上所處的情形較壞，而大多數地方的新聞報紙，概受地方蘇維埃機關或黨部的津貼。與各個人相對的是各機關，他們是各報的大多數定閱者。再則有所謂「集體定閱」制，此制是一羣人定閱一分，有時每個分子各定閱一分。在此集體定閱中，無疑地是含有強迫的成分；集體定閱是在公開集會中提出與表決。但是個人定閱現正予以優待；蘇維埃與黨的工作人員，在出版界裏所得的結論是：個人定閱畢竟是分散最效力的方法。

因爲採用個人定閱的政策，新聞報紙的銷數業已迅速的增加，且已因此使定閱的價格得到相當的減低。據蘇維埃統計上之所示，新聞報紙的數目，在革命以前於印行八百種中，總銷數約有三百萬分。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有新新聞報紙五百七十七種，內有幾種是週報性質的，銷行數有三百七十六萬九千一百七十分。一九二五年八月，新聞報紙數目增加到五百九十五種，而銷數幾有倍之，達到七百二十八萬四千二百四十九分。當這短期間中，農民的、共產青年的、紅軍的各種新聞報紙的發達，是總銷數增加的最大來源，雖然中央指導的機關報的銷數亦有很顯著的增加。現在，日報與至少每週出版一次的新聞報紙總銷數，據一般估計，超過八百萬分。工人俱樂部、圖書館、市鎮讀書室、鄉村讀書室及蘇維埃與黨的各機關，仍爲大多數的工農閱讀各種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以及各

種小冊子各種書籍的中心，但新聞報紙又正起手在個人家庭裏面找出路。據云莫斯科的工人過半數都各定閱一種報紙。十個或十個以上的家庭共同定閱的辦法，在農民社會裏仍屬有用的。

在工人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各學社中，「新聞報紙友誼會」或「圖書館友誼會」是非正式的懇求定閱者。因為這些學社是政治教育的園地，希望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團員能在此主動與領導。兒童先鋒之一種公民職責是在其家庭中，在一般工人中，與特別在鄉村裏，來推進新聞報紙的銷行。自動的公民團體，例如「打倒文盲協會」甚至於如「國際革命家互濟會」是印刷品間接的宣傳機關，他們自己也有印刷品與宣傳品。蘇維埃與黨的團體對於定購有簡便的辦法。個人受委託的要求定購辦法亦在應用。在大城市裏，販報兒童與新聞報紙零賣處，零賣各種重要報紙及其他許多種週報與月報，而城市裏的許多看報者，以此按日購買報紙，這在定閱的遞送費上可以稍省一些。

以其各種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毫無例外地是由於蘇維埃或黨各機關印行或在其指導之下，所以彼此之間少有競爭。每種出版物預先在心裏定有其特種閱讀者的集團或有其特殊的地盤。在共產黨人支配與領導及蘇維埃檢查之下，一切出版物必須遵從同一的政治路線，國家出版部在普通出版界裏（定期刊物的出版亦包括在內）所得的領導地位，是蘇維埃體制另一種的特徵。此種連絡使銷行問題得能簡單化。合一切定期刊物之名稱與內容的公報是由國家出版部印發，在新聞報紙上與雜誌上之出版物的廣告，亦能助讀者以選擇最適合

其特殊興味之報紙與雜誌。共產黨以其特種出版部介紹每一類讀者以特殊的出版物。此種介紹在黨員方面似乎等諸於正式的訓令，在理論上每個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必須閱讀新聞報紙。兒童先鋒亦望其成爲閱讀者，且我們已看到爲兒童而編的特種刊物業已發展。這三個黨的集團在其各自的集羣與「集體」中，對於非黨員民衆應示模範與指導，同時羣衆新聞報紙之閱讀，正無疑地迅速發展起來。此種進步一部分是歸諸所採的分散事項之特種方法。

各種小冊子與傳單，歸於定期出版物一類中較諸歸於書籍中爲妥，在報紙零售處中與書店中均有零售。一種小冊子的大部分是分散於各俱樂部或各讀書室的書桌上，電影院的前廳是觀衆在此等候下次開演時，常備有讀書室。但是閱讀者選擇他們的小冊子，是在小舖子及較大書舖的陳列架框上與櫃檯上。報紙零售處不但在街上的側隅可以找到，即在一切機關，各種人民委員會，人民法庭及戲臺前廳的走廊裏亦可找到，書店開設於大城市裏，於一切省分的市鎮裏，與甚至於農村裏之一切區處。鐵路小站之報紙零售處通常亦是該地的書店。

書店與報紙零售處大部分是政府各部處，黨或其他團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公開的分散代理處。私人的書籍銷售所不在此列，假使將分列於各都市與大城市之道旁與空地的書攤不算在內的話，這些私人書籍銷售所大都是經售革命以前出版的書籍。蘇維埃出版物之非賣品，亦在書市場中山小販們發賣。國家出版部的書店值得特別提出來說。這些書店的招牌與房子的外表都是一致，可於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到處找到。這些書店頗能引

人注意，而櫃檯內部的陳列能誘人進入，並使其徘徊而不忍去。新書與小冊子陳列於櫃檯之上，以使人們容易審閱。櫃檯的不懇求客人購買，雖然這是國家管理之缺點的特徵。書籍與小冊子陳列的方式是一好廣告，並在這些書店中，時常看到許多人在審閱與甚至誦讀新的出版物呢。

共產黨人並不隱諱其以出版物為宣傳及煽動之工具的政策。新聞報紙日復一日的碰撞着每天興味的事，故被視為比諸書籍與小冊子更有效力。閱者鮮覺其容籌詳計的心力以創造某種「思想的」環境，這種環境的創造是共產黨人坦白地把定以作他們的任務的。新聞報紙在由一集團明晰計劃支配之下，能藉鼓勵，藉以下擊中民衆興味所在之這問題，另一下則擊中其興味所在之那問題而起作用。如此藉每天與持續的宣傳，特殊的活動形式得以增進。在共產黨人的支配之下，全部出版物着重一個論點與一切歸於獨一無二的解釋是可能的。指導的機關報逐日給出有權威的解釋，等於給黨員以訓令，得以輔助與厲行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或黨的中央機關發出定期正式的訓令。黨的委員會為工農所印行的新聞報紙，使此等訓令得以普及於大眾。

再則在積極階級鬭爭的時期，新聞報紙在性質上原視為政治的；按共產黨人主張，非政治的出版物不能存在。這不是說，按共產黨人的觀念，新聞報紙不能同時作為記載消息的。這是說：通知消息是宣傳、鼓勵及政治活動的基礎。由於記載消息，得引起閱者注意。但是，蘇聯各報紙的一切消息，必須「通過共產黨人的折光鏡。」一個會做莫斯科消息報的負責編輯者，在其編蘇聯報紙編輯之職務的小冊子中，說道：一隻狗被街上一輛車撞死的事

實，可作「君主專制的」描寫亦可作「無產階級的」描寫。以此之故，國內外的各種消息與新聞，不僅予以選擇，而且應完全合於共產主義宣傳與訓練的宗旨之用。這就是時常固守着「共產主義的路線」，「列寧主義的原則」或「馬克斯的解釋」，以為編輯政策及一切報紙新聞部分之基礎的意義。

雖然，這可以斷言，共產黨的支配、檢查，與蘇聯各機關出版物之擴大活動，保障工人與農民獲得為其自身利益而組織與應用的出版物。再則，工人與農民得藉通訊以獲實際參加所印行的發表公共意見的機關報之機會。由於特種訓練的組織，使這種參加收得實效，通訊員學社與壁報等就是這些特種訓練的例子，這是加重說明的。保全出版界之影響力，對於勞苦羣衆的參加具有真正意義。從公民教育的觀點上，通訊員的組織，壁報之廣為應用，與所謂「活報」的設置，其所代表穎異的與有興趣的特點，一部分是由於俄羅斯特種情境所招致，一部分則是革命之一種產品。一切新聞報紙之公家性質，使各編輯身上負了一種特殊的責任。這堪致信的；此種責任足以促進坦白的自我批評，這種的自我批評實是在出版物上所作的各種討論之特質，且表現於各種弊端之經常揭發與各種失敗的認受。另一方面，在蘇維埃與黨的各報上所揚溢着之公然樂觀主義，實足對許多共產黨人提示公家報紙之弱點。

第六章 蘇維埃的國家式範

蘇維埃的國家式範與其蘇維埃的政府形式，素為革命最重要制度的產物。由於這種蘇維埃政治的機構，發展為所謂「蘇維埃民主政權」。蘇維埃的政府形式之一種顯著的功績，依據其創造的與維護的人們說法，是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化為至低限度，雖事實上此種政府形式，同時能給予很切實的與有力的政府威權。在另一方面，反對在蘇維埃體制下的官僚習氣與官僚方式的鬭爭，是蘇聯近幾年來所發生的事情之一，並仍為未來若干時應繼續進行與警誡的事項。列寧曾有一次說，剷除在蘇維埃裏的所謂「官僚主義」需要一世紀的期間。

用以打擊官僚主義與強化蘇維埃民主政權的方法，是本諸更自覺的與積極的公民精神，要設法使這種公民精神發生實際的效力。據說，選舉的原則與蘇維埃政府的立法行政與司法各種機關的機構，亦足以使公民對此發生與表示積極的興趣。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在這方面有一種領導權，這領導權在許多點上是蘇維埃體制所特有的。稍具穎異的各機關制度業見發展，以構成蘇維埃民主政權的器械之要素了。

一切蘇維埃制度是以階級原則為根據，因為蘇維埃原以階級制度而起的。蘇維埃的雛形是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這第一個蘇維埃當一九〇五年十月大罷工時，尚不失為一個都城工

廠工人代表的集會。它擁有此種廣大力量，在其時竟能表示出建立馬克斯綱領的「無產階級獨裁」的努力。在別處城市與工業中心區，雖有相似的團體成立，但是未曾達到聖彼得堡蘇維埃的優勢與權力。雖然「蘇維埃」一字，通常是用以名一切屬性的會議，自這時候以後，則應用於俄羅斯社會黨人間，義為革命工人的會議。是以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局面再行開展的時候，蘇維埃的觀念立即復現。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次革命的情況中，都城兵士與工人的組織同成為可能。「聖彼得堡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躍然而為革命第一階段的指導勢力之一種了。

一九一七年夏間，隨着革命運動的「深入與擴大」，工人兵士的蘇維埃擴張到一切城市中心區。在前線的軍隊裏，亦組織了蘇維埃。各委員會與各會議雖在一切機關裏面與為一切宗旨方面成立起來，但是「蘇維埃」之字，則限用於工人與兵士的會議。當革命的幾個月間，農民的組織比較地是欠明確與鮮然一致的，但是嚴格的各農民代表大會與該時期的委員會，是與各蘇維埃合作的，並於一九一七年五月至六月之間，由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立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得派有代表。屆於二月革命與十月布爾塞維克革命之時期的蘇維埃，監視臨時政府的「警犬」。他們之言與行，以「革命的民主政權」為名義，自稱為代表工人與農民的。

或認為這時期蘇維埃大多數的領袖是非布爾塞維克社會主義者，他們企圖在以普通與平等的參政權召集國民會議時，撤消這種蘇維埃制度的政治活動。一九一七年夏季，各蘇維埃並代表工人及一些農民的經濟利

益。所以該計劃似爲在職掌一切政治權力之國民會議召集以後，各蘇維埃僅保留爲各種經濟的組織，與職工會一類的組織相合併，至少與之發生聯繫。雖然布爾塞維克之一個口號，確爲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其各領袖尤其是列寧，在這個同一的時期中最初原不信利用那時所組織的蘇維埃，有實行無產階級獨裁策略之可能性。在這時候布爾塞維克是擁護國民會議的原則，即是無階級性的民族團體的原則；同時他們希望蘇維埃職掌全部的權能，在於到了國民會議能夠產生與召集爲止。以此，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在布爾塞維克的主動的領導之下得到成功的時候，其所成立的政府僅爲臨時性質的，不過是「工農的臨時政府」而已。

一九一八年一月隨國民會議解散，而採用蘇維埃政府的形式以爲永久的權力機關的時候，各蘇維埃實已成立而遍及全國了。城市的蘇維埃仍爲「工人兵士的蘇維埃」；在鄉村區域，貧農的委員會變爲村的或鄉的蘇維埃機關，由農民中半無產階級分子構成，以此，在小鄉村社會裏，階級原則已在應用。蘇維埃稜錐體最高並列的組織單位，爲「工人、農民與紅軍兵士代表的蘇維埃」之各代表大會，後來，由於哥薩克人有些分子，採納了新制度，在哥薩克人團體所在的區域裏之農民集團，亦派有代表參加。某階級某階級的代表，邇後漸漸不再一一標出，因爲這樣的全銜未免過於煩瑣了。即在機關上與外交上的公文，「蘇維埃政府」一詞亦予採用，其同義之詞是爲「工農政府」。在最初時期，「貧農」一詞時常作一切公事上的應用，但是當決定中農與貧農同被爭取與引入蘇維埃裏的時候，這個「貧」字的形容詞廢而不用了。

「工農政府」與「無產階級獨裁」二詞的關係，在俄羅斯會爲共產黨人與其反對派社會黨人間及其共產黨人自己的內部，所探討及所爭論的問題。採用那個比較廣泛的名詞，是爲便利起見，大部分是爲宣傳用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確是一個誠實的名詞，因爲農民就以農民的資格，在一切蘇維埃機關以內——從高級而至於最低級——得派代表參加。但是農民必須接受工人的領導。這二階級是同盟的，但是並不是平等的同盟。其關係有時分析之如下：全部分，或一部分從事於農業生產之農民羣衆的貧苦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同盟的；不會僱傭別的勞工之個別中農，是屬於同情的階級，沒有他們的維護，蘇維埃的制度不能得到盛行的。所以無產階級的獨裁，至少在理論上，是其基本的原則。在最近共產黨的內部的爭論中，托洛斯基堅稱蘇維埃政府已漸漸成爲「遠離無產階級政府」，因爲政權太自由地擴張到全體的農民，且甚至於及到農民中的資產階級分子。

這種爭辯的詳情與各對立領袖集團正反二方面之是非曲直，此地毋待細敘。但是這種探討，使蘇維埃政府之重要特徵，很顯著地標出。整個的工人階級，是獲得特殊的代表權與領導權的。在農民裏面根據經濟的畛域再予以分別的看待。一切資產階級分子均被放棄與排斥於參政權之外。假使知識分子或公務工作人員，在工農的利益上做着社會上有用的工作，則許其有政治權。要防止這些分子在事實上變成統治的官僚階級，蘇維埃政府曾發生了饒有趣味的實施方法，此層本章的次一部分再行討論；因爲蘇維埃政府是「工農的政府」，而工人同農民必須覺到在事實上這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除了行選舉制的蘇維埃會議以外，其他的機關亦帶有階級的銜頭，以便取證於廣大的民衆。蘇聯的軍隊以「工農紅軍」組織成之。惟有反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分子之工人與農民纔許其武裝，其他階級固在服務之中，但是無須乎訓練之以爲使用軍器。通常的警務隊是「工農的軍警」(Workman-peasant Militia)，由於這兩階級中招募之。對於一切機關實施監督與管理的廣大權力之重要政府部分，是「工農檢查團」(Workman-peasant Inspection)。這種團體的人員選舉非常謹慎，這是反對機關的庸弱無能與官僚方式的鬭爭之一種主要的武器。「人民」一字在俄羅斯的政治生活中用爲指稱農民與工人的，已逾一世代之久了。此字現在用之於「人民委員」，「人民審判所」或「人民裁判員」一類的名稱上，亦卽具此特別的意義。

各種選舉真正的手續與蘇維埃各機關的功用，其目的在於使工人與農民真正覺悟到這些都是他們的機關，爲其自己供驅策，爲其自己利益而工作的。至於要斷定其所成就的計劃到了那一種程度，是不在本書範圍以內的；而共產黨在蘇維埃裏面所負領導的作用，則是一種原動力，此種原動力曾予表示出來，並必須予以提及之。但是，這可穩妥地說，一再增加之工人與農民，已在積極參加到各種選舉與蘇維埃立法的與行政的各團體之實際工作了。此種增進政治活動無足置疑的事實，——特別是在俄人生活，常爲很被動的與呆拙的農民分子中，——似足以證明固執階級原則，在蘇維埃的政府形式裏具有實效。

雖然，這須牢記心中的，階級的原則，在革命前俄國的各機關裏已予厲行了。各地方省議會與市議會選舉制，

是根據經濟的與社會的集團之人口的區分，並在鄉間保障地主階級各團體，與在城市保障財產所有主即「資
本家」的優勢。國會，即國民選立的會議，同樣以階級選立，對於有資產的階級，優予差別的待遇，再則，舊統治農村
民選的行政機關，是單階級的農會，其作用又是確定該社會之階級分類。舊統治各制度之階級性，主要是重於保
障有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反對工人與農民的政治權。列寧曾說道：「布爾塞維克主義與俄羅斯十月革命之主要
的、根本的東西，就是引導在資本主義之下最受壓迫的人們，作政治行動。」

蘇維埃的領袖們都是共產黨人，一向堅決主張民族的情緒，是舊統治另一種的遺產，此種遺產他們作最後
的清算，但是，在現在，民族性的要素予以考慮了。地方語言的應用不但受允許，而且在一切的公務機關裏成爲不
可少的，因爲在蘇聯之東南及西亞區域，有若干很落後的種族集團，故按其地方語言創立文字。地方區域的研
究，在無俄人孳聚的地方尤加重視。蘇聯是獨立各政治單位，根據民族性之一種「自由的聯盟」其最大的政治
組織單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以二十二個自治民族組織單位構成的聯邦。各獨立的民
族組織單位有其自己的蘇維埃代表大會，該會的代表又遣派至「全聯邦」代表大會；且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
會的選舉中，委員人數是根據人口多寡在各民族集團裏分配的。每一個獨立的或自治的單位之最高蘇維埃機
關，各指定五員參加「民族蘇維埃」(Soviet of Nationalities)，但這種指定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選
舉時，經過「全聯邦代表大會」批准。

所以民族性的成分不僅予以承認而且予以重視，雖然這成分最後的分析應附屬於階級原則之下。烏克蘭蘇維埃大會是全烏克蘭的代表大會，但是屬於烏克蘭工人與農民的，而韃靼或啓耳基茲蘇維埃共和國（The Tatar or the Kirghiz Soviet Republic）亦是如此。據說，蘇維埃體制已畢竟發現其解決小民族問題的途徑。事實上，民族情緒似覺滿足，至少關於民族言語的應用，民族文學的提倡與民族習慣和文化的注重各方面。在另一方面，政治的統一與經濟的統一已有保障，致在事實上布爾塞維克的敵人有「蘇維埃帝國主義」（Soviet imperialism）一詞的採用。不管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所應用之自治的和自主的原則與聯盟的原則，所形成之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其目前直接的結果則是發展公民的興趣與活動，甚至於幾個最落後的較小種族集團，亦能獲到如此結果。

使蘇維埃做成工農羣衆之有效的治國工具，此即是所謂「蘇維埃民主政權」或「無產階級民主政權」的目標。這二名詞於近來纔成爲通俗化，而這二個名詞的應用，並未改變其最初所重用的「無產階級獨裁」的術語。各種方法與各種制度，對於政府各部分之用以發展蘇維埃民主政權者，原意在於打擊官僚的習氣與武斷的行徑。蘇維埃的選舉制，共產黨在蘇維埃裏面的作用，以及例如「工農檢查團」或「人民檢察員」之各種制度，將以這受重視的對象爲着眼點，作初步的探討。晚近幾年來，有一種有系統的宣傳運動，以「助活」（enliven）蘇維埃，因其屬望於蘇維埃的政府形式之許多結果，不能得到實體化的緣故。

蘇維埃選舉制的探討受着嚴格的限制，雖然該選舉制之普通原則，於革命初起的時候，在其詳盡的選舉法上已予發表出來，但是初期選舉的報告，在文字如是大意，即最膚淺的研究亦付缺如。以後在激烈內戰的期間，各種選舉實已停止，祇在幾個大城市裏，蘇維埃的機關尚為強固與有組織不在此例。那時中央各蘇維埃是僅由其下一級的組織單位之執行委員會選出的代表構成之，而下級的改選則被延期。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以後，一切蘇維埃從最低的單位起，已有定期的與完全的改選。在前幾年由下級送上候選人，由上級加以指定的例規繼續施行着。選舉的原則，尤其在鄉村區域裏，實被這種例規把它取消了。其結果，致有一九二四年秋季之各選舉會中，很多抱不出席主義，拿這種態度對付選舉，是有意不合作之全部表現。這種選舉在第一時期未完結時就遭毀棄了，而上述之「助活蘇維埃」運動，即已着手進行了。

爲了第二期的選舉，對於地方蘇維埃各機關，與特別是地方的各黨部，發佈了法令，凡壓迫與強迫的方法均予禁止，採取真正的選舉運動，並嚴格地遵重選舉原則。所以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的選舉，在蘇維埃體制下之第一次真正的普選，（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大城市中，選舉的原則尤拘謹地遵從，甚至於過去在內戰與外戰的期間亦是如此。）且在這時候，其選舉法，對於蘇聯一切構成之單位均已一致。選舉的結果都完全記錄下來並報告出來，創空前未有之記錄。下次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度的選舉之結果，在茲寫作之頃尚未予以全部的分析。以此，探討蘇維埃選舉制各原則的應用所根據之材料，仍甚感窮乏。

蘇維埃選舉制，據一個共產黨人的著作說，它是「保障勞工有組織的集團，得時常有積極影響於其遣送到各代表團去的各代表之可能。」依據同一的作者，一切蘇維埃選舉法之詳細規定，是由於一個簡單原則所指示，即是該項法規必須「有裨於社會革命之克有奏效的實施。」這第二個要點，使蘇維埃法律與他國選舉制不易互相比較；因為它是一種暫時性質之革命的選舉方式。不過，該法律保證有較責任性與拘束力的代表權，這種效能可予探討，因為蘇維埃的選舉制，不僅應付政治上積極羣衆的需要，而且有助於公民活動的發展，並在某種意義上與某種範圍裏，各國的選舉制對於這方面均不能做到的。

蘇維埃選舉制之一個基石，是選舉權限於「勞動者」；「資產階級」分子無投票權。在每個選舉單位或區域裏，將這些分子個個列成表單，並必須公開揭示以作選舉的準備。這些被剝奪選舉者的人數，實在是少數的，而且有減無增，因為前資產階級分子，已成爲蘇維埃的雇員得許有選舉權了。在鄉村區域，此種剝奪公權者的成數，約佔有選舉年齡者之百分之二；在較大的城市裏，此種無選舉權的成數，於十八歲以上者要達到百分之六。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選舉的結果，指示地方的選舉委員會，對於一切被剝奪公權之剝削分子，不曾厲行憲法上的規定。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度冬季之選舉，曾發出訓令，由其最詳密的規定，選舉權的實施較諸往年受到更進一步的限制。

不得參加選舉的根據，是剝削他人的勞力。農民或小工匠在規定限制以內或在特殊條件之下，得雇傭勞力

而不剝奪公權。同時農民耕作家得出售由勞力所得的生產品而未成爲「商人」所以不合「資產階級」分子的資格。但是鄉村裏之農民企業者或私人店主，則不許參加任何各蘇維埃及蘇維埃各選舉。在城市裏之一切「納不滿」即或他們在製造裏或商業裏，得受有特許與得經營合法的事業，都是被剝奪公權的。

剝奪公權之另一種的根據，是在舊官僚政治裏面站着高崇的位置，或在舊式警察隊裏，或在階級的爵位裏站有任何位置的人，則即或該員現是被引用於社會上有用的工作，亦須剝奪公權的。「自由職業」的成員，應以其現在「社會效用」的活動，予以謹慎的鑒別。一切前資產階級分子如要以現在的身分來投票，則必須給出忠實於蘇維埃統治積極的證據。任何宗派的牧師在憲法上均不許有選舉權。在關於選舉的演說與報紙的記載上，對於摒除資產階級分子於蘇維埃之外多所論列，以便對工人與農民申說蘇維埃是他們真正的機關，由他們選立起來，並只有它纔代表他們的利益。工人與農民必須把其應列在無公民權表上的鄰人名字，報告給選舉委員。以此，各選舉之必經的手續，乃構成階級鬭爭之一種要素。

蘇維埃選舉另一種基本的特點，是爲一個聚合集團的代表制，組織於該集團工作的地方。工人在他們所工作的工廠投票，公務機關工作人員的投票，是在他們所隸屬的機關裏；學生則在於他們所學習的教育機關裏，小工廠或小機關，若其所雇用人員的人數，在該投票人之特殊階級得派代表的組織單位之下，則合開一個公共的選舉會；這種投票者分爲二個集團，一是職工會會員，一是不屬於職工會的人們。後者的選舉手續所以採用，爲的

是至少要使這些「混合」的選舉會具了較有組織的性質。農民則按村莊來投票，如遇大村莊，則分爲幾個選舉區。同時，在大工廠裏，一個企業之各工場或部門分別投票的辦法，正在實施。僅僅家主婦的投票是以住所爲根據。其他一切代表的選舉都是按職業的。現役紅軍兵士的投票，以團爲單位。此種代表制的方式，着重於在「生產中的公民。」必使此種選舉制能使代表受其所代表的集團之經常的與有組織地積極的影響。同時選舉人對於其工友之在個人關係上與生活上的接近，必較諸與僅僅做鄰居的人爲密切，並因此在代表選擇時能運用較理智的判斷；這就是此種選舉制的論據。

蘇維埃選舉的間接性質，使真正的選舉僅限於從投票人所屬而得在其中活動的小集團裏選其所欲選的人。例如農民在農村裏，當他選出地方蘇維埃時，則選舉的參加就算完了。地方蘇維埃從它自己的成員中選出代表到鄉蘇維埃；鄉蘇維埃從它的成員中選出代表到區蘇維埃；以此類推，經過省與特別區以及全俄羅斯或全烏克蘭代表大會，以至於全聯邦代表大會。在大城市裏有坊蘇維埃，由此選立市蘇維埃。市蘇維埃直接選出代表到全俄羅斯或全烏克蘭代表大會，而同時又選到以該市爲省城的省分之省代表大會。較小的城市之市蘇維埃選舉代表到此種代表大會裏去，須經過區「全聯邦代表大會」選立「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選立「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ies)。

不論在其他方面或有缺點，而此種間接的選舉制，具着投票人得親身密接於其所選舉的人之意義。同時在

這種選舉制之下，代表對於其所選出的集團作定期報告的實施，雖具有有效的與真實的性質，這種報告在理論上是代表應有的職務。這種採用組織細小的代表單位之間接選舉制，似可以在任何時候召回代表的辦法易於實施，這是蘇維埃體制之另一種特徵。這種間接制在交通工具不發達，新聞報紙的閱者羣衆較少，與人民教育及一般文化特別落後的國度裏，較爲合用，這是可能的。舊俄由選舉而成立的各機關，亦是間接選舉制所產生的。在另一方面，一九一八年生命短促的國民會議，卻是由直接選舉產生的。

在蘇維埃統治第一年間，選舉時常舉行。全俄代表大會——此即從低層起一切蘇維埃改選的意義——每三個月或四個月召集一次。後以選舉的延擱，兩代表大會間的時期以之延長，乃有不曾重選而爲「執行委員會處理的時期。」現在，憲法規定以一年改選一次。但是，因爲一九二四年的選舉遭着破壞，在下一屆全聯邦代表大會選出前超過一年的時光寂然過去了。一九二五年代表大會召集的遲延，以致一九二六年的選舉之再度延擱，這種情形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纔予以結束。

間接的選舉制與以工作場所爲選舉地方的規定，使在各不相同的選舉人集團中，得能分配代表的人數。在無產階級獨裁理論之下，產業的無產階級於代表分配上受到特惠。要準確規定工人的特惠代表的人數要擴充到如何程度，頗爲困難。城市的選舉，代表多寡是依據選舉人的人數，而鄉村的選舉，則依據全部人口。城市選舉人的代表單位，小於鄉村選舉人——即農民——的代表單位五倍。所以工人代表的人數，至少兩倍於農民代表的

人數。予工人以特惠代表是不作絲毫隱瞞的。有幾個著作家說此種代表的分配是公平的辦法，因這樣纔能使工人與農民二個主要階級的代表人數相等，蓋農民的人數實多於工人好幾倍。再則，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是蘇維埃體制根本原則之一種，而工人與農民的「同盟」不能作一種平等的同盟看。近來有人提議這二個階級的代表，應按二者人數若干作最近的確的比例。反對有利於工人的差別待遇之論調，顯然是出於農民之口的。但是黨裏的爭論，其反對的集團就在這問題上攻擊大多數的主張，說道：「無產階級獨裁已被遞退，而祇為農民的民主政權了。」因此當局宣佈現在代表的分配暫從原議。

在蘇維埃各種選舉中，表決是公開的，或由於讚諾，或由於舉手。不記名投票法，現在未被正式禁止，不像前幾年的那樣了，但是這投票法是未加鼓勵，且實則未予實行。其證據是：常階級鬭爭的時期，一切均有公開的必要，不能隱蔽任何觀點與任何表同情的意見。讚諾與舉手的表決法，在革命前的鄉村集會已見諸實行，以此在農民間，對於這個方法似無強烈反對的情緒。在工人間，對於這個公開表決亦無有反對。在另一方面，反對派以在各種選舉中參加者成數之低少為理由，抗議此種表決法，他們作此抗議，尤其因為繼續採用具廣大權力的政治警察與出版言論失卻自由。

選舉運動應受限制，主因在於無組織上的自由。祇有惟一有組織的黨得能指揮有組織的選舉運動。指導此種運動，是這個享有合法特權之惟一的黨的義務。選舉單位之共產黨集團，時常先把候選人名單提出來。非黨員

的候選人是可以並通常包括在這名單以內。個人亦可宣佈他們的候選資格，但他們在選舉會上普通是站出來給大眾認識，而不作事先的運動。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的選舉中，非黨員的投票人與地方公民團體的代表，第一次被引入地方選舉委員會裏。同時爲了這些選舉，個別的通告送給各投票人，而且選舉運動的印刷品亦散佈出來。以此，形成較積極的選舉運動。在選舉會之前，並與選舉會無關係的，有各種集會的召集，關於各人在黨與蘇維埃之工作與活動向會中報告。這些集會，用以分散印刷品與選舉日期的個別通知，對於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蘇維埃選舉之具真正選舉性質頗有幫助。

共產黨人自己說，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之選舉，是第一次自由的與民衆的選舉。農民的參加選舉是鄉區政治活動顯著增進之一種明證。在此等區域，合格選舉人的參加有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一九二五年秋季的選舉，僅有百分之四十參加，而一九二四年參加各選舉會平均人數僅及百分之十。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的選舉中，城市區選舉人有百分之六十來參加。在判斷這些選舉中參加人數的百分比時，必須牢記表決手續的方便與容易。選舉會舉行於工作的地方，在每一特殊機關裏面，那日工作就早些停止了，以便從事於選舉。選舉人表決僅有一次，而其責任的程度比較細小，或間有強迫的成分，此即不出席選舉會的事情馬上會看出，而且可釋爲反對態度的表現。這或是在城市選舉中非工人分子有如是的情形。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度選舉的報告，表示出參加選舉會之人數再略有增加，尤其鄉村選舉裏知識份子參加的增加。至於小民族方

面，在一般上對於政治少有興趣，在各種選舉參加的百分數相當地低下。

共產黨人表示對於蘇維埃各選舉中不出席者百分比之巨大，深致關懷，雖然其參加選舉之百分比數，較諸其他各種的情形良有足多，但是共產黨的領袖們，仍很渴望地要將他們的體制與其原則推進不已。最近二次選舉中，將其結果加以仔細的分析，可以判定參加選舉到那一種的程度。此種分析亦可表出附屬於無產階級獨裁的原則之重要。在各城市裏，選舉人之非無產階級的集團比諸無產階級似乎大增其活動，同樣的，在鄉村裏，中農的活動較諸貧農與農業勞動者活動，亦表示大有增加。反對派曾提稱減低羣衆活動，以防止無產分子領導權消失的政策，當爲從這種分析所得到必然的結論。實則，就共產黨人把選舉的經過與選舉結果作種種的研討，意義之所在，原歸諸於社會裏無產分子參與選舉所生的作用。

各蘇維埃機構之稜錐體性質與代表的小單位，致有許多的蘇維埃的成立，及其相伴而來的許多多蘇維埃委員的產生。茲就俄羅斯單位而言——關於本問題，祇這方面的材料可以考查——凡有三百七十五個城市蘇維埃，委員總數大約有四萬八千個代表，並約有四萬二千鄉村蘇維埃，共有六十六萬五千個委員。所以選入蘇維埃的代表超過七十萬人。每個村蘇維埃平均有十六個委員，而每個鄉蘇維埃平均則有五十至一百委員。區與省之蘇維埃平均委員二百人。城市蘇維埃按城市之大小從五十人起向上遞增。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蘇維埃是很大的，委員人數在一千人以上。全俄代表大會，若以整數計，包含二千個委員。全烏克蘭、全白俄羅斯與全高加索

代表大會比較小些。上述蘇維埃委員總數的估計，不能表達出委員人數是否重複，（一個較高組織單位的委員時常是其直屬下級組織單位的委員。）但是，蘇維埃的體制，予廣大公民對於其選立的機關得密切的聯繫。

各蘇維埃通常會期是時常的，但是日期頗短。各蘇維埃實際工作由各執行委員會執行，該會大小不等，在最低級的鄉村間之蘇維埃平均九人，到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則有幾百人。蘇維埃各種會議與各代表大會的作用，主要是歸聽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與通過決議案。立法案件也提議到，且有若干的討論。各種辯論成爲更通常與更詳盡的了；但是在這些大團體中，每年常會僅舉行數天，日常的立法工作要在該會討論是不可能的。祇較大的具一般性的案件纔正式在該會通過。所以執行委員會有廣大的立法權；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年至少須召集三次，相當於他國代議制的國會。但各種會議與代表大會，對於各代表回向其所選出的集團做工作報告的原則，頗爲重要，這是蘇維埃體制必須給以有效之實施的。

茲以注意轉到經濟改造的問題，各種經濟的活動，特別是城市各蘇維埃，業已發展，莫斯科與列寧格勒二大城市及其他較大的城市的蘇維埃，均大規模地趨向着公共有效用的企業。爲要應付新的管理問題，各蘇維埃重新改組，增加「各部處」或常設委員會的數目。這些常設委員會，引導很多的委員做蘇維埃實際的工作。近來正特別注意於所謂委員的「活動分子」的組織問題。鄉村各蘇維埃亦在教育、公衆衛生或合作團體之各種題目上，正着手發展各種常設委員會的設施。這些常設委員會會引很多數的委員，參加各蘇維埃立法的與行政的實

際工作，且要相對地減弱於讓執行委員會來統治的趨勢，這種趨勢原為蘇維埃體制之公認弱點之一種。

在同一路線上，近來發展另一種的例規。在各蘇維埃改選的時候，助長所謂「新陳代謝」(renewal)的政策。一九二六年選舉的報告，表示出蘇維埃新會員佔着很顯著的百分比數。執行委員會與各蘇維埃大會全體會員新陳代謝的政策，有助於提引特別活動的各個人之實施。他們大概是由共產黨團揀選出來，被舉到其直屬上級的組織單位；且此種選擇，常常落到非黨員的農民或工人的身上。以此，公民活動之正式獎勵制，正成為蘇維埃選舉制之一種特點。在各蘇維埃裏與其他各機關裏，已有許多在業工人與農民，他們均以此，得站上有些負責的行政位置。他們形成一種所謂「被提拔的」(pushed-forward ones)之特殊集團。

蘇維埃領土的劃分正在改訂中；在烏克蘭，新劃分業已成就。用此為新行政區設定的根據，是經濟的特徵，不是歷史上發展的事實。對於這些區域將給以新名詞，着重其經濟利益，同時拋棄其根諸過去而來的舊名詞。在此，堪信其對局部主義與狹隘地方主義不致予以鼓勵的。對小民族，尤其是文化落後的民族，民族的名詞將予以保留。同時，在這種新劃區中，最低的行政區——鄉——在面積上將要增加，主因是在於減少行政上的損失。這種變更會若干影響及蘇維埃的機構，而循着擴大地方蘇維埃管轄區域的方針進行，而且要減少蘇維埃的總數。

在蘇維埃統治的第一年，地方分權的原則廣泛地應用，那時期主要的任務是奪取政權與新政權的建立。所以地方蘇維埃予其行動上極大的自由，旋以經濟與軍事的危機，最大的中央集權即成為必要；蘇維埃政府的形

式成爲最高的中央集權形式。自從一九二四年以還，政策變爲高度地方自治。近來的新法令，增加地方蘇維埃的權力，而同時增加其管轄區。這種新政策是爲力求「助活」蘇維埃之要素。雖然其稜錐體的結構形式與其間接選舉制仍構成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人說蘇維埃的組織原則，是與黨所根據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相同的。

黨在蘇維埃中的問題，得以少數文字把它托出。共產黨合法的特權已如上述。隨這種特權而來的，就是難以置辯的黨在蘇維埃內之領導權。不論這種領導權稱之爲「支配」(control) 或「指導」(direction)，總不過是字的問題。共產黨人用以指明黨在蘇維埃的地位的一個術語，此書都譯作「統治的」(ruling)。當第一時期，黨在蘇維埃中此種統治地位未加限制。於是各蘇維埃一切較高的、同級的各組織單位之人員，幾幾乎完全是共產黨人。在下級各組織單位中的重要執行職位，由於上級任命的慣例，使黨又足以支配各地方的蘇維埃。當這時期，領導的方式我們知其爲「命令的」方式。這一類的領導權，使民衆眼裏不信任蘇維埃，一九二四年的各選舉中不出席者百分比數之高大足以取證之。

一九二四年選舉的失敗，使黨在政策上不得不改變。各種命令送到一切黨部裏而去，要立時禁止此種現行的慣例，而僅用商討與說服的方法，來保障與維持在蘇維埃中黨的領導權。雖然地方的共產黨人，覺得要改變他們的習慣與方式頗爲困難，而黨的紀律卻助着此種政策的改變發生效力。共產黨領導權仍予維持，而黨合法的

特權，在許多黨員間乃致於弄成傲慢的與專斷的方式。但是中央黨部所頒的命令，申述憲法所規定之選舉原則，必須嚴格遵從。民衆的利益與選舉的參加，必須予以保障，且令非黨員分子更多量地引入蘇維埃裏，以分擔黨關於政府的政策上與策略上的責任。

此後人民對選舉的興趣與參加的增多，表示先前領導權的形式至少應負一九二四年危機之一部分責任。隨黨領導方式的改變，有助活蘇維埃大運動的產生，這一點已見於上文。但是黨對於蘇維埃一切活動的領導權，仍是關於原則的問題。下面的數字可以表示黨於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選舉之後，在各蘇維埃中的力量。這些數字僅僅包括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別個單位在選舉報告上未及詳加分析。共產青年團團員，在此地歸入於共產黨黨員一類中，不過他們通常僅參加最低級的鄉村蘇維埃。

在村蘇維埃中，共產黨員僅佔全數委員百分之九·九；但是在鄉蘇維埃中，他們佔着普通委員的全數百分之二五·七，佔執行委員全數百分之五〇·五，而佔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全數有百分之八六。在城市蘇維埃裏，於各大會中共產黨員亦佔着少數，已經失掉從前擁着的多數。一九二二年全城市蘇維埃的委員，百分之七十是共產黨員；一九二四年黨員的比數，降到百分之五七；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度選舉以後，僅僅百分之四五·五委員是屬於黨的。此亦與較低級鄉村的組織單位一樣，非黨員分子的人數大有可觀。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蘇維埃，則不包括於上述的數字中，在這二個革命的中心區，各蘇維埃委員浩大的多數是屬於共產黨黨員或

共產青年團團員的。

在各蘇維埃上下二連級即區與省各組織單位中，共產黨黨員在各大會裏與各執行委員會，是佔着少量的多數。在各共和國與全聯邦的代表大會中，共產黨員則成爲浩大的多數了。少數的非黨員的委員會被選到中央執行委員會裏。最後，人民委員會的行政院，則絕對是共產黨員。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度選舉的結果，仍在搜集與分析的程序中，但其大致的眉目，在蘇維埃各級層次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例，僅見出細微的變更。這間接的選舉制，自然大有助於從低級組織單位到了高級組織單位之共產黨力量的增加。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之約七十萬蘇維埃委員中，共產黨員或青年團團員佔了十一萬五千人左右。

關於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的關係，國外多有討論，有些堅稱這兩個是有顯明分別的，而另有些人則說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是無論在理論上與事實上都是同樣的。在黨的文件上與著作上，普通可以找到「黨蘇維埃」(Party-Soviet)一字，同時在政府文件裏此字則爲「蘇維埃黨」(Soviet-Party)。共產黨人現正把黨與政府的區別，畫一條嚴明的界線，而同時不放棄黨對於蘇維埃方面佔着統治地位的原則。共產黨人在對其合法的特權之辯護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教人注意；他們黨是俄羅斯各社會主義黨中，支持十月革命與蘇維埃政體的唯一政黨。同時，共產黨人堅稱工人與農民對於政策，得能透過共產黨或透過一切蘇維埃內的非黨員分子，自由地與合法地發表其意見。共產黨員能被佔大多數的，非黨員選舉出來，可解釋爲民衆信任並擁護黨與其政策的明證。

多數的非黨員，在事實上確難覺得把他們委員中的共產分子，選送至其上一級的蘇維埃為得策。這個政策或許是由於利用與信託某一個黨員或整個的黨而來的。黨員若能在本地方服務，其所成就或有更多的希望。

各委員會任命與管束蘇維埃政府的行政公務員。人民委員會委員與其協助員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的；人民委員會之各局或處（collegia）的辦事人員是任命的，但須經該執行委員會批准。各種任命時常根據於政治上的考究，以保障黨的統治地位與共產黨人的領導權。但蘇維埃裏各雇員的職位是藉蘇維埃職工會的組織予以保護的，蘇維埃公務人員成立好幾個極大職工支會。這個蘇維埃體制之政務人員為數有二百萬左右。在這個數目中，還不會把國家鐵路或教育與公衆衛生的機關之公務員包括在內。

布爾塞維克黨人在其革命以前之印刷品與各種計劃方案中，想要解決一班官吏的問題，規定着付給政府官吏的薪金，必不可多過熟練的工人。新制度成立時，此種理論見諸實行。共產黨人的薪水，由「黨的最高額」的限制與黨員對於一切負責位置的把持，使能儘就標準薪金之規定，予以履行。在經濟上的管理機關中，技術的與經理的專家之服務，則保障以特別報酬費，而超過固定標準薪金。「公務員薪金」（civil lists）的規定，直至現在與工資獲得者同其成規；集體合用由職工會予以磋商並加以監督。但是近來，對蘇維埃行政機關的巨隊「公役」（civil servants）有確立公務工作人員的等級與薪金的趨勢。此事是由於立法當局與職工會當局共同磋商而成立。雖然這種辦法會弄到提升「公役」階級，而與手工工資獲得者——無產階級——分開，但是採取這種

「資產階級」制的慣例，顯然覺得方便。各官吏時稱之爲「蘇維埃工作人員」(Soviet Workers)而力防他們變成爲「蘇維埃的官員」(Soviet Official)；但是當新政府政制發展的時候，加緊反官僚主義的鬭爭，已日見其重要。

共產黨對於蘇維埃工作所負的大責任，包含抨擊行政上的官僚方式與在政府機關裏的官僚習氣之特種義務。由於其組織的形式與其嚴密的紀律及對黨員的支配，共產黨可稱爲剷除這個新的政府形式內的官僚主義之最強大的力量。黨有一個機關，即「監察委員會」與其地方的支會，在其職責中有使各黨員或各地方黨的負責工作，與有以策略來防止一班壞分子的作用，設法反對那些在其各種活動，尤其在政府的職位上而有玷辱蘇維埃與黨之分子之規定。監察委員會與其正式列在同等位置的「工農檢查團」的政府機關，對於在蘇維埃裏握着負責位置的地方共產黨人，舉行定期的與特種的調查。這些黨機關對於黨員有處罰的權力，並有權把他們開除黨籍。中央的與地方的監察委員會，時常把以專斷的或甚至於純官僚的行政方式，使黨與蘇維埃失信用的共產黨人撤消其在蘇維埃的職務。若共產黨人的蘇維埃公務人員，一被發覺到犯着不法的或有罪的行爲，則監察委員會即報告該事於相當的政府機關來查究。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的一年期間，有四萬六千六百零五人的共產黨員被繩以黨的紀律。

這種黨機關與其活動，所具顯著的特點，或者即在於它的工作是公開的與甚至於取公佈的方法。它招呼個

人的報告與訴不平的事件，它時常在實際的審查的手續中，要非黨員之農民與工人來作證，且顯然地對於制裁個人共產黨員，甚至於整個的地方組織之工作與紀律的執行，時常要找些最足爲人所周知的事。共產黨各領袖的意見，似以爲黨員不掩藏其弊竇較之於掩藏此種黨的組織與紀律的弱點，爲小傷黨的威信與領導權。以他們的權力如此的廣大，對於這些監察委員會全體人員因有特種的規程。這些重要的黨機關之人員必須爲老黨員，在黨工作上具有負責活動的證據。監察委員會纔是黨與蘇維埃政府惟一合法的完全合併的機關。在其他一切的機關，黨在理論上僅僅是工作於各蘇維埃之內與經過各蘇維埃來工作的。但在檢查的場合上，黨機關與其相當的政府團體——工農檢查團——以共同的職員合組一個機關。

「工農檢查的人民委員會」(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Workman-peasant Inspection) 是工農檢查團的全銜，通常縮寫之而稱爲「工農檢」(Rabrin)。在一九二二年以前，這是一個約有一千三百委員的大團體。這個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其他人民委員蘇維埃的其他委員同行選任的。其全部職員的任命，須受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批准，而僅僅共產黨員纔能被選爲這種檢查團的人員。這種機關所以要這樣多的人員之一個個理由，是因爲同時要利用這個機關，以爲訓練農民與工人作行政上與執行上的活動。「工農檢」的工作遍及國家經濟的企業機關與政府行政的團體，此種工作要引導它的人員密接於行政的與管理各種事務。但是，該團體之大，使運用不靈，足以減少其爲監察機關的效能。「工農檢」是蘇維埃的政府形

式中最公開的機關之一，以其鮮有效能，故與其說予新統治以信譽，毋寧說是近於玷損。在另一方面，這種政府的部分本身不應發展官僚習氣與官僚方式，而此種習氣與方式的剷除，乃是其職責所在，這是至要的事。

這種政府部分之適當組織問題，非常重要，是以列寧在其尙能工作的最後幾月中，親自地與特別地注意這個問題。他改組「工農檢」的提議，在某種意義上成爲這領袖最後的音旨。他對於「工農檢」改造的貢獻，時常被入加重申說，以便把它的威信與威權眩耀於民衆耳目之中。其改造的進行，是減少該組織成員的人數，而同時把「工農檢」與黨的監察委員會的組織網鎔合於一。凡較少的成員所克形成的官僚趨勢，因黨的較密接聯繫與其較大的支配力量，得以消滅。

「工農檢」按照一定的計劃，工作於其自己創設的，檢查的各機關中。它歡迎訴不平事件，並接受到關於這些控告各個人，在蘇維埃中「負責的」公務員，或各特別的蘇維埃機關之許多案件。在這方面，它作爲聯接政府機關與民衆最重要之一種紐帶。凡是過半數之訴不平事件遞到「工農檢」裏，是反對行政上的官僚方式；據「工農檢」的公開報告，這些事件凡四分之三以上是有根據的。這些訴不平事件係來自各個人，且有來自各集團。黨的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根據他的調查，對於蘇維埃機構問題要作普遍的研究，而且，以其是政府之一部分，其地位與其他人民委員會相等，故得以創議立法的程序，使國家行政的與經濟的機關實行「合理化」。他們所採用於工作上之各種方法，能保障他們與廣大工農羣衆作經常的密接，接吾人可信這樣接近羣衆，就能防止

這黨與政府二個聯繫的團體自身之變為官僚化。因為它的工作之廣為宣佈，尤其關於它所偵發的事項，「工農檢」無疑地做了許多減少行政上專斷的事情。在廣為分散的論「工農檢」工作的小冊子印刷品上，其保護工農權利之特別重要性，是盡力予以發揮的；同時各個農民與工人須陳送報告與訴屈書，以助「工農檢」的工作。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員的義務，在這種活動上要能創先與同時幫助組織地方陳訴局，這種陳訴局之設立，乃是「工農檢」機構之要件。

在蘇維埃體制之下，法庭的組織與功用之某種特點，是使蘇維埃體制具一種越見民主的特性。在蘇維埃憲法裏與種種法規裏的規定，法律施行之許多特別新奇的慣例，也是表現這個政府駢支機關採用着防止官僚的方法。革命初期之純然非正式的審判手續頗多更變，但是在蘇維埃較低級審判所或是在較高級審判所，此種手續普通是極不拘呆板的形式與絲絲入扣的。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之較早的「人民審判所」羣衆得自動地與竟然直接地參加審判。審判室時常殆成爲這時期的民衆集會，用以激發革命熱忱與散揚革命的口號。在激烈內戰的時期，正式的法庭被特種法庭所抑，在特種法庭以內，採行了羣衆恐怖的原則。這時期有幾種法律把偵探與報告「階級的敵人」作爲工人與農民的公民職務，並在某種特別情形之下，爲了革命竟致執行直接報復的手段。

因爲較常態情形的恢復，這種鬭爭的口號乃變爲「依法革命」(revolutionary legality) 的口號。各

種法典予以準備與擬訂，而最初法庭原欲擬訂的制度，在實際上建設起來與發展起來。在較低級的「人民審判所」與較高級的「省審判所」裏面，單獨的專業的審判員，與二個「人民助審員」聯合工作。這個助審員亦可稱之為「人民陪審員」。這些人民陪審員與專業的審判員一樣，由審判所的司法蘇維埃選任。各陪審員的服務表一年訂立一次，而每個陪審員服務從五日至六日。各人民陪審員時常與人民審判員坐在一塊，而與人民審判員在各方面有同樣的權力。蘇聯的審判手續規定在案件事實的查詢時，審判長須作實際的參加，而陪審員亦得自由詢問被告者與證人。陪審員退庭時，與專業審判員同作判詞，陪審員裁決的規定有同等的權力，而該判決如發現被告一方有罪時，並有權決定處刑輕重。不過，庭上判決詞的宣讀，通常是由專職的審判員。這也是真的，有時人民陪審員的作用，在審判開庭時僅不過為旁聽者，鮮用其詢問與反詰的權力。於審判員與陪審員三人蒞庭判決作詳細審議時，在判決書的語氣上，亦須把陪審員站在較被動的位置。

因為這種手續之不拘形式，常常能使民衆易於參預案件。各審判室時常擁擠着人，而審判手續且有動人的趣味。嚴格秩序的規則未予以厲行，而從聽衆裏所發的笑聲與評議是時常的；這樣，這班聽衆如革命初期的慣例一樣，在某種意義上是有助於審判的。這種允許民衆的自由，復見於第二種原則，此種原則即是蘇聯各領袖正試以採用於司法行政上之審判的教育作用是。訓練工人與農民，使其負政府上的責任之理想，在這地方亦可以見到。審判時在工廠中於工作時間以後舉行，使工人能更容易蒞臨。巨大政治上的審判，曾舉行於最大的戲院裏面，

設以精構的佈置與公開的排場。爲這樣審判手續用的法庭，純然是爲政治宣傳目的用的。不過，這須注意的，此種慣例漸漸日見減少了；而在這些公然審判中的興趣，亦覺到日見消喪。

又有另一種頗爲新奇的制度，把民衆導入司法的行政方面。定出一種所謂「社會檢察員」(social prosecutors)這與「人民司法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justice)的常設國家檢察員(regular public prosecutors)顯有不同的。這些檢察員是簡單的公民，他們自己去請求參預案件的檢舉，想檢舉幾件特別有關於公衆利益的事情。聽說，此種由公衆「舉步向前」(stepping forward)的事情，可在審判的過程中很自然地發生。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一年中，這種「舉步向前」的實例約有一萬四千件。個人可以用其自己名字或以如職工會一類之團體的代表名義前往。共產黨就其自身而言，亦有在幾次審判中曾以社會檢查員來代表說話。當個人代表一個團體時，則該制度失其似以爲主要優點的自然發動的成分。但是卽在此種情形之下，這種事情也有兩方面的價值。它是在政府的機關裏面減低官僚傾向之另一種工具，同時，它是有公民教育的姿態，且使工人與農民有藉實際參加來學習司法的行政原則之機會。

蘇聯軍隊的招募與組織的方法，是根據於其所信的增強蘇維埃民主政權，與減低軍隊組織的官僚傾向之原則。革命起初九個月的赤衛隊，是工人的自願團體。它在革命程序之第一步驟中可以說爲代表「無產階級的武裝」。當其時而要具一種更有組織的軍隊與成立紅軍的時候，這個自願應募的原則仍予以保留。但是，很快地，

強迫的軍役採用了，這個且是現在的基礎。同時，以民警制來代替常備軍的政策也曾討論過；而近幾年以來，對區的民警制已開始與常置的紅軍並列，而且正漸漸擴大起來。因為這方面的發展，紅軍的數量會為減少。凡應服軍役而沒有編到正式的軍隊的人們，則被分派去服民警一類的軍役，有時來自某一區域的，全部應募者即組為區域的民警。

在這些所謂「地方軍」中，其根本觀念是避免集團化軍隊的政治影響，與大常備軍的財政的與經濟的負擔。在地方軍組織單位裏面，軍役的年限是缺少於紅軍的年限，而此種年限有拖延過於五年者。例如農民，若他可分期被召集去訓練，則妨礙他的工作甚少。至於工人軍事訓練，有一部分是正當該青年人在業工作時舉行的。總之，訓練的地方是與該新募的青年兵士的工作地方密接的，當他到屯營或野營中去時，他的謀生能力，以在五年中分成幾個短期訓練，故所減弱的亦很微少。蘇聯軍隊的理想目標是最後祇存在這些地方軍。

在紅軍方面亦有相似的組織原則，其目的為防止在積極服役中的青年，脫離每天公民生活的影響。軍隊被視為不免要導入於正在繼續的革命的政治鬭爭。對於軍隊裏的政治宣傳與公民教育給予特別的注意，以此，紅軍兵士在其服役中能起積極的政治作用，且後來能成為具有特種戰鬥訓練的公民。在紅軍裏，公民工作非常重要，故自成一題，再予探討。蘇聯的海陸軍兵士，在實際服役時並不失其公民權利。他們被稱為「公民戰員」(citizen-fighters)，得參加各種選舉，與在各蘇維埃中堪作代表。在服役時期中，職工會的會員資格要被停止，

但是退伍的海陸軍兵士立即恢復其會員的資格。在另一方面，合作運動已盛行於軍營與軍艦中，且得長官積極的提創。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在各軍營及各軍艦中，與在各工廠及其他各機關中一樣，也有他們的細胞。

要保障海陸軍兵士不致於完全喪失日常生活及其興趣，因之有特別對紅軍的扶護運動。工廠或其他機關負有對其鄰駐團部之扶護職責者，應察看各兵士在其時間所允許之範圍以內，是否參加工廠的生活與各種活動。共產青年團成爲紅色艦隊的扶護者，且它的地方集團爲海軍兵士亦執行同樣的服務。最後，軍隊之參加大紀念會及甚至於較小的公民事件，比較實行於其他各國者多得許多。

在紅軍與紅色海軍裏的紀律，較舊統治之下的軍隊所通行的或其他各國軍隊所維持的，爲不大嚴格；這是常常有人說的。軍隊指揮人員與紅軍兵士的同志關係的政策，似在實際上實行。「軍官」與「兵士」二字是捨而不用的，雖然在本書研究中不能將這二字廢而不用。即在服務時，海陸軍兵士仍是民衆之一員；有時在街上的人民都以很不拘禮節的態度對待穿軍服的人，這是極堪注意的，衡之以舊俄的規矩與習慣尤足以注意。蘇維埃軍事訓練的目的，是在於養成公民戰員（Citizen fighter），而在第一期種種訓練方面時予重視。地方分區的民警制，最後完全替代常備軍，這是理論上的目標，對此能發生出最大的力量。

在各蘇維埃與黨的代表大會與代表會議，或在職工會、合作社及其他主要的經濟團體的代表大會以外，還有兩種代表會議，在論蘇維埃的國家形式之本章，應予提及。這二種代表會議，就是女工人與女農民的代表會議

與所謂生產代表會議。這二者稍後當予討論，生產代表會議是與職工會的教育工作有連帶討論，而女工農代表會議則於討論婦女們的公民訓練時，特予申述。這二個團體均有連續的活動，而這種活動的一種姿態，是要引導其活動方向於一般的蘇埃維與特殊的政府機關。他們是蘇維埃民主政權長成的要素，同時是打擊官僚行政方式之具有組織力的要素。

蘇維埃預算與徵稅制度之一般性質與特點，在演說裏與出版物中時廣作討論，而這些討論是着重於經濟發展的計劃，生產支出之高大的百分比數，與從國家企業方面所得收入之漸漸的增加，與租稅的負擔之相當減少。這些特點可說是一個工農國家的預算之特殊地方。對這些問題的分析，非在本書研究範圍以內，但是在蘇維埃體制下之預算的性質，共產黨人信以為能增進人民對於新制度作進一步的覺悟與積極的擁護。僅僅從這一個觀點上，對蘇維埃國家財政的某些特點，作相當的介紹。

蘇維埃租稅制度曾經過許多次的更改。在第一時期，一切直接稅除了「特種革命稅」以外，均予以免除，此種「特種革命稅」係向有產階級徵收的，而為公用徵收計劃之一部分。農民剩餘生產品的徵取，也是一種特種革命方略，在危機時期，用以制裁半敵對的經濟階級的。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各種租稅因之均再予施行。農民以先本以物質品納稅的，在通貨再行設立的時候，漸漸改為以貨幣付稅。這是一種累進稅，而當農業生產的復增與達到戰前水準的時候，免稅的人數一年一年增加起來。一九二八年，計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農家，完全免

了這種負在農民身上的主要直接稅。整個的工人階級，當徵稅制度重立的時候，最初是豁免一切租稅的。以後在施行累進所得稅時，亦及到工人。至於對於新資產階級，租稅的徵收，是用以為控制與屈服這些「敵對」經濟分子之一種工具。以此，直接稅可以解釋為原來是根據於階級原則的。加列寧對蘇維埃租稅政策的概要論述如下：「在蘇維埃體制之下，租稅之主要負擔是落在人民中生產最繁富的分子身上的，而且年復一年地使這些完全免稅的人數有增無減。」

因為農民漸漸感到他們所負租稅的擔負過重，乃有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度之所謂農民「自行徵稅制」(self-taxation)的採用。從前本有各種地方的課稅的設施，但是他們並未照正確的階級原則去組織與實行。在新稅則之下，地方農村會議可自行徵收到基本農業稅百分之三十五為止，其稅額與基本農業稅的稅額具同一的比率。這種自徵的稅，必須用於地方文化事業的增加與發展上，例如學校、醫院或道路等。較窮的分子，豁免了一切租稅，藉以促進與通行此種新法度。富農與甚至於中農反對這種法度，以為這不過是直接稅之另一種形式，這雖是公認的事實，但是要判斷這種法度的效果為如何，為時尚早呢。但是自行徵稅的理想，是希望發展農民更自覺的公民態度。但這也是應予說明的，這種自行徵稅制是與反對富農的運動同時採用的，故此亦是階級鬭爭武器之一種。由是言之，它尤其能增進較窮苦的農民分子之政治活動，此種分子就是視為鄉村無產階級領導權之主要維護者。

蘇維埃體制有公債的規定，而在一九二七年此種信用借貸計約二十次。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所負公債的全額計算稍過十萬盧布。這些公債的價值大有可觀的，因為其利率與所含彩票性質的數目都是很大的。一九二五年估計有公債負擔的僅不過數十萬人。在一九二八年，至少有千萬人投資到蘇維埃政府的債務。此種公債的流通時常被解釋為在「蘇維埃體制裏面與尤其在蘇維埃經濟政策裏面，證明羣衆信任蘇維埃政府」最重要的政治態度的表現；而且此種認購公債之廣為流佈的政策，即或此種政策勢必致於使國庫蒙到最大的犧牲時，亦是要採行的。

要保障在公債中切實的利息，幾幾乎在每次發行時，須指定其特種的用途。有多種「農民公債」是用以幫助農民之農作品收穫的處置與應付他必繳的租稅的。最大公債之一種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工業化公債」(Industrialization Loan) 由私人工人與國家工商大機關征集的。與其相當的「發展農業公債」(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oan) 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度的冬季發行。在這個公債中，每鄉區所購的全數百分之十，須仍用於該鄉區；在利息規定以外，同時亦有彩獎。這些公債均以票面小單位幣數發行，每張在五盧布以下，以便個人能直接參加購買。其集體認購的辦法，允許每人平均及較少數的認購，且規定若干次以分攤方法付清。公債的發行，使之以廣大的與積極的運動。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職工會與合作社，以及幾個公民團體與一次出版物，均從其各個錯綜的中心區接受命令動員起來。其應有部分的分配，各區域間非正式的競爭，

拼盤一集團中的別個分子，或其他同樣的集團之競賽的辦法，都為捐募公債運動中所採用的鼓勵方法。直接的與間接的強迫方法總難免應用，特別是地方的當局者，雖然對於這種方法，中央當局時予以預先的警告，或當其發現時嚴加以處罰，仍是無濟的。

列寧在蘇維埃的國家新式範之發展史上早就說過：強固的政府當是此種國家所具的特徵之一。有一次，他曾警告道：或許將來有一種政府，比俄羅斯人民在沙皇制度之下所能經驗到的一切東西更為強固。鎮壓的及強迫的方法，用之毫不猶豫，且用到一切活動方面。從開端時，即擬設一個特種的機關，並要促成之使鎮壓政策發生實際的效力；這種機關的名字標出其特殊的權力與其管轄範圍的廣大，其名字即是——「攻擊反革命，怠工與投機的非常委員會」(The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Sabotage, and Speculation)。這機關的長名在國外與國內即時縮寫為「乞卡」(Cheka)，是從該原名前幾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縮寫而成的。「乞卡」一字在一切反對分子僅常在耳語時用之，而一切同情者則用之不覺肅然起敬。

激烈內戰結束時，「乞卡」的名稱隨之廢除，代之以國家政治管理局，或以該名縮寫的形式表之，則為「葛杯烏」(G.P.U.)。雖然在其權力上比較加以限制，而在理論上至少較不積極，但是「葛杯烏」也同它的前身「乞卡」一樣，能使一部分人害怕，另一部分人肅然起敬。這是該機關的理想與宗旨。在其十週年紀念時所名為

「乞卡·葛杯烏」(The Cheka G. P. U.)者，以其對革命的重要與在蘇維埃體制裏的地位，爲之舉行一個特殊的慶祝會。當此之際，它被稱爲勃興工農階級對於其垂死的地主與資本家階級之鎮壓機關。斯丹林形容之爲「無產階級出鞘的利劍。」其他定義則爲「乞卡·葛杯烏」是「工農防護的機關，」「保護無產階級國家輝赫的同伴，」或「工農真正的朋友。」

若鎮壓的策略有及到工人或農民，這是由於工人或農民曾背叛其階級的立場。若其爲強迫的政策而非爲鎮壓，則這個機關如整個的蘇維埃政府一樣，一方面是逼迫敵對階級，以爲工人與農民服務，另一方面是使各個工人與農民把其各自的階級利益放在其自己個人利益之上。至於這個「乞卡·葛杯烏」活動的解釋，能滿足整個工人與農民，羣衆到如何程度，則難以斷定。在他們之間，一如其在智識分子之間，關於這種機關，洵有深刻的與圓滿的器重。要使這些工人覺得這種機關在事實上是他們的，與不論怎樣是爲他們的利益而工作的，則必須使他們直接參加這種活動裏面。當內戰期間，這個機關是「羣衆恐怖」的意象與自動偵探與告發的激動物。在現在，此種合作仍是需要的。在新近「煤礦案件」(Shakhta trial)中，曾時加以申說此種「經濟的反革命」與五十個工程師集團被告發以爲怠工，是由「葛杯烏」得工人幫助發現的。其敵對階級或集團與他團的資產階級之所以仇恨與攻擊「葛杯烏」的概念，就可以釋爲它有保護工農利益的作用，與必須留作蘇維埃體制之一種機關之最清晰的證據。

以上所敘述僅是蘇維埃政府結構最顯著之幾點，我們的志趣是在指出這種工農政府勝於簡單的官僚公式到了怎樣的程度。在列寧之成語中，其常所引用的一句話是：「只有在蘇維埃裏面，被剝削的羣衆纔能開始真正學習其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且此種學習不是從於書本上，而是從於實際經驗上求得之。」工農檢查是執行其「在羣衆支配之下」的一個箴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黨代表大會中，斯丹林扼述蘇維埃政府關於力的來源，他先指出政府引出權力，透過各蘇維埃，與工農羣衆作密切的接觸。政府的機關不是從羣衆方面隔離開來，而是要透過許多羣衆的團體，各式各樣的委員會及各蘇維埃與各代表大會的各部分，與工農沆瀣一氣。他覺得蘇維埃政府機關的主要弱點，是官僚傾向不斷的呈現。在他的意見中，反官僚傾向最重要的武器，是工人與勞苦農民，關於文化上的進展，且他鄭重申說各蘇維埃是成千百萬的工人與農民從政訓練的場所。在這一點上，他引人注意下面的事實：在過去二年中，三個重要的政府位置是由工人充任的——即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Supreme Soviet of National Economy) 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與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是。

蘇維埃的國家式範與其蘇維埃政府的形式，是根據於所謂蘇維埃民主政權而來的。在本章所略述各術語的內容，將在其他各機關與蘇維埃制度的形態之繼作討論時，再作進一步的說明。這是明顯的，官僚主義尙未隨着蘇維埃政府的形式之採用而受了剷除，雖然在另一方面足信其有廣大羣衆在各蘇維埃裏面正成爲較有興趣與較能活動。這種興趣是一般政治活動增進的表現之一種，特別在於農民裏面。工人與農民在許多方面正表

示出他們視蘇維埃爲其自己的機關，而各民族的集團亦正利用蘇維埃，以作他們民族文化願望的表示。

第七章 蘇維埃職工聯合會

組織團體的權利是爲工人與一般工資生活者革命的戰利品之一種。蘇維埃職工聯合會現在有超過一千萬以上的會員。在這個勞工國裏，位於蘇維埃與共產黨之下的，職工聯合會就算是最重要的組織。職工聯合會對於蘇維埃政府的關係，尙是一個爭論的問題。雖然，這是明顯的，在無產階級獨裁之下，於政策的決定上，職工聯合會的機關保障有真正的發言權，而且當負擔政府公務性質的責任。蘇維埃職工聯合會不僅希望其保護會員——工資生活者——的利益，而且須特別注意於共產黨領導之下所設施教育的與一般文化的工作。從它的文化工作上，與在蘇維埃裏面的活動及對於國家經濟企業的關係上來看，職工聯合會是用作爲共產主義的學校，在這學校裏面，工人發展其活動的能力，攻擊政府機關的缺點……與從經驗上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這是從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裏引來的。「共產主義的訓練」我們已知其爲許多機關的立腳點，但是在職工聯合會裏，「共產主義的學校」之特別名詞用之尤爲適當。

在舊俄統治之下，雖隨十九世紀末葉而起的產業，無產階級得到迅速的增長，而工人的組織卻少具前途。舊政府特別懼怕道「無土地的無產階級」，乃周詳地限制與防範這個正在迅速增長的階級由自身所表現之一切

活動，若工人要成立一些小具組織的集團，則必須採取秘密的方式。以此一切的集團，以受環境的壓力潛成爲革命的團體；在一班革命職業家所領導的影響之下，其所構成的綱領與活動的首要點，與其說爲經濟利益的保護，無寧爲政治鬭爭。莫斯科警察當局看到該項組織的傾向，不能完全加以消滅，乃即時採取齊拔托夫 (Zubov)所擬設的一個計劃，即是對於工人的組織加以允許而秘密予以限制。一九〇四年在彼得堡工人間的蓋本 (Gibson) 運動，亦是有些相似的事情。這種警察限制工人運動的理想，尙未廣予施行，且隨即廢止了。這可說爲俄羅斯工人運動之一種傳統。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工人運動是其主要力量之一種。職工會的組織成爲革命運動不可少的東西，而組織職工會的權利，在這革命的期間自由地實行起來。一九〇五年尾，職工聯合會約有六百五十個，會員超過三十萬人以上。全俄代表會議召集起來，並在各大城市成立中央理事局。各國職工聯合會在各聯合會的總會中聯絡起來，這有助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大罷工的成功。承認選立國會之十月宣言同時亦確認組織職工會的自由。職工聯合會第二次代表會議，在一九〇六年提早召集。於檢查較不嚴格的情形之下，爲工人而刊發的新聞報紙與雜誌曾有發行，此是工人運動之教育的與文化的活動之開始。

但是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年所發展的運動，旋被一九〇六年的反動漸漸鎮壓下去。雖有十月宣言的確認，而組織職工會的自由並未得到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保障。若要組織職工會，必先得政府的允許，而允許又時常不能

達到，或以種種理由撤消了允許。在一九〇五年所成立的許多職工聯合會，被政府封閉了，同時其他的職工聯合會，乃趨向於「秘密」。

在大戰爆發不久前，所制定的工人強制保險法，堪作爲奠工人組織的基礎。但是即根據這個保險法而成立的受保險的團體，亦受詳密的與嚴格的限制。隨大戰而來的俄羅斯民衆之一切階級的醒覺，也及到工人了。政府對於民衆因大戰混亂情形下之許多問題而起的自發活動的表現，當其與工人階級有關係時，特別顯示出懷疑的態度。惟以極大的費力，纔得工業界的領袖於其所組織的戰爭工業委員會中，允許有工人的代表。因爲這些工業委員會活動的短期，與工人參加這些團體裏面受到限制，致使整個工人階級在事實上有十分重要性的參加受了阻障。以此，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次革命的前夜，俄羅斯工人實際上是沒有組織團體之權利的。只有二十三個小聯合會，淒淒蒼蒼地存在，以代表其成績之全部了。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之最先幾個月中，於絕對自由條件之下，有組織的狂熱時期，這表出革命第一階段的特徵。這主要是一種政治的運動，而這種工人的政治活動，首先是在一切城市與工業中心區所勃茁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內，與經過這些蘇維埃表現出來。初期的蘇維埃是寄託於大工業中所組織的工廠委員會裏面的。同時，工人是由於各個不同的社會黨領袖在經濟的陣線上把他們組織起來，此種按經濟陣線的組織，與職工聯合會相似。在這時期之各蘇維埃與較嚴格的職工聯合會運動，兩者之作用與權限大都是平行的。第三次全俄職

工聯合會代表會議是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召集，中間已經過十一年（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已提及爲在一九〇六年召集的。）自從推翻舊統治以後，在這四個月，職工聯合會之勃茁，遍於全國與一切工業部門。在這第三次代表會議裏面，代表着九百六十七個聯合會與約一百五十萬的全體會員。在開會前已有五十一個相互聯合的中央理事局設立起來。這個代表會議就產生了「全俄職工聯合會中央蘇維埃」。十月革命的前夕，職工聯合會的會員增到二百萬人左右。

際此之時，「工廠委員會」的制度曾被採取，而且廣予施行，工人的出版物着手編印，以補各蘇維埃及各社會主義黨的機關報之所不及。當地方的蘇維埃與市議會，根據普遍與平等選舉權之選舉法而改選的時候，職工聯合會實盡了重要的作用。布爾塞維克黨組織在該選舉中所以能得到重要的政治收穫，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它的活動在工人階級裏面具了較圓滿的組織，尤其在莫斯科與彼得格勒二處。全俄工廠委員會的代表會議，即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召集起來。六月職工聯合會代表會議以門塞維克黨人佔據多數而設立的執行部，致布爾塞維克黨人對於該執行部首先發生了鬭爭。在這兩個敵對的黨派間，關於工人組織之支配權的鬭爭，至十月革命纔作最後的決定。布爾塞維克黨人勝利之後，工廠委員會與職工聯合會合併，工廠委員會變成爲職工聯合會基本組織的單位。全俄職工聯合會代表大會乃召集起來。這是一個代表大會不是一個代表會議，且以此得有較高的權力，在現存的「職工聯合會中央蘇維埃」與其他職工聯合會的權力之上。有幾個職工聯合會不承認該代表

大會，繼續獨立行動，以作反對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的工具。在布爾塞維克黨人所支配的代表大會中，其採取的政策，是要把各職工聯合會完全成爲新蘇維埃國家之制定的機構。

雖然有幾個職工聯合會多少仍繼續着獨立動作的路線，終以受到內部鬭爭的壓力，一切職工聯合會在實際上即刻歸諸政府。由於一九二〇年「軍事的」或「完整的」共產主義完全的表現，各職工聯合會對於工人變成爲新政府之強迫的工具，會員成爲機械的，一切服務於國家企業的人們，均須登記爲特種生產部門職工聯合會會員，而會員費從工資上扣除下來，以爲該會的用途。這就是強迫的會員。凡各種憑券發給食糧、食物、住居、衣服及其他許多種供給的制度，一部分的責任放在這種強迫會員的身上。再則，職工聯合會時常厲行着強迫勞動，勞工動員與分配工人到工業各部門或特別的工廠裏面，這些都是在軍事的或完整的共產主義時期最顯著的條件常事。組織勞動軍的嘗試，就是向着勞動軍隊化方面進行，而這種嘗試不久即打消。

同時，從前採行於工業界的由工人團體派代表參加集團管理的「工人監督制」(workman control)因採用單純的個人負責管理原則，把它大大改變了。最後，當內戰的期間，在職工聯合會裏各種選舉，如蘇維埃裏面一樣實被廢除了，而職工聯合會的領導者亦由於指派。這時期共產黨在職工聯合會裏一如在蘇維埃裏面一樣，成爲支配一切的黨。以此，在這種機構裏，少有工人民主政權的成分；其領導成爲官僚的領導，以致與羣衆失掉了切真正的聯繫，而羣衆亦對這個被強迫加入而未直接付會費的團體，感覺到少有積極的興趣。

以上所述，祇是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蘇聯職工聯合會之主要的特點，藉此可以進而介紹第二時期之澈底的修正。新經濟政策同時招致工人組織之功用上的改變，與其相隨而來之結構上的改變。此種進展，起自一九二二年。此處將不按年序來敘述。職工聯合會的作用問題，在共產黨人間曾為爭論點之一個，至其詳情此地亦毋煩細敘。本書的宗旨，只要把職工聯合會的結構與效用，就現在所能找到的，持綱扼要表出之就夠了。共產黨人現在對於目前的職工聯合會所以躊躇滿志地指出之者，在其全體會員超過了一千萬人代表了一個重要的主動力，由於它，工人民主政權得在蘇維埃體制之下繼續增長起來。

雖然在英文中所用的職工聯合會 (Trade Union) 一字，在俄字意義是「職業聯合會」(Professional Union)，而蘇維埃的職工聯合會是以生產立場為基礎來組織的。這種組織原則，由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全俄第三次代表會議所採取，即是在十月革命以前由門塞維克黨人所採取的。雖然，這個原則直待一九二〇年纔完全實行。由於這種原則，一切工作於特定的生產行程裏面的人，均須組合於一個單一的職工會之內；職工會包括某一種工業或某一個工作場所的在業工人，且包括經理的、技術的與機關裏的人員。職工聯合會的組織，要擴張到社會上一切有用的工作部門，因工資生活者，無論在何處都有被剝削的可能。

凡共有二十三個職工聯合會，即是金屬工人、紡織工人、鐵路工人等等的職工聯合會。蘇維埃工作人員的職工聯合會，包括一切蘇維埃行政團體之雇員。教育工作人員的職工聯合會，包括研究的科學家，一切等級的教師

與教育行政機關的人員，各機關的看門者亦在其內。新聞記者在這種職工會中另成一組，享有若干自主權。在工業的職工聯合會中，亦有一「技術工程師組」。以工資作工的農業勞動者，與甚至於被雇於鄉村社會在公共牧場上為各個人家庭看牛馬的一大羣牧畜者，也有他們的職工會。在教育機關裏的學生，亦得為其所學科門之職工會的會員。雖然在業工人由法律與細則規定着得在蘇維埃裏與黨裏保障有領導權，而嚴格的工業職工會比諸非工業的並不享有任何特權。至就事實的問題而言，工業的職工會是最活動的；有些活動大體上是限於這種聯合會以內的，而且，雖然知識分子與小職員，藉與無產階級密切接觸與受其領導，而得與無產階級同時受到「再訓練」，但是職工會的教育工作之目標，是以教育嚴格的工人分子為主的。

所以一種生產部門——一個職工會，是蘇維埃的職工會主義的原則之一，這個原則能把巨大的職工會集中起來，並因此使其有偉大的力量。藉這種組織方法，要使狹隘的職業利益隸屬於共同的階級利益之下。這種按生產部門的組織法，據解釋說，是由於引導職工會實際參加到經濟改造工作之政策所指示，而經濟改造的工作，僅當一切工人與勞動者在一種特定的企業裏面，組合成一個單一的職工會時，纔有可能，這種職工會能使他們在其特殊生產部門之全部生活上過生活。

因為一切等類的工資生活者，均包括於蘇維埃職工聯合會裏面，一部分致成這整個的運動掩有極大的人數。近幾年來，該運動的增長，大都是由於把農民的工資生活分子組織在職工會裏。對於這種農村無產階級，已予

特別的注意，且以土地與森林的勞工職工會間這種分子工作；而農工或農村農業勞工尤其是關懷的對象。建築工人職工會的組成分子，是最大部分是冬月回轉農村的農民。這整個運動所採取的基本組織方法，對於許多正式登記的職工會會員是不適用的。但是，這可置信的產業職工會會員人數的增加（包括鐵路工人的職工會）已足以維持這種最嚴格的無產階級分子之領導權。因為鐵路工人加入職工會，產業職工會的總會員增過百分之七十。這些事實，大足以對於說蘇維埃職工運動之大部分不過是小官員官僚與知識分子之一種組合作一種回答。其最大的二個非工業的職工會，即「教育工作人員職工會」與「蘇維埃雇員的職工會」是。在這二種團體中所應得的工資以低少聞於世。至於比較諸蘇維埃職工會中的無產階級分子，這班「工作人員」並不代表「資產階級」的分子。

現在蘇維埃職工會的會員是出諸自願的，強迫入會的原則，在一九二二年業已廢除，加入須先要求，而要求必須有正式表示。一切剝奪公權者，當然不許進入職工聯合會充當會員。凡作私人企業的雇員而有權來雇傭與解雇工人或別的雇員者，則不能加入職工聯合會。生產合作的企業家與從事家庭工業的各個人（即手工業者）亦不能充作職工聯合會的會員。最後受養老金的退職兵士，也包括在不能充作會員之特種表冊以內。

一九二二年，自願入會的原則之採用，以致註冊的會員人數遽有大減退的情形。但是（一九二五年）全體會員又旋即超過了在強迫時期所達到最高的數目了。晚近幾年來，這種增加進展無已，因為有幾個新集團也加

入裏面來，而每個集團或場所之工資生活者入會的成數亦較多。現在的宗旨，就是要一切範疇之任何工資生活者，引導入職工聯合會來。在增加會員運動中，產業工人與農村勞工仍是主要的目標；希望着馬上使這二集團完全成爲職工會的會員。現在估計蘇聯裏工資生活者，已有百分之九十作了職工聯合會的會員了。

在求職業的實際情形之下，隱示着以前強迫作會員的舊例，在事實上未曾完全消滅。近幾年來失業者增加不已，同時節省的制度，已把機關裏與工廠裏的人浮於事加以澈底的裁減。通常的情形是這樣：凡職工會的會員是後他人解雇而先他人雇用，雖然對於這種事情並無特別的條文，或者這不過一種趨勢而已，因爲有許多的職工會會員是在失業的大軍裏面。但是，這是顯然的，凡做了職工會會員，則關於保障工作一項總佔了一種大便宜，不過這也似乎是如此，若失了工作的人要想加入做會員，普通是被拒絕的。無論如何，此種要求加入者，覺得難以證明他或她是有權利做會員的「在生產上公民」的身分，有一個失業的勞苦的智識分子說道：非職工會會員要得到一個職業，實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沒有職業的人要想做一個會員之一樣的不能。對於這些人，同樣地對於一般工人，關於職工會會員一端，顯然的仍有強迫的成分。總之加入職工會不免含有特殊的刺激。

做了職工會會員，即具有會員應得之某種實質的特權。例如在國營商場裏面，會員得有特別的折扣。會員的兒童在入學校的候補表上，列在前面，因爲這些學校不能與要求入學者成爲適合的比數，許多戲院與其他遊藝會的入場券，遍散於職工會裏面。最後，關於職工會之教育的與文化的活動方面，我們能看到的非會員亦能參加，

但是非會員只能說爲來賓，不能作爲積極參加者。反之，做會員即含有各種義務，最現實的是爲必付會費。最初付費是一種入會費，新會員每人須繳每日所得工資之半。常費按照工資百分之二比率抽繳，而每月收一次。會費的徵收頗有組織，雖然他們現在是以每個會員與按月個別付繳的。地方組織單位之一切集會，他們有按期蒞臨的義務，而當其選立的權立機關分派工作時，關於地方組織單位之公民工作，應履行一切的任務。但是，他們並沒有如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所負的，至低限度之固定的公衆活動。

婦女加入職工會與男子立在絕對平等的地位。工作於工業界裏的女子而成爲會員的，其百分比數較諸男子是顯著的少數。在另一方面，在蘇維埃的雇員中，婦女之加入職工會與男子有同一百分比數。婦女農業勞動者，即女農工，所達的百分比數亦是低小的，婦女特種組織「女工人與女農民的代表會議」之一種宗旨，是在職工運動裏面，要發展勞動婦女最大的興趣與活動力。十八歲以下的人可以充爲職工會的會員，他們在職工會一切選舉時可得投票，但是不能被選爲各委員會或理事會之任何位置。

當一九二二年採取自願入會的原則以後，會員人數隨着迅速低落，職工會的領袖乃起而「助活」職工會。首先，在一切職工會委員會裏與代表大會裏嚴格施行選舉的原則。正如在各蘇維埃裏面一樣，在革命鬪爭壓力之下，下級組織單位負責的領袖由於上級指派的辦法，在職工會中亦成爲很普通的。現在這種辦法說是完全廢除了，甚至於對偏僻地方的工人也廢而不行。選舉是時常舉行的，尤其是基本的組織單位，在每次改選時，引進新

分子到選設的機關裏面之政策，爲該運動的領袖所堅持的。吾人可信用這種方法；能使職工會的官僚派頭不致於發展，與在職務上不致成爲造端作祟，同時，由於這種「改革」職工會得在事實上成爲共產主義的學校。因爲這些被選出來的職工會的辦事人員，是在該運動裏的活動分子，能實行特殊的任務，與不僅能對於其所選出的集團負責，而且在職工會的機構上能對其直屬上級的機關負責，下級選立的團體之常常更動，足以助最活動的與負責的工作人員提選出來，這些工作，人員以後可以推而進之，以至於負最大責任的位置，此種推進活動分子的辦法，在蘇維埃體制中作一再的申說，視爲組織上之一種特點，在職工會中應用之似爲更有系統。

職工會的組織機構，很似蘇維埃與黨的組織機構，其基本組織單位是工廠委員會，在非工業機關或鄉村社團中，則或爲地方委員會。假使在一工廠之內，其工資生活者的人數不到二十五人，則可派一代表參加其他的工廠之委員會中。在一個小鄉村社團裏面，對於一切的職工會會員，普通或只有一個地方委員會，該會是一種聯合的職工會之地方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委員，是由該企業中一切雇員選舉之，不論是否爲職工會會員，均有選舉權。此種允許非會員得參加選舉工廠委員會的負責人之政策，是與使一切工人參加此種運動的目標相一致的。至在非工業區域或鄉村區域的地方委員會，非職工會會員大概亦可以參加選舉。

此種基本組織單位選派代表到區代表大會，再由大會產生區指導部或委員會；而這些區委員會復選派代表到省代表大會，產生省委員會。各省委員會遣派代表到全聯邦職工代表大會，每種職工會，至少須二年召集全

聯邦代表大會一次。至在獨立的與自治的共和國裏面，其區的政治組織單位以內得召集代表大會。但是其高於一切的權力機關，則是全聯邦代表大會。所以職工會的組織，是橫過於蘇聯所公認的聯邦性之民族界線。

每一種職工會的全聯邦代表大會，選立一個中央委員會，它在每一種職工會以內為最高權力機關，在每省、每特區或每民族共和國的各種職工會代表大會之外，另有其各種職工會的總代表大會召集起來。這個代表大會產生一個職工聯合會蘇維埃，「這個機關是以某省某特區或某民族共和國的名字稱之。這種蘇維埃在區與鄉之各下級行政單位裏，各有其辦事處與秘書處。而這些蘇維埃亦得選出代表到全聯邦代表大會。」由該大會產生「全聯邦職工聯合會中央蘇維埃」，是整個職工運動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機關。全聯邦職工聯合會中央蘇維埃，對於下級所選出的負責人與地方組織如有違反其決議案之事，有權可以撤免與解散。以此，「民主集中制」的名字又被共產黨人用以表出職工會組織原則之特性。各種職工會之各中央委員會，與全聯邦職工聯合會中央蘇維埃均一塊設在莫斯科之一座最高大的房子裏面，前是一個孤兒院，現名為「勞工的宮宇」(Palace of Laborers)各種職工會的出版工作，亦集中於同一的機構之內。這些總辦事處靠近克林姆林皇宮在莫斯科河畔，是蘇維埃都城裏最蓬勃最熱鬧的機關中之一個。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工廠的或地方的委員會，共有五萬六千個。這些委員會會員的總數，共有二十二萬六

千人，內中有二萬八千人是專任該委員會的工作，而按工作的時間由職工會付給生活費。這些職工會工作人員在其選出的時限滿了後，得復任其在工廠裏或在機關裏以前的位置。在最大的工廠裏面，又有所謂工廠中央委員會之「工場」代表，而他們的人數有八十萬人，在各個工廠或地方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會中，共有委員六十四萬二千人，而參加這些專門委員會的工場代表則有八十七萬人；至這些專門委員會的活動，容後再行提及。以此，在職工會低級的基本組織單位中，共計有一百七十三萬八千人擔任職工會的工作。此種數字尚不曾把會員費的徵收員包括其內，因為他們的工作，當視為是參加在這個有組織的職工會的工作之內。專任的職工會的工人員之百分比數比較地小，此層後當知之。此類人員組成職工會之活動分子。一切委員會與其專門委員會的委員，堪稱之為職工會之下級活動分子。工廠的或地方的委員會，亦可指稱為「活動的學校」。由於每六個月選舉一次，這種活動分子時常更換着，所以在實際上，其數目甚至有大於上舉之數。一九二六年各工廠的與地方的委員會的選舉，委員平均數更換到百分之五十，有些地方還要超過百分之五十。

職工會是一種非黨的羣衆組織，但是在該會中的領導權，一如在一切蘇維埃的組織一樣，由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來運用的。上所舉的職工會的活動分子，大約有百分之三十是共產黨人。在較高的與在中央互相聯絡的組織單位中，其百分比數與在蘇維埃裏的情形一樣，比較的高，這是由於間接選舉制所致，而高級黨部有較好的有組織的活動亦有以致之。共產黨各領袖曾鳴其不平說黨的低級組織單位對於其相當的職工會的低級組織

單位，沒有保障其適當領導的方略。地方黨部工作人員受到命令，不得再有命令或實等諸指派的方法，以便在職工會之選舉團體中得到位置。他們要成爲領袖，必須能爲他人模範，與在非黨員之會員中間建立了真正的地位。工廠委員會的辦事處是常與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的細胞之辦事處不相隸屬的，雖然黨或團的細胞之辦公室，可以與職工會總機關的房子接連在一塊。共產黨領導權的作用，不可以爲就是把職工會的團體減低到僅是黨的一個代辦處的身分。但是「共產主義的路線」必須透徹於職工聯合會的活動裏。該運動傑出的領袖——全聯邦職工聯合會中央蘇維埃之主席——即是共產黨政治局九個委員中的一個。

在主要關於經濟政策與經濟問題之各種的蘇維埃團體中，職工會就其本身而言，得有特別派定的職位。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與國家設計委員會及其地方各支會，全聯邦職工會的中央蘇維埃與其地方組織單位，均有代表參加。常勞動人民委員之由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定時，職工會得受咨商。有時且說職工會在事實上得選擇這個特殊人民委員呢。

職工會對於蘇維埃政府現在的關係頗難確定。在較早的時期，職工會很乾脆地是政府機構不可缺少的部分。以後，致有主張職工會對於政府常獨立的趨勢，而同時在決定政策以及確定工農政府的人員時，都把職工會的作用看得很重。職工會對工人在政府各團體與各機關內，與對於這些團體與機關的權力，是竭力加重說明的。工人們時常聽到說：他們得透過他們的職工會，以對他們經蘇維埃選立的政府機關作繼續的控制。

共產黨保障政府與職工會間之經常的密切的關係。黨在這二方面各佔有領導的負責的分子，能把這二者的活動聯繫起來。黨的決議案是蘇維埃裏面的黨團必須執行的訓令，而該黨團的黨員同時是職工會的會員，普通是職工會委員會的委員，與在相當的蘇維埃機關者相似。職工會參加於國家經濟企業的經營之具體表現，是見諸於該企業的管理員或指導員的選擇方面。雖然這些人員真正的任命，是由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則由於人民委員會議任命，而職工會對於國家經濟企業的管理員與指導員的職位，得提出候選者。此種提出候選者的權力，是給於職工會支配該企業管理部之一種方法。若該部不能與管理員合作，職工會大概能保障管理員的撤退。已如上述，管理員時亦為職工會的會員，因此，他們是直接受職工會機關的支配。

職工會又在決定工作與工資條件的集體合同的訂立上，對於管理部得運用其進一步的權力。集體的訂約，會為極廣大的工資生活者所採用了，在理論上，這是含有守約義務的，祇需假以時日，此種辦法在事實上得能普遍通行。工業各部門與勞動者各範疇之工資高低表格，由上所說的政府團體規定，在該團體之內，職工會派有代表。在每種特殊的企業中，其包括該企業一切工資生活者之集體合同，是由於職工會與管理部簽訂的。個別工人有陳訴事件，必須向職工會陳訴，而不直接到管理部，管理部亦把陳訴案件交到職工會去。集體合同須在工廠或地方委員會全體大會詳加討論。永久法令規定着這種手續必須遵守，這是表出工廠與地方委員會於其自身的權力機關，解決案件的常例，在這種事情上，黨細胞有獨立的與重要的領導權之運用。所謂管理部、工廠委員會與

黨細胞之「三角關係」，足信爲能保障工資生活者的利益，同時使工資生活者在決定工作的條款時，得作實際的參加，而不傷管理部的效能。三者關係適當的平衡，是賴黨的力量予以保障。黨的效用即在調和工資生活者的利益與管理部的利益。

「糾紛評判委員會」(Appraisalment-conflict Commissions) 是監督集體合同的施行，與調停所發生的各種誤解與糾紛的。在每種企業與機關裏，都有此種團體，而這團體是由於管理部與工廠或地方委員會之等數代表所組成。如不致與法律有明顯的違損，則該委員會的決定是最後的，若有違損法律情事，而爲勞動人民委員會懸而未決的，乃有仲裁委員會，付諸再議，在仲裁委員會裏面，兩方有相等的代表，而其主席是由勞動人民委員會任命，而有表決權。至「糾紛評判委員會」不能獲得協定，則此種爭議另有一種委員會解決，委員亦由勞動人民委員會任命，在該會主席無表決權，但是必須引導相等代表的兩方獲得協定。

在理論上，職工會在國營企業裏面同諸在私人企業裏面，有組織、宣佈與指導罷工的權利。在私人企業裏面，近幾年來曾有幾件小部分與短期間的罷工，至在國營企業裏面，若以其大影響而生他種勢力而論，與就職工會甚至有權壓迫管理部來遵守勞動法，與遵守工人和雇員的代表所簽訂之協約的條文而論，此種罷工視以爲失策的，事實上且無須乎用到罷工。

一個企業之一般工作條件與管理政策，亦須接受生產委員會與最近設立的生產會議的討論與支配的方

法生產委員會是工廠或地方委員會的幾個特種委員會之一種。這些生產委員會是希望循着企業工作的大道，並提供技術的與一般性質的進步。因為這些委員會之不活動，以致採取較大的生產會議，以討論生產的情況與各問題。該會設使一個企業的一切工人與雇員均得參加。而管理員與技術人員亦必須蒞臨。參加該會議的成數尚不甚大，邇來職工聯合會創始了一種運動，要給這種會議以較大的重要性與權力，藉以保障工人大量的蒞臨。黨員則受命對於引導工人作生產問題的討論之新努力須加以注意，而到臨會議者的大多數，顯然是共產黨人。再則，傑出的各領袖，例如里可夫（Рыков）曾向最大最重要的機關之生產會議中作了多次的演說。

這些生產會議未付予任何實際的權力；雖然管理部分直對於在討論過程中所發現的事實，當予以細心的注意，與參加此種討論並答覆種種問題，而各種決議案之在管理部方面，卻沒有必須聽任的義務。這種理想之真實托出。曾有許多的批評，且對該會議性質上的更改視為必要。總覺得他們的討論，老是循着這種一般空洞的路線，以致毫無收果的。在一個會議上，會議決必須建造一個完全新式的工廠，而工人對於管理部無人走上前並對這問題發表意見，曾表示失望了。正如職工會的首領托模斯基所說，這些討論的題目，未免過於一般了。他教人注意下列事情：有一次會議，正在敘述與討論美國式的技術時，而會議場上的破頂罅隙處滴下幾點水，正落在發言人的鼻子上；又有一次，當赴會議時，一個人被一堆亂礫跌翻，而這堆亂礫堆在工場上有幾個月了。但是有些會議也引導一大羣的工人，作生產的與管理的具體問題之有秩序的討論。並說有許多受用的提議，曾在這些會議中

得來；且在許多事例上，工人會看見他們提議得以實行。不過，這不是時常都這樣。雖然各管理員不懷敵意，對於這些會議，是一種最善意的中立態度，但是這種會議總被視為殆不過是如機器上有用的保險機括而已，且管理員不肯賣力與之合作的。以此，到會者以致減退，因為工人知道從這種探討上，沒有多大具體的結果，或覺得是此種集會僅不過用為報告抽象的題目，例如國家工業化一類的問題而已。有一種印象，覺得技術專門家不大相信這種會議之有真正的用處，因之，他們也不積極參加該會議。

雖然生產會議是另一種工具，由於這種工具，工人與雇員能影響，並相當地控制，其所雇傭的機關之工作條件，與甚至於管理部的一般政策，至其所生的有效的影響力或控制力實際程度為如何，卻不能斷定。似乎是工人與雇員或至少是職工會的活動分子，感覺到他們能藉這種會議，以運用真正的影響力與若干的控制力。對於一般的職工會，地方的與中區的工廠委員會，職工會在行政團體的代表，與他們的集體合同，都可作同樣說法。在職工會的種種活動裏作廣大的與有效的參加，是蘇聯公民教育之特別重要的活動機會。

文化教育的工作是視為蘇維埃職工會各種活動之一種特點，且為革命以來工人最大收穫之一種。公務工作人員亦能受沐於文化工作 (CULTURE WORK) ——這字是慣用的流行縮字，在各機關的討論有關於職工會之運動時，每次常能碰到。這種沿着教育的與一般文化的路線之工作，是有裨於會員之訓練的，使上所舉的職工會的功用，得到最有效的實現。該項工作具有提高工人階級一般文化的水準之較大的目標，尤其在於幫助工人階級

適當地利用其閑暇的時間。這種在共產黨人領導之下，且必須守着共產主義的路線之教育工作，得藉其計劃與方法，使職工會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學校。

在革命以前，工人間的文化教育工作，幾幾乎只有藉各種定期刊物與小冊子予以施行。這些刊物與小冊子，因在舊制度政治條件之下，工人的組織大都頗薄弱，故被限制了範圍與不能達到縣遠。在革命之前，間有所謂「工人俱樂部」，但是它們與那時期的職工會毫無關係的。該項活動肇始於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於其繼續下的反動時期，該運動尙有一時存在着，自一九一〇年以還，予工人出版的條件更成爲艱窘，一九一四年大戰的來臨，檢查制與行政上壓迫的方法，尤爲嚴酷與擴大。當二月革命的時期，即一九一七年的夏季，職工會的文化教育工作，被限於定期出版物的刊行與偶爾組織的演講會或音樂會。那時是工人的組織自由發展的時期，但是亦是各社會主義黨間關於組織的支配之鬭爭的時期。蘇維埃與職工會的關係雖尙未經定出，而對於這個問題，各領袖均致深切的注意了。

在蘇維埃統治的初期，職工會比較地不大注意於教育的工作；一切努力都集中於攫取職工會所產生出來的權力之直接鬭爭的任務。工人的報紙着重於煽動，版張狹小而內容貧乏。工人俱樂部成爲實際應戰的「突擊」任務之動員中心，或成爲投放一切力量於生產或分配之特種場所的中心，以便應付那幾年持常軍事的與經濟的危機。各種集會舉行於各俱樂部，與在劇場裏及各大廳裏。這些集會大都是民衆的集會，用以激發熱忱，是革命

的「短小精悍的集會。」各種演說爲工人聽衆而擺佈。但是各色各樣的題目，彼此卻無甚關係，或關工人迫切的利益。在這第一時期中，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化」多有討論，而要求必須組織「普羅文化」(Proletcult)的團體。但是這些團體並不具有民衆的性質，職工會參加這些團體裏面，一如在其他國家教育團體一樣，不作教育的與一般文化性質的實際工作之正式負擔。

一九二一年以來，以軍事的與政治的勝利獲得保障，這纔得以有系統着手進行其業已綱舉細究之教育的與一般文化的計劃。隨着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必須設置爲工人解釋新政策的門徑，以保持工人對於革命主義的信仰，雖在對資本主義的原則作讓步時，亦可無礙新經濟政策給職工會以組織的新原則，這種原則有特於較廣大的教育活動。以此所謂職工會的「文化工作」於一九二一年以還纔氣象萬千地開端了。

初時，許多勞動者，當職工會的各領袖把文化的教育的工作放在前列的時候，他們抱着懷疑而近乎鄙夷的態度。但是不久，每個工廠或地方委員會在它的專門委員會裏，有所謂「文化委員會」且一切省委員會中及該運動之相互聯絡的團體中，亦有「文化組」或「文化委員會。」一九二二年職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曾通過下面的決議案：

職工聯合會對於地方工廠或機關的文化教育委員會，應加以特別的注意，把它們視爲職工會自己基本民衆的組織細胞，與勞苦民衆活躍的創始力與活動力之根源與基礎。

文化工作不僅為啓發職業的、政治的與文化的知識之方法，而且就一般說來，是以職工會為中心把工人組織起來之有力的工具。工人俱樂部漸漸地趨到職工會指導之下了。該會第五次代表大會時指出：

職工聯合會文化教育活動的中心，必須成為工廠工人的俱樂部（職工聯合會俱樂部），而工廠工人的俱樂部，則不僅必須為無產階級教育與宣傳階級鬥爭惟一的陶冶地，而且為工人每天工作以後休息的場所。以此，「普羅文化」應從小小的作業室與研究組而發展為羣衆運動。全聯邦職工聯合會代表大會，記出此種事實而指明如次：

職工聯合會的文化工作，必須環着該聯合會，把廣大的工人羣衆，在其精神需要多方滿足的基礎上，努力使之組合起來，而且憑藉廣大的階級的教育方案，予他們以官威的與身體的舒適及娛樂，這樣纔得保障其脫離頹喪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

扼要言之，文化教育工作是假手於下面的機關與方略而實施的。每個工廠的與地方的委員會之基本的文化委員會，於特定的企業或地方的單位之工人中，對於工廠的地方的委員會負着一切文化活動的責任。這種文化委員會，要監督肅清文盲或入校手續一類問題是否在大會上或代表會議上提出討論。文化委員會對於設立於工廠裏或企業裏之特種技術學校或訓練班要與之合作，並運用職工會某種限度的控制權。這種更嚴格的教育工作，是由於教育人民委員會的職業教育科管理的。雖然，在任何種特殊企業中，此種訓練班的範圍，時常定如

集體合同之一部，由職工會予以磋商與核准。文化委員會的職責，是在監督其於磋商之時與在合同之中，對於此點是否予以適當注意。文化委員會與教育人民委員會其他各科，例如社會教育科或政治教育科亦有同樣的合作，以改良與組織成年工人的普通教育訓練班，或政治訓練班一類的學校。

職工會的組織層中之每一級，與這些基本文化委員會的工作是互相聯繫的。藉工人與俱樂部「紅色處」設立，文化委員會各級所做的工作得更為切實。尤其是俱樂部，乃政治訓練的中心，其整個生命，據第五次職工聯合會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是充滿了政治的與專門職業的內容。「紅色處」是俱樂部基本組織細胞，普通設在較小的企業或機關裏，工人的寄宿舍裏，或大工廠之各分立的作場裏。「紅色處」之一種目的，是補充俱樂部之所不及。若在無俱樂部的地方，則「紅色處」亦可代替俱樂部。現在將要說到的俱樂部的羣衆活動，可以由「紅色處」來舉行，而研究組的工作則不能以「紅色處」為中心來組織。新聞報紙與其他流行的讀物，在這些基本組織細胞中都有購備。該處無正式會員，而其設置與維護，由於工廠的或地方的委員會之文化委員會負責。一九二五年一月「紅色處」為數約有八千個，一九二六年年尾，其數增加超過二萬；一九二八年，超過四萬。

一九二五年，俱樂部之數約近三千五百。在這個數目中一千四百個（整數）是工廠俱樂部；大工廠各有其自己的俱樂部。大約有九百個是所謂「集體俱樂部」，一個俱樂部可供附近幾個工廠使用。再有一千二百個左右所謂「相互聯合的俱樂部」，是為一切職工聯合會的會員而組織的，以此，工人、公務工作人員或教師共同享

用一個俱樂部。在莫斯科有幾個少數分立的俱樂部，專供蘇維埃雇員與教育工作人員的職工會享用的。俱樂部會員之總數，一九二五年超過九十萬，而自此以後，會員增加則寥寥無幾。

作俱樂部的會員是自願的與個人的。雖然大概沒有俱樂部的會員同時是職工會的會員，但是做俱樂部的會員不必一定是職工會的會員。充作俱樂部的會員，其意義比諸作職工聯合會的會員，應更有積極的政治覺悟與階級的意識。俱樂部的會費不多，且在俱樂部裏一切的活動是自願的。許多工廠俱樂部就是利用前廠主的住所。住在其工廠切近的地方是廠主的常事，在這樣的俱樂部裏，工人能表示出其具體的革命戰利品。從前的飲食店亦改爲俱樂部。這些房子，尤其是飲食店，頗合爲作俱樂部之用；雖一般人以俱樂部的房子一再用作各色各樣的大集會，以致俱樂部的房子不夠應用，頗多申訴，但盛大的聚會每在俱樂部的大廳裏舉行的。俱樂部的房子普通是簡樸的，但是妥爲佈置，而且時常充分備以各種標語。這些房子雖在參觀者看來，不免得到粗陋的印象，但是較諸工人的宿舍，則尙顯出無限的精緻與潔雅。且比諸小酒店更具有吸引力，我們將能到它們與小酒店是在激烈爭競之中。

俱樂部會員選出其自己的辦事員與委員會，不過候選者與選舉的手續，是由管轄該俱樂部區域的職工會機關的文化委員會，予以相當的監督。俱樂部的負責人，必准照文化委員會所準備的計劃辦理。俱樂部的預算亦須得文化委員會批准，文化委員會從職工會的通常經費裏，撥出一部分以供俱樂部各種活動。但是俱樂部的計

劃與預算既已採用，直到過了一定的時期為止，文化委員會不可加以更改；在這時期末尾，俱樂部的負責人須作報告。以此會員在實際上不斷地享用俱樂部及進行俱樂部的活動。文化委員會常被望其與俱樂部合作，而確保其與某種企業裏或工廠集團裏的各問題發生接觸。它同時供給教育性質的娛樂性質的材料。例如莫斯科各俱樂部好些活動，得力於莫斯科職工聯合會城市蘇維埃的文化組之助——這是一種職工會間相互聯合的組織，由該組織供給演說家、電影、參觀計劃與參觀的指導員及印刷品等。在職工會與管理部所訂的集體契約中，時常規定着於總工資中抽出百分之幾，以作文化教育工作維持之用。以此，俱樂部不由會員費來維持，而此種會員費前已說過祇能收得很低，而實際上所收的確是很低的。

俱樂部的活動凡有二類，即羣衆的活動與研究組的工作是。羣衆的活動以普及全會員爲目的，而時包括其家庭。例如有參加各種政治的或專門職業的運動，以及關於該項運動的宗旨之初步演講與究討，用這方法，廣大羣衆的專門職業的宣傳與政治的宣傳得以實施。再則，又有關於一般題目的各種演講。演講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或爲發問與回答的晚會形式，或則於演講後演映電影來說明。在工人俱樂部所演映的影片，大概是關於教育性質的。這些影片編製成組，由政府機關準備起來，而俱樂部演映之僅以名義上付費。戲劇的表演、音樂的彈奏及「活報」均包含於按月編排的節目單裏，而且貼之於入口處。各種標貼與圖表時時揭示，表示俱樂部的各種研究組對於會員羣衆的工作。

各種遊藝會大部分是含有教育性質的。「純粹娛樂的俱樂部晚會」亦有舉行，但是亦有教育的意義；幾乎隨時隨地都是「有目的的」革命的事跡或一個特殊革命上的英雄，將作為戲劇的或音樂的遊藝會的題材。若活報離棄了其表現時事問題之主要宗旨，而純為酣暢其滑稽笑罵，雖慰快人心意與賞神悅目，而按其本源乃無明晰的用意，則其編排者要受到嚴厲的批評。游覽博物院、郊外或鄉村，則成為俱樂部之另一種羣衆活動。至各種遊覽而政治上宣傳與訓練用的，則將另以專題再行討論，因為這種公民教育的方式，在一切年齡中與各種階級中用得頗廣。

各俱樂部自己設有圖書館與讀書室，或作為中央各大圖書館的地方流通處。在此地，小冊子及定期刊物與各種大部書籍，均為合用的。純粹文學的與技術的雜誌，在俱樂部讀書室的桌臺上，不大多觀；所知大部分的書籍，都具有政治的與宣傳的性質。各圖書管理員在圖書館與讀書室一般的推進上與管理上，得「愛書者學社」的翼助，此種學社按種種題目為俱樂部會員製好圖書目錄，並組織特種「圖書晚會」。這個學社為了現在所規定的與最重要的每次革命紀念日，特貼出一張書目表，表內之書是敘述所應慶祝的事跡或偉業的。在許多個俱樂部裏面，亦能找到通報局，在該局會員們關於找職業、找住所或求學等類事項，得有正常的諮詢，負擔這種事情的專家，在局裏有經常的辦公時間，視此為其公民活動之一部，而每星期必須給出若干時間，以做幾種公衆工作。有些俱樂部設有簡單的小吃店，但不得出賣含有酒精毒素的飲料，在小吃店裏的價格，比諸公衆食堂或小

酒店爲低，在小吃店與消閑處裏，各種棋子的遊戲是允許的，帶有賭錢性質的紙牌遊戲則受禁止。在俱樂部裏關於跳舞問題，曾有許多討論。直到現在，跳舞尙不爲所喜而實則加以禁止，摩登的跳舞被斥爲「資產階級的」與德的與縱慾的。俱樂部的房子是不適宜於跳舞的，時常說以爲地板不適用與多塵埃；當跳舞亦得允許之時，則青年人清晨入場，且暢其一般的醉飲與個人縱情。不過最近以來，要將俱樂部儘量地使能引動心目，與空氣少些沈塞與抑悶，幾個職工會的領袖曾否認反對跳舞了。但是所提倡的是集團的或四組的跳舞，以之反對「卻爾斯登舞」與「太吳哥舞」。近來試行計劃一種「無產階級」的舞步，這是一種含有運動性質的新步法，以便有助於身體的發展。

俱樂部的研究組表示出它對於羣衆活動得有收果。這些研究組的組織，是滿足那班對於羣衆活動中之特殊的某一問題，能引起較深刻興味之會員的需要。但是這些研究組（*Grupp*），並不是視爲具有專門科學研究組（*Bohnar*）的性質；而設備與時間的條件，亦不許研究組這一種的理想得以發展，且使俱樂部的研究組，形成爲正式的教育的性質之趨勢，亦是受譴責的。此種研究組不欲試與工人補習學校、勞工大學或其他工人設立的一種教育訓練班相競爭。此種研究組應爲最活動的，會員所發起的；俱樂部管理處雖應對於各研究組盡一切可能來鼓勵，但若俱樂部管理處不促進羣衆自動而祇自上而下地熱心努力，是要受指摘的。

研究組有經常集會，且有時那樣的數數，一星期竟有三次或四次晚上的集會者。每個研究組各有其指導者，

他祇是一個老同志，對於特種問題具有較豐富的經驗與訓練而已。研究組的領導，常是個人盡其黨員或高等學校的學生或畢業生之應有義務的公民活動，在別的事例中，指導員如其專任此職得受報酬費。研究組又選出一個「組長」，他代表研究組對於俱樂部管理處提出一切需要。各個研究組的組長組織成「組長會」，由於這種團體，研究組的活動得與俱樂部的民衆活動互相聯繫。研究組的工作時以作羣衆活動爲主要目的。如藝術研究組的爲俱樂部參加紀念會或慶祝會時而準備小旗與標語布。組長又擔負執行研究組裏組員業已採用與俱樂部管理處業已允許之工作計劃的責任。在這種計劃之下，研究組的組員必須接受組長所規定的工作的分配。到會必須按時，且由書記記錄下到會的人數與研究組的活動情形。

藝術研究組亦頗能標出俱樂部研究組之一的性質。集體主義的則時常十分重視，這些研究組例如歌唱組或樂器彈奏組，不欲以資個別的會員希在特種藝術上造就成才的需要。研究組的工作應看作爲絕對羣衆的性質。以此，研究組的目的僅可以作爲幫助組員了解與欣賞音樂，而不是要他們參加到音樂隊與歌唱隊裏去做專門的藝術家。

許多較重要的研究組，在俱樂部羣衆活動與研究組組織法的大綱中，業已指出。降至現今，在俱樂部管理處方面，有一種趨勢，欲把研究組的活動範圍規定出來，各研究組的詳冊已準備好，而希望組織研究組的會員，必須登記在這詳冊裏。共產主義路線的厲行與各種宣傳的目標，在這些表冊準備時應首予注意。「政治訓練班」列

在首要位置，而每個研究組務須表示出與這政治訓練有關係。俱樂部與其各研究組成爲一種小型的政治教育機關。因爲在一般俱樂部裏，尤其是在研究組裏，興趣的消殺，以致有擴大研究組的興趣範圍之舉。在現在，其主要的興趣範圍，凡有四種：第一仍屬於政治，而各研究組仍繼續爲重要政治教育工具之一種。第二是職工運動，這研究組的組員究討職工運動的常識，即是職工會的原理與結構。第三種介紹給研究組的興趣範圍是生產的一般問題。第四種的研究組則以藝術、音樂、文學、無線電、運動與遊戲等是。在這個最後一類中，現有極廣大的興趣範圍，獻給俱樂部管理處。

雖在政策上有這樣的變更，而任何俱樂部之最重要的幾個研究組，仍舊是歸於第一類的。有些時候這些研究組被稱爲「社會科學研究組」；最通常名稱，則爲「政治常識研究組」(circle political grammar)爲這些研究組而準備的計劃方案，很似政治訓練班一類的特種學校之計劃方案，後將與政治訓練班一類特種學校同行討論。這些研究組的基本宗旨是在於「助成一種適當的共產主義的態度，以便應付全世界的與蘇維埃共和國內部的一切社會的與政治的事變。」馬克斯主義研究組是與最基本的政治常識研究組連續的高一級的研究組。在這種研究組裏，組員對於馬克斯主義與「辯證唯物論」的理論，得更有深造。當其他研究組的活動入到政治的領域時，則政治常識一類的研究組，對於這些研究組間接運用一種支配的辦法。例如藝術研究組所準備的政治的標語與小旗，時常要依據於這些政治研究組的提示。

體育研究組是俱樂部活動之重要的特點。在大城市裏，有特種的運動俱樂部，亦在職工聯合會掩護之下。革命所得戰利品之一種，是羣衆間運動與遊戲的發展，而以前則僅在上層與中層階級纔有之。體育訓練的一般問題，此處將與蘇維埃職工聯合會的活動同行討論。這是必須注意的，各種遊戲與運動，在紅軍訓練綱領中是居着重要的位置，而且包括於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活動裏面，並包括於各學校各大學裏面的。

言及體育訓練與遊戲，通常是着重於有組織、有指導與有宗旨。誰都聽見過「最高體育委員會」與其「地方的委員會」的名稱，雖關於這種委員會的機構與功用未見有何記載。亦有國家體育大學，該校校長曾寫了許多關於「蘇維埃」的遊戲與運動的目的與特徵，拿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的遊戲與運動來比較。在體育上雖然有不少借用於他國各種制度，而其所採用的方法，良有某種特到的地方。譬如體操是共產主義訓練的要素，必須從社會觀點上爲經濟的而且有用的。體育是要保障勞工健康到最高限度，足以補勞動法之所不及。這又是勞動的科學組織的有效方法之一種，對此曾有許多討論，而且爲此設立了幾個機關。光是體操而無實際的宗旨，則當視爲徒然消耗時間與精力，同時表示出自私的個人主義。勞動者的身體鍛鍊，必須含着階級利益的顯示；例如因襲的防禦與攻擊的訓練，必須與階級鬭爭嚴密結合起來。上所說的國家體育大學的校長曾在這個場合扼述蘇維埃的體育方法，爲：

探求社會有用的、具有有目的的措施，重大的意義，階級的特性的，從衛生學與教育學的觀點上爲有用的，

人人學得會的，並要以最低時間與精力的消費，而達到最高度周身平均發展的體育運動。

在蘇維埃的競技的與遊戲中，是着重習常的與集體的競賽，不主張造成如何紀錄。後者可以信爲是「資產階級」競技之主要特性，是發展狹義的專門化，有害的專家主義與虛榮。集團競賽乃個人競賽的反面，所以予以重視，而競賽亦由於根據這種基礎來組織；雖然網球中的「單人賽」仍是有的，且又有他種個人可爲勝者的比賽。但是其目的是「不僅在於訓練與教育成一個週身無缺的健康的具有工作能力的社會成員，而且要成一個共產主義的不折不扣的集體成員。」這是引上面同一的人，所說的獎品與獎章，即在青年人裏面亦是不鼓勵其採用的，而所含的競爭成分，祇把勝利歸諸於一集團——跳高團即是其例。以此，爭競與抵抗，在蘇聯的運動裏是不受排斥的；它們必認爲有助於運動員體格上與智力上的發展。爭競與抵抗有需乎「限制」而尤其在於「自制」且其舉行應不妨害維護共同利益之團結精神的發展。

民族的遊戲、競技與跳舞均用於體育的發展上，尤其在最落後的小民族裏面。有許多種遊戲與競技在身體上且在道德上是有害的，例如村與村的相戰。然其爲無用的與甚至爲有害的，都向民衆解釋，漸漸予以革除，而代替以運動的競賽與含較有建設性的競技。跳舞用以爲體格訓練之一種，以其是人類固有的按節奏舞蹈的本能之表現。俄羅斯大部分的民族跳舞是集團跳舞。舊式跳舞室的跳舞尤其是四組跳舞，亦提倡之爲有益的。但是所稱爲「摩登」跳舞，則絕對反對的，以其缺乏自然的姿態與動作之不合乎節奏。在幾個新派的蘇維埃戲臺裏，甚

注重戲劇演員之體格訓練，此點亦應加注意。至於蘇維埃體育原則，實際上業已施行的到了那樣程度，則不能斷定。在作者所能參觀到的幾種運動俱樂部以外，在大都會的公園裏，甚至小城市與鄉村裏，時常可看見運動與競技的發展。

在俱樂部裏，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不是把他們自己從非黨員方面隔開。通常並沒有黨細胞與團細胞。在俱樂部裏面，卽其例子。但是管理部裏的共產黨員，組織有共產黨團，該黨團是對這俱樂部所服務的工廠細胞，或對這俱樂部領域中的黨部負責。管理部之主任普通是共產黨人，而時常受黨部的命令，不過此種手續是不合乎常規的，且爲職工聯合會的當局積極反對的。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均屬望而最活動的會員，爲組織上與活動上的領袖，尤其在政治常識研究組與馬克斯主義研究組裏面，許多這一類的研究組，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如上之所指，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在俱樂部裏所盡的特種職務，例如各種演講或各研究組的指導等，可作爲實行了他們對黨所負的公民活動之職責。

但是，各俱樂部，如職工聯合會一般，是非黨員的，乃羣衆的組織；俱樂部負責的領袖，力圖保障非黨員工人之天真的自由創造力。在第十四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托謨斯基指出：在俱樂部各種活動之共產黨領導方面，對於俱樂部過於一再試其「建立行政的、管理的、財政的及其他種種之家長政策了。」黨部受到命令，不可削弱其俱樂部活動的領導權，但是同時被警告不可有層層干涉的事，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議決黨員在俱樂部中的工作，必

須是活動的，且

在俱樂部工作之思想的與一般組織的措施上，運用他們共產主義的影響，但是對於俱樂部非黨員分子要表示出與其所選設的管理部最大的機靈與審慎態度，推進非黨員工人作俱樂部的工作，對於管理部於其工作方面，給以一切可能的幫助，而不擅奪它的權利與權力。

俱樂部及其研究組，凡在十六歲以上的青年人都可加入。以此，工人階級最年輕分子，亦許其參加俱樂部的活動。在事實上，較年輕分子，在俱樂部的會員中，甚為顯目，有排出較老的工人與勞動者的情勢。因其青春的狂歡與騷亂，這班青年人乃至於獨占了俱樂部的各部分，且在幾個俱樂部裏，「流氓主義」盛行着。有一時，特為青年人組織了特種俱樂部，以為共產青年團運動之一部分。但是此事並未繼行，因為要希望把青年工人引導之密切聯繫於年較老的工人，故未繼行。較年老的工人，亦屬望其能把他們在革命之前與在革命初期積極鬭爭的時候，參加了「秘密的」活動所得無產階級的意識，傳給青年人。但是，要把俱樂部的活動，對於年齡相差這樣遠的會員受着吸引力，確是困難的。青年部現在正在組織起來，把差不多的男青年與女青年聚在一塊，而留下俱樂部的另一部分，以供年較長的工人作另一種活動之用。「家屬晚會」則用為引導各工人的妻子參加俱樂部的生活。當父母去聽演講或音樂時，小孩子們的看法亦設法代為負責。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俱樂部設備了永久「兒童看護處」。

再則，政治教育的宣傳的成分，在俱樂部的集會與遊藝會的節目單上，比較有些不看重了，這是想吸引較多的工人，尤其是較老年的工人，來加入或傾入於俱樂部裏。老是在革命題目上與革命口號上大吹大擂，曾認爲於俱樂部集會裏與遊藝會裏極其殺風景之一種東西。在近來關於俱樂部問題的討論時，報告道這種成串的演講會之組織，招致一班工人喃喃怨語道：「老是煽動，他們不讓我們休息或吃食了。」其結果，俱樂部勢不能與小酒店相競爭。這已不是一個舒息的地方；較年老的工人寧願小酒店，而年輕的工人，則願跑電影院或街上。別種機關爲俱樂部須與之競爭的，則是教堂。引導較年老的工人及其家屬加入俱樂部的生活，其各種努力之所以常是放在心裏者，一部分是想把俱樂部作爲教會禮拜的替代，尤在於宗教節日之時。但是，青年人在俱樂部裏面，與以俱樂部爲核心，所佈置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動，無疑地卻成爲阻着較老年分子趨入俱樂部各種主因之一種了。

在工人與雇員的休息所、療養所與醫院裏面，職工聯合會又進行若干種非正式的文化教育工作，如供給書籍，佈置公衆演講會、音樂會與其他遊藝會等。「政治常識」與「職工常識」是這些許多書籍與各種演講會的主題。作者前在這些機關的讀書室之桌上，看到政治教育的書籍那樣的繁多，尙留着印象呢。

在下續幾章中，對於蘇聯職工聯合會之教育的與文化的工作，將作進一步的敘述。在這種文化工作中，俱樂部雖然是主要重心之一種，是文化革命的武庫之一個，而其所造詣比較尙爲狹小。此種工作頗有爲內容所限，而不能滿足工人的需要。有一個職工聯合會的領袖說道：羣衆活動未予健全組織起來，與政治運動彼此有似水之

二滴之微弱。一般地說來，文化工作遵從着呆板化的綱領，各種工作計劃都是「可驚異的」相似；在這些工作計劃上，工人對於普通教育的要求，不能予以反應出來。各種研究組有壟斷俱樂部的趨勢，至於會員羣衆，則其活動鮮有具體的表現。據其解釋說，文化革命尙在初期，而循着新路綫之重新訓練的計劃，是很確定的，而且遠大的。

蘇聯的職工聯合會，在其他基本的功用上，與在所謂「共產主義的學校」之更普遍的意義上，是有較大的成功。於全聯邦職工聯合會成立十週年紀念時，職工聯合會在蘇維埃制度中的作用，曾予以扼要說出。蘇維埃政府經濟活動之每種場合，職工聯合會曾給予極密切的注意。

在工人階級的前衛——共產黨——領導之下而工作的，且是蘇維埃政府之直接合作者的職工聯合會，業已最大規模地與有實效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了，且引導工人羣衆積極參加於此種工作，並無時或忘其工作有關於工人階級的需要與要求。

在這個蘇維埃職工聯合會之性質與功用的扼述中，並述及其國際的姿態。有一篇論文的標題是「蘇維埃的職工聯合會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別遺隊。」實際上，蘇維埃職工運動是紅色職工國際之首創者。蘇維埃職工聯合會至關於這方面的活動，在論及蘇維埃主義之國際姿態的最後一章中將予論述。

第八章 蘇聯的合作運動

列寧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很多論及合作社的問題。這些合作社，爲革命前的俄國與革命初期的各反對政黨之多方爭論的焦點。共產黨人對於舊式的合作運動的態度，是仇視的，或者是極其藐視的；他們的意見，以爲這個是小資產階級的运动。革命初期的純粹共產主義，亦用到「合作」一字，而且仍用革命前此種運動的骨幹，但其所爲卻完全改變了合作的根本原則。以後，隨着新經濟政策而來的有利於合作團體的新政策，是根據於入社自願，組織自由，與獨立自主之諸原則的承認。列寧晚年所製定之一個新口號，是爲「蘇維埃加合作制度，等於共產主義。」合作社與合作團體乃公認爲在該國經濟生活中，顯出與私人企業，尤其是私人商業，相鬪爭的社會主義原素之一。所以在合作社裏充當社員的意義，即爲參加階級鬪爭，此即共產主義的公民活動。最後，在各種合作中的活動，成爲訓練之以作蘇維埃的公民，所謂蘇維埃的公民，即自覺的參加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建設者。

合作運動之在俄羅斯，佔一縣長與重要的歷史，該運動起自前世紀六十年間，是受着一八六一年農奴的解放，與又受着西歐的合作理想與努力之影響而起的。不過，直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合作運動進展得很慢而已。俄羅斯的農村地租制，已含有合作的成分。各種法律與賦稅政策，是使公社的地租制在俄國農民間，得以繼續至二

十世紀的一種主因，但是，俄國的農村公社（mir or commune），以此養成了合作的習慣。同時有頗關緊要的「勞工組合」（artels），或稱爲生產者或工資生活者的集團，亦於合作的基礎上組合起來。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政府開始破壞舊式的公社地租制，而在農民間施行個人的租稅，在這個新政策之背後，政治的與經濟的動機是頗明顯的；這可致信的，個人私有制，將使農民更爲保守，且在革命年間所表現的土地再分割之紛擾，與土地的強奪，得能減少。政府視合作運動爲這種土地的新政策之一部，所以對於合作運動不僅予以允許，而且加以鼓勵與幫助其發展，尤其關於信用合作方面，雖以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政治上有一個反動的時期，而合作運動卻是顯然有迅速的增長。尤其是一班從他們的公社「分出來」的農民，擁護着各種合作，因爲這些會幫助他們建立新家庭的基業。但是全體的農民已爲合作運動所波及了。迨至一九一四年，各種合作成爲俄羅斯鄉村生活種種特點之一；而城市的工人，合作社亦初行發現。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年，各種社會主義黨的黨工作人員，凡試作農民組織的，均投身到鄉村的合作運動。工人間的合作運動，亦給黨的領袖們以活動的園地，而且作職工運動的替代，因爲職工運動隨革命後的反動而破壞了。代表較溫和的各社會主義黨，即社會主義革命黨與社會民主黨的門塞維克派——即布爾塞維克派的對立者——在這種合作運動裏面，是特別積極的。無疑的，他們看見遲若干天後，就有利用各合作團體以爲政治活動的可能，因爲這些團體在最廣大羣衆間能予以領導之基礎的緣故。

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戰爭的情勢引起合作運動再度的進展各種公衆團體例如各省議會（*zemstvo*）與市議會之各聯合會，普遍地利用這些合作社，以爲前線作救濟與給養諸工作。合作運動的各領袖，是時未蒙許其設立組織中心，使之相當於上所舉的各省市議會的聯合會的組織中心；但是各省市議會的聯合會之領袖，以其爲統治的有產階級的代表，享有較大的自由，故予合作工作人員以若干的保障。這一切的公共團體，都證實爲反對彼時現存政制的運動之一部，此種運動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達到登峯造極。當大戰時期，合作運動實成爲真正的民衆運動。一九一七年二月，各種各類的合作社約有四萬個，社員約有一千五百萬人。因爲每個社員代表一個家屬，故此種運動包含了全人口最大的成數。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把合作運動純然導至政治的活動，革命的策略影響到合作運動，一如它影響到全體生活一般。在革命的新情境中，合作運動當時有完全行動的自由，而且能把它自己的界限劃定出來。代表該運動各派別的「全俄代表大會」設立「全俄合作代表大會蘇維埃」。該代表大會議決，合作運動在性質上不可仍爲非政治的。並議決應參加隨革命而勃茁的機關——蘇維埃——以便推進蘇維埃運動使達到農民，並要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來參加未來國民會議的選舉。雖然合作運動各領袖的最大部分，是屬於社會主義革命黨的，該黨時常主張農民的政治領導權，但是合作運動在黨的聯絡問題上，仍是站在中立的，終以其合作的各領袖投身到以蘇維埃爲中心而形成的黨爭，並作國民會議參加的預備，致這種永居於無偏無黨的決議即遺忘卻了。

工人的合作社，與全體的合作運動——該運動主要的是鄉村農民的運動——相對時，亦召集代表大會，該大會代表一百二十四個合作團體與約超過五十萬的社員。該代表大會議決，與其業已成立的較大組織單位共組一個「理想上的中心」(ideological center)，但是仍維持其分離的與獨立的工人的合作運動，以便在全體合作運動裏面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傾向，而加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因此，在這個決議裏面，肇始了各種政治趨勢，與各政黨間關於支配合作運動問題的鬭爭。各政黨一再趨入政治方面，而忘掉在食物供給的危機時期所負擔之重大經濟任務。在一九一七年八月「民主政體的會議」中，各種合作社指定佔有許多席。全階級的合作運動，與工人合作運動的政治區分益形顯著，最後，竟致於這二個團體完全分離開來。

在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二個觀念此時所發展出來的公開鬭爭中，全階級的合作運動，以國民會議為全階級的機關，將它自己投諸於國民會議方面。這種決定通過於十月革命的前夕，而是合作運動的領袖對蘇維埃表示反對態度的結果。合作運動的領袖，且覺得在負責十月革命的黨之經濟綱領中，對於其自己的主張受到威脅，甚至於對它本身的生存亦受到威脅。事實上關於銀行國有的蘇維埃法令，最初確伸及最大的合作銀行方面，即莫斯科人民銀行是。

雖已知合作運動的領袖，對於蘇維埃新政府是取仇視的態度，而蘇維埃政府起初對於全階級合作運動所採取的政策，卻是一種靜作觀望的政策。合作運動的領袖宣佈其組織在政治上中立，且因此使其在經濟上得以

獨立莫斯科人民銀行取消國有。在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一九年，合作代表大會的蘇維埃得許繼續存在，且可召開代表大會；甚至於得許擔任若干教育工作。這時候的共產黨人，雖對於自由的與自願的諸合作原則，未曾表示多大興味，而合作運動以其為羣衆的機關，未致與舊制度中之其他機關作同樣的毀棄；這是進擊的共產主義時期，是以力益為先決的。因為該機關接近農民，故合作運動在許可農民得採取其自己路線的大政策之下，許其繼續進行，以便當此城市中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激烈階級鬭爭的時候，在政治上能將農民中立化起來。

但是在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府採取了更積極的政策。合作運動因為國內商業的國營，與因為同遭經濟的危機大大地衰弱下去。這些許多最傑出的領袖，被捲入於內戰之中，與投入敵對的營壘之內。各種合作社的中央指導各團體，以在政治條件的與經濟條件的壓力之下，乃計議作自動的解散。反之，共產黨人卻試把他的經濟理論推及於農民。共產黨人同時要在其理論上為普遍的與包括一切的合理化計劃之下，解決一種食料生產品與其他物品的分配之嚴重問題。這似乎常時現存的每種合作社的機構，就可供作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利用之以在農民間得有效地增進集體主義的方法，而且能助國家統制食料及其他一切商品的分配問題。此種新政策，更具體地表現於一切消費合作社的國有化。

這種國有化計劃，在其廣大的綱領中，即將全體民衆導入完全的與強制的「合作化」。大凡每一個行政單位，只有一個單獨的合作團體。在這單獨的消費合作社裏面，所有一切消費者都須登記為社員。在城市裏，則有工

人的合作社，是在蘇維埃之下直接組織起來的，且是一切合作社的支配者。一九二〇年的開始，一切合作團體，凡與新政府化的各種合作社不相隸屬的，都被正式解散了。以前合作工作人員，在該項運動的下層的組織單位裏面，繼續任職，但是該項運動之中央互相聯絡的團體，則以任命轉入於共產黨人的手中。當引導各合作社，使其成爲廣大的政府機關之進程正在前進的時候，俄羅斯在國外的合作諸領袖有一種提議，欲藉合作社以重新建立他們的國家與國外的世界之商務關係。這或者因爲最初向着蘇俄厲行封鎖，以致加速了各種合作社之政府化的過程。信用合作已遭廢止。任何種類之一切消費合作社，在一個單一的中心，即「遜托羅沙榮斯」(Сельхозбанк)或「中央聯合會」之下組織起來。各種合作由政府當局的指導而動作。一切合作社的財產與資本均被公家財庫所吸收。此種政策之實施，固有相當學說上的關係，但是政治的策略與經濟的危機，都是使各種合作社在共產黨人支配之下而成爲蘇維埃化的因素。

一九二一年的開端，隨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對於各種合作團體，亦因之有其相當的新政策。新經濟政策給農民在其付給固定的稅額以後，得有權來處置其剩餘生產品，且這個政策暗含着貿易的自由。是時希望把這種貿易導入集體主義的方式；並以此種目標放在心中，而決定重行建立自由的獨立的合作原則。在這時候，經濟政策的變動，亦給予私人在生產領域裏面創先進行；小規模的製造業，脫離了國有化而轉由私人經營，在特許契約之下，進行其商業上營利的原則。各種合作社若能接受特種條件，則鼓勵其取得此種特許權。最後，農業集體主義的

方法，亦按自願組合的原則來策進。由上層命令所組織的少數農業的集體企業，已證明毫無成績，不能對農民起何宣傳作用。

合作的各種形式與允許自願合作社的自由之限度，於全套的新法律中均有規定，該項法律最重要的幾種，直待一九二三年年尾與一九二四年年端纔頒佈出來。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的法令，常說為消費合作社的「新法律」——這是一個例子。而在全蘇聯，要使各種合作社的立法一致，亦只有漸漸而來。所以只有在近幾年間，農民合作社纔多少取了確定的形式，又只有在比較新近的發展中，各種合作社再度代表一種廣大的社會運動。而且，惟在新近幾年間，共產黨人採取合作運動，以為實行他們的經濟政策之重要的工具，同時使其成為迎合共產黨與蘇維埃的各種原則之政治組織的工具。

現在蘇聯裏合作運動的範圍，可以幾個概括的數字表出之。在零售商業方面，此種合作團體包得住得以駕凌私人的企業。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合作商業可與國營商業相與品題，而這個「社會主義成分」之二部分，佔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全部商業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約居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僅僅合作商業佔居國內零售商業的全額之百分之四十二，同時國營商業則佔百分之三十五，而私人商業則為百分之二十四。若照一九二七年會計年度到九月為止，則私人商業的部分減少到百分之二十二。消費合作社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的數目，約近二萬七千個，店舖有四萬七千個，而

社員有一千一百萬人，內中有三百萬人是工人。這些消費合作社，對於工人的食品原料，衣服與鞋，有大部分的供給。並有四萬五千個的信用合作社，與各色各樣的農業合作社，把約有七百萬的農家均成爲合作化。合作建設社在最近以來纔有發展，而大概是限於城市裏面。手工業者（家庭工業）合作協社爲數有一萬一千個，約有五十萬社員。集體的農業公社，希望它在農民間終能引起合作運動，普通也包括於整個合作運動的範疇中。凡有超過三萬種農業企業，完全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社員超過一百萬，耕殖約近七百萬英畝土地。自從這些數字所關的時候以來，尙有一再增加不已的情形，尤其在農村裏面。斯丹林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黨的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估計農業合作社所組合的數目，約佔個人農家合數之三分之一，消費合作社供給鄉村的貨物佔了過半數，同時合作的與國營的商業團體，對於農民所售的農業品，幾幾乎握到三分之二。他又指出集體農業公社所供給的市場農產品僅占百分之七。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紀念節所出版的我們實力的評論中，對於合作運動的進展，以下面概括的數字標出之。在一切種類的合作社中，共有二千五百萬股東；二千四百萬的個別農民企業之半數，與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及機關工作人員，都爲合作社所包羅進去，至少有起碼的接觸。

合作運動的結構，亦循着蘇維埃體制中之其他機關所耕見的各種組織路線；自願的原則是特別着重的；且至少在理論上，地方的創始力是組織的基礎。在消費合作社，規定着至低須有三十個社員。任何集團只要有三十個公民而享有蘇維埃選舉權者，均可成立消費合作社。至於其他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同樣有至低社員人數的限

定。現在法律規定着，由一種政府的機關來作地方合作社的登記；在以前地方合作社的批准，繁之於區的或省的合作的「聯合會」，此種「聯合會」現將加以說明。但是在合作運動裏的最高權力機關，可以對於地方新立的合作社的登記提出抗議。每種合作社有正式的特許狀。當初級的合作社不遵守它的特許狀，或者在一般上與國家的利益正相違反的時候，地方的蘇維埃政府，可以將這些合作社予以封閉與取銷。現在得能到有許多「假的合作社」，曾有設立起來，這種合作社一被發現應即予以毀滅。

地方初級的組織單位，可以成立區的或省的聯合會，而地方的組織單位與區的或省的聯合會是互相聯絡的。掩及一個經濟的特區之較大的領域的聯合會——即蘇聯為行政上及其他目的上被再分成的特區——只要得其中央權力機關的同意，可以在各種合作社之每種支部裏面成立起來；而且惟有這一種聯合會在特定區域裏，得以行使職權。這些特區的聯合會，是一種固定的軀幹，而為地方合作社之所由出者。在這種軀幹之外，不允許任何按區的獨立組織；在此有一種間接強制的成分；而且地方的合作社附屬於特區的組織單位裏面，若非為必要亦至少為便利計。當某特區是蘇聯裏一個獨立的或自治的組織單位時，則該特區的合作社聯合會同時是為民族的合作聯合會。

各特區的聯合會，由其各中央團體把它們集合起來，這些中央團體，各特區的聯合會派有代表，成立各經理部與各該部的監察員。消費合作社的中央團體是「遜托羅沙榮斯」或「中央聯合會」，而農業合作社則有其

「珊爾斯柯沙笨斯」(Selakosyus 即農業聯合會——譯者按)邇來又採用另一套中央互相聯絡的團體，即「合作社聯合會的蘇維埃」是。每一特區都有一個此種蘇維埃，同時亦有「全聯邦的中央蘇維埃」這個蘇維埃包納一切合作的各部門。這些蘇維埃的成立，由特區的聯合會根據共產黨人的創議，而提議出來的，而且說為自願的，以其與特區的聯合會自身之為一種固定的結構不同。這些蘇維埃相當於各職工聯合會之互相聯絡的團體。

雖然各地方合作聯合會，可以與時常得和國家企業直接互相交易，而各合作社要與國營工廠托拉斯，國營貿易辛狄開，及國營的信用機關建立密切關係，則有賴於這些中央互相聯絡的團體。合作運動在國家經濟的與行政的機關裏面的代表權，亦由於這些中央團體得以實現。各種合作社的中央團體的代表，在蘇維埃最高選定的或指定的立法與行政各機關開會時，得允許參加，有時關於討論合作運動諸問題，得有表決權。實則，各種合作社的領袖，在這些政府的團體裏面，所享的特權與其所有的影響，似乎各職工會的代表一般。在合作社組織層中，站着負責任位置的共產黨人，同時是黨的最高機關的委員。

各種合作社的聯合會，尤其是互相連絡的特區聯合會，有所謂「指導員」一類的職員，他們幫助組織地方的集團，然後成立區的或省的聯合會。這些指導員又有檢查的職務，來往於各地方之間，審核各地方團體的帳簿，及調查全體社員，並鑒別地方的合作社是否有假的參雜在內。各指導員又幫助地方的組織單位，每年選舉之準

備與指導事項以此，在合作社的結構中，一方面有強大集中力量，他方面則有地方的自治權。在其他各種團體所曾看到的「民主集中制」亦視為合作社及其聯合會的組織機構之根據。

一切合作社與其聯合會的各部，都是由於選立的。互相聯絡的組織單位的各部，是由其直屬下級組織單位的各部的代表會議選立之。此種選舉制如在蘇維埃裏，黨的委員會裏，及職工聯合會裏一樣，是間接的。選舉每年舉行一次，從下而上的，在消費合作社初步組織單位的選立時候，「審核的委員會」同被選出，由非合作社的社員的人選任之。這些審核委員會主要的功用，是審核經理部的帳簿。在此種委員會裏服務的人員，一如在經理部的服務人員一樣不支薪金，而豁免納稅。地方合作商店的支薪店員，大都是由經理部在其社員中擇出充任。一九二六年，這些支薪的雇員近六十萬人。吉爾仁斯基（Dzenzhinsky）在將死之前，正在作反官僚方式的鬭爭，而述及合作運動的官僚化時說道：「像這種態度，你們能建設社會主義嗎？」吉爾仁斯基是經濟界的著名人物，曾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因其甚注意各種選舉，現在採用各種刊物與小冊子來作宣傳，與由上級機關對地方的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員下訓令等方法，以激發地方合作社裏的社員與甚至非社員的興趣與活動。由於這種興趣與活動的結果所生的約束作用，可信能使在該運動所顯現的各種弱點得以革除。在鄉村社會裏，一切「活動分子」由其不同的團體與機關授予訓令，使其發展各合作社的社員羣衆之活動。這些活動分子都成「合作化」了，這是必然的。

事情。

各種合作社選舉前運動與選舉，都有一般的政治意識，尤其是在鄉村社會裏。這種運動的目的，首先在於審查所選立的經理部對於合作社業務之處理是否得當，與吸收新社員。但是各種階級集團的政治興味——例如農民社會——希望其能在選舉時表現出來。該運動應引導之使其加重與增進農民內部的階級鬭爭。在最近合作社的經理部的選舉中，據共產黨報紙的報告，農村的「勞苦者」與其「資產階級」分子，曾有許多激烈鬭爭的事例；前已見到區的與省的聯合會，派遣他們的指導員來幫助選舉前的運動與選舉時的指導，地方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領導之下，現在組成特別集團定期舉行會議的貧農，均被希望與富農鬭爭，並奪取中農羣衆。在幾方面看來，合作社的選舉，可認為與蘇維埃自己的選舉一樣重要；而且黨與合作社的領袖們，盡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增進民衆在地方合作社的經理部，每年改選時之積極的興趣與參加。

合作社的社員享有每種特權。當特種商品有缺少時，社員是首先受得供給的；這對於一二種廣大的消費品，連年都有如此情形。社員得須記帳，在非社員則一切購買必須付現錢。在信用合作社裏面，有股者的借貸利息較低，而享有優先權。在農業合作社裏面，只有社員可以參加合作社的活動；由於這種合作，他們能夠買到農用機器，而近來，甚至於曳引機也以特別的價格給予社員，且支付的條件頗為容易。實則，曳引機幾乎許賣給合作社裏面。

因為社員有此等特權，故階級的原則，在蘇聯的合作社中特別着重。在合作社中的社員，現在是自願的，但因社員享有利益，故某種分子不許其進入。這些利益對於「敵對」階級是必不可公開的。因為他們若在合作社中做了社員，亦可得到政治的勢力；所以凡被剝奪公權的一切人，即以此種事實，不許他們參加合作。鄉村的商人與城市的商人，同樣不許認有合作的股子。這是從賦予合作社反對私人貿易，以在較近的將來完全消滅私人貿易的職責上，所得的邏輯結果。

階級的原則在合作運動裏面，另有厲行之法，在城市中，工人合作社有其獨自的組織，而與自一切有公民權的人公開——即是向勞動智識分子與公務機關工作人員也公開——合作社分立。以所謂「勞動知識分子」為社員而組織成的合作建設社，關於貸帳一項，比諸工人同類的合作社較不容易。在農村裏，合作運動取確定的路線，遵循「貧農的方針」——這句話是照着繁重的俄語直譯出來的，在討論各種合作的政策時，此語可時常碰到。合作社裏社員成分的分析，時常表出貧農對於中農的比例，尤其是對於經理部的成分。合作社因為要增加貧農的人數，使其積極參加合作社擔認股子，故必須每年撥出一部分利潤，貯成一筆款子，以獎勵入股。農村合作社還要必須在他方面以特種政策來幫助貧農。例如經理部由中央團體命令其與貧農訂約承銷日用必需品，各種機器、種子與釘鏈等物件的價格，賣給貧農得以減價。貧農在農民間亦望其予該運動以無產階級的色調。同時，由於合作社，貧農與中農的同盟將能加強，而中農將能引導到更積極地作反富農與私商人的鬭爭。

很多假的合作社成立起來。地方的農民商人或店主的創先進行，且可獲得付了入社費，與應繳股子的鄰人之資押，他自稱是被選為經理部的主任。直到被發現為止，他能以廉價購得貨物，而以其自己的價格出售之，而不受社員之一切控制。富農由於同樣方式所組織之假的農業合作社，得能獲到農用機器，他把這機器租給對伊有幫助，與藉以設立合作社的人。有時私商人得利用合作社，以購股票的形式，以擴充其信用款。若這些假合作社的事例一被發現，則廣為公佈，以便重伸蘇維埃的合作社與其階級性質之本來原則。「富農在合作社裏面，一時為許多報紙上報欄的標題，凡遇假合作社的事情，即在此欄明揭與詳加分析，以便其他地方可以防止這些流行習見的事情。」

工人合作運動與一般合作運動分離的趨勢，為政府的與合作的當局所反對。蘇聯主席加列寧，他是政府裏擁護農民利益之主要發言人，曾經說道：工人階級，雖為盟主，必須「毀滅鄉村與城市的區別。」合作運動是工人與農人間之另一種的紐帶。工人合作社以其較大的財源與較善的組織，均希望藉其把最豐富的經驗，揉合於農民合作社之中，使整個運動得有最大的力量。

當合作運動脫離了國有之時，它仍被放回商業的基礎之上。從前合作社的財產，均被轉移過來，而另以公共的房室，亦歸入這些合作社所有；這些足以表明合作團體的資本之數目大有可觀。合作社的股東數目頗多，但是每股應出之數是低微的。在消費合作社裏，入社費規定五十哥比（等於美金二角五分），各股數目額面是五盧

布(等於二·五金元)而按期攤付的。在鄉村合作社裏,平均交納股款每人是二盧布,而城市的合作社平均交納股款在四盧布左右。這些數字是從一九二六年年尾引證來的;自茲以還,每股額面的價格曾有增厚,而每股平均所付總數亦有增加。在其他各種的合作社,每股額面的價格稍高一些。革命前合作社之每股,平均從十五盧布至二十盧布。信用合作社農民的貯金總數,在一九二六年僅有一千萬盧布,戰前則有一萬五千盧布。增加合作社股東人數的運動,迄今尚無顯著的結果。各種合作社有其自己的銀行,這種銀行的股子,都屬於合作聯合會,而少數初步組織單位亦有之。國家大工商業的機關與國家銀行所推行的信用借貸,是合作社流通資本之最大部分。合作團體又有他種很實際的特權。在國家銀行與信用機關裏,合作社可以與之商量借款,其利率低於與其競爭的私商人所必付的利率。國家工商業大機關與國家企業大組合,對於合作社必須先私人願主而履行定約,且引用最低的價格與給予支付最容易的條項。合作社在慣例上,對於需要大大超過供給的某種商品之出產,獲得專利權。假使每年產額不到二萬盧布,則該生產合作社不付產業稅。所有一切種類的合作社,其稅率均特別減低。服務於合作社經理部的個人社員而不支薪的,則免卻一切的納稅。合作社的一切財產,列於公共財產之一類,合作社的財產如遭盜竊或故意的損壞,則由於蘇維埃法典關於民衆財產方面的規定,要受着嚴重的處罰。

起初各種合作社以營大利爲出發點,直待在國營大商店裏,有價格的限制,因之間接地採用了價格的規定,從先的情形纔行停止。在消費合作社裏,分配機關的耗費是非常大的,甚至於超過國家分配系統的機關耗費;又

有不稱職的事情，而濫用款項之事亦非無之。在一般說來，合作社足證為不善於經商與笨拙的營業機關。私人商業與之競爭，故能矯正其弊。但是，合作社的經理部已養成一種習慣，專在期望撥用公款，以彌補其機關的耗費。同時他們也不得不學習怎樣去做買賣，而此事須經過相當的時間。在新經濟政策的初期，私人商業獲得較大的自由，其一部分原因，即在使新合作社能在與私人商業的競爭中，從他們學習起來。

在合作商店裏的價格，與國營商店的價格相似，較諸在私人商店裏同樣物品的價格為低。私人商店雖加諸以租金與付稅種種的障礙，但尚能存在着。在城市裏，私人商店的願主是勞動智識分子與新資產階級，他們因為私人商店招待得較快與較好，及質地時為較優，故願付較高的價錢。且某種物品間有缺少的，時常僅在私人商店裏面能夠購得，因為私人商店的主人，能以間接的而尚屬合法的方法得到此種物品，例如遣派其代辦員，從鄰近的合作社裏購買任何單獨個人得許其購買的充分物品。此種代辦員只要施以小惠，能從失業隊伍中雇得的。這種私人商店同時經售小規模私人製造業的出產品，此種製造業主要的是生產小件的消費品。

但是私人商店在農村裏亦能找到，在該處各願主是農民。在這些店裏，招待較周，貨品的配置較善，尤其能吸引女性的顧客。鄉村的合作店時常成為社交的中心，在該處男子們集聚着。日間與夜間相若。在這些人羣裏，時常表現出胡鬧的行爲，特別當一女顧客走入店裏的時候。招待的失周與貨品配置的不合式，是在合作店裏的特色。故希望着在各種的工作中應及時去掉這些缺點，所謂「民衆們經過他們自己的各種合作社來學習經商，」這

句箴言係列寧所作的，並留作社會主義新制度的建設之一種任務，這箴言要最後使之完全實現。

在一九二六年所訪問到的幾個鄉村中合作者，能把合作商店與私人商店作一比較，且得與那些負責者談話。在鄉村社會裏這些觀察，與在城市裏購買必需品親身的經驗，將上所舉的私人商店得以存在的理由，清晰地表白出來。但是，這些商店主人一再成爲垂頭喪氣了。一個小小的私人商店主，正在儘可能地來趕快結束其店務，這並不是因爲缺乏顧客，而是因爲他政治的與社會的地位爲私商人而已。因爲是一個「剝削者」，故他是一個非公民，被斥爲這小鄉村社會裏的敵人，而且與牧師相伴，昭然地被剝奪了公權。在學校裏，在兒童面前指示私商人爲極其不足齒數的人，爲社會上一種敗類，希望趕快從蘇維埃社會制度裏把它完全剷除。在論合作之印刷品裏，用以陳述私商人的詞句，提出極其透澈的解釋，來說明階級鬭爭的學說。行政的與政治警察的有司，深深覺到把私商人的謀生，儘可能地使之陷入困難，纔是他們的職責。衛生的規例，用之於私人商店之中，不肯稍示寬鬆；正如一個店主說道：「民警在雨天的時候，時來檢查清潔的地板。且私商人厲行着每天八小時工作，一分不肯放鬆，而在合作商店則允許其開張通宵，而星期日亦得照常營業。民警在一個農村裏，曾十分坦白地說道，他們對於私人商店有一種政策，而對於合作企業，則另有一種政策。他們與蘇維埃的職員及共產黨人一樣，繼續向着階級的敵人宣戰。這種階級鬭爭學說之應用於地方方面，以作合作運動的推進，僅示爲一種很分明與有效用且爲人所注意的事例。這似乎與蘇維埃合作運動各種原則之一般說明相契合的。」

合作運動爲蘇維埃制度之一切最重要的機關與團體所特別關注的問題。地方的與中央的蘇維埃有其合作部，它的職務是研究合作運動的策略與實施，並準備與建議立法。從黨細胞到中央的一切黨部，則有其合作委員會，它是使黨對於合作運動的參加與領導，得具有組織與克奏實效。職工聯合會各個組織單位，而尤其工廠委員會，亦有合作委員會，它在工廠裏或地域範圍裏，增進與參加合作事業。職工聯合會不以其自身的活動，來直接加入合作的場合中。共產青年團團員與兒童先鋒，必須爲合作原則而鼓吹，與幫助合作社發散其印刷品。每個共產青年團的細胞，有其「合作組織員」。在鄉區中，學校的教師希望其特別幫助地方合作社的組織。地方的農業專家，居於每一鄉裏，受命不但應參加合作運動一般的宣傳，而且須在該組織內積極幫助，尤其是農業合作社。他應利用合作社與合作事業，以爲其「農事宣傳」(agropropaganda) 最重要的途徑，即宣傳怎樣推廣較完善的農業方法。

至言及黨，則有領導權的問題。黨在合作社一切選立的機關裏面，由其黨團作用與在其高級的聯絡的組織單位裏面，由其個人的黨工作人員，以建立合作運動的領導權。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黨的地方委員會之合作委員會，實際上是一個消費合作社的執行部，本地方裏的一切居民須在此登記。隨自願的合作制之重立，選舉的原則亦予以採用了。但要破除以前的習慣，頗費時間。地方的黨部仍繼續其任命方式，以代替選舉。現在黨的各級委員會之合作委員會，僅僅究討關於該運動一般的政策，與在該運動裏黨的領導方法，而不進而討論各種合作社

工作之目前的實際問題。黨的各委員會之合作委員會，必須注意到在合作社選舉時宜作積極的參加，且必須在合作社所選立的各團體中，指導黨團的活動。

一九二六年，合作運動所選立的執行機關之人員，約百分之二十二是共產黨人，這種成數表出超過一九二五年的成績，在那年，黨員在合作社的經理部裏，約僅佔百分之十四。共產黨人在下級組織單位裏的成數較小，若在省聯合會裏則較大；在中央機關裏，共產黨人則時常佔有大多數。「遜羅托沙榮斯」與「珂爾斯柯沙榮斯」的主席，都是共產黨人。黨的領導權之克奏實效，是歸功於黨團與負責的諸領袖。中央黨部覺得恆常禁止地方黨的委員會，不許施行黨的護短政策，與禁止對於合作機關每天工作的干涉是必要的，乃指出管理的問題，必須由合作機關自己來決定。黨的命令又禁止通常所慣用的提出整個名單的選舉，這種提名單的選舉法，常選舉制恢復時即被採用。時常僅是一個共產黨的名單提出來，內中包括了幾個非黨員的候選人。但是現在，每個候選人如在蘇維埃與職工聯合會的選舉一樣，必須分開來選了。

共產黨人深信，由於合作運動，由於組織上集體主義的形式，二千四百萬的個別農民的企業，將能引導到社會主義發展的路線上。各種合作社均被望其能摧毀農民個人主義惰性。所以合作運動在黨的目前任務之一覽表上，得與大規模國營工業的發展作等量齊觀。共產黨人的目標，且可以說為蘇維埃政府的目標，是毫不隱瞞的。他們要漸進地，但是要有把握地引導農民實現他們的理想。教育的方法勢在必用，而強迫的壓力亦要實行，至低

要以間接的方法施行之。要乾脆地對農民們說道：蘇維埃政府與黨，視集體的農業比諸於個人主義的農業，是完全的經濟形式；而且說道：集體的經營，享有賦稅的免除，信用借貸的較優條件，與農業機器分配上的優先權，藉此將得到特別的幫助。

共產黨人對於農業的理想，已經實現於「集體農場」(колхоз)或「集體的農業經營」之中，在這種組織中，一切農具、牲畜與土地都是公用。在一九二六年，這些集體農場近一萬六千所，包含超過九十萬「人口」，所生產的全部穀類，幾幾乎可以出售其半數。按此數字，集體農場已不再如共產主義初期試驗時之成爲受撫卹的消費者。一部分農具之作集體的使用，在農業合作社中予以實現；若干種重要的勞動過程，都以此共產主義化了。農業生產品的分配，亦含着若干共產主義化的成分，此種分配是農業合作社之另一種的活動。共產黨人相信這些步驟將不可避免地引到土地耕種之具共產的性質。雖然，這是明顯的，因爲這種合作的形式，較繁富的農民來代替較貧苦的農民，曾參雜進來。富農的假合作社已被發現，尤其在這種合作社裏特別的多。但是蘇維埃黨與中央合作機關受到命令，當小心翼翼地調查這種農業合作社，而且發起在貧農間組織農業合作社。在集體農場裏面，其大多數分子在初時是爲貧農，中農吸引進去的僅佔少數。

所以農業合作社之主要任務，是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指導着基本的農民羣衆之經濟發展。各種不同的對付方法，施之於中農，以與貧農有別。對於中農，計劃了一種綿長而迂緩的手續。首先對他購買的東西，然後對他出

賣的物件，逐步使之合作化。於是，在合作的牛乳場裏或其相似的企業裏，關於他的出產品的銷售予以推行。最後，由於機器的使用與電氣的使用，在其分配上能建立中央的統制，可相信私人經營的企業，得能連根帶蒂使之消滅。貧農現在正有拋棄農業之勢，必須在農業上予以救濟，使其安居樂業。他們需要信用借款，農具甚至於土地，在貧農方面，經營農業之集體主義的形式，纔能夠即刻地進展與持久不懈。

合作運動的重興與一般出版活動的發展，產生了一種大規模的與方興未艾的合作運動的報紙，與大批關於此種運動的書籍。即在較低級的合作社聯合會，也有其自己的定期出版物，而較大的團體則有其報紙。這些定期出版物，是討論組織與管理之一般的與技術的問題，但是亦涉及政治的各大問題。共產黨人的合作原則所附麗的政治意義，與經過共產黨人由蘇維埃政府所給予的政治意義，實際上使一切問題，均可從其對於合作運動之關係的觀點上，予以討論。所以合作團體的出版物，亦時常可當作其讀者之普通報紙看。

各種小冊子特別廣為應用，以作合作理想的宣傳。關於技術的合作印刷品，用小冊子形式印發的至夥，以便及到廣大的工農羣衆。不定期的印刷品，包括各種小冊子，大都由中央團體印發，故該運動所遵循的政策，能得有依據與控制，為農民而編的各種小冊子，策勵社員們對於其「剝削者」的富農，務須嚴鎖門戶，且在一般的事情上，小心翼翼地監視與控制各合作社或合作團體的工作，說明社員均有此等權利。這些小冊子一再申說各種選舉與積極參加選舉的重要。指導員的作用亦予以詳陳。且喚起注意黨與政府機關對於該運動特別的眷念。這些

小冊子基本的題旨，時常爲合作社所能給予的消費者與生產者經濟上的節儉。許多小冊子以簡單的圖表與統計表，以及合作商店或合作社所努力經營的事業的畫片，來示明一切。

各種掛圖是合作宣傳之更通俗化的形式。蘇聯有幾種最完美的掛圖，是由合作運動的中央機關所印發的。再則，合作運動可藉掛圖以更有效及到農民。有幾種掛圖是屬於統計的，顯示該運動的增長，與在該國經濟生活之地位，用圖表來表達其統計的材料。有許多掛圖表出農民生活的全景，以井井有條的組系出之，繪畫着合作對於勞動條件，各種利潤，舒適的生涯與休息等所起的種種變化。富農或私人店主，則繪之以餒腹華服的「資產階級者。」在「遜托羅沙犖斯」所印發的一個特別足以驚異的掛圖上，圖中祇有一個農民，立在他的裸麥田裏。他在舉着的雙手裏握着一本書，書面橫着「合作」一字。這農民正用着這本書來打擊二個正在咬嚼他的穀類根莖的兇悍的昆蟲。一個蟲具有肥胖的人類面孔，並題着「富農」二字；另一個蟲是形貌可憎的獸類，以「私商」二字橫寫在他的身上。

蘇維埃黨與職工聯合會的新聞報紙與定期刊物，爲合作運動留出許多篇幅，且甚爲注意。在工農的羣衆報紙裏面，其通訊員時常作地方合作情形的通訊。最近莫斯科真理報每天留出二欄，凡在一月以上，叫其通訊員描寫各地方的合作社，作有趣的競賽。這競賽的目標是在選出「最好的與最壞的合作社。」有許多參加競賽者，似乎挺身出來要得到發現與暴露蘇聯最壞的合作社之獎品。

一切合作社的組織單位之得有特許者，得舉行教育工作，該運動中央機關所印發的小冊子與報紙之目的，在於傳播合作的理想與原則，各指導員是作教育活動的；但是直至現在，他們不得不專用其時間於組織的問題與視察的任務上。其意欲使各合作社之發展其有系統的教育與文化的活動，正如職工聯合會之在城市利用俱樂部，在鄉村利用讀書室為中心，以推進其教育的與文化的活動一般。蘇維埃體制洵為合作運動之最肥沃的土壤；今該運動經濟上的成就，即是這事實之最好證據。一九二三年，當此種新運動與新發展業經表顯出來的時候，列寧寫着：「只有一件事情是必不可缺的。他說明這方面真正成功的條件如下：『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民衆『文明』到這樣程度，使他們真正了解大批羣衆加入合作社與組織這種大批參加的一切利益。』」這位領袖又繼續解釋說：「這將需要戰線全部的改變，與全體民衆長期的文化進展。」

以此，與一般的求智識運動相並而起的，有所謂「合作的求智識運動」也。須求推進，尤其在農民方面。在工人間希望把他政治的智識，放在「職工會的智識」基礎之上。在農民間，合作的智識即用以為求政治智識的基礎。在這兩方面均須注意的，是「職工常識」與「合作常識」是比較晚近的纜子採用的；從前則惟有「政治的常識」，合作社的教育工作範圍較狹，設備較差，因為新式的合作運動的發展較晚。亦因為在政治落後的農民間，此種任務較為困難。合作社的教育工作之無系統與偶然的性質，是共產黨人之一個苦腦的來源。合作社的教育大概仍在究討的時期中。在合作的方法與理想上，也與在一般的教育場合一樣，常識訓練必在教育之前。在縮減

機關的巨大支出之節省制度之下，教育的工作首遭牽制。在職工聯合會裏，其集體合同時常規定着抽出應發薪金的全額之百分之幾，以作教育與文化的工作。至於較大的合作社聯合會，僅在少數情形之中，纔有採用從收益中規定撥出若干以作教育工作的提議；而在這些情形之中，亦屬很受限制的。有一個合作社的工作人員，關於這問題作一篇論文，其結論說道：

需要黨有威嚴的言詞，使這些負擔合作中區的與合作聯合會之工作的人們，從其昏眠的狀態驚醒，而且逼迫他們莊重地負起教育的任務，與進行任重致遠的計劃。

共產黨人說他們的合作運動，為蘇維埃民主政權之另一種表現；地方的合作社與合作協社，以其選舉前的運動與其各經理部及審查委員會的選舉，足予該運動之基本的初步的組織單位以羣衆的支配；在經理部與審查委員會裏，人民學習處理其自己的事務。以此，「家主婦會學習管理國事」這是重引列寧有名之口號。在區的與省的合作社聯合會中，其較活動的地方工作人員，負擔最重的責任。但是，合作運動已發展其官僚主義；而各指導員，尤其中央的與特區的合作社當局，成了一種超上層的組織，來指導與支配合作運動。蘇聯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雖為獨立的組織，而其活動之特別範圍與各種任務，是由政府當局指定的，一部分是因為法律允許政府有一種特權的結果。近來的趨勢，在一切政府機關方面，要為這些合作團體增加政府特別的垂慮。其對政府機關密切的關係，有對於政府機關成爲若干隸屬的意義。

各種合作社在理論上是一種羣衆的且爲自願的運動。政府的經濟政策，藉其對於製造工業的統制與對於商業的親自參預，得以勵行，而起了有力量的刺激作用，所以合作社的組織，仍有強迫的成分。加之，共產黨給予合作運動的領導權，厲行其共產主義的路線，與引用合作的紀律。蘇聯的各種合作社，主要的是經濟的組織，但又使其參加革命的政治。各種合作社之所以用作階級鬭爭的場合，要希望提高其教育的價值與其經濟的效能，並提倡合作的精神。在各種合作社之中，與由於各種合作社，堪信素來把政治放在心中的農民，將得到較能有條不紊的政治意識。有待發展的政治意識，由於各種合作，纔能給予一種指導。以普通的言詞說來，蘇維埃各種合作社，是使農民接近社會主義之各種重要接引線之一種。

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之黨的代表大會上，合作運動是該會主要討論的各題目之一種。一個特種常設的委員會設立起來，更加密切地指導黨在農民間的工作；爲了這種工作，且採用了一種新政策。從前黨在農業區域裏而的工作之一般路線，在於加強貧農與中農的個別的農民企業。現在，政策上有根本的更改了，其意即爲「每個機關（黨的與蘇維埃的）之與農村有關係者，必須以聯合與改組小規模的個別農民企業之基本任務爲己任。」這些機關固不是直接擔任這些集體主義的企業之組織工作，但是他們爲要排斥個人企業，乃特別注意與特許幫助集體主義的企業。並說這種政策的改變，並不是由諸黨的利益與無產階級國家的利益，而是由農民羣衆自身堅決的需要，他們已爲集體主義的企業得有成就的先例，與一般的合作運動所喚醒並受其吸引了。

黨的代表大會之關於農民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可將其要點簡單地總述於下：決議案中所着重的是二千四百萬個別的農民企業，足以代表蘇聯人民的基本羣衆。無產階級獨裁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命運，全賴於對於這個超過一萬萬的農民羣衆之適當的政策，無產階級獨裁之「偉大」的十年，當不忘遺留其痕跡於鄉村。鄉村的經濟與政治的各種形態，已有最根本的變更。舊地主的剝削予以根本剷除了。雖有富農分子的增加，而中農仍不失爲中心的主腦分子，而他的作用愈加重要。同時，中農與貧農的聯盟被加強了。社會主義的根苗，並不是如黨裏的反對派所說的漸歸死滅，適得其反，已表其欣欣向榮的情形了。其最明顯證據就是生產者合作社增多，與集體農場已獲相當的代價。黨的職務，扼要言之，即在使農民羣衆相信轉入社會主義的生產之必要與利益，與積極鼓勵這種轉變，利用黨所握着的經濟命脈的全體系，以達到這種目的。黨工作在農村裏之其他重要的活動範圍，是發展農民羣衆的知識與文化；因爲沒有這些工作，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是不能實現的。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的書記，在代表大會上結束其報告時，關於農村工作有下列的言詞：

僅僅在城市，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能夠且必須建設於鄉村，與在城市一樣。再則，必須真正了解：若在鄉村裏，僅由於村蘇維埃主席的努力與黨細胞書記的合作，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單靠這二類人，必不能創造社會主義。問題是在乎要把這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引廣大的貧農與中農的羣衆來參加，因爲他們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觀點，總難免有些不信集體主義，而且他們的公民的本能，亦遠遜弱於工人階級。

第九章 蘇聯的公民團體

「公民團體」這普通的名詞，是用爲包括在蘇維埃體制之下，所發展出來的各色各樣的會社與團體。這些團體有許多相當於他國所謂「愛國的會社」，但是又有幾種則在蘇維埃制度中顯然特放異色，是由其所依據的各原則產生出來的。其革命的國際姿態，助長了許多會社與團體的興起，此種團體的興趣及活動，都向着國外世界方面。此處須把這些在宗旨上與組織方式上甚爲不同的會社，放在一塊來討論。不過這一切的會社，都是以各種頗相同的諸原則爲根據的，例如自願入社與發展羣衆或某一特殊階級在某種公民活動上之興趣。有幾種公民團體是補蘇維埃、職工會或合作社之所不及的。在一切此等團體中，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均要爲自己找得一個足供更大活動的場所。這些團體與正式的蘇維埃機關是有區別的。其基本的目的，並非要涉及其成員的經濟活動，如職工會與合作社之所爲。這些，都是疏鬆的羣衆團體，迥異黨、青年與兒童三個共產主義的團體。階級的原則，這些團體之最大部分是不甚着重的。不過大多數這些團體是把政治的目標放在前面。宗教的團體，此地是不許其包括在內，或至少是勉強的，而其爲故，後當予以說明。再則，把農民的鄉村會議歸入於這公民團體的範疇，亦將有解說的必要。

這些團體每個均有其自己特殊的歷史，各滋長於特殊的情境中，或各抱一個特殊的目標，它們都有持續的與一般的活動，不過隨時各有其特種的活動，隨機應變，以便應付特種的危機。內中幾個有定期的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的召集，在此等大會中，把其增長成績與宗旨作一總結，且在會議期間，報紙上將集中討論該團體的性質與宗旨。當國內或國外事變正屆危急存亡之秋，則工作於危機情狀日見進展之場合中的團體，為其利害計，將引起各種遊行示威與報紙的宣傳。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在一切這些團體中——宗教團體除外——之特別的活動與領導權，使能經過其關係的團體，來集中一切活動於一個特殊問題之上，以便維護某項公共的政策或應付某項公共的問題。是故不僅一般的公民興趣與活動，得為這些團體所掖進，即公眾的意見，亦能即刻引起與易受指導。惟公眾意見或公民活動之不受拘束的表現，如其在一切蘇維埃機關裏的情形一樣，曾為許多人所置疑，因為共產黨人所負的領導作用，要與其集中的與有紀律的黨組織相伴而來的。在一切這些團體中——宗教團體亦除外——黨細胞與團細胞站在主動的地位，或成為最活動分子，或經過在該團體中之正式的黨與團的「黨團」以行使其領導權。

其最活動與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公民團體，要算是「扶護社」。法國字「郵扶」(otz)為俄人採用之以名此種團體，而按該團體的性質，則得以我們所譯的「扶護」(patronage)一字稱之。或者這二個字的採用，尚非恰當。按俄字「郵扶」的採選，其原由是根諸於過去的。例如在舊統治之下，一團兵有其義務職的指揮官，道

人就名之爲「郵扶」，在其他場合裏面，亦有扶護的制度，以此是種觀念，成爲通行且發生力量，尤其在落後的農民間，以其顯著的弱點，就是希望得有某某較高的有權力者或階級的幫助。在蘇維埃制度之下，發生一種新式制扶護，而舊日所用的字所以仍予保留，或因爲加重說明扶護制在性質上與方法上，均有改變的事實起見。

扶護社的類別頗多。至該社一切的根本原則，則不外如下：凡一個組織較善，經濟力量較強與政治意識較濃厚的集團，對於一個組織較差，經濟力較弱與政治上較落後的集團，負擔着物質上與精神上幫助的責任，統名之爲扶護。扶護活動之至先的與至大的活動範圍，是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方面。工人各集團負擔着對農民的扶護。至於一工廠對於一團兵的扶護，是這種扶護制特殊的表現，因爲農民在紅軍裏面佔着多數的緣故。但是一兵團可成爲一兒童先鋒隊的扶護者。蘇維埃的行政機關，又負着一個農民團體的扶護，以使勞動知識分子亦可幫助與影響文化落後的農村集團。教育的機關以文化爲理由「撫育」其他的集團，而其本身則不成爲一個工業集團所特別關懷的對象，使教育機關與生產行程，可作更密切的接觸。

對於這個饒有趣味的公民活動之形式，如要試舉其主要事項，總覺得該項活動可能的結合，殆爲無定式的。雖然該運動之初步的甚至爲暫時的性質，或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但其理想太通俗化了，故有待規定的必要。農社的中央扶護委員會已予設立了。各兵團的扶護，於軍事委員會某部之下發生聯絡。至於紅色艦隊，則有共產青年團擔任在海軍中的一切扶護活動的指導。扶護運動在初期所表現的自然發動的特性，自在組織的方針採取

這些步驟之後，已有若干減少的情形。在另一方面看來，這些扶護社的活動，由於其聯絡團體的指導與支配，已見出更實際的價值。新結合又常在成立之中，最近且看到一個正式歌劇藝員的集團，對於一個工廠工人所組織的清串劇社所擔任的扶護。一個集團對於另一個集團的影響，在此具有兩方面的；工人且幫助歌劇社，以迎合新聽衆（即工人）的需要。

在扶護的運動中，工人對農民的扶護社，洵為最重要的典型。此社是扶護理想最主要的表現，且做了甚有系統的實際的工作。因為在這些扶護社中，把蘇維埃體制幾個根本的原則統行集合起來。諸如工人對於農民的領導權，無產階級的影響之及於農村，工農二階級的「黏合」與「面向農村」的大政策——舉凡種種原則或政策，均為這些特種扶護社活動的基礎。一切這些扶護社之有自然發動的性質，亦是極其顯著的。惟在最近以來，俄羅斯的工人是從農村裏生長出來，而許多工人時常慣要回看其農村。有時工廠工人的家庭仍在鄉村裏，而其日常工作則在城市中。當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的食糧恐慌時期，有許多工人重返鄉村，而重與農民成立關係。

工人扶護社最先的發展，是由於共產黨細胞發動。在黨的一個細胞之各種專門委員會中，設有一個扶護委員會，以為作鄉區黨細胞的扶護。由於這種聯繫，工廠中的黨細胞，須幫助鄉村的黨細胞。作農民間的活動。於是工廠委員會接受了共產黨團的創設，亦照這個理想來工作。在工人扶護運動第一階段，以扶護責任的負擔，取決於

全集團集體的決議，致時常把自願充作社員的原則打消了。因為要予該運動在工人間具有羣衆的性質，所以工廠委員會成爲一切扶護社之公認的基礎。後來因爲扶護社發展起來，組織了一個指導部，而以黨細胞與工廠委員會或工廠委員的文化委員會的各代表組織之。黨的原有領導權，以此得予保留。聯絡的團體以省爲限，因爲一個扶護社在其活動上，永不能越過省外的。但是全體的代表會議是有的，該會議給整個運動以簡單的指導，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是該運動最重要的中心，在此處聯絡的扶護團體，準備有各書籍及指導書，以供其他工業區裏的扶護社之用。

扶護社的經費有數種來源。首先是社員費，每個社員每月規定五個哥比。又創立捐款的運動；在蘇維埃各種運動的日曆表裏，有一週是爲黏合週；當這個字用作爲口號的時候，其義常爲把工人與農民黏合一塊。音樂會或戲劇的表演，在工人俱樂部裏都有之，而所有的收入亦轉移爲扶護的工作之用。

扶護活動最先在性質上大概是具激動性的。各種運動或遊行，由工人扶護社的代表帶入農村。農村裏有幾處地方真覺得這是從城市裏驟然侵入的事情。帶有演說的集會，於是組織起來，然後城市的集團，自覺其義務已圓滿執行，乘興而返。現在仍有這種所謂「音樂的歌唱會」遍及各地。最具實效的，則爲物質上的幫助，如捐贈圖書、報紙，甚至於器具等等。在一九二一年飢荒的時期，最着重的是物質的幫助。在現在，則着重精神上的幫助，並表現於各色各樣的形式。扶護社的代表，或幫助組織合作社或提示農村讀書室應備的書籍。最特別的是他與農村

的活動分子，作目前的政治與經濟問題的討論。他必須時常特別與鄉村無產階級、貧農與黨細胞及團細胞共同合作，而他的工作又必須經過這些鄉村無產階級、貧農與黨細胞及團細胞。他必須助成貧農與中農的聯合，以反對富農。或者他為其他各公民團體分發捐冊及印刷品到農民之媒介。現在以該社的名義，為社員籌劃在農村裏永久的住居與工作，是扶護社之一部分活動。為要達到此目的，研究農村的各研究組成立起來。有許多工人把他的空暇時間化之於農村裏面，而這些研究組又準備利用工人此種訪問，以進行其扶護的活動，因為扶護的運動應時時不忘「市城的工人要多方面幫助農民。」

社員各大集團之有組織的參觀隊，仍要用到，雖然，這種較早的辦法，正以較實際工作的代表團，或遣派常任的工作人員來代替。與此呼應的，有農民到城市與工廠的參觀，這亦是扶護活動之一種。邇來，對農民趨向城市尋找短期的或永久的職業，會給予特別的注意。這些季節的短期農工與其新加入的分子，為工人所組織的扶護社，開一眼前急須活動的場所。

有些個別的扶護社，採取了許多不正確的路線，致農民對於他們的扶護者的態度，亦常合於該運動之宗旨。曾經發現了從扶護社中派出的代表，其所表現出的活動，時常使農民有這樣的方法：「我們的扶護者今日來關照我們。」這種說法隱示着扶護者對農民的態度，有時同過去大官對農民的態度相似。因為要反對工人扶護者這種不正確的態度與工作方法，致有些農村或機關，故意使這個扶護者的集團去作些下賤的工作，如洗地板或

打掃走廊等。扶護者的社團，乃是希望其做實際之工作的，並不是注意着瑣屑的事情。它要以其對於蘇維埃組織形式之原則上與技術上，有較豐富的經驗與較清晰的了解，來幫助農民去組織。它的任務又為解釋政府與黨的各種政策。例如最近宜提出「節省制度」的解釋，又例如在討論工廠的經驗時，應着眼在幫助農村實施這個新口號。茲據一個鄉區扶護社工作調查的報告說：全集團的政治認識顯著地提高起來了；大規模教育的與文化的工作，都已在進行，且大都是來本鄉訪問的工人所引導之結果；而且物質的援助，亦由扶護社給予了。有一個扶護社在其自己的工作報告上說道：它因為不知不覺地推進農村進行新生活與新工作，曾盡了「發酵」的作用。

其他扶護社的活動，在本質上並不與在農民間的工人扶護社之活動有所差別。為紅軍兵士與海軍所設立的扶護社，則以特別保持他們在服役時候得能接觸每天平民生活為目的。要擴大無產階級的對農民的影響，亦得實現於此種對於在城市社會的兵營中之由農民出身的兵士所發生的接觸。在革命前的俄羅斯，先進的知識分子儘試其可能的方法來接近「民衆」，尤其對於農民。他們一方面因為受政府當局制止，他方面又因為民衆的懷疑態度，致不能完成此種使命。現在的扶護運動，既是工人所努力的，又是蘇維埃民主政權之一部而在共產黨指導之下進行的，故該項運動能得政府與黨雙方面一再的鼓勵。而農民對於來自城市的扶護者之態度，似為表示好意的。共產黨人否認一般的在蘇維埃體制之下，與特殊的在農民間的扶護工作中，工人所負的領導作用，引起任何不滿。因為扶護社不僅推闡文化而已，這是有階級覺悟的與政治上較進取的集團，對於一個較被動的

集團之積極的政治領導。城市裏的工人，以其顯然切望於教育，當然歡迎有利於他們的知識分子方面的扶護活動。兒童先鋒既得一兵團來援助，自然是躊躇滿意的。至於船員則其扶護者是其本身階級的成員，即工農的青年分子。在工人對於農民的扶護活動裏面，可生出一個政治問題。共產黨人所標出的普通的公式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城市分子與鄉村分子之對立，是不能避免的，而惟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則此種對立祇有可能，而非不可避免。扶護社以其活動上所特有的性質，能減少工人與農民間對立的可能性，這是可以置信的。工人扶護社受其領袖們經常不懈的推進，使能成爲更有組織的努力與更大的活動。

整個扶護運動之真正的成就如何，以該運動的性質緣故，不能加以斷定。在作者到一羣鄉村的訪問中，看見了很具體的證據，特別是在文字的形式上與在足球隊比賽的形式上，都能意味到扶護是有點意義的。在一九二六年，共有十五萬個扶護社，全體社員超過一百萬人。在一九二六年，僅僅工人扶護社的社員，即已超過一百五十萬，約在一千個鄉村區行其扶護工作。每一社員除了每人每月繳五個哥比以外，均希望對於工作上另有若干致力，但是活動尙沒有普及於全體社員方面。在這裏，一如在一切蘇維埃團體一樣，有活動分子與不活動分子的區分。在一個共有一千工人的工廠中所作的調查，發見扶護社形式上的社員有三百個，而活動的扶護工作人員，實際只僅有一個。在另一工廠則發見扶護社工作較爲積極。該社對於其所扶護區域裏的農村，送給各種抄寫簿、鉛筆與小冊子，該社要求若干信用借貸，以設備二十七個「紅色角」三個農村讀書室，幾個軍事準備處，並供給各

種必需的器具與書籍。再則，該社籌集經費購買籬別機與幫助組織幾個合作社，及廢除舊式三田播種制。活動的分子希望其按期報告工作，而這些報告時常是對工廠全體工人而作的。希望藉這些報告以激發不活動的分子，而且得引入最多的社員加入社中。

「女工人與女農民的代表會議」在討論蘇維埃的國家式範時曾已提及。這種會議雖已指出在性質上非屬於政府，但是除了其他各種目的外，亦有補益蘇維埃政府團體之目的。此種機關後來將再論及，因其為特種政治教育方式的一種，與「政治訓練班」一類的學校相同。但是這種會議是自願組織的公民團體，以此理應包納於本章之內。俄羅斯特別的情形，暗示着此種特殊的機關有提倡的必要。以是有一個在性質上具很遠大的目標之非黨員的羣衆團體，以便適應這些特別的情形。工農階級的婦女，除了少數的例外，在政治的發展上，是遠居於男子之後的。工人與農民在過去對其女人之在公共生活的任何參加之處傳統的消極態度，以致革命所給予的婦女平等之實現，甚為延緩。此必須在婦女方面發展其有建設性的積極。纔能破除此種傳統的消極態度。藉此，可使婦女們亦得參加入蘇維埃的民主政權。列寧有一句話加重說明蘇維埃的政府形式之優點，這句話已引用許多次了，而對於這種蘇維埃體制之勞苦婦女之特種組織，尤為直接合用。將能回憶得到列寧指出吧。在蘇維埃之下，家主婦可學習去管理國事。此種要語已成爲婦女代表會議運動各種格言之一個。

在這種會議的組織中，黨是創導者。黨的機關從最低的細胞直至中央委員會，均有婦女部。這些婦女部是婦

女會議之積極的領導者。黨供給組織者與指導者的人才；有許多黨員對於這種會議負有義不容辭的公民活動之責。爲該運動所印行的書籍，大部分是由黨的出版處供給的。會議是召開於黨細胞的辦事處裏面，如該處以爲可能與合式的話。該運動的經費當然黨裏支給，因爲參加會議者不繳納會員費的。

在城市裏與鄉村裏，每年召集選舉會以選出該地方代表會議的婦女代表。在大城市中，各區將有若干個代表會議；較小的市鎮可以僅有一個；在鄉村間，一鄉的代表會議要包括該鄉一切的村，且在各村沒有分部。一九二六年大約有六千個女工人的城市代表會議，與一萬二千個女農民的鄉村代表會議。參加會議者的總數，約有六十二萬人，而由於成千百萬的人們選出的。每年又選出全新的分子，以此每一地方導入一般政治生活的婦女之人數，正在有加無已。一個代表會議的每種集會是頻繁的，在最活動的中心區，每星期至少召集一次，而且每次開了一綿長的俄國夜晚，到會與否不能含有強迫性質，但是到會者的成數，大約居正式會員的人數之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之間。一城裏或一鄉裏定期的代表會議，一年召集許多次。

這些代表會議的一般效用，是把目前的政治與經濟的各問題，陳之於婦女們之前。其辦法是作各種特殊問題的報告，並根據此種報告來討論。由於這些討論，各人在這個或那個場合裏面，被激起種種活動。以此在婦女間得培養出「活動者」，他們得成爲蘇維埃的代表，工廠委員會的委員或合作社經理部的辦事人員，在各蘇維埃裏，婦女的辦事人員人數的增多業已見到，這大都歸功於婦女具有此種特殊組織的緣故。

除了固定的討論大綱以外，代表會議的會員組織有各種研究社，凡依照個人的特殊興趣之實際工作，得藉此着手進行。在這些特別興趣的發展中，所許可的範圍至為廣大。婦女們應作軍事的研究，以此他們於準備防敵的場合上，能成爲更有用的公民，此其例也。在這種研究社的一切活動中，該運動的指導員之各種訓令，加重說明該項活動有與婦女們——其爲工資生活者或爲家主婦——的每天實際生活互相聯絡的必要。一個集團可以負起任務，以作堅決攻擊通常撻妻的習慣，或父母對兒童肉體的懲罰，或家庭裏猥褻語言的應用。其他實體任務，則爲引導鄉村或城市社會的青年女童，參加兒童先鋒的運動。一般說來，在文化的陣線上，此等代表會議必須對於具體的與有宗旨的任務加以注意；雖然在該會議的活動之其他各方面，卻是希望其能討論一般的政治大題目。

婦女的丈夫特別對於這些代表會議，仍以懷疑的態度看待之。茲據報告，有許多家庭間的吵鬧，是由於這種運動引起的。要克服其男子們的反抗，公開的宣佈與公開的宣傳，足予婦女們以助力。黨爲婦女們印行有三種報紙，即勞工的婦女、農民的婦女與婦女的代表是。爲農民而發行的新開報紙，與一般的出版物，也留下不少的篇幅，以記載該代表會議的工作，以此作爲破除男子成見的助力，同時破除俄羅斯工農階級的婦女對於公共事項之常爲漠不關心。在一種農民的新聞報紙中，有一張諷刺畫，分爲二部分，一方面表示農民的老婆，企圖不讓丈夫進入酒店，而另一部分農民丈夫要把其妻在進入代表會議的入口處拖回。當工人的老婆以赴會而離去，或以一個

代表會議的會員而投身於公衆的活動時，工人亦時常提出積極的反對，而人民審判所關於裁決這一類的案件洵爲不少。但是，婦女們每年總有其自己的選舉會，且在公共事務作最積極參加之準備的時候，總有超過五十萬以上的婦女，按期聚集着來討論而且同來研究，不顧及有許多譏笑的人們，與甚至於男親屬們的反對。

「考夫」(Ков)或「農民互助社」是另一種公民團體的式範。農民互助委員會最先是由列寧所提創，於一九二〇年飢荒的初起時，在黨領導之下肇始於莫斯科省內。一九二一年五月的命令，使該運動具合法的形式，且其類似的委員會遍設於全國，以作救濟飢荒運動之一種要策。凡脫離飢荒的省分，應救濟爲飢荒所截擊的省分；生產品集合起來而分散於飢荒的區域。根據這種活動，農民互助委員會成爲政府在被飢荒所蹂躪的各省裏，而協助復興工作之一種主要工具。其全俄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二二年尾召集的，加列寧在會上曾致歡迎詞，陳詞如下：「當我們有了共產主義的時候，則全邦將成爲一個龐大的全人類互助的組織。由於這個觀點，農民互助委員會是共產黨爲農民經邦治國的訓練場所。」

以其蘊藏着此種的宗旨，該運動乃由一種純粹的慈善團體，而變成以彼此實際互助爲根據的團體。並組織地方極貧苦分子的互助委員會，以補濟政府特種救助，此種救助以給予貧農爲一種大政策。一九二四年以後，中農的較年輕與進步的分子，因該會根據於自願集合的原則，另行改組，得參加進去，其名稱乃改爲「社」。共產青年團得到特種的領導作用，以便吸引農民的青年分子。該社之一種宗旨，是在農民間作進一步集體主義的實施。

但是該社並不是通常的合作運動之一部分，且不與合作運動沆瀣一氣的，社員是自願的；而微少的社員費是照成數徵收的，該項社員費大約僅當該社收入百分之五。該社有其自己的經濟企業，或為耕耘的土地或為小工場。由此，該社得有如上所云收入中的若干數目，同時得幫助貧農在農業界或在小工業企業裏找到工作。這些社中有幾個有其自己的製造場。寧有農用的機器，尤其是曳引機，這是該社的特點，而所謂互助，大部分是在於這種機器應用的分配。在一九二七年夏間，有一千四百具以上的曳引機是在這些農民互助社手中。一九二五年這些農民互助社的總收入，超過一千三百萬盧布，而對於個別人家所資的幫助，有一百十三萬六千三百十二家。

該社原來的慈善性質並未完全消失。殘廢的兵士或在服役中紅軍兵士之家庭的土地，由該社代為耕種。對於羸弱的社員不受酬而予以幫助，且這種事情為其他社員認為替自身防止不測之變，或不幸之事之一種保險形式。借給貧困農民以款項，乃是最通常之一種互助形式。教育的工作，則有演講會的組織。有許多農村讀書室，是以該社的款項來創設與維持，從政府各團體裏所撥來的款項，彌補該社一些開支。在城市裏的農民招待所，亦時為這些互助社的機關。這些招待所，在一切省分的城市裏與許多地方的市鎮裏都能找到，農民凡走到城市或市鎮，得能以虛價找到住宿與食品。在較大的農民招待所中，農民會找到一大批關於農業的展覽品，且有專門家來說明這些展覽品。並設有正式完備的詢問局，在該處，有法律家與其他專門家，他們有一定的辦公時間，助農民解決租稅或土地使用權之法律上的問題。在莫斯科的中央農民招待所中，切實的訓練與幫助，組織尤為妥善。在該

處，對於參觀的農民，表演如何去掘井，如何在建築時使用三合土，如何做防火屋頂與其他種種。農用的機器及曳引機亦有陳列。晚上表演遊藝會，參插以演說會及討論會，都是關於政治問題與政府的及黨的經濟政策。

農民互助社每年有其理事部與審核委員會之定期選舉。此種選舉與蘇維埃及合作社的選舉，同為農民大眾中至關重要的選舉。農民互助社較諸新式的合作社年代較久，其為較窮苦農民的組織則更明顯，而居於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尤為直接，故在共產黨人看來，是鄉村裏之一種極關重要的社會勢力；它時被稱為農民大眾裏面公民活動的先河。既具了此種理由，益之以政府所撥充的款項，要經過該互助社之手，故地方的互助社得以按省正式聯絡起來，且集中於一個中央委員會指導之下，該中央委員會有定期的全體會議。前面曾已看見，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地方團體，對這些互助社受命應給予特別的注意，並積極參加於這些社裏，且以此對於這些社得運用其另一方面的指導力量。

與農民互助社有顯著差別的，是農村會議。這種農村會議的機關，是否應歸入自願發動的公民團體一類，尚屬置疑。但是，這機關似乎是隸於蘇維埃各團體之這一範疇。這是舊式的農民公社所遺留的農村集會，甚至於在農奴制度時即已存在，且於農奴解放後成為農民自治的機關。這是確實的，舊時代俄國農民大眾的自治，是大受限制的；在許多事例裏，農民選出的官吏，祇成為官僚政府的經理人。不過雖有這些限制，而農村會議仍是召集，討論與議決土地使用與分配諸問題，並選出長老，且至少要貫徹一些自治政府的舉措為。

當蘇維埃統治之前幾個月間，農村會議在鄉村間成爲新的權力機關，議決奪取地主的財產，與進而實行沒收土地與重行分配，此一例也。在這種意義上，它是鄉村間的蘇維埃，換言之，是建立一個新階級政權的工具，卽建立農民的政權而非土豪劣紳的政權。上已言及，在革命的初期，農民得允許遵循其自己路線。但是迫及一九一八年夏季，階級鬭爭與無產階級獨裁的蘇維埃原則，在農民間應用之至爲嚴格。爲要達此目的，極窮苦農民的委員會創設起來，成爲鄉村間真正的蘇維埃階級的政府機關。一九二〇年所採取的政策，謹慎地把中農從富農方面分別出來，而且對於中農予以優待。一九二一年，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對於中農作尤進一層的讓步。乃重行釐定定期選立的蘇維埃，由此，在鄉村裏，只有少部分的資產階級分子被排除出去。但是鄉蘇維埃，把一鄉或一市鎮的一切農村都聯絡起來，而成爲權力中心；且村蘇維埃相當地減少其重要性。前曾指出，一九二四年各蘇維埃的選舉，農民已作漠不關心的表示。這似乎正當此時，往昔遺留下的農村集會開始復活。總之，從那時候起，開始有村蘇維埃與農村會議的關係之活躍的爭論。因農村會議的構成概爲各家家主，不管他們是否有蘇維埃參政的資格，他們仍要集議與作正式的決議，不願選立的蘇維埃已是鄉村裏新的政府機關之事實。

當一九二六年間訪問一羣農村時，這一種的農村集會曾經到過。這如革命前的農村會議一樣，是一種全體性的集會。卽地方的牧師亦有蒞臨。地方蘇維埃的代表，此時受該鄉黨部所維護，在該會充當主席，允許大家都能參加討論，祇當需要最低限度的議會手續，以確定會中的大衆意見時，纔略加干涉。該會之具有權力，頗爲明顯；充任

該會的主席，與參加討論之蘇維埃與黨的代表曾說道：村蘇維埃將進而實行該會的議決案，這話似予該會以滿意。因為農村會議無政府上的權力，甚至於在蘇維埃機關裏而無其地位。雖然在事實上，該會能時常為決定農村內部問題的政策之團體，但是在技術方面，它僅是一種自願的公民集會，聊以表示其意見而已。至在這個特殊的農村裏面所有的情形，能否通行各處，則亦難說。因農村會議是不禁止的，要加以制止或者為不可能與不妥當。

由於這些會議，每集團全體的農民，可以發表其自己的意見，但是真正的權力，則付予於蘇維埃與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裏面。在共產黨人視之，這些舊式農村會議，是代表「簡單住民」而與自覺的階級或經濟集團，則鑿柄不能相容。因為對於農民生活的習慣許其存留，故此種會議得允繼續；實則，應試加掖進之與利用之，以發展公民的利益與活動，俾助文化的啓發，即是藉捐款以補助學校的建築，或設備讀書室等。但是每個會議僅是一樁地方的事務，而沒有其相當的鄉的或高級的互相聯繫的代表會議或集會。在本書中，對於農村會議所以特感興趣者，因為共產黨的領袖把它當一個機關相看待，在這機關的機構裏面，階級的原則是不存在的，即或以其為一種羣衆的機關，其態度亦是如此。因為在這種機關之內，其屬於階級覺悟性最大分子之領導權，是不能實現的，且階級鬭爭的原則，不能作為活動的根據。

範圍廣大而成員普及的社，並不是工人的或農民的或婦女的社，在蘇維埃體制中亦得找到。這些肇始於蘇維埃的具一般性質的首要的社之一個，具着笨澀的稱呼，即「消滅文盲社」(Down-with-illiteracy Society)

是在工人與農民間，文盲佔着巨大的成數，是舊俄統治以來難以擺脫的重大累贅。「肅清文盲」成爲教育界新領袖之第一個的目標。「肅清標點」已予堅起，此標點爲成年的工人與農民，至低限度要學習能讀能寫。因爲一個工農政府，不能完全以巨大成數的文盲工農組織而成的。若一有文盲，則政策徒成爲虛言，這是列寧在他一個演說詞中說的。學習會讀會寫，已成爲一種公民的職務。而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致力於反文盲運動，助政府達到其所建立的肅清標點，亦是一種公民職務。這是消滅文盲社組織的緣起，其目的就在於把這種自願幫助的人組織起來。強迫的成分，是革命初期蘇維埃各團體那樣的普遍見到，在這地方亦曾有之。一班知識分子，正被引入蘇維埃各機關裏面去了，其意義即爲被動員來翼助這種工作。

消滅文盲社現在完全是自願發動的，但是其工作有許多是受一定的團體的指導。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爲其各自黨員與團員，解決該項問題；識字的黨員與團員應參加該社，對於達到肅清標點要費若干時間，且以此克盡其應爲的公民活動。不識字的黨員或團員之第一件必要的公民活動，是學習讀與寫。在黨裏不識字的人數是很少的，但是仍有許多團員是不識字的。職工聯合會亦致助人民教育委員，會對於其會員負推廣識字運動的任務。在該會有一大羣人不能讀不能寫，故職工聯合會要使其許多會員加入消滅文盲社。在農民間，該問題仍是很嚴重的一個，而該社在鄉村社會裏，對於此問題有一活動的大範圍。地方的學校教師與其他的鄉村知識分子，均望其有助於克服此種難以克服的問題。他們必須加入該社，乃是當然的事，且付少量的社費，但是尤當積極從事

於教較老年農民讀與寫，以盡愛國的工作。

政府的努力與該社的活動，所獲的成績大有可觀，此點應予述及。雖然現在工人階級，因為來自農民間，致增加了許多不識字之新分子，將不識字的問題，老是放在職工運動的領袖們之前，但是不識字者的百分比數，在產業工人階級間，卻已大大地減低了。紅軍的教育工作，將紅軍兵士中的文盲，在初服兵役期間即已完全肅清了。女工與女農民的代表會議，至少在破除農工階級的許多婦女之被動性方面，獲得成績，而為婦女的活動首先表現於學習讀與寫二端。吾人當能回憶對於兒童先鋒所希望的，在能使其父母實現識字求知的需要，假使其父母是不識字的話。這堪置信的，現達到農村的無線電與許多演說會及討論會等，將使能讀能聽的願望日益增加。假使到了一九三四年，其所採用的普遍的強迫初級教育的計劃實現了，那末，不識字的根源，最後將會把握到。現在，許多的兒童長成起來，仍是不能讀與不能寫，致增加了不識字的人數。所以，擺在消滅文盲社之前的，仍有一個廣大的活動範圍。當不識字之各種事實，在幾種報紙記載裏面加重發表出來時，則該社為社員排場一種出版運動或一個遊行，試為其全體社員掀起最大的活動。消滅文盲社在一九二六年間之活動的工作人員，曾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對於過去已做的工作，作一種檢閱，以為刺激該社社員作進一步的活動，該會的報告說道：自從一九一九年肅清文盲的命令下了以後，從即日起，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所有一千七百萬不識字者，內中有八百萬人已教之能讀能寫，而達到肅清標點為數在四萬人左右。

在蘇聯裏有二個最大的自願發動的會社，均具着國際的姿態，即是世界革命者互助社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ssistance to Revolutionaries)——普通知其爲「木潑兒」(Mopr)，是從全銜幾個字之第一個字母合成的——與中國自主社 (Hands-off-China Society) 是。「木潑兒」是在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一九年向國與德國革命運動流產後組織的，而最近因爲與薩哥及梵鬧蒂事件 (Sacco and Vanzetti Case) 有關係，復行顯現。「中國自主社」緣起自一九二五年，當時莫斯科共產黨人以爲這是緊要關頭了，假使西方列強不作實際干涉中國的話，當中國民族主義運動與革命運動進展到正屆利害的關頭，該會的宗旨又成爲對於一班革命者，作一種保護與幫助。共產黨人、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要訓練之使成爲世界革命家，且由於他們的組織，使與世界革命運動發生聯繫。這些會社目的，在於及到最廣大的羣衆，以此，對於其「革命」的最廣大之作用與領域，亦必須加以計及。「木潑兒」有一個定義，說它是「一種橋樑，由於這種橋樑，使勞苦的廣大羣衆，對於世界革命有建立聯繫的可能，同時對於正爲革命而鬪爭的領袖將來作協助之可能。」世界革命者互助社是以籌款爲主要的目的，對於他國的政治犯，要給予物質的幫助。中國自主社則以宣傳爲主要目的，它以爲他國革命如獲成功，在國內得能激發熱忱，且對於爲羣衆利益而鬪爭的中國革命家，給予精神上的援助。

這二社均有巨數的社員。「木潑兒」在蘇聯裏說有三百五十萬左右社員，再加之他國五百萬社員，一切共產黨員是當然的社員，而共產青年團團員及兒童先鋒亦合入此巨數之內。這些社員是按細胞組織起來的，在一

九二六年，細胞共有四萬三千個。中國自主社歷史較短，而社員亦因之較少。在該社，共產黨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亦頗有所表現。這三種黨組織，是一切公民團體中之熱心徵求社員與自願捐款資助者。爲要保障他們不致使其自己有捐款過重的負擔，對於他們應捐到多少的總數與捐到其他會社應爲若干，有一種最高額的規定。在另一方面，非黨員的公民，尤其是勞動的知識分子，對於各種屑碎的捐款，如他們實際上必須認捐的「木潑兒」捐款，頗有怨言。先前實行着一種集體決議，凡一集團所有的組織成員，例如對於「木潑兒」均必須參加，茲未予進行，至少形式方面是如此的。「木潑兒」在其活動五年之間，曾籌集超過了一千萬盧布，大約半數是籌自蘇聯內部的。

愛國的團體，就此字最嚴格的意義說來，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已有產生。民族的愛國主義固受着烙印，以爲是資產階級用爲掩飾其對勞苦羣衆的剝削之詭計，但保護工農自己的國家與其政府，則認爲是勞苦羣衆愛國的職責。在論蘇維埃公民訓練方法的國際姿態之一章中，蘇維埃愛國主義這一題目，將使其與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共產黨的國際主義之關係上，予以論述。公民的團體是用以謀保障「革命戰利品」與「第一個勞工國家」的志願之發展。直待近來工作這種場合上，凡有二個團體即是「奧沙」(Ого)與愛尼愛希姆(Авраchem)是這二個團體現在合併爲一個，叫做「奧沙愛尼愛希姆」(Осоавраchem)。

「奧沙」是從俄字「禦敵合作社」縮寫而成的；「愛尼愛希姆」在俄文字面上亦能認識，即是「航空化

學工業社」禦敵合作社的創始，常回溯「和平」時期的開端，是在擊敗白軍與驅逐外國侵入軍隊出境之後。自從對外方資本主義世界商業的與外交的關係恢復之後，認為工人與農民有「乾貯其火藥」的必要，以便防禦「世界資本主義」來摧毀這第一個的勞工國之任何新截擊。這使工人們與農民們，深深感覺到有進一步與常作禦敵的必要，故禦敵合作社以此組織起來。充當社員含有利害關係，並為各種演講與印刷品供給款項，而亦為聽衆與讀者供給款項。「航空化學工業社」的組織，視為對「寇崇哀的美敦書」(Curzon Ultimatum)的答覆。這個當能回憶吧，方英國正式抗議莫斯科放出宣傳活動的時候，民衆抗議的聲浪，掩及蘇聯的全境，甚至於到遼遠的鄉村。使這個民衆抗議最具體表現的，就是此種自願發動的組織着手了，而事實上，即掩有浩大的工人與農民。迨與英國絕交之後，該項組織不僅為表現民衆的準備。它具有「幫助民衆謀科學的與技術的進步，使我們國家得有圓滿社會與文化生活的組織之實際目的。」這句話引自人民委員會蘇維埃主席賴可夫，在航空化學工業社之莫斯科分社的代表會議上說的。這種演說詞裏，他推行出下列的思想：

假使你與我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假使我們將來能成功，使在我們的境內，決不致有庸愚、落後、黑暗、飢荒與凍冷，則只有因為在那時科學已成爲人類爲社會組織，作奮鬥之一種應用自如的工具。這種奮鬥的領導之一，即是我們的航空化學工業社，該社如得有成就，要在於該社的目標，能成爲工人與農民的目標之時。

所以航空化學工業社所負的任務，除了爲防禦蘇維埃故土外，還有爲建立新制度的任務。飛機的建造是以

商用爲目的，但是亦常注意於軍事防禦方面者。化學工業之發展，要成爲國家工業化之一種要素，但是更當牢記勿忘者，下一次軍事的鬭爭，化學的戰爭將負着很重要的作用。文化上與技術上處於落後的勞工國家，必須在航空與化學所表現的科學，特別加以注意，使在對其敵對資本主義的世界相角逐的場合中，不致處次等的地位。由是觀之，該會的主旨是很廣泛的。當蘇維埃與英國政府的傾軋達到外交關係明顯的破裂之最高點時，航空化學工業社再形活動，視爲一種愛國防禦的團體，並以此爲「答覆張伯倫」。從各工廠各機關各農村所籌集的捐款，來建造飛機，即以該會的名稱名之。這些由於此種民衆捐款來建造的飛機，爲繼續至數月之久的示威運動之一部分示威品與陳列品。各新聞報紙對於捐款者的名單，均詳爲披露。

航空化學工業社的成績，可以下面的數字表現出來。現在全體社員人數達三百萬人，而在這個數目中，僅僅約有五十萬是活動的社員，在各機關中組織成各細胞與各小組，或各研究社或各陳列室，而以其中央蘇維埃聯絡之。內中有二十三萬五千社員，積極參加軍事科學研究社，十一萬三千個社員，加入來復鎗練習社，而一萬一千社員則入空中競技社。在三百萬社員中，有六十八萬整數是農民，所以平均每二十三個村莊，只共有一個細胞，估計只有一個該運動的指導員，該社具有常置的陳列館、圖書館及幾個「防護所」。防護所有似爲會員而設的一種俱樂部或聚集的中心點，有些像上述的農民招待所。在英蘇外交關係斷絕之後，爲特別看重一九二七年的「防護週」，該社亘數個月的時間，創立農工特遣隊的組織，該隊對於軍事作實地的研究，與參加過赤軍正式部

隊的秋操。該社活動的綱領，又應注意其他方面的興味。其最具體任務，是派遣遠征隊以清除遭受昆蟲侵害的耕地。一九二八年四月該社中央蘇維埃最近的會議時，賴可夫又是主要發言人之一，他說道：「該社的宗旨，要把它的社員這樣的組織起來，使他們會覺到其自己是我們的社會制度之積極建設者，與在經濟建設及加強蘇聯國防的工作中之直接的參加者。」

與此相似的另一公民團體，則為各區研究社 (societies of regional study)。這些區研究社，在此說到航空化學工業社時連帶說及，因為這些社亦是促進該國經濟的與技術的發展之一種努力。各區研究社約二千個，一如其名稱之所指示，是專注重其地方行政單位的研究，尤其關於其天然的資源，經濟活動的狀態與一般文化上的事業。在這些研究上，於經濟發展資源利用之合作事宜是否可能，必須加倍看重，以其着重經濟的問題，則堪信其狹隘的鄉土主義，將不為各該社所提創。當革命期間，各區的歷史亦包括於各該社之研究綱領中，工人們與農民們均參加各該社的一般工作，例如當各該社組織演講會與展覽會之時。各區的研究，在蘇維埃學校裏面是各種教授法之一種，這些研究社的活動，對於學校亦有裨益。研究的實際工作，大部分必須由勞動知識分子負責。對於該社的事情所聞見的，不多，蓋其所有活動外人直至現在止，都至少大部分是屬於地方性質的。至在少數事例中，當與其工作發生實際的接觸時，則似乎從前在省議會 (zemstvo) 的文化與經濟工作中，作積極參加的人們，現在亦有繼續活動的可能。現在各該社所搜集的材料，頗有歷史的價值，且能應用於目前的經濟問題。

在此，把各宗教團體與最重要的蘇維埃公民團體相提並論，於相互的比較中，可藉以表現這些具宗教性質的集團所給的地位。宗教團體以其自願發動的、民衆性質的，而且爲非政府的團體，故宜歸入本章所專論的各種組織的大範疇之內。但是首先必須注意的，這些團體不可使其發展而成爲一般公民性質的活動，而嚴格限制於宗教上儀式的舉行與宗教的禮拜之範圍以內。同時，這些團體不允許其設立互相聯絡的機構。關於每種宗教或每個教派，或在一個教派以內的集團，一個中央機關的成立是許可的；區域的或教區的組織則認爲不合法，以此各團體分離着，彼此不可發生具有效力的密接，即或對其名義上的中央機關發生具有效力的密接，亦所不許。政教絕對的分離，又加重了這種孤立。蘇維埃體制之惟一的政治組織——共產黨——在此當然沒有互相聯絡的領導。

任何公民的集團，可以用禮拜的目的，來請求設立一個宗教的社團。假使這種請求，由於地方蘇維埃政府所允許，則該社團得予註冊。一座教堂的房子將轉歸於該社，該社就是負着教堂房屋保護的責任；教堂仍爲人民的財產，而該社對宗教任何毀壞或損失應負其責。對社員按定期的與定額的抽捐是禁止的；所有捐款必由於絕對的自願。該社必須把自己限定於宗教範圍以內；它不能進行任何教育的工作，至訓練僧徒的學校，則不在此例。在這些宗教社團登記的規程中，禁止着不能運用「行政上的權能。」這個很普通的用語，似乎就是這些社團對於任何一般公民的活動之限制的基礎。例如一個宗教的集團，就其本身而言，不可使其自己組成一個消費合作社。

這些限制嚴厲的執行，地方蘇維埃政府是受有訓令的，而在各蘇維埃裏的共產黨人，關於反宗教宣傳一項，亦受到黨部特殊的與堅決的訓令。以促成這種禁令的履行。希臘正統教是從前的國教，且擁有最多數的教徒，對於這種教，限制其活動的政策，解釋之尤為偏狹。回教得有某種的特免，尤其關於對未成年者的宗教訓練方面。基督教在教育工作與公民活動雙方，被剝奪得較少，因其教徒不多，同時亦因其在舊統治之下曾受到殘害。宗派別很快的增多與增長，及在這些集團間，社會服務的精神很強盛與很活躍的事實，以致大約在去年，對於這些集團之各種限制，亦予以最嚴厲的施行。在本書所討論的每個題目之下，都可看到要從公民活動或公民訓練方面，深思熟慮地排斥教堂，是蘇維埃體制之一種顯著的特點。

同時亦有許多「具拘謹心思的」青年工人與青年農民，尤其是這二個階級的青年婦女，加入宗教的社團或與這社團發生關係，特別是那些福音會的宗教社團。一班青年人雖常常沒有正式的組織，但是在教育影響之下，將採納各種意見與例規，例如不喝酒、不吃烟與不應用穢褻的語言，而且在這方面，與共產青年團起了競爭。這些青年人的數量，按照黨的著名的領袖公開的宣布是很大的，就是共產黨人看來，對於這些青年人予以一種支配的力量，是絕對重要的。這或者所言之數有近過甚，以便提醒共產青年團的領袖與團員，因為共產青年團是共產黨影響後起青年之主要的途徑。

宗教的社團實際上是在蘇維埃體制內一班非公民可以參加之一種絕無僅有的團體，即是新資產階級的

「納不滿」或甚至於農民商人或店主均可加入；至於對宗教團體的各種活動，付予種種限制，則在於要使這些分子進一步地失掉公民的資格。共產黨人對於這種事實不憚煩地加重說明，意在使在工人及農民的廣大羣衆之心目中，不相信這些宗教的社團。關於此，他們形容教會是一班在思想上不能接受新制度的分子之惟一安藉與托足的地方，且說負債於富農的貧農，「納不滿」的雇工或「簡單的住民」亦時被教會所吸引。

共產主義者的敵對者堅稱，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沒有作獨立的公民活動之可能；他們所見到的是共產黨在政治組織上的專斷權，亦擴張到一般的公民活動之領域。事實上，共產黨的發動與指導，差不多在一切公民團體裏都可見到。蘇維埃各機關所根據的階級的原則，卻在這些公民團體以內是不甚着重的，雖然該項原則並不是完全不存在，且是組織上的根據。一切公民團體都宣稱是自願發動的；但是爲保障會員與穩固捐款起見，則有時含有強迫的成分。但是經過各種選舉，各代表會議，與有時經過其自己的各代表大會；藉其自己的報紙之公佈與出版的活動；及藉各種演講會各種遊行與各種宣傳運動；成千百萬的羣衆與這些團體得以發生關係，並由於這種接觸，使大批羣衆的態度即已受到影響。在大多數這些團體之內，除了共產黨團或該黨的集團之外，還有一種非黨員的活動分子發展起來。

第十章 陳列館與參觀團

「革命」從舊統治接收下來許許多多之歷史陳列館與藝術陳列館，作為其所承受的一種「遺產」，沙皇時代的政府與私人對於這些機關的設立與維持，頗為慷慨。俄國的科學與大學生尚能集成有價值的歷史搜藏，且俄國的藝術家在許多現代的圖畫展覽室中，其所表現良有足多。加之有許多大規模私人藝術展覽室是屬於富商，或為地主貴族的所有物。沙皇與其皇族的宮宇，對於歷史的與藝術的物品，亦搜藏得頗富。這一切的私人收藏品均歸國有了。有幾所歷史上僅見的教會房屋與廟宇，變作陳列館。有許多皇宮與幾處私人的城區大廈與鄉間別墅，也改作「博物館」，存其舊觀。舉其各色各樣的陳列館，均歸於教育委員會專一處理之下，該會於管理這些機關時，把許多收藏品再加以分配。

「革命」亦產生其自己陳列館，最重要的是「革命陳列館」。雖然列寧格勒的陳列館，因該地是革命之最先首都，亦蘊藏着革命運動上幾件極有興味的歷史材料，但是莫斯科的陳列館實為最大。在哈科佛（Иркутск），「自由解放的烏克蘭之陳列館」實際是烏克蘭革命運動的陳列館。有幾省省城的革命陳列館是為較大陳列館之為各區研究用的屬館。且有職工聯合會的陳列館，凡在職工運動之較大的辦事處均有設立。莫斯科中央職

工聯合會陳列館，有一部分是爲「母親與嬰兒保護的展覽處」，該部分實際上成爲具陳列館性質之一個永久的機關。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處，均有一個紅軍與紅色艦隊的「陳列館」。在公衆健康人民委員會指導之下之「社會衛生陳列館」，是用爲提創個人與大衆的衛生，且有許多地方上的分館，在該處收藏了各種模型與統計材料公示於衆人。

「共產國際的展覽處」是「革命」另一種產物；該處與「莫斯科革命陳列館」同在一座房子。「列寧陳列館」於前討論列寧主義一章中曾已提及。現在爲這領袖而設的中央陳列館，成爲「莫斯科革命陳列館」的一部；這種關於列寧私人所有紀念品之收藏，將來大概要轉入最近纔完全建造好的「列寧學院」中。在某種意義上，一切「列寧紀念處」都是小小的陳列館，而且有許多處保存着他的生活與活動各種歷史性的材料。紀念其他革命領袖的單獨陳列館，祇有爲那些前輩的著名人物，例如海爾遜（Herzen）、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等而設立的；這些前輩的革命領袖們及十月革命之其他顯著的人物的紀念材料，均搜集起來歸入革命陳列館之各部。自從革命以來，其他小規模的陳列館多所創設，惟此地之所舉乃是特別用作增進政治意識的機關，同樣的對於較舊式的陳列館，我們興趣之所寄，是在於利用之以爲促進政治教育的工作之那些陳列館。在現在快要扼示的各機關所公定的參觀程序單中，其他各種陳列館與展覽處，亦要提及與作梗概的敘述。

參觀團的制度，前幾章曾經數數提及，此處與陳列館相提並論，討論之較爲詳盡。因爲各種陳列館與展覽處

要使其合乎政治宣傳與政治教育的目的，須經過這些有系統的參觀團的作用。參觀團的組織另有他種的作用，不僅是把這些歷史或藝術的陳列品徒供作瞻覽已也。所謂「參觀工作」在蘇維埃體制之下，應用之至為廣大。但是最通常的參觀與早就有的參觀，乃是陳列館的參觀；這是該制度初起的情形，後來則應用到其他各方面。凡到蘇聯參觀的人們，對於該處許多工人、農民、兵士及兒童在各陳列館中遊覽，總會受到印像。在種種記載中，時常說明「革命」把各陳列館向大眾開放了，在以前，他們是不許人進觀這些陳列品的。此種記載至為真確，由各種團體如學校、職工聯合會或兒童先鋒等等所舉行的有系統的陳列館的參觀，引起了很大的興味，尤其在成年的工人與農民之間，是故成羣的民衆之瞻覽各陳列館，以及個別工人或農民之遊覽，較諸革命前的情形尤為習見的事。

這些參觀工作是蘇維埃政治教育之一部，並代表其他政治宣傳與公民教育之具有系統組織之實例。以此，學校的作業課程中對參觀方式的採用，施之尤為廣泛。曾有幾種提議要把全部學習課程表根據於各種參觀而釐定；在另一方面，則有對於這種參觀所耗的時間與精力過多，提出抗議。普通的慣例似乎如下：在學年開端時，參觀計劃的擬製，是與學習課程表的課題相關聯的。以此，每種參觀都有準備；在參觀的進程中，把材料搜集起來，各學生至少應將其所得的印像予以摘記。是後，則進行整理材料，並藉討論把參觀所得材料作集體的摘要。在成年農民工人的教育工作中，各種參觀認為頂通常，而較諸正式學校的作業課程利用之尤為廣泛。參觀現成爲職工

聯合會例假日活動之一種。參觀的方法亦已用之於鄉村區域，以便提高農民文化的水準，而尤在乎使他們對於工業中心區之經濟方式與政治觀念，得獲直接的接觸。在紅軍裏，政治的課程以各種參觀予以補充。各種競技與運動，亦有藉參觀以為提創；這方面的參觀工作，此處將略而不談，因為此處所談的參觀，其興趣是用為政治宣傳與教育的。在另一方面，至蘇維埃其他各區域與其他各國的參觀，亦以較大的規模組織起來，這是以「研究社會」為目的，而這些參觀程序單，即根據這個「研究社會」的宗旨擬定出來。

莫斯科職工聯合會蘇維埃的文化組（即文化教育組）之參觀程序單，是所謂「參觀工作」所包含的廣大範圍之最好的例證。這種程序單顯著地貼在一切俱樂部裏面，同時亦貼於公共機關之內。這張大紙以黑字與紅字寫着職工運動二個格言：即「職工聯合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與「工人俱樂部是無產階級意識的鑄冶爐」，把要參觀的各地方類成各組，每組放在一個項目之下。最前的一項是「職工運動」而在該項把上面會提到的「職工聯合會的陳列館」與其職工聯合會的歷史部分均介紹出來。文化組自己的辦事處與「工人中央職工聯合會的圖書館」亦開列在上。在「生產與技藝」項目之下，則看到一個「工藝陳列館」一個「中央工學院」及勞動人民委員會的「心理技術實驗室」這些是代表所謂「勞動科學組織」的研究之主要中區。下接着一個表，把所介紹的每個工業部門之各工廠的名字列出，表內所舉出的有七十餘工廠，且這些工廠包含首都最大的與最重要的企業。

關於建築與建設方面，托浮斯卡牙街 (Tverskaya Street) 亦向參觀者作一種介紹。該處「中央郵政局」與「列寧學院」的新式大建築，在這個參觀程序單中，把日期全部都規定出來。莫斯科之三個大廣播電臺與全城的自來水臺，則在表上另立一款。這部分之最後項目是「農業」，凡有二個「農民招待所」及農村建設式樣的陳列品，一個特種的「農業大學」一個牛乳場、一個牛油製造廠、及一個「獸醫學院」都介紹出來。

在「自然研究」項目之下，列着天文學與生物學，一個氣象臺、一個生物陳列館、一個動物陳列館、達爾文陳列館與動植物園成系的題目標舉出來，以為參觀的對象。為研究「勞工衛生保障」起見，關於公共健康與社會衛生的展覽處與陳列館一一舉出，而一個火葬場亦包括在內。為研究「體育」起見，則有「各種各樣的競技、運動與體育衛生」之特種學院，而在城外列寧山上之廣大運動場，則推為各種競技與各種運動設備極其完善中心區。「勞工保護與社會保險」可以在其陳列館中研究。「經濟地理」引起莫斯科城設計的研究，要從幾所高大房子的屋頂與從列寧山上俯瞰全城。在莫斯科城設計的研究中，克列姆林皇宮亦須參觀。紅場是代表歷史上的事實，而不是代表經濟上的事實，但是它也包含在這部分的參觀表中。各陳列館是專重於首部公共利益的企業與莫斯科一般的工業中心點。「本地工業陳列館」則例示莫斯科區域經濟的特點。「複式技術陳列館」、「歷史陳列館」與「人種學陳列館」及「人種展覽室」乃例示「人類與自然的奮爭」、「蘇聯經濟的發展與資源」及「蘇聯各共和國的人民」。

在這個參觀程序單中，有一部分名爲「文化史」，尤饒興趣。第一類是關於「俄羅斯革命運動史」程序單上第一個機關是「莫斯科革命陳列館」，該館每部分類均標之以單獨的題目。「軍事歷史陳列館」是陳列舊式軍隊歷史上的東西，同時「紅軍與紅色艦隊的陳列館」則專注重於新式軍隊與內戰時的歷史。爲革命的領袖單獨設立的陳列館，除了列寧以外，祇有在莫斯科爲克魯泡特金設立的陳列館。在「文化史」這一分類上，又有該城的二區域，亦作爲參觀的標題；有一區域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戰爭的中心區，而另一區，則爲一九一七年十月戰爭之布爾塞維克的中心區。一九〇五年革命之一個布爾塞維克祕密印刷所，曾保存起來，作爲一種紀念處。

「文化史」部分之第二類，包有二種展覽處，以例示西歐革命運動，即是共產國際的展覽處與「木潑兒」的展覽處，該處即是世界革命者互助社的蘇聯支會。「文化史」的第三類，名之爲「社會形態的發展」，上所說的「歷史陳列館」是專注重於埃及的與古代的文化。莫斯科城外有一座大寺，曾改爲一個陳列館，以明示古代寺宇對於經濟上、社會上與政治上的作用。同樣的，在莫斯科西邊，有一個茲尼尼果羅特（Zvenigorod）小城，是作爲表示封建諸侯時代諸城之一種型式。十七世紀有一座貴族的房子，與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間之一個博物館，從舊統治接收過來，現仍照舊用之。上所說「人種展覽室」在這個項目之下，又再見到。

「蘇維埃法律的問題」亦列入參觀工作的範圍之內。關於「犯罪學與刑法政策之研討展覽室與陳列

館」曾加以設置起來，而此外又有一個陳列館附立於「莫斯科犯罪研究所」的地方。該參觀程序單再下個部分是關於「合作」事項。任何地方的合作商店，有參觀的必要，且有一個極大的工人消費合作社特別介紹出來。有一個頂大的市立合作食堂把名字亦說出一個合作麵包製造廠與一個合作罐頭企業的「布爾塞維克」工廠特予指出，以例示合作生產的事業。「遜托羅沙犖斯」的棧庫，表示各種合作的作用，洵為城市與鄉村間之分配上的津梁。最後，一個郊外農業集團的合作，例示農村裏合作事業的功効為如何；普希金諾的小規模郊外農業合作，視為最切近的與最完善的例子。

在「每天生活問題」項目之下，把前已見過的兩個農民勾留所再介紹出來。在「職工聯合會陳列館」中之藝術展覽室，亦再予指出，且上說過之合作食堂第二次加以標明。「現代俄羅斯藝術陳列館」之一個特租所藏的圖畫，例示家庭的服裝，且特別關於革命前俄羅斯結婚的儀式方面，而均包括這個標題之下。最後，「莫斯科市立洗衣處」是革命之一種產物，亦介紹出來，以示「新生活」之一種模範。

在這「每天生活問題」部分之內，言及「藝術」方面，最着重的是現代俄羅斯藝術的陳列館，該館時常以其「托萊雪果夫展覽所」(Tretyakov Gallery)的舊名稱之。這是由於一個富商托萊雪果夫送給莫斯科城之一個禮物，時在十九世紀。除了前見到藝術陳列館之外，又介紹了二個木器與瓷器的陳列館，與東方文化之特種陳列館。「梵薛萊神明(Vasily the Blessed)的博物院」是紅場上之一個教堂，是建自約翰·塔列勃爾

(John the Terrible) 其所以敘入這個參觀程序單中的緣故，爲的是表示「專制最初時代的建築物。」有幾個戲院有其小規模的陳列館，而這些陳列館也列舉於這部分之「戲院」標題之下，再則「莫斯科藝術戲院」的戲劇，用以表示現代舞臺上表現的技術，同時「農民技術的中央表演場」是作爲「工農劇場簡單化排演法」之表示，在「文學」標題下惟一的參觀的標點，則爲「托爾斯泰陳列館」該程序單結束以所謂「軍事宣傳的部分」在這部分之內，第三次介紹到「紅軍與紅色艦隊的陳列館。」

演講會與電影，又爲文化組準備起來，以補足參觀程序單上的許多條項。工人俱樂部可以出極低廉的價格而得到電影與演講會。文化組且助俱樂部訂定本年或以本年一個時期的參觀程序單。其所提創的實施方法，則爲於演講或甚至於電影之前，先舉行參觀，其題目是同樣的；於是乎演講與電影纔能迎合參觀時所引起的興趣。有時亦採用相反的次序，參觀在電影或演講之後舉行，先把要參觀的事物提示出來，然後實地的參觀，以補演講與電影之所不及。在學校裏，作參觀準備之通常慣例，是在課堂裏面先作一次談話與討論，不過參觀後所得的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亦重視爲兒童們所準備的報告之構成的部分。

「各種指導書」曾爲各種參觀團而印行。有時各陳列館有其公印的指導書；但是又有成組的、細小的、不等程度的而且小冊子形式的指導書，備爲各參觀集團指導者之用，而亦爲各個人以其自己發動想參觀陳列館或機關之用。有一組指導書是爲「莫斯科職工聯合會蘇維埃」所備有，而由於這一組成書，人們可以看見這種指

導書一般的性質爲如何。政治宣傳的成分，亦時常表現之於各種解說中與應作如何注意的提示中。例如工人在作一個城外鄉村集團中參觀時，應注意那所房子從前是地主或商人住的，並考察這些房子曾改爲工農療養院與休息所了。參觀者宜研究近郊地方經濟的組織，並注意該處與城中進行貿易循着那樣普通法則。所以由於參觀所得一個最重要的功課是：在舊統治之下，農民是被地主與資本家所剝削的，可是在新統治之下，他們則與工人們作政治的與經濟的同盟了。

離莫斯科不遠，有尙未完全告成的前皇室的別業——沙立薛諾（Tsarskoye），係建自喀德麟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這些建築物表示一種鄉間別業的計劃，現該地供作其近畔莫斯科工人與農民參觀之用。爲便於參觀起見，印有小冊子的指導書，題以「專制的沙皇是土地最首要的地主。」且繼以下列扼要的證說：

維護專制制度的人們，時常說道：沙皇的專制政府並不是一種階級的政府，並說沙皇是超一切階級之上，是獨立的，且在其人格上表現出至高無上的公正。若把沙皇的政策加以研究，我們就明晰地看見這種話是不真確的。沙皇的統治，以其起源與所代表的利益及慣用的策略看來，時爲有產階級的統治，首先是地主貴族的統治。不僅此也，只要注意一下：這班俄國帝王生涯的風采，其周圍侍從的人們，其消磨時間的方法，以及其嗜尚、好惡與思想，則即刻便能恍然大悟：這種統治與勞苦羣衆相去奚啻天淵，事實上所依據的階級統治，其所建立

的幸福，是由於剝削人民的勞動。試向沙立薛諾作一度遊觀，將能使這些話語對你澈如觀鏡。

前沙皇有幾所宮宇，尚保留着作為博物館，且各房間的佈置，未加以任何的更變，參觀的人們在沒有了解它這樣佈置的用處以前，會驚異這樣未免失當。工人與農民經過這些皇宮遊覽之後，就會知道以前的統治者的生活是怎樣了。受過教育的參觀者，對於末朝沙皇的稱心居室，其所得的印象，並不是在其華麗圓巧，而在於所陳設的器具與圖畫之具庸俗性質。沙皇前的私人閱書室，有人偶作瀏覽，寫其內之所收藏者，僅不過無聊膚淺的各類書籍，且無價值的小說，在在皆是。工人或農民深入於他們以前統治者之深邃幽藏的住處，無疑地引為一種滿意。舊制度之完全傾覆，亦以此深刻印入他們的心中。有許多故舊皇宮，用作為行政上的機關，或者更為普通者，是作為工人的療養院與休養所。這也應予注意。

有幾所從前地主貴族最有名的別墅，同樣地保存下來，以作歷史上的紀念品，但亦具有目的，欲藉以指示工人與農民，使其知道前之「剝削者」如何生活。在有幾所別墅中，舊時代的文人學士曾著作於其間，而其解釋則謂革命前的文學，是在資產階級控制之下，並為資產階級効力的。

近代俄羅斯藝術的陳列館，是專注意於參觀工作上之政治教育的目標。在近代俄羅斯藝術的各派與各時期的大傑作中，蘊藏着俄羅斯歷史的材料與革命前俄羅斯生活條件的材料，至為豐富。為工人們與農民們請好「指導員」亦如學校裏的兒童之有導師一樣。各指導書或為各種圖畫作解釋，或以問題引起他們的討論。作者

前聽到了一個學校參觀團的學生，對於一張鄉村風景畫正作討論的時候，曾引起興趣，把他們所舉出的各種階級典型，一一紀錄下來——地主、農民、僧侶與警察。該畫是一羣農民被捕的畫，畫的標題上未曾明顯示出拘捕的原因或原委。有一個小孩指出道：「這警察拘捕這班農民，是爲取悅地主的。」他已學好以共產主義定則來推斷在資產階級制度之下之政府機關的作用了。

以革命的術語來解釋藝術展覽室裏的圖畫之辦法，似乎甚爲通常，凡參觀過有名的「莫斯科近代俄羅斯藝術品展覽室」的人，都覺這樣解釋並不是偶然的罕遇。假使該展覽室所印成的指導書，未曾根據馬克斯的原則，他們至少尙能反映共產主義的解釋，例如，一種指導書在其序言裏面，把俄羅斯繪畫的各時代扼要舉出。「藝術爲貴族効勞」是肖像畫全盛時代的標題。寫實主義與其後的「農民主義」的興起亦予述及。尤加注意的，是彼時對於其現存制度已有批評，各種圖畫且又以「社會的階級」分類於指導書中，其歸類如下：在十八世紀的作品中，有描寫爲黃金、品級、勳章而奔走者的畫；往後則有「地主貴族之俄羅斯」與封建生活的圖畫；於是漸漸有農民田園生活的圖畫，但是描寫商人與官吏的圖畫最爲流行，並引人注意僧侶的圖畫中之「消極的形態」。最後直到十八世紀末了，纔初次發現描寫工人與城市無產階級的藝術品。在這種分類之最後一項，題句爲：「農民與工人是未來建設的基礎。」

革命陳列館是參觀者最常到的陳列館；在這種陳列館中，特別含有參觀的刺激性。「莫斯科革命陳列館」

凡有三十餘間房子，是這類機關之最重要者。該館主要共有八部，其分類為：「農民暴動與十二月黨」(Десятилетие)、「農民主義」、「羣衆革命前之工人研究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之間」(爲十月革命的戰利品而奮爭)(即內戰)、「共產黨史」與「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是。作者曾作幾度的參觀，要研究該館陳列品之歷史上的材料，而每次總看見男女農民、紅軍兵士與年齡不齊的學生，一隊一隊的，及成一大隊的來參觀。革命運動，從十七世紀農民騷動以來，以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階段一階段地接踵而來。十七世紀農奴暴動的領袖斯通楷·萊成(Stonk's Rasin)與十八世紀農民領袖普格川夫(Prugchev)都是革命最先的英傑，在該館鄭重紀念之。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人」雖然都是貴族階級，且其運動又不是普通的或羣衆的性質，但是亦給以一個位置。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的「農民黨」運動，似乎陳列得較不充分。但是八十年代所肇始的無產階級運動，與第一次工人的組織，得以那時各組織家的相片及所印行的與所分發的印刷品之樣本，完全表明出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自成一個獨立的與很完全的一部，而那時期的布爾塞維克亦很受特異的看重。該陳列館之最後二部，是關於共產黨與列寧的陳列。公平言之，共產黨史誠爲革命史的基礎，在各學校關於「政治常識」的科門，所採用的教育大綱與課本都是如此編定。

與革命陳列館處在同座的房子的，有共產國際展覽所，該所專以展覽世界革命運動推進的情狀，有各種一覽表標明世界上業已存在的五十四國之一切「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共產黨集團的黨員。共產國際所印

行的印刷品之樣本，按各種不同的文字陳列於架上。每次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均作統計上的分析，且有各種照片與圖畫以紀念之。共產國際第二次重要的代表大會，有一張非常大的圖畫把它繪出來。指導員謹慎地向美國人指出美國共產黨人約翰利特的面孔。並有一個饒有趣味的巧妙方法，來表示世界大戰後革命進展的情形。有一張西歐的地圖畫一個大的透明的屏帳上。屏帳旁有一槓針，該針能轉動到羅盤面的各標點上。當槓針放在「君主政體傾覆」的標點上面時，剝落的皇冠，從後面發出了光，現之於柏林維也納與列寧格勒的幾處都城。當槓針放在「同盟罷工」之上時，則紅旗將在圖上之許多地點照耀出來。在羅盤上有一標點是爲「蘇維埃的創立」。當槓針指着這個標點的時候，雖然紅旗與斧頭及鐮刀的標記之數目，較諸指於「同盟罷工」的標記地方爲少，但是透明體之所顯現，尤爲鮮明適度。羅盤上最後的標點是「蘇維埃政府的建立」。當槓針放在這個標點時，蘇聯各民族單位的首都，而同時於匈牙利及巴伐利亞（*Bavaria*）現出一粒紅星。

「紅色海陸軍陳列館」亦是革命史的陳列館。在該館之各種印刷物與其他材料，乃說明紅色海陸軍的建立與其在革命上的作用。革命初年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內外戰爭時之紅軍的歷史，是紅軍裏的政治功課與共產黨「政治訓練班」一類特種學校的研究問題之一種主要題目，所以這些陳列館之供人參觀，是與這些問題的研究互相關聯的，尤其在於紅軍兵士的研究方面。但是工人與農民亦要作是類陳列館的遊覽，此事列入各機關的工作表中，是作爲政治教育的工作。兒童先鋒亦時常蒞臨。現在就要說到，在蘇維埃日曆中有一個

「紀念日」是爲「紅軍紀念日」這些陳列館要爲各學校與其他機關作那一天紀念的準備。「莫斯科紅色海陸軍陳列館」有一室是陳列着對「反革命者、匪徒與經濟的盜賊作鬭爭」之初期革命裁判所的活動材料，這裏的引語是引自一本送發的指導書。在該室陳列一隻「人皮手套」(human glove)，說爲在烏拉爾(Urals)戰爭時，一個紅軍兵士被白軍用酷刑所扯下的手皮。並有許多畫片引證柯爾恰克(Kolchak)與台尼金(Denikin)的官吏，對於紅軍兵士與共產黨人所施的酷刑，尤其是在土耳其斯坦的遊擊隊，更爲殘酷。

「職工會陳列館」設於全蘇聯的職工運動之中央辦事處的「勞動宮」之內，保存着革命前與革命後工人運動各種出版品之原來材料，各種圖表與表格，給予革命前關於組織上努力的歷史，與革命後關於該項運動迅速的進展。不過除了作學生研究的題目以外，這些並不是饒有特殊趣味的展覽。在該陳列館中，有一部陳列着勞工的藝術品，職工聯合會曾得到過去與現時的各種繪畫，以表示勞工經過的情形與現狀，並把這些東西總集於這永久陳列館之中。「母親與嬰兒保護的展覽處」亦設在勞動宮之中，並在職工聯合會機關指導之下，它對於革命已做了什麼事業有裨於母親與兒童作一種檢討。該處並作個人的與社會的衛生之宣傳，且依據參觀標準表，使之一部分適於這個宣傳宗旨之用。

在這方面可連帶把社會衛生陳列館作更充分的解釋，該館在前相舉各陳列館的種類時已曾提到，是類機關，在大城市的各區，與較小省分的各城市，有其中心的總館與地方的分館，準備着蠟像、畫片、圖表、及傳染病、產業

病與花柳病之裝好燈光的滑面之各種陳列館。這種材料公示諸觀衆，且亦有送至各俱樂部及讀書室各機關者，作爲衛生與保健方法之一種普遍的宣傳。中央分送的地點，主要是調查的與研究的各機關。但是，許許多多的人與農民，以及於學生與學童，經過參觀之後，由主腦的社會衛生陳列館及其分館之種種陳列品，得能受着最深刻的印像。這些社會衛生陳列館從前是醫學研究院。從前選立的市議會與省議會對於公衆衛生的工作做得不少，且現在的機關與所有人員的一部分，是從老議會做醫學工作的遺留下來的。革命對於這種工作加以推廣，而在於宣傳方面，尤廣予佈置之，參觀的制度有助於這種宣傳工作的推廣，厥功良多。

人種學上的收藏品，在參觀工作的組織中受到特別的注意。「蘇聯」是「許多民族自由的聯合」且小民族與落伍種族所得到的權利，視爲革命戰利品之一種。到該陳列館中參觀，得見各民族的習慣與風俗，此等民族由舊俄帝國鎔合起來，而今則歸入於蘇聯之中，此種參觀藉以加重說明蘇維埃體制之廣大無垠。當夏季時，組織了到國內各不相同的區域之參觀團，他們的目的，一部分是在於作各種不同種族的的研究，尤其對於蘇聯之獨立的或自治的組織成員之「非斯拉夫人」與「非俄羅斯人」方面。

「革命」把廣場上許多的舊紀念物一概掃淨了，尤其關於一班沙皇的與將帥的。是故在克列姆林宮裏面，所謂農奴的「解放者沙皇」亞力山大第二的鑄像已經拿下了，但是該像的臺基仍與一切俄國沙皇的嵌刻人像留存着。移掉其他鑄像的顯著例子，是斯廓培來夫（Skobelev）將軍的鑄像，這個紀念像立在一個廣場的中

央，正對着後來的莫斯科蘇維埃的辦事處。在該處，代替了沙皇帝國主義的代表之斯廓培來夫鑄像的，則有革命新紀念物的建立，即是「革命紀念塔」。且在塔邊刻有蘇維埃憲法概略。較早的君主例如彼得與喀德麟的像，因為有藝術的價值，仍予以保留。在列寧格勒，亞力山大第三的銅像仍立在前業夫斯基直街之上。這個紀念物在革命之前，受着嚴厲的批評，從藝術的觀點上一般人都認為是失敗的；而且該像會使君主明顯地現出粗魯甚至於野蠻的外貌。至於保留這種紀念物的理由，則見於在革命以後所添鐫的幾個字：「國家已經擺脫專制政體的苦厄，我立在這地方，有似恐嚇鴉雀的稻蕪人。」

建築物上皇朝的標記，二月革命已把它移掉了，而十月革命處理的手續尤有系統。但是在尖閣頂上或在別處的二頭鷹，尙能看見，設或一經移動，則會玷損及該建築物建築術上的美觀，或在實質上難以移去，故仍本其舊觀。革命的標記，即是斧頭與鐮刀，已代替了舊式君主的徽章，而且用之更多與含義更明。對於馬克斯、恩格爾，與其他過去革命家，及俄羅斯已死革命諸領袖，尤其是列寧之各種紀念物，遍全國建立起來。不過在共產黨人間尤其列寧夫人，關於這些許多紀念物的設立，則有耗費過巨的批評。

參觀工作除了注重政治教育、職工組合教育或合作教育之較狹義的宗旨以外，尙有啓發文化的宗旨。但是共產主義訓練的原則，在一切參觀工作的理想上與程序上，很多是把它放在前面的。有一個格言，時常印在貼於牆壁上的參觀節目單的上端，這個格言是列寧所說：「惟有把人類所積聚的文化撫取起來，你纔能得望成一共

產黨人。」莫斯科歷史陳列館的各部擁藏着前代的史實，而尤其關於俄羅斯前期的歷史——對於該館，參觀程序單上介紹已不止一次了。先前教會的藝術與某種歷史上的教堂之特種收藏，亦包容於該程序單中。但是，在新陳列館的創設與參觀團的組織雙方，其主要着重的，實是關於當代的生活與革命的主義，及新社會制度建設問題等項。

各個人實際得到參觀的數目，尙未經加以估計，不過有時以最一般的言詞表出之而已。工人俱樂部有其參觀紀錄簿，且須做該部所組織的參觀團之報告。各種單獨學校的紀錄簿，把這些特定學童參觀團之數目表示出來。扶護社亦守其所應爲的參觀常例。有時各陳列館公佈參觀者統計表，同時標明利用其陳列館的參觀種類，但是尙未找到概括的數字，使其能爲估計該項工作實際活動範圍的基礎。

參觀之各式各樣種類，本章曾已言之，且亦述之於與其他題目之互有關係的地方。兒童與學生作各陳列館的參觀，而且參觀各工廠、各農村以及各行政機關。工人們參觀各陳列館、各農村，而且參觀各種各類的工廠。農民們參觀各陳列館，且應特別參觀各工廠與集體農場。工人們與農民們以至於後起的青年們，羣作前統治者與有產階級的宮宇與別墅之遊覽。一般的文化上的宗旨，固是參觀工作之基本要點，但是政治宣傳的成分亦時常表現出來，且每每決定每個參觀團的着重點。學校裏的兒童，必須使之密接於生產的行程。農民必須使之受無產階級與集體農場之影響。工人必須爲新無產階級文化的決定者，而同時要在文化進展的場合上領導農民。而且一

一切這些集團對於在文化的領域裏面之革命的戰利品與革命的任務，必須注意不懈與體達周詳。

第十一章 蘇聯的紀念會與宣傳運動

欲顯示蘇聯各團體與各機關的公民活動，必須時常徵引到各種革命日期的紀念與有組織的宣傳運動之運用。在此將論述蘇維埃體制下的各種紀念會之一般性質。有一個共產黨人形容蘇聯的紀念日為日常生活的記里石。定出一年的季節，以使老少人民均各有所遵循。在組成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之努力中，紀念日含有更特殊的用意，以助新社會的性質之確定。宣傳運動，則是對着某一對象掀起羣衆行動；且在建立一種新秩序的時期中，其所遇到的任務多而且難，故羣衆遊行的方法廣為利用。紀念會與宣傳運動成爲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是民衆自動表現的一種形式，這種民衆的自動表現是從前對人民橫加禁止的，同時又是革命行動的技術。革命的熱忱得藉紀念日與宣傳運動以求發展。革命已有其自己的歷史，且至今已十年多了，故在日曆上某些日期的紀念，可供追思革命的成績，並使昔曾身歷其境的人們，有機會回想當日的革命精神與其英雄事蹟。但是紀念的目的，尤其要使未曾參加這事變的人們，能了解這特殊事件的以及整個革命的意義，所以要少年人與兒童參加這些紀念會，是特別應予注意的事情。

在革命未成功前，已有多年的鬪爭。在本世紀中，「革命」這個名詞，可以應用的已有兩個時期——即一九

○五年的革命與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認為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布爾塞維克革命之原型。所以在革命運動史上，這些日期當然是要提出來紀念的，或至少是要提起使人注意的。十月革命的幾個特殊的日期，如屬於蘇聯本身的或屬於紅軍的，都要用某些辦法顯示出來。所以蘇聯及紅軍成立的紀念日，特別在革命的日曆上標出來。在蘇維埃制度之下，著名的人物也非不去表揚的，而且在事實上予以重視的。列寧常然是最著名的例子，他的死日，是十月革命本身的紀念日外之最重要的紀念日。其他領袖的死日，如熱爾仁斯基 (Dzerzhinsky) 或弗龍茨 (Frunze)，也以特殊的集會與報紙上的專載來紀念。馬克斯與恩格斯，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與盧森堡 (Luxemburg)，孫逸仙或美國的共產黨人約翰李特 (John Reed)，雖然沒有組織普遍的紀念會，但都每年於其特殊的紀念日，成為討論會或各種論文之中心題目。著名的領袖之生日，亦時常提起注意。對於共產黨人，尤其對於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編印日曆的編者，都能於一年的每日提起一件或多件，關於該國革命與關於其他各國革命運動的事件，令人注意。

對於革命事件的紀念，其中一個目的是掩蔽與逐漸消除與舊統治有關係的各種紀念。實際上一切這些過去的紀念日，差不多都是宗教的節期；例如，沙皇的神聖日之紀念，按希臘正統教的風俗，要比他的生日還更紀念得正式一點。這差不多是舊統治之惟一的政治紀念日，而且這同時又是尼古拉神聖的宗教節。在舊俄時代，除了基督復活節與聖誕節之外，還有許多的宗教紀念日；並且這些紀念日在人民的意識上，有牢不可破的印象，尤其

是對於農民。這些宗教紀念日的次數，雖已大受減少，但要把它們完全取消，仍覺不可能或不方便。許多這些紀念日，甚至能使一切政府機關停止工作。可是在這些日期中，他種活動組織起來，尤其對於兒童，但在這些日期仍不禁止工作，一如某些革命紀念日一樣。時常因時間相同，有可能把革命的紀念與宗教的紀念對立起來；在一九二四年，希臘教的復活節恰是五月一日的國際勞工紀念日，於是直接針鋒相對的競爭能有效地組織起來。曾有一度採用過「共產青年復活節」的口號，但後來把它取消了，因這個口號有造成共產青年要建立特殊的蘇維埃復活節的印象之趨勢。

在給外國人用的正式指導書中，所規定的合法紀念日的表單，示明兩種紀念日的對立，並同時示明許多宗教紀念日仍予存留的事實。一月一日同時是蘇維埃的新年，雖其經濟年度是從十月一日開始的。一月二十一日是列寧紀念日，即是這領袖的死日；且一月二十二日又是一九〇五年流血紀念日，當時在冬宮前面的工人示威，被武裝軍隊衝散。三月十二日，按一九一八年所採用的新曆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日期，定出這一日，為的是紀念沙皇統治的崩潰。三月十八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紀念日。神聖星期六、復活星期日與復活星期一，都是仍舊依照教堂的日曆。此後即為國際五一節。耶穌升天節、聖靈降世星期日、與聖靈降世星期一，則為第二類的宗教節期。七月五日為一九二三年採用「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憲法之紀念日；這是憲法紀念日，且是較大的紀念日之一。於是又有兩個宗教的紀念日，即耶穌聖節與聖母升天節，十一月七日與八日，則為一

年中最重要政治紀念日，是十月革命的週年紀念；雖時常說起來都稱「十月革命」，但現行的新曆把這日子改到十一月了。蘇聯日曆中的最後紀念日，也同國外的基督教世界一樣，是聖誕節；且十二月二十六日也認為合法的紀念日，以循革命前的舊例。這些是合法的紀念日，在這時候一切機關都停止工作。此外還有許多別的日期，或為全社會的紀念日，或為幾個特殊集團的紀念日。一切這些特殊的日期，不能在此完全說出；祇是較一般的與重要的日期略為敘述，如國際青年日、勞動婦女節、收穫節、與紅軍紀念日。蘇維埃勞動法所定每星期的休息日之在全蘇聯採用者，都是星期日（譯者按：星期日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已廢除，現在採用所謂「不斷生產週」，每人工作五日，便可休息一日；各人的休息日可不相同，所以各生產機關可以每日不間斷地工作。）

在「共產黨人的月份牌」裏，這些合法的紀念日更特異地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革命的休假紀念日」，包括一月二十二日的流血紀念日，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紀念日，巴黎公社紀念日，國際的五一紀念日，與兩天「無產階級革命」的紀念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新年、聖誕節、復活節、聖靈降世節、降世星期一、耶穌顯聖節、與聖母升天節，則稱為「俗例的休假日」，且僅說出這幾天的日期，而避免沿用宗教的術語。再次是「週年紀念日」。這些日期都稱為「工人紀念日」。有「追悼日」，為紀念一月二十一日列寧逝世的日子。其他為紅軍紀念日、勞動婦女紀念日、林那鎗殺紀念日、工人報紙紀念日、蘇聯憲法紀念日；最後為國際青年日。一九〇五年一月的流血紀念日，認為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開端。紅軍紀念日是一九一八年採用徵兵制成立紅軍的日期。勞動婦女節是

一種國際的紀念日，早在一九一〇年爲促進婦女選舉權，在柯本海京（Copenhagen）所召集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婦女代表會議所決定。林那的鎗殺事件，發生於一九一一年林那礦區的罷工中，當時軍事機關的干涉，以致屠殺了幾十個罷工工人；在那時候，這件慘案曾引起國中的保守派與自由主義分子的抗議。工人報紙紀念日是一九一〇年真理報出版的日期；自此以後，「真理報」這個名稱，成爲布爾塞維克與後來共產黨各機關報的商標。國際青年日是在一九一五年爲第二國際的左翼分子所成立，以反對第二國際對世界大戰所取的態度。其他週年紀念日，則顧名思義，已可瞭然。

還有兩種較不同的紀念，表現於蘇聯紀念日與收穫節。蘇聯紀念日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五日正式採用蘇聯憲法的日期。這是夏季最重要的與唯一的政治的合法紀念日。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總部所出版的二百五十頁巨著中，對於這紀念日的意義，在含有許多口號的序言中寫出，其中第一個口號是：「蘇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紀念日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憲法紀念日。」憲法的定義是：「握到政權的階級之基本法律。」這本紀念蘇聯憲法的書，先說有史以來的一切憲法，都是「地主和資本家聯盟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法律」或是「文明」的資本主義對弱小與落後的人民之壓迫與奴役的法律」於是說起蘇聯的憲法是「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上的工人和農民聯盟的基本法律。」又解釋說：這憲法「得擴充其勢力，越過蘇聯的國境之外。蘇聯的憲法喚起德國的工人反對其本國的與其他各國的地主和資本家的鬭爭……並喚起中國的紡織工

人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鬭爭。」憲法在蘇聯境內建立「全體人民之親愛的聯邦」以代替「羈押人民的沙皇的俄羅斯，即警察與教士的俄羅斯。」在蘇維埃制度下的小民族的地位，與擴張蘇維埃制度超過其現在的國界；這些都是在這紀念日所討論的主要題目。因為學校不開會，所以紀念的中心點在城市是俱樂部，在鄉村是讀書室。各種研究社都被邀為壁報撰擬特殊的文章，而特別加重討論民族問題；並在這天召集一個大會，有關於蘇聯成立的意義之報告與討論。

收穫節是共產青年的理想，其紀念為一九二三年共產青年團所發起。在其原來的理想上，這紀念日是，至少一部分是，反宗教的性質；青年共產主義者組織他們的紀念會，以加重說明豐年的收成是從應用農業的科學方法得來，不是從宗教的節期祈禱上帝得來的。第一年紀念的性質，據其所稱是一種「鼓勵的宣傳運動。」曾有各種集會，會中有共產黨與蘇維埃領袖的祝辭，並有舉着旗幟與標語的遊行。那時候祇有共產青年團員參加，鄉村中其餘的人祇是站着旁觀。次年，黨與公民的團體以及個別的農民都來參加；並當這個新的紀念日作第三次紀念時，它已成爲全鄉村的大事了，且在性質上有更多的教育作用。組織了農業的各種展覽會；鄉蘇維埃、合作社以及農民互助社，都利用這機會來做報告，於上屆農業年度結束時報告其活動情形。

有一個作者提議說：收穫節是農業專家與其宣傳工作的「神聖紀念日」此時組織了農產品的展覽會。有些地方，這紀念又成爲一般政治宣傳的媒介。學校與鄉村讀書室，也以其各種研究組起來紀念，展覽他們在普

通教育與政治教育各方面的活動及其成績。收穫節之紀念，本是注重工作與成績，而非注重娛樂與奏凱，故其紀念方式之得此種發展，誠爲倡導此紀念日之共產青年團的領袖所歡迎。其目的是在藉更有系統的籌備與增加個別農民的展覽，以增此種鄉村紀念日的重要性。在紀念中之用展覽的形態，是要同時藉此表示集體耕種的方式，優於個人耕種的方式。合作社之要表示的，不僅在其工作的外表，而且要表示「他們在反對私人資本的關爭中已做些什麼。」

國際青年日是在九月初正當各學校秋季開學前舉行紀念。這紀念日前的一星期是國際兒童週，此時使兒童先鋒隊得以徵求新隊員，並使共產青年團的組織單位，得於夏季以後恢復其活動，蓋在夏季各研究社與其他活動都大加減縮。學校裏的及兒童先鋒與共產青年的俱樂部，此時重新開放。於是於國際青年日，這兩種共產主義的團體所屬的兒童與青年，都來遊行並召集紀念會。在莫斯科，這一天的遊行是一年中最大最盛大的遊行事件之一。據一般估計，在一九二六年的遊行中，參加的兒童與青年約有二十萬人。歷一整個的上午，遊行隊走進紅場，經過列寧墓，在此停步並作注意的肅立。兒童先鋒背誦其遊行列寧箴言的「誓辭。」而新加入的兒童先鋒則在此「宣誓。」這是加入儀式的一部分。著名的共產黨領袖與政府的首要代表，都站在墓頂的檢閱臺上面。這紀念日是兒童與青年之最重要的政治紀念日，並爲學校工作恢復的標記。兒童與青年，藉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領袖所準備的各種旗幟與口號，得回想他們在革命中的任務與職責，以及他們所必需的共產主義的訓練。

在關於蘇維埃學校裏的教學大綱與教學方法的討論中，將注意到革命紀念日的利用。將到臨的紀念日常供作下次研究計劃的題目，且對於較重要的紀念，須有兩星期至三星期的籌備時間。在初等學校第一年級的兒童教科書中，編入列寧幼年時期的故事與其求學的方法，使兒童們逐漸有了準備，以在列寧紀念日得有正確的態度。在學曆上第一個的革命紀念日，即是革命本身的週年紀念——十一月七日與八日。初等學校第一二兩年級及幼稚園的兒童，並不實際參加遊行，而祇於當日召開紀念會；當局決定：遊行過於費力，且參加羣衆大會，亦是要使兒童聽得不耐煩的。祇得由教員在學校裏籌備一個會議，而這種會議對於那樣年齡的兒童，至少是這一年中所遭到的生平奇遇了。此後，當進入第三年級的時候，兒童就直接參加校中的紀念，編入兒童先鋒隊裏面，並且參加較大的蘇聯紀念日所特有的羣衆遊行。

特別對於兒童，對宗教紀念日作反宣傳的目的，是革命紀念的對象之一。革命紀念日是滿足參加宗教紀念日，如復活節或聖誕日，或到教堂做禮拜等所發生的同樣情緒。它同時又是根據新的原則創造新的情緒。又藉教科書或籌備旗幟與口號，以點綴學校房屋或參加遊行，把紀念日與學校工作密切聯繫起來。以遊行或至少以羣衆集會來紀念特殊事件的較早觀念，現在一變而爲着重紀念日的籌備了。時常使兒童去聽長的歷史報告與唱其父母的歌。當局建議：須向兒童做簡短具體的結論，若有可能，當用敘述個人回憶的方法；並須令兒童準備演劇，這樣能加重說明某一特殊紀念日的政治內容。爲兒童用的紀念計劃表，預備得更加審慎。現在覺得在學校的生

活中，這些紀念的籌備及參加次數太多，而所費的時間過長，有些日期和事件，現在祇在平常上課時提起解釋一下，並因此，其紀念是很平淡而有節制的。

紀念日與宣傳運動，是建立學校與校外生活間之更密切關係的有效工具之一。兒童與其年紀較大的人同在一處紀念，並因此獲得這種公民活動方式的習慣。在鄉村社會裏，學校甚至可為組織紀念會的中心，並因此積極負起文化中心點的公民職務，幫助其周圍的社會了解某一特殊政治事件的意義。此外，一個革命的節期給學校以一種機會，可總結其已有的成績，並對其所服務的社會報告此種成績。這種積極的參加，幫助兒童了解新的社會秩序，並使他們覺得自己正在對社會主義的建設効勞。如此，「階級鬭爭的觀念，會得加強起來。」因為對兒童也是一樣的，時常解釋紀念為一種羣衆行動，以達到祇藉鬭爭纔能達到的目的。在一切蘇聯的遊行隊中所舉的旗幟上之口號，不僅解釋要建設的東西，他們且指出要毀壞的東西。所以，一面有「萬歲」的口號，而另一面則有「打倒」的口號，而且後者常常多些。

較大的革命節期之紀念的內容與方法，都特別為每種機關或團體詳加規定。專門的手冊與教本，均詳細解釋在俱樂部裏，怎樣舉行紀念；在讀書室裏怎樣舉行紀念；在兒童先鋒隊裏怎樣；在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的細胞裏怎樣；在高等、中等或初等教育機關裏怎樣；在兒童學園裏怎樣等等。這些許多的手冊中，有幾種為本章找材料時參考到並引述到的。為學校用的與為列寧紀念日紀念用的手冊，編得特別審慎，且按各階級與各種年齡分類

編成各種小冊。爲兒童用的圖表與掛圖以及專爲各紀念日用的歌曲，都由黨、青年團與教育出版部來供給。茲除了紀述此種出版物之繁多並對於其中的幾種作進一步的觀察外，若欲更作其他的敘述，殆不可能。例如，在蘇維埃各種紀念日的總題目之下，有非常多的「鼓勵的劇本。」以備工人、農民、兵士與兒童的戲劇研究社之用。

在一個較大的紀念日之前——有時在事前幾個星期——各種報紙即已開始準備紀念。在政府與黨的領導機關報中，合法的與正式採用的口號將予公佈，並有各種論文從政府與黨的當前任務之觀點上，討論這一紀念日。羣衆的報紙亦取同樣的路線。職工會的報紙將努力提高一般的職工會會員或每個特殊的職工會；對這紀念日的興趣及其參加。對於鄉村舉行紀念式，例如紀念收穫節，在當局所出版的報紙上，都訓勉鄉村學校教師與農業專家執行其應有的領導任務。在國際青年日的籌備中，凡較大的領導報紙，都盡量留出篇幅，以討論紀念的問題，幾與這紀念日的主要的積極參加者之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機關報相等。全蘇聯的報紙都動員起來，以負籌備紀念的任務。在紀念日到了的那一天，各報有許多篇幅，有時幾乎全分報紙，專載關於紀念的問題，有黨與政府的各領袖之論文發表。

革命紀念日的慶祝，是審查各種舊的口號與採用各種新的口號之時機。爲便於在旗幟上書寫與用作各種標題起見，口號必須簡短；爲易於奏效起見，口號必須簡明。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的準備中之有偉大的力量，其來源即在於「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或「和平、土地與麵包」一類口號。在革命開始的幾年中，口號都仍是簡短

與明確當時祇需要反對地主與資本家的少數「鬭爭」口號，而且這些口號差不多在一切時候都可應用。後來在經濟上以及在軍事與政治上發展起更複雜的而同時更普遍的任務，其口號因之更繁多與複雜，這些口號都從黨或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印發出來。職工會正式採用他們的口號。在各種旗幟的準備中，黨或青年團的細胞，或工人俱樂部或其他機關的各種研究社，亦有可能得本其個別的創造力撰擬幾個少數的口號。這些更簡單且時常是更有力的口號形式，必須按照正式印發的一般辭句。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是特別重要的事件，且其各種口號都以總結蘇維埃統治十年來的成績爲着眼點而撰擬的。共產黨的口號單，包含九十三種口號，其中有些口號是很長的且是複雜的句子。但是細心讀過這個差不多於紀念日數星期前即在各報登載的口號單的人，就會按其分門別類得到很完全的觀念，知道已經獲得的成績是那些，與仍在其黨員之前，須予以執行的任務是那些。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正式採用的口號，亦自成一一個很完備的政治綱領。蘇聯各種紀念日之有羣衆遊行的紀念性質，其本身便已增加口號的重要性，且其趨勢足以使口號成爲戰鬪的呼聲，而非僅原則的表示而已。在政治紀念會中口號的應用，最近又得新的發展。許多團體現在不用書着標語的旗幟，而做起用人擡的巨物，或小巧而活動的東西，顯示一個口號，由一小羣的人擡其下端遊行。其中有些東西做得很巧妙，其所描寫的口號，一見便知。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的國際勞工紀念日，蘇維埃的職工國際在蘇聯指導紀念會，印發十七個口號，每個口

號的第一個字都是「鬪爭」；爲這十七點作鬪爭，就成爲隸屬莫斯科所發動的這團體的各職工會活動的綱領。這些口號於紀念日三星期之前即已發出，以便遊行用的旗幟，各種報告，與各種戲劇之用於紀念會者得及早預備。其鬪爭首先是反對直接地或間接地延長工作時間；爭取國家保險；反對職工會組織之受法西斯蒂包辦；與爭取結社的完全自由等等；——「爭取」與「反對」二字是替換來用的。其最後的一個「爭取」就是「建立純一的與階級的國際，包括一切國家種族，與各大陸的職工會。」

共產黨人承認內心感觸表達於外，務求強烈而合法，這在較年長的人民中與在青年及兒童中都須一樣。革命紀念日的裝飾，都是細心地研究出來，而且頗費力的佈置起來。革命的紅色標記，常使街道、房屋、或大廳與舞臺，換得一副五光十色的景象。共產黨人大顯其佈置劇場的拿手好戲，而且他們毫不遲疑地應用演戲的要素，以使他們的紀念得有更大的感動價值。書着他們口號的旗幟與佩着他們標記的大旗，是在革命節期的紀念中之主要的象徵主義的表現。在共產黨人看來，革命的象徵主義，主要的似乎就是各種政治的與經濟的口號之狂歡似的表演，就是在公衆廣場上之羣衆劇景的組織，或就是目前的熱烈問題之在俱樂部或讀書室排作劇本的應用。凡羣衆可以了解的與各種報告與鼓動宣傳的精華，都使之具有化身，以形達意。當革命初期，有一派藝術家抱着一種觀點，認爲藝術應以貢獻革命紀念會的美麗，爲其唯一的目標；他們就專門在這方面的任務上努力，並獲得很大的成功。革命的歌曲，也是紀念會的象徵主義之一部分。兒童先鋒有其特殊的敬禮，前而已經描寫過了，而且

這些兒童還有他們的隊員徽章。但對於其他的人，齊在旗幟或揹起的巨物上之口號以及歌曲，是在遊行或集會中的表現形式。

對於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團員，革命的紀念日差不多是唯一的節期。結婚的儀式僅爲一個簡單的登記，祇需幾分鐘就可完結，且不舉行婚禮。一種蘇維埃式的洗禮亦已規定出來，小孩子是要交給工廠委員會的，在該委員會的正式決議案上，批准他是蘇維埃的公民。這類儀式的許多事例，已在蘇聯的報紙上發表，而且父母均須採用此種辦法。在幾次蘇維埃式的洗禮中，孩子的名字取爲「十月」或「列寧」。在另一方面，著名領袖的喪葬，有許多方面近似一種政治的紀念。在較不著名的同志之喪葬中，紅旗的應用與在埋葬時說話中，關於死者政治活動的申述，使喪葬更具日常慣事的性質。在報紙上登載訃聞的俄羅斯舊俗，仍繼續實行；但是具名的不是死者的家屬，而是黨的委員會或蘇維埃機關宣告喪失一個共同工作者。

在遊行中的列隊進行，是在紀念日的紀念中特別予以鼓勵的。由此，個人得切實參加紀念，且因羣衆都去參加，全社會都籠罩在這紀念日的精神中。遊行之所以成爲特別通行活動形式，也是因爲這種舉動在舊統治之下是實際上加以禁止的。在革命前得以組織的唯一遊行，是喪葬遊行，且因任何種類的遊行示威均遭禁止，有幾次這種喪葬隊遊行就被利用以達政治目的。一九一七年第一次的二月革命，開始了廣大羣衆的示威與遊行；在起初的幾個月中，示威遊行成爲每星期的事情，每個星期日都可看見某大羣的人，爲某一特殊目的作列隊的

遊行。共產黨人採用遊行爲一種政治行動的方法，並且後來作爲慶祝革命前線勝利的方法。這種行程使政治行動或慶祝的行爲，都具有羣衆運動的意義。蘇維埃制度的紀念日，較諸其他制度的紀念日，能使更擁擠的廣大羣衆參加共同的遊行，據所宣佈的數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革命十週年紀念時，出來到馬路參加遊行的，在莫斯科有一百萬人，在列寧格勒有八十萬人。

至於這些羣衆的遊行，是否出於自然參加，則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遊行者都是按團體與機關整隊出發的，且時常是在該機關或團體的共產黨、共產青年團、或兒童先鋒的領導之下的。據說，這些領導者同時留心注意個人是否有犯規的事情；凡在這種參加爲這些領導者小集團所組織的時候，若要去作越軌的行動，則顯然不能參加遊行，或很易令其退出隊伍。共產黨人否認採取任何強迫的方法，以令廣大的羣衆出去參加，而造成各大紀念日所常有的人山人海的遊行隊，並指這種羣衆的參加，是蘇維埃自覺的民主政權之發展的最好的明證。

雖都聽得見個別的與年老的知識分子，對於紀念會的數數，時常叫苦。黨與職工會的組織方法，是以中央的權力機關經常指導全體黨員與會員的，此種組織方法能使高居在上的小集團採取一種參加的政策，使此種參加實際上就等於一切成員必須實行的義務。這特別適用於共產青年團或兒童先鋒隊，參加的決定採取一種方法，使一切下級的單位沒有不來奉行的。據作者所看見的遊行，由其面容與精神上判斷之，覺羣衆出來遊行確是由於自願的；或無論如何，既然出來了，他們就盡量地享樂，確實的，遊行的時候常在夏季或早秋，且在這些日子

天氣溫和。遊行的意義就是停止工作，休假時候的精神又在面容與聲調上反映出來。俄國人時常歡喜合羣唱歌，而遊行則通常都伴以歌曲，且在長久停步的時候甚至作集團的跳舞。在莫斯科首都裏，大概軍隊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爲多，而且這些軍隊也時常參加紀念，因此又增加了一點歌聲。在此，吾人應注意到：革命已產生了自己的歌曲，其中有些歌曲的音調，是特別能激動人心的。

關於蘇聯的羣衆遊行與街道示威是否出於自動的問題，可舉一九二七年英蘇外交關係破裂時的羣衆抗議一事爲例證。當時在各省的市鎮以及莫斯科與列寧格勒都舉行示威運動，當得到蘇聯貿易團被侵掠與蘇聯大使在華沙被暗殺的消息時，這些示威運動差不多是同時舉行的。所以，這些運動並不是由報紙，由關於該問題的論文與標題，於事前數日或甚至數星期煽動起來的。但是，雖對此種示威運動不能準確地分析其如何組成與發展，吾人總不能不回到共產黨與其青年團及兒童先鋒隊之紀律與集權，以及共產黨人與其後備軍，在每一有組織的集團中所起的領導作用。共產黨人動作的發端，可藉黨的各級委員會之密切連接的體系，而能敏捷地與容易地得到。

實際上一切在莫斯科舉行的較盛大的紀念會，都以遊行到列寧墓爲其最高點。列寧墓同時是蘇聯主要的講臺，而且各種紀念時常都有著名的領袖站在這講臺上發出演說辭。寬廣的紅場四面八方都有揚聲器裝置起來，使這些演說辭能爲場中全體羣衆清晰地聽到，這些羣衆時常達數萬人之多。這些演說辭又用無線電播送到

其他各城市。現在有一種希望，要藉廣播無線電的發展，使在列寧墓發出的演說辭，能在蘇聯全境到處聽見。

著名領袖的革命的喪葬，具有一種革命紀念的性質。這死亡的同志之在革命行程上的功績，將為在墓前所發的演說辭的主題，所以殯儀式的舉行，是採取政治集會的形態。差不多每年之中，革命總要失去一兩個領袖，所以這種革命的喪葬，又增加了幾次蘇聯的紀念會。跟隨死者之後整隊遊行以示崇敬的俄羅斯舊俗，仍繼續奉行，而且一個著名領袖的喪葬，便成爲一種羣衆的遊行。死者載在未蓋的棺材車裏面，由其親密的同志去擡；因爲著名領袖的喪葬都在列寧墓舉行，在墓後克列姆林宮牆下有一個小花園，特別定出以作「著名領袖的公墓」，所以用這種方法行葬時，政府著名的人物——史太林、加列寧、李可夫、與直至不久前的托洛斯基和齊諾維夫——都可爲首都的民衆，於他們列隊遊行到紅場時親眼看見。

羣衆集會是革命的一種產物；它與遊行及街道示威一樣，是在舊統治之下被禁止，或祇能在嚴格的限制之下纔能舉行的。在革命初期的幾年中，羣衆的集會，幾成爲一種流行病；蘇維埃的擴大會時常舉行，且爲一般的集會示範。會有一切種類的與討論一切問題的集會；各領袖藉此得在廣大的羣衆面前提出口號與革命的綱領。但是此種集會後來漸漸不足爲奇了。同時羣衆集會的效用，也爲領袖們所懷疑了；正如列寧在其晚年的活動中所經常指出的：經濟改造的問題，不能藉羣衆大會來解決。但是，羣衆集會仍爲蘇維埃體制的特點，非此不足以完成一個紀念日的紀念。蘇維埃且舉行全體的「莊嚴」大會，並有演說與決議，以在紅軍紀念日慶祝紅軍，或在國際

青年日慶祝共產青年團各職工會的地方機關，將為職工運動的活動分子佈置一個大會。在俱樂部裏、學校裏、與鄉村讀書室裏，有演說與決議的大會將組織起來。在最近的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中，連續紀念了三天，使各機關與各團體得有充分時間在這紀念時期中舉行他們特殊的集會。

在這些大會中，所有的演說與決議的內容，都一般地依據為其紀念日所提出來的口號。到目前止的成績將予以檢閱，而此後幾年的各種計劃將舉其綱要。在蘇聯的報紙上所發表的，這些大會的報告，在局外人的讀者看來，總覺其單調，每次都是一個樣子，並除了所注重的事情略有不同外，年年都沒有多大變更；每年按其當時的環境，提出特殊的一方面令人注意。但是，這種一成不變的辦法，是有相當用處的，因為這樣能把領袖們所決定注重的事情普遍化；一個特別重要的口號，可因此有系統地提到一切的集團面前，並似乎覺得是很有趣的。

在學校、俱樂部、或讀書室裏，集會的性質可從正式的演說會變為含有娛樂成分的集會。例如，戲劇的表演，假審判會，或「政治遊戲」，都可用以代替正式的報告。表演各種革命口號的劇本廣為分佈，以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的劇社應用。若有一個團體要佈置一種假審判會，他們可於各種組織的「政治教育」部發行以促進此種活動形式的書籍中，找到自由選擇的材料。

現在無疑的有一種傾向，要避免這種以大會慶祝革命紀念日的方法。從共產黨的領袖方面已有各種建議，欲使各種紀念得到較深刻的內容。有人提議：以對十月革命的要點與其口號及歷史意義作更詳盡的分析，來

代替一般的口號與一般的演說。譬如，在高等的教育機關，不舉行一個單獨的羣衆大會，而舉行多次連貫的小團體集會，由各年級與各學院的學生集團，分開準備關於革命的各方面之細心研究的報告。據其解釋說，用這種方法，可使紀念有裨於了解目前各種政治的與社會的問題，這問題正在一年複雜一年。正如一個領袖所說的，在一九二八年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但在一九二〇年的主要問題則是：「我們能否戰勝佛郎格爾（Wrangel）」

宣傳運動徵求運動，亦可與革命紀念同在一處妥爲討論。因爲這些運動與革命紀念一樣，其目的是在以建設新社會的各種任務經常提示民衆。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革命的時期就是不斷的宣傳運動，而徵求運動則按預定的計劃大綱與在相隔很短的時間內時常舉行的。一時注重鬭爭的這一方面，一時又要注重鬭爭的另一方面了。這對於生活未免給予一些劇變的性質，但是這又能在羣衆面前時常提示新制度的各種目的，與建設新社會所應遵循的政策與其實施。

蘇聯的宣傳運動與徵求運動之某些一般的情形，在關於公民組織的討論中，已經說過一點。如會員的徵求運動是時常舉行的，凡革命的事件或一種新的發展，往往利用之以達某一特殊團體的目的。馬路上或挨戶的募捐，也是很常有的事。這種徵求會員或徵求捐款的運動，同時舉行集會；凡遇有一般性質的問題，例如援助他國的革命運動，差不多在一切機關裏都要舉行集會。一切報紙都要集中於這一問題；口號都要公佈出來，領袖亦要登

臺，並在重要的會場上說話。這些重要的集會，在報紙都要登載其消息。當一九二六年英國礦工大罷工時，曾有這一類的宣傳運動。一種宣傳運動的意義，時常就是對一個特殊的任務作長時間綿綿不絕的申說。約在三年以前，開始了「節省制度」；對這個問題的申說歷數月之久，在會場上與報紙上都大加討論。節省制度現在仍舊常常提起，且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這曾經是中心的問題。國內公債的行銷，亦藉一般的宣傳運動與徵求運動得以實現。對於一九二七年的「工業化借款」募債的宣傳運動是一件很有組織的運動。在每個企業裏，募債冊都交相傳遞，並在各處召集大會，解釋工業化計劃的重要，報紙上專闢一欄，詳載這宣傳運動的成效，今日見於這個工廠或機關，明日又見於那個工廠或機關。工人簽字認購公債的各種照片，都在報紙上披露出來。

幾年以前，會由共產青年團發起一種武裝的反宗教運動。這運動採取常用的示威、遊行、開大會、假審判、與演劇等形式。這運動深入學校裏，尤其是兒童的教養所裏。與聖誕樹相反的，有一種杉樹，裝飾以各種革命的標記與口號，並在這杉樹的周圍作報告與討論，或讀諷刺宗教儀式的譏弄詩，「把宗教的邪說揭穿。」但是，這次的宣傳運動是失敗的；這運動反足以增強宗教的信仰，這對於兒童及成年人都是一樣。有幾次發現到兒童表示對於宗教的事情發生更大的興趣，以示對於這種宣傳的反感。因此，組織這個運動的共產青年團團員，受令廢棄這種武裝的方法。廢棄這宣傳運動的方法，並不是即為廢止反宗教的宣傳。這是值得注意的，蘇維埃式的各種方法之特點——直接的武裝對付的方法——在對付宗教上已覺不妥。

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季與夏季，有許多少年男子成羣對婦女無禮取鬧的事情，令人注意其有發展成胡鬧主義或「流氓主義」的趨勢，我們所用的「流氓主義」一字（hooliganism）係根據俄人從英文政治字典上借用得來的，事實上或許沒有一般地增多無秩序的行爲或甚至強姦的行動。但是，政治的領袖們覺得開展一個反對「流氓主義」的宣傳運動較爲妥當，此種運動繼續到數月之久。在俱樂部裏與鄉村讀書室裏的辯論、集會、討論——一切都在報紙上大加披露——都把這個問題提到大眾面前，而成爲當時的熱烈的論點。「流氓主義」一字成爲人人口中常說的與一切出版物上常見的字。有幾次對於幾羣少年男子的審判，在大會場中舉行，聽衆非常擁擠，且在一切報紙上登載詳細的消息。幾個月以後，這問題漸漸冷淡下去，而且實際上人人都覺得再沒有人提起這問題了，或甚至曾在全國通行且爲各界人民的口頭語之「流氓主義」一字都聽不到了。但是在其宣傳運動的期間內，曾經一度集中大眾的意見於這一問題。

除了政治的紀念日與宣傳運動外，蘇維埃的體制又有多種設施，以引起民衆注意科學上與技術發展上的成績，以及注意經濟的發展。所以在蘇聯的日曆中還有各種宣傳週，如飛機週、航空化學週或合作運動週。在某一特殊题目的宣傳週中，就在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的羣衆活動中討論這一題目，並由研究這問題的研究社作報告。在這些宣傳週中，與其所宣傳的題目有關係的社團之社員，均將被邀參加工作。各種報紙登載論文與社評，以加重說明這題目。在學校裏，這題目須在課堂中或在俱樂部或學童與學生的研究社中，提出來研究。這可推想得

到的，這種辦法的到處一律，使其參加者與對此的描寫均覺同樣的單調。教員們都希望對於較幼的兒童，減少這些紀念會與宣傳運動的實行，因為這些兒童因常常有各種紀念日與宣傳週需要紀念，已明白表示乏味與甚至反抗的精神。事實上已看到，紀念會太多了反足以減弱兒童的印象。在二月與三月，有三次紀念日——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與紅軍紀念日。因此提議祇選擇一次，且一般地提議，四次或五次舉行得好的紀念會就夠兒童在一年的時間內分配了。

某些宗教的紀念日與禮拜日均循例為休息日。就在這些日子為工人與兒童組織參觀。藉這種方法，就可指導人民的興趣時常與宗教的事情脫離，並同時使在休息日能作有用的消遣。這些參觀的性質，已在別處討論過了；這些包括參觀從前地主貴族的別業、陳列館與藝術展覽室，以及在公園及鄰近郊外的簡單遊覽。在兒童中組織這些參觀，不應明白說這是代替到教堂做禮拜的，不然，兒童將不自覺地選擇教堂以反抗此種參觀。最饒興趣的參觀，則在夏季幾月中計劃之以消廢宗教的紀念日，一部分要吸引年齡較大的人與兒童一同參加。在這些休息日中，扶護社將在其所扶護的鄉村裏，舉行政治的集會，在禮拜日中，組織城市到鄉村與鄉村到城市的參觀。在較落後的鄉村社會裏，革命紀念日的紀念，時常僅限於共產黨人、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且因他們的設備較為簡陋，這些較活動的分子不能佈置一個使人印象深刻的遊行。在最近出版題名為「一個落後鄉村的素描」之一書中，一種詳細研究後的各方面結論都彙編起來，作者引述農民的訴苦說：他們得以在飲與演滑稽劇的舊

式半異教的宴會，現在由革命的紀念節來代替了。他歡喜舊式的紀念會，因為這些紀念會能使人「快樂」。現在呢，——他抗議說，——人人不得不把休息日消磨於用思想的事情，且當一人稍有空閒並欲開一點玩笑以取樂的時候，可是沒有這樣的機會了。說到革命的紀念，農民覺得這是無論如何沒有多大意義的，這不過是舉起紅旗在馬路上跑一下罷了。前面所述的收穫節之特殊的農村紀念會，就是迎合農民此種意向的一種組織。

收穫節紀念的性質也起了變化，這表示關於一切種類的紀念所發生的一般趨勢。領袖們建議說，那種一般的煽動方法，應輔以能吸引更廣大的羣衆參加實際工作，以實現其特殊任務的方法。這種新方法應用的奏效，可見於下列一例：當一九二七年國防宣傳週的紀念中，其一部分工作爲成立軍事科學研究社，組織來復鎗的實習，並組織自願的團體，參加紅軍的演操。

蘇聯的紀念日固是慶祝革命的勝利，但時常又要加重說明須有進一步的成績以鞏固這種勝利，同時對於此後仍須執行的任務，亦予以同樣的重視。這種事實已在上面敘述各種口號、演說辭與成爲革命紀念的一部分之戲劇的簡短描寫中舉出。但在此應該特別提起，以加重說明這一點。共產黨的領袖堅持着蘇聯紀念會的這一特點，並在他們關於紀念節的演說與論文中亦對此多作介紹。他們的目的，是要把他們的革命家的熱忱與負責領袖的唯實主義合爲一體，藉以創造一種不自信過甚的樂觀主義的精神，並創造一種沒有不應該的悲觀主義的鬭爭的嚴重性之實現，——這是摘錄他們自己的訓令之概要。

在教師職工會的權力機關，給各教員之關於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的另一訓令中寫道：「一切蘇維埃式的紀念會，應充滿無產者的與階級的內容。」這些指令繼續解釋說：「革命的感動力」可用以激起羣衆作新的努力與達到新的成績。又警告說：紀念切不可過於狂熱，因紀念日同時又是休息日。又介紹組織演劇以代替易使人厭倦的正式演說與報告。祇要革命的階級的內容不致消失，藝術形式的成分非但得加注意，而且大加鼓勵的。紀念必須同時具有教育的性質，因為這常是本會各章所討論或述及的政治教育工作之一部分。

第十二章 蘇聯的普通教育

蘇聯的教育制度，已爲世界各國對之作廣泛的討論，而這種討論並不是欲分析其組織的另一企圖。而且蘇維埃的教育方法，亦未予以詳盡的陳述；這些方法，若能予以分別研究，或較妥善。但是因爲蘇聯的教育機關有訓練公民的很特殊的任務——一方面爲着業已成立的新的國家式範造就公民，另一方面爲着共產黨在這蘇維埃式的國家中維持領導權——整個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方法所根據的一般原則，必須予以陳述。在蘇聯的教育機關中，正如一般人對於以建立社會的與經濟的新秩序爲目的之革命過程中所能期望的，可發見其對於公民科目以及學童與學生的公民活動之重視。在事實上固有一種重視，但其是否妥當常爲一般人所懷疑。最近共產主義的教育家自己覺得對此過分的重視，而且教學大綱與教學方法都因此有所更變。實驗尤爲蘇維埃的教育方法之特點，特別關於公民訓練的問題，供給建議的材料。

蘇聯的公衆教育，是結構上的分立制最廣爲採用的一個場所。蘇聯的每一個民族單位，都有其自己的教育人民委員會，且在每一單位之地方的教育費，佔總預算很大的一部分。烏克蘭人民教育委員會的政策，與俄羅斯單位的政策是有相當區別的，並在許多細則上以及關於一般的原則，對後者的政策都有影響。各地方的公衆教

育組，時常採取相當獨立的路線，以適應具體的學校問題。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公衆教育組與人民教育委員會間的討論及甚至爭論，對於蘇維埃的教育方法的創立很有用處，並利用之以研究其新的教育方法。

但是在公衆教育方面亦有很高度的集權制。各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之「互相聯絡的」非「統一的」各人民委員會，時常彼此商議，並使他們的活動互相聯絡。藉經過與教育有密切關係的共產黨、共產青年團、兒童先鋒隊、職工聯合會以及其他一切全蘇聯的組織之作用，教育政策的統一性可以獲得。一般的政策大部分是從莫斯科發號施令的，所以全蘇聯之一般的教育狀況，是大致相同的。莫斯科的人民委員會的影響，若非在立法的形式上，至少在事實上，是及到蘇聯全境的。結構上的分立制，並不能阻止顯著的集權主義確定其統一的政策與甚至各種方法。所以在本章的探討中，居領導地位的最大的俄羅斯單位之教育人民委員會，將視為吾人所探討的基礎。

革命的各時期，都在教育的政策與教育工作的具體條件上，明顯地反映出來。爲本章便於研究起見，分成兩個主要的時期，即一九二一年以前的最初三年爲一時期，與自此以後的幾年爲另一時期。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也引起教育政策發生變化。於一九二七年開始發見的新趨勢，可爲第三個特別時期的肇始，這時期的特點，是成爲工業化政策之一部分的職業訓練，予以更大的注重。自一九二一年以後的教育政策，具體地表現於一九二三年最後完成的新法典，表示對於公民訓練一項，予以更大的注意。所以革命初期的教育政策，將主要地擇其

與這第二時期的政策有關係者，加以探討。現在的各種趨勢，凡已具相當形式可供討論者，亦將在其與新經濟政策開始的幾年中所定的政策之關係上，加以探討。

蘇維埃體制中的教育人民委員會，所包括的範圍甚為廣大；它不僅包括各教育機關，而且包括入學前的與「校外」的教育。教育人民委員會在其發展與組織特殊政治訓練機關——蘇維埃黨校——的工作中，與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團有密切的合作。此外，教育人民委員會將管轄陳列館與藝術展覽所，以及歷史上的紀念品與建築物。歌劇所與戲園也在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管轄之下。最後，在審查上的行政權與在出版界的積極的直接參加，都給教育人民委員會以進一步指導與控制教育的與文化的工作及其活動之可能。

這又應該注意的，一切教育的機關都是國家的或黨的機關；國家或黨在教育上的獨霸的原則，厲行得尤其深思熟慮。直至最近為止，私人創立教育機關是不允許的，而現在對這規則稍有例外，亦不過是無關重要的與臨時性質的。一處地方的人民，可以由其自己的經濟建立一個小學校，但這必須得政府的特許，並須受其節制；這種學校稱為「立約」的學校，並按其契約的條件，須在一定的年限之後，移交國家的機關管轄。在一九二七年採用了一種法律，規定在機械的藝術上之純粹的技術訓練可以由私人來組織。當一九二一年在軍事與政治的戰線得到勝利時，稱教育為革命的「第二道戰線」。用這個術語的意義，將在本章的討論中完全闡明。但當在經濟上的國家壟斷已有通融辦法時，教育上的國家壟斷的原則，反更予以嚴格的厲行，這無非是要在這一戰線上也得

到勝利。自從革命最初的幾個月起，教堂不僅與國家分離，而且與教育也分離出來，這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

在蘇維埃體制下的政府的教育部之廣泛的活動範圍與職務，使教育機關的分類難以正確。入學前在幼稚園與撫養院裏的工作，也必須在教育兒童的一般問題上作連帶的討論。在一切種類的機關與場所設立以教讀與寫的「消滅文盲處」，是適應暫時局面的一種重要的教育活動。鄉村讀書室是一般政治生活的中心，已如上述；可是它們是在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之政治教育組的管轄之下，而後者則毫不遲疑地自稱是國家宣傳共產主義原則的工具。工人學校、工廠學校、農民青年的學校，都同時是普通的與基本的教育體系之特殊的機關與其構成的部分。統一的「勞動學校」有其各年級與年級裏分「組」的編制，這是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社會教育組」管轄之下的正式的教育體系的基礎。高等技術的與普通的教育機關，是在另一組的管轄之下，這就是「職業教育組」該組同時指導工廠學校、農民青年的學校，以及工人學校（原文 *Workmen's Factories* 想係 *Workmen's Faculties* 之誤——譯者註）。研究院則與教育及訓練的機關分離。還有政治訓練的特種學校，其工作由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組與共產黨相當的部或組共同指導。最後，特殊的夜校與函授社，由許多基本的教育機關組織起來。兒童學園與居留處，也必須包括於蘇維埃的教育體系中。

一般地說來，必須注意還有幾種的教育機關，在原則上是具臨時性質的，雖其因以成立的條件還大概要延長到相當時間。例如，工人學校就是其中之一，這種學校是幫助在革命前俄羅斯的條件之下失學的工人與農民

階級，獲得一種補習的教育。農民青年的學校與工廠學校，都可預料將在蘇維埃的教育制度按其綱領完全實現時無形消滅。在紅軍中開辦的普通教育班，是彌補現在普通教育體系中的農民罅隙之暫時權宜的辦法。至於識字運動的中心，則更明顯地是填塞罅隙的。鄉村讀書室也可預料於將來成爲公民生活之一般的中心，而非如現在這樣是特殊政治教育的中心。在另一方面，在孤兒撫養所裏面，有某些特點是視爲「勞動學校」之低年級的理想教育。蘇維埃教育體系範圍的廣泛，教育機關種類的繁多，以及特種的與臨時的學校，據政府與黨的教育領袖所能解釋的，是一般地從革命的原則與目的所產生出來的。

據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的教育領袖說來，蘇維埃的教育政策及其機關均有某些特點。在學童與學生的招收與組織中，階級的原則均嚴格地執行。教育機關必須與生產機關發生密切聯繫；教育上的實習方法（*laboratory method*）則盡可能地廣爲應用；學童與學生都在校內給以廣大範圍的自治。在一切教育機關的課程表裏，都規定必需的社會科學研究之至低限度；學童與學生之一種必要的公民活動，用以補充其對當代的社會與政治生活的研究。所以蘇維埃的學校是一種「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機關，而且坦白地引到政治方面去。再則，地方語言的應用與地方區域的研究，都重視之爲蘇維埃教育制度的特點。至若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共產主義的兒童先鋒之在蘇維埃學校裏所起的重要作用，則已於討論這些黨的組織中予以論述過了。因爲希望各種新的觀念與方法能在各蘇維埃學校裏實施，所以又特別注意重新訓練老教員與訓練一批更多的新人才。

因此，這些蘇維埃教育政策式方法的特點，將一一在本章舉出，討論其一般的原則及其在各種學校或教育機關的應用。至於「政治常識」的學校，則因其在此種討論中有特別的興趣，將在另一章中再予討論，因為成爲訓練紅軍兵士之一部分工作的特殊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將在另一章中討論。

革命爲工人與農民開辦了各種學校與教育上的輔助機關，這是對蘇維埃的教育制度的一切討論與引述中屢次遇見的尋常話語；據說，在舊統治之下，教育是有意限於有產者或資產階級的，這種可用以對內與對外宣傳的說法，是有相當真理的。從前在城市與鄉村的初等學校所能招收的學童數目，不過當學齡兒童總數之一半。農民與工人的兒童之入升中等學校已屬勉強；而且除學費之外，還有繁瑣的入學手續，尤其是對於農民的子弟。至於高等教育機關，則工人與農民更難插足。舊政府的政策並非要在羣衆間促進普通教育。這就是政府與民衆間的衝突點之一。但是，民衆藉選立的地方省議會、市政議會，並藉國會（Duma），得漸漸起而逼迫政府。正在世界大戰之前，國會通過了一種法律，按這法律要在十年以內，採取強迫的初等教育。彼時中等學校的數目也正在增加，而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團體也日漸德模克拉西化。但是，彼時還有許多特殊的教育機關，專爲從前貴族的特權階級而設；而且中等學校的學童與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主要的都是來自有產的與官吏的階級，或來自非工人與農民的知識分子。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臨時政府，提出了按照民主的路線改良「新俄羅斯」的學校問題；但是這些計劃

因十月革命的繼起而遭夭折，而十月革命又產生出另外一批領袖與另外一批教育計劃。新的政治秩序之基礎為階級的原則，這原則同時應用到教育方面；但是更特異的，則為把教育向大眾公開。整個的教育體系改組為單純的統一的勞動學校，其低年級的設備，要來容納全國的兒童。在這種統一的學校裏，一切人為的班級間的隔膜統統廢除。為革新學校的性質起見，一切入學的條件，除了年齡的條件以外，均加廢棄。所以，工人與農民均得進入高等的與中等的教育機關求學。各級學校的數目，大大地增加起來，而工人與農民的子弟入學的百分比亦因以增加。

「工人學校」就是在這第一時期創始的，其目的為準備工人和農民進入高等教育機關，這些學校是為高等學校作專注的預備。至於這些特殊學校的教學大綱與方法，將與這時期的「統一的勞動學校」的教學大綱與方法歸入另一項目來討論。在此祇欲探討其對於各類或各階級的學生所施的政策。革命已特別為工人們及其子弟開辦各種學校一語，可在工人學校中得到具體的明證。在這軍事的或完整的共產主義時期，不僅不收學費，而且國家對兒童供給午餐，並對年齡較長的學童與學生作物質上的幫助。這第一時期之有加無已的經濟困難，使這計劃不能完全實現；但是教育工作的物質方面，縱在這個經濟恐慌的時期，也有很多的幫助，而對於城市的兒童則尤甚；此點是必須說明的。甚至在冬季，學校的爐子是時常無火的，但較其他機關或私人住家，則爐子生火的次數卻是多了。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支出的緊縮特別影響到教育，且在一九二二年學校與學童的數目，降到戰前的數目以下。一種預算的制度，重予採用；於是對於教育的用費定有專款，並因鑒於恢復國內的生產過程最爲迫切，在最初時較爲貧乏。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初等學校的學童人數尙未恢復到戰前的數目。高等教育機關度過這次危機較爲得法，至少在數目方面；事實上在這裏採取的政策，是減少學生人數到實際可行的便利與適宜的數目。至於中等學校，學童的人數則以適合初等學校的升學名額爲限。在採用這種政策限制入學人數，以適合於實際上能起教育作用的設備時，階級的原則就更確定地成爲決定入學條件的基礎。無產階級的兒童，仍在高等學校的學生中佔了很大的百分比，並在中等學校的學童中也佔了頗多的百分數，這是可以見到的事實。因在新經濟政策下發展了新的資產階級，所以保障學校不致被這一階級侵入，以維護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認爲必要。

這種新政策發展的詳情，不能在此一一舉出；這種發展的最後表現，是在一九二五年。在鄉村社會裏的初等學校，貧農的兒童有入學的優先權，並免學費。中農的兒童也不繳學費。在另一方面，鄉村的富農必須爲其子弟付出學費，但是富農的兒童仍許入學。在事實上，中農與富農的子弟時常都能進入初等學校，其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乎鄉村的貧農分子過於貧困而且文化亦過於落後，以致所有限制的辦法不生效力。同時這也可以看到，鄉村初等學校的學童一向都是農民，所以在這裏不覺有顯然的變化。在城市的初等學校裏，這新政策就有真正的意義。工人的子弟享有入學的優先權，因爲學校的數目還不能滿足這個要求，所以這種優先權可說是最大的特權。其

次受優待的是蘇維埃的雇員與勞動的知識分子；但對技術專門家的子弟則收少量的學費。新興資產階級的子弟，祇當學校有空額時纔許其入學，且其父母必須繳付學費。

在中等的普通學校裏，階級的原則甚至更厲行得嚴格些，因為此等學校的學額有限。「工廠學校」祇限於學徒，這些學徒的本身已是工人。「農民青年的學校」是以教育貧農與中農分子的青年為其主要目的。大概被剝奪選舉權的富農子女，不許進入此等學校。普通的技術高級中學，是以訓練有技能的熟練工人為目的，其所招收的學生，主要的是工人的子弟。「工人學校」本其特有的性質是絕對由工人與農民組成的。同時「蘇維埃黨校」是要取得工業工人或農業工人的「生產資格」的候補者所必修的。

在高等教育機關裏，要使工農佔得優勢比較困難。在此等教育機關裏，舊資產階級的，新資產階級的，與尤其是蘇維埃國家僱傭的勞動知識分子的子弟，比較出自工農家庭的子弟，佔着較大的比數。所以，學生的名額，除留出一部分給「工人學校」的畢業生升學外，還再留一部分給地方蘇維埃、黨與職工會的團體去分配。這第二部分的學生是由這些團體自行選派與推舉出來，得免入學試驗，蓋以這些地方機關自應選出其合格的人員。藉這種地方自行選派的方法，想望這些高等教育機關之有限的學額，能得最合格的與最有準備的工人與農民來填充。但是，這種選派的方法，並不能證明完全成功。所選派出來的學生往往是學科的準備不充分，不合在高等教育機關工作的程度。所以，決定了重新建立入學試驗的制度；並於一九二六年採用這種新辦法，而對於「工人學校」

則有例外，工人學校的畢業生仍留得直接升學的相當名額。高等教育機關的大多數名額，是根據試驗的成績，對一切投考者完全公開的，但尚有某些行政上的慣例，實行附帶的階級選擇，其作用好像「濾清器」，使從階級的觀點上較稱心的分子，更容易濾過來。」——這是引述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教育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報告。自重新探取入學試驗以後，國家對學生的幫助也更有系統地組織起來；並藉中央或地方的蘇維埃、黨與職工會團體對於宿舍與各種許可物的分配，工農出身的學生仍受優待。但是試驗的必需手續，有阻止不願能力而任意使用這種特權的趨勢。

等到蘇維埃學校制度的發展，能達到實施對十八歲以下的兒童之強迫的普及教育時，一切這些限制之施行於今日者將統統廢除。希望到一九三四能實現這計劃的第一部分，相信到這時候所有的設備，能使對於八歲至十二歲的初等教育的強迫制有採用的可能，但是第二步計劃的實現，迄未定出日期。同時認為工農的政府應給工人與農民的子弟及自願享用現存的教育設備的工農以優先權。優待工人的限制辦法，亦有另一動機在：他們與他們的子弟常能引入無產階級的態度於一切教育機關裏。莫斯科有一個實驗初等學校，校址在都市中以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佔多數的一區，這學校招收一羣附近兒童學園的無產階級兒童。兒童學園是蘇維埃的理想之最十足的表现；這些機關裏的兒童大部分是出自工人或農民的家庭，或是未受家庭的階級影響的孤兒。自治是一切蘇維埃學校從最低級以至最高級的內部組織的基本原則之一。在革命前的學校裏，一種嚴格

的紀律，由政府通令各教師厲行。甚至在中等與高等學校裏的學童與學生之組織均被禁止，主要的是恐怕有革命的或政治的活動。所以自其過去的背景觀之，縱屬最微小的自治辦法，或許也有很大的意義。最初表現的，就是學校裏的德模克拉西化達到悖謬之點。自二月革命以後，不久即發現學童與學生開始作肆無忌憚的行爲；十月革命更使這種傾向成爲一種政策，爲羣衆參加革命的一部分政策。同時，學童與學生是在教育上引用新觀念與新方法的媒介，這特別是在一般的教師對新的蘇維埃政府與其多種的教育計劃表示明顯的敵視態度之後。

自治的原則在革命開始的幾年中廣爲應用，並對這第一時期中蘇維埃學校裏真正的教育工作的荒廢，應負一部分的責任。這種原則時常證明不是啓發責任心的方法，而是德模克拉西化的淵源。當一九二三年關於教育方面的各種新政策定出，與主要的教師至少在形式上，都傾向於新方法與新的教學大綱時，自治的原則纔有更合理的表現。共產黨人將否認自治的制度有何重大的縮少；他們將堅稱這不過是給以正確的指導罷了。無論如何，這原則於此時纔得更完善的基礎，且具顯著的建設性質，給學童與年齡較長的學生以有用的公民基本訓練。一般的印象是在實際的執行上，年齡較長的學生與較幼的學童之參加學校的實際組織有進一步縮少的狀態。誰都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此冷酷的事實壓迫之下，不得不放棄一種理論；兒童與甚至年齡較長的學生均不能有效地執行最初放在他們肩上的責任。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共產黨人堅稱學童與學生的自治必須在事實上認真實行，而不是僅爲教員維持紀律

之自己服務或代辦的一種形式。現在這種自治制富有彈性，以適應各種年齡的條件與能力；而在過去則已成爲呆板化了。由於此種彈性，自治得在每一集團中更有生氣；共產主義的教育家常加重說明：自治切不可任其「在自己的肉汁中緩煮以致發酸。」所需要發展的自治式範，是要能合於使學校成爲一種「社會的機構之目的，並使學校不僅是兒童或學生讀書的，或甚至作謀生活的訓練與準備的簡單地方。」在共產主義者看來，「集合體」的意義，不是一個簡單的「總和」，而是一個「完整體」——這是一個作者的術語。要成爲一個集體，若祇是一羣人在一定的時間出現於同一的地方是不夠的；要成爲一個「集體」這一羣人必須有共同利益與共同目標的覺悟。集體在學校的意義應該是：這已成爲兒童生活的地方，甚至是兒童生活的中心。相信自治制度將使之如此。再則，學校必須是整個社會的構成部分，並且兒童藉其參加學校的組織，得與他們的教師與父母共同過目前的生活。

一般的生活條件與一個革命時期的生活條件，無疑地能使兒童與青年得在學校裏更好地準備其責任。農民的兒童從幼年起即已參加其在俄國鄉村的生活條件下的家庭工作與家庭的煩惱。同樣的，或在稍爲減輕的程度，在一個工人家庭的兒童，不得不參加其在目前人煙稠密的條件下之家庭生活的組織。這革命時期的兒童則更完全地經過了其全家庭的生活狀況，而且這是一種充滿組織與合作的問題的以及時常辯論的生活。這一切無疑地幫助兒童了解與參加學校的自治。

在鄉村的初等小學中，正在開始引用自治的辦法，各班人數的衆多與幾個班級祇由一個教員來上課的辦法，使此原則實際上沒有很廣泛應用的可能。但在城市裏，在初等小學裏的自治程度大有可觀。在這一方面，蘇維埃的學校一定能比得過舊俄的學校。在作者於一九二六年所參觀到的一個實驗學校裏，實行了一種規模極大的自治制，每個兒童都有一種任務，與學校的工作發生關係。每四十兒童的一班中，分成幾個細胞，每細胞以五人組成之。在每一細胞中，每個兒童又各有一種任務——一個是組長，另一個是副組長，第三個是衛生檢查員，第四個是事務員，第五個是政治活動的領導者。這第五個普通是兒童先鋒。這些人都在校中的「學童委員會」之相當的各部互相聯絡。學童委員會有主席團，兒童先鋒在此佔重要的位置，視如事實上的權利。這主席團，則又派代表到學校蘇維埃，學童在此作報告，並與教員及父母一道參加討論。這是值得懷疑的，這種完備的與成效卓著的學童組織是否能普遍行於莫斯科的各校，甚至於較好的各校中，據所看見的這種自治制度成效卓著的學校之指導員所申說的話，這學校是一種實驗的學校，且通常物質上的設備完善與師資的人才良好。

孤兒學園是兒童生活的中心，在這裏的學童自治，較諸在尋常初等小學裏的，更發展得完全些。組織的一般原則是同樣的，班中有小組或細胞，各派代表到「學童委員會」的各部裏；並由學童委員會再派代表到學園蘇維埃，以代表學童而與教師及學園的其他辦事人員並列。在一個這種學園裏，有一張詳列學童的各部或各委員會的表單，表示這些委員會的數目已有減少。在回答問題中解釋說：學童責任的負擔已覺太重了。一般地說來，我

們的印象是：自治的制度固能使蘇維埃的學校成爲一種積極的學校，但同時這種制度要使兒童的體力與腦力耗費過甚，尤其是在低年級。

在中等學校裏，據稱自治的制度實施得最有成績。這裏年齡較長的兒童與青年，表示對於直接參加其校中各項活動的組織有濃厚的興趣。在此，關於研究的題目之各項問題，都在相當更廣的範圍內與學生共同討論與共同擬定，但時常以每班所定的教學大綱爲限。共產青年團的團員與兒童先鋒，均希望其能在各委員會與各節中特別積極。「工人學校」也是屬於中等學校的範疇，此種學校還可享得更大的自治，因爲這裏的學童比較年齡大些，且往往都是已「在生產中」的。

在高等的技術學校，與在大學及研究院中，自治的原則且更廣爲應用。例如，宿舍是分配給學生，並由學生自己管理的。紀律的問題，很大的部分是留給學生委員會去解決的。研究大綱的細則是由學生有代表參加的一個團體去擬定的。在這些教育機關裏的學生，有許多人已加入其所預備的生產部門之職工會。許多人是共產青年團團員，而且共產黨黨員的數目也頗多。這些學生經其職工會的組織與共產青年團及黨的細胞，對於校裏的事務負有特別的責任，且在學生中握有特殊的領導權。若與其他各國的大學與高等技術學校裏的學生會與其他團體相較，則蘇聯的學生委員會比較活動與有權威得多。有一種雜誌，叫做「無產階級的學生」，是由職工會機關得學生的編輯員與通訊員之助而出版的，它是討論，並在相當程度上指導學生的自治活動。

自治的制度縱或限於至低限度，亦證明其對於兒童與青年的積極性與活動能力的發展是有用的。若遇學校有完善的設備，則這制度便可成爲蘇維埃的教育制度之值得注意的特點。在此事例中，這不僅增進兒童的活動能力，且甚至於教誨較幼的兒童，以使其成爲共產主義的訓練所欲造就的組織者與集體主義者。但亦可遇到各種個別的事例，覺得兒童的積極性不是啓發新社會的建設者，而是啓發此種煽動家而已。而教師則既受各班人數過多之苦，且又多每人必兼數班功課，以致不能實行其所必需的指導，於是自治便成爲純粹的幻想，並祇是幫助教師以厲行紀律而已，不然，則如革命初期的那樣放肆，使有效的學習絕無可能，並完全喪失其教育的價值。

往往吸收全體學童與學生參加自治活動的目的不能實際達到。時常自治在事實上祇限於一小部分活動的學生，此等學生或因此從純粹的求學的觀點上是最困苦的學生。於是選舉的位置多少是被一小集團的人永久保持着，這小集團真正地成爲一種官僚的團體，而發展官僚所特有的自負與高傲的癖性。這些事例是代表此種制度之失敗的另一例子。在學校或大學裏的自治之共產黨、共產青年團或兒童先鋒的領導權，時常要對這種發展負責。

當共產黨人討論到他們的教育方法時，他們時常反覆地說：「學校必須與實際生活發生最密切的聯繫」對於法庭、工廠或市場作時常的參觀，是求學工作的一部分，甚至在最低的小學班級裏亦是如此，對於各種革命紀念日的慶祝之參加，甚至較小的兒童亦望其能夠實行，雖在最近最低的兩個年級之從八歲到十歲的兒童得

免參加街上的遊行，而僅在校舍內舉行紀念會。兒童時常被指派去參加工人俱樂部或委員會的常會。年齡較長的兒童，可在附近的工廠、作坊或國家農場，以幫助推廣識字運動或設立看護所的方式，實際參加工作。至於高等技術學校與普通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則以幫助組織讀書室與俱樂部為建立此種聯繫的一種方法。鄉村的學校甚至能按此同樣的工作路線更容易地參加農村的生活。以此等方法期望學校能成為社會生活中之有用的與積極的要素。兒童先鋒與共產青年團員，有使整個學校或大學插足於其附近各地的日常生活之內的特殊任務。一般人相信兒童是免不了要與生活接觸的，且如果不採取積極的方法以建立這些聯繫，則其所接觸的必定是壞的方面，並具無組織的狀態。俱樂部與各種研究社是設在校內的，但是不在學校的正課以內，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運動，是組織這些聯繫的主要媒介。

蘇維埃教育制度的軸心，就是統一的勞動學校，並因此共產主義教育的基礎首先是勞動，勞動二字在蘇聯憲法上的意義，不祇是簡單的人工勞動，而是「一切生產的與社會有用的努力，治理家務亦包括在勞動的函義內。」以勞動為基礎，可信兒童長大起來對於現在將有一種特殊的認識與了解。勞動又可使兒童從其幼年時期起即能引入於人生之社會有用的勞動活動中。所以對於勞動的重視，不僅在研究勞動的過程與其組織的方法，而且要在每人的體力與心力依年齡大小而能做到的範圍內實際參加工作。這種參加必須是自覺的，且須有社會上的認識，並必定要能引起內心的推動力與熱情，此等推動力與熱情，能把校內對於種種美麗的事物之無情

感的研究，一變而為走上生活道路的方法的與各種自信心和想像力的鍛鍊——這是他們所解釋的。同時，其從事的方法又必須是充滿毅力、熱忱與革命的熱烈情感。

由共產黨人與各職工會的正式代表所組成的教育人民委員會之「國家科學參事會」於一九二三年最後決定的關於勞動學校低年級的確定的教學大綱，就是要實現上述關於學校的一般概念。這機關又統制一切用以實施這些大綱的教科書，並終於一九二七年重新編輯初等教育的教科書。這些大綱在理論上是要一切學校必須執行的，但可預料物質上的條件，將使此種新計劃不能完全應用，尤其是在鄉村區域。這些計劃顯然是實驗性質的；並邀各方人士對此種大綱之應用的可能性，作極廣泛的討論，且使此種討論繼續到數年之久。這已顯然的了，這種討論的結果，將使這些大綱有所修改，其中某些特點會即刻予以重大的更改。但是這些大綱亦必發生重要的影響，且其各種基本的原則，將繼續為共產黨在教育方面的政策之基礎。

「實事分類」教學法 (the complex method)，或設計教學法，是這些大綱的基礎；勞動學校的低年級，已廢除按科目分配的教學大綱。在革命前的初等學校裏，所採用的科目是於宗教的科目之後，按次序繼以通常的讀、寫、算的練習。直至一九二三年，這舊的教學大綱仍採用於大多數的學校中，祇把其首要的科目——宗教——廢除。現在課程的基礎，則是題目與問題。這些題目是由學童與教師於某一興趣點的範圍以內選擇出來的，這就是「實事分類」(complex)對於「實事分類」的一個簡短的定義是：「從現實採取出來的許多事實，並以一

個確定的概念或題目爲中心，加以分類。」在蘇維埃的教授法上，實事分類必不可僅是興趣的中心，這必須是日常生活中活動的中心。讀、寫、與算的練習，則是實行這個設計的過程中所必需的。

勞動學校之正式的教學大綱，把學習的科目分成三大類。在刊印出來的教學大綱提要中，有三組平衡列出：第一組的名稱是「自然」，第二組是「勞動」，第三組是「社會」。第一年的學童研究一年的四季、家庭的日常工作，與家庭和學校的關係。在第二年級，則自然的研究，包括空氣、水、太陽、星球、與家畜；兒童所住居的鄉村或城市方面的日常工作亦提出研究；而且城市與鄉村的行政制度，亦爲兒童們所研究。至第三年級，「勞動」與「社會」二組，涉及經濟活動、行政制度，與本城市或本鄉村所在地的區域史。在第四年，即勞動學校初級的最後一年，蘇聯和其他各國的國民經濟，以及蘇聯的政府組織與其他各國的政府組織之比較，及人類過去生活的狀況，都是「勞動」與「社會」兩組的內容，並以在「自然」一組下關於地理與人體生理的研究爲基礎。

此後三年的教學大綱，條目更爲詳細，但其所根據的一般方針仍屬相同。爲勞動學校第六年級，即爲十四歲的學童用的第三組關於「社會」的題目中，其教學大綱定出如下的學習題綱要：

工人與資本家。工資勞動與資本。私有財產與勞動。工人階級的狀況。地主與資本家的聯盟。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的共和獨裁制。資本主義。競爭。生產的混亂現象。勞動與資本間的鬭爭。英國的憲章運動。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者宣言表示工人階級的意志。工人的國際協會。第一國際。工人奪取政權的企圖。巴黎公社。第二國際。藉

罷工來鬭爭。職工會。各種政黨。俄國的資本主義。封建的殘餘。君主政體。在一九〇五年與在一九一七年的鬭爭。這關於一個特殊年級適用的正式教學大綱的提要，足以表示這班學童按其計劃所學到的是那一種材料。相信這種方法能藉有系統的觀察、搜集事實、利用書本、陳列館等等，以養成與發展自動工作的、勞動的、科學研究的習慣。這種教育方法的目的，特別是在發展兒童在政治與行政團體裏工作的習慣，而此等習慣又藉參加上述的各種大會與藉個人的與集體的執行某些社會任務，而得進一步的增進。各種研究社、團體、合作社、俱樂部、參觀的組織，與在各種紀念會及在壁報的出版上的參加，都是補充在這些教學大綱下的工作之學校的活動。

關於設計教學法的實際工作的例子，在此不能詳細舉出討論。有一次看到一羣學童作鄉村的調查；其結果以文字的形式寫出，並廣收每個兒童所供給的材料，這報告讀起來極饒興趣，且同時具有很實際的價值。我們應注意：例如在研究「你的家」一類的題目中，唯物主義的觀點是很重視的。一個教師報告道：「母牛」這題目引起許多業戶更注意母牛的養畜，因此便可得到社會有用的工作。對於這種教學法之最嚴重的批評，是說這方法不能給兒童以讀、寫、和算的真實訓練。這些訓練原是希望其能為研究這題目的一部分工作。因為這些訓練被置於次要的地位，所以就時常加以忽視。革除根據這些訓練的舊的教學大綱之訓令，太被許多教師執行得呆板了。設備的不足；各班人數的過多；初級小學之四年課程，在鄉村學校中因到課的不經常，實際的學習時間不過兩年的縮減；與最後教師因這新的教育方法所受負擔過重，均使此種教學法不能在實際的事實上完全應用。當

一九二六年各高等教育機關重新採用入學試驗時，很多的投考者於俄文及數學兩科之不及格，明顯地表示這新的教學大綱至少在其所實施的環境中是有弱點的。最後，祇須注意一個最普通的事實：許多教師雖或對此新的教學法是極表同情的，但不能在事實上來應用。因為教師要一人兼管幾班的功課，並有時每天要上八小時課，所以他就沒有能力來指導按題目的研究。

凡遇新的教學大綱與新的教學法能多少美滿實行的地方，其學童似能非常自立並甚至是積極自動的。他走進教室裏，並不使其學習的工作中斷，而且當被問到的時候，兒童們都很熱烈地談論與解釋他們的工作。他們對於目前政治問題饒有興趣，以這樣年齡的兒童能有如此表現，使作者覺得這幾乎是反常的事情。兒童在街上與在革命紀念日的慶祝會中，表顯上述的一種積極性，誠與革命前在俄國所看到的情形大不相同。但亦有一個劣點，即在他們的面容上與在他們的問題和評語中表示過於嚴重。一種溫和形式的「流氓主義」亦常在兒童與青年中發現。

適用於正式的教學大綱的各種教科書的編輯，是受對此教學大綱負責的機關之統制，或至少受其指導。在最近幾年來對於各種教科書的供給大加擴充，前此教科書供給的不足，實是一種錯誤。藉這些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原則與適合於蘇維埃政策的教科書之助，教師們能給學童以適當的指示。這些教科書的編者通常是共產黨黨員，而且為這些蘇維埃小學生讀的選文，都要以給予共產主義的訓練為主。幾乎在兒童讀本之最初的幾頁，即

以列寧的生活與工作向兒童介紹，勞動的過程亦在前列的幾章中提出討論。這些教科書之一般的内容與着重點，都與教學大綱所定的相同。這些書都是按勞動學校的各年級與等級分別程度深淺來編定的。至於技術學校與高等學校用的教科書，後來將予以論述。

國家科學局所定的教學大綱，雖適用於四年制的及七年制的勞動學校的整個學程，但不能適用於九年制學程之最後兩年。這最後的兩年是在不久前加上的，要在特殊的職業部門上給以職業的訓練，並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教學大綱。對於工廠學校，農民青年的學校，與特殊的工人學校，都同樣各有其特殊的教學大綱，在此按科目的課程編制仍予採用。在高等技術的與普通的教育機關，其教學大綱亦按科目來編定。在一切這些教學大綱中，「社會的研究」是各種科目之一，並把蘇維埃課程中之歷史科與公民科編入這科目之下。研究此等科目的鐘點定出非常之多；在大學中一種社會科學的最低限度是必修的，甚至在科學的專門學校裏亦是如此。在這裏可以把維護這種社會科學的最低限度之行於高等技術學校的論據，作一扼要的敘述；這些論據同時可以解釋公民科之在低級技術學校所得的地位。在大部分以社會化的大規模工業為基礎的新社會的建設條件中，專家或技術專家必須在其四周的與正在按新路線建設的社會裏所進行的一切事情中，能明顯地站定自己的立場。國家的社會活動，是在蘇維埃體制中的工程師、醫師、農業專家等等所不可免的。這些技術專家必須使之能握到了解一般的社會勢力與蘇聯特有的社會勢力之關鍵。了解現在所進行的一切事情的門徑，即在對於這些社會勢

力的研究，利用科學分析之已著成效的各種方法，並把這種分析所得的結論運用到實際的生活上。這種方法就是「馬克斯·列寧的方法。」若沒有這種方法，做醫生的就祇能是其本行的一個狹小的專門家，並不是現在蘇聯所進行的國家建設努力的一個自覺的參加者。無產階級的國家所需要的一種專門家，乃是具有下列知識的人：

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發展史與工農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史，領導這鬥爭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勞動階級武裝信條的原理，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現時代，蘇聯無產階級與其政黨之政府的與經濟的建設之成功的理論與實施。

這個長的引語可作為「社會的研究」之課程內容的簡短綱要，施行於高級的中等學校與技術學校以及高等的教育機關。

對於年齡較輕的學生，社會科學各種功課的目的，是在乎把現今的條件與各種問題引用到學校的工作裏，並同時給他們以一種「社會的科學的發展」，使他們認識社會生活的法則，且幫助他們成為新生活的建設者。其前途既具有如此實際的目的，則要在所限定的時間範圍內，對歷史與社會的研究定出有系統的課程實為不可能。共產黨人說，從前的學校以犧牲現在為其勾心鬪角的政策；他們自認是犧牲過去的，因為在發展革命鬥爭的觀點上看來，現在比較重要些。為要表明現在的文化是人類歷史上所有一切之最後成績起見，教科書與教學。

大綱均把原始的及此後各時期的文化提出來與現在的文化比較。但其所着重的必須是下列的一類題目：工業革命，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兩種社會，或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東方，古代希臘，羅馬帝國，中世紀，改良政策，人道主義，基甫時期的俄羅斯與新城的俄羅斯——這一切題目除了爲舉例與顯示的材料外，都必須略過去。在大學裏特殊的歷史工作中，這些題目將提出來研究，或者個人得按其將來的文化興趣選擇這些題目中的一來研究。

爲這些課程所編的教科書，都是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編著的。這類教科書中通行最廣的一書，是瓦爾扶所著的「社會研究概要」(M. Volfson, Outline of the Study of Society)，這本書的序言寫道：

本書的目的是在馬克斯主義的見解上說明社會，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的定律，及其在衝突與運動中的內在的勢力之一般的觀念，並使讀者了解勞動者的社會，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得到解放的道路。

這位著者又加上說：「如果此書能供給後進的青年以馬克斯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宇宙觀的武器，則著者甚爲欣幸，這些後進的青年正要代替老的戰士，並親密地參加於新世界的建設中。」假如爲篇幅所允許，可扼述這本書的精華，以示明這著者如何把歷史的與現在的事實呈於吾人目前以達其目的：這是頗饒興趣的。這本書的第一句說：「人與其他一切生物一樣，都從其周圍的自然界得到每件東西。」在第十七頁則把階級鬭爭的問題寫出來；並且第一章的結語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要素」上指出階級鬭爭的不可避免。第三章述「經濟形式

與社會關係的歷史。」其末後的一段是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論「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一章中有下列的語句：「全世界的工人已在過去與現在努力爭取無產階級的獨裁，祇在蘇聯是例外，該處無產階級革命已把政權轉移到勞動者的手中了。」一句結語寫道：「所以，無產階級的目的是共產主義；其方法則為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秩序的毀壞，並以無產階級獨裁為過渡時期的方法。」這些引語是從這本書的第十版引錄出來的，且該版印行達五萬分。這本書共有三百五十頁，售價低廉，祇定價六角。

在職業的訓練中，造就一種具有多方知識的工作人員之目的，使技術的熟練受着犧牲。例如電機工程的功課有六十種科目要研究。其理想為一個工程師應訓練為不僅懂得一種專門技能，並因此對於生產的各種較廣泛的問題須有更好的了解。近來已有一種趨勢，懷疑此種方法是否聰明，要減少科目數目以及分配於公民科的鐘點。高等學校的學生功課的負擔很重。最近曾有一次問答的調查，表示工作時間太長，睡眠的時間太短，健身的運動時間很難得到，而在公衆的與公民的工作時間則很多。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很壞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每月用費大約從十金元至十五金元。在關於這次問答調查所發見的學生的工作時間與工作條件的討論中，最普通的意見是：對於學習太注意了是反動的；認為學生應「養成建設工作的熱情。」或如一個發言人所說的，「在每一細小的事情中尋求世界革命。」

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學校與大學的學童及學生，都使之與環境的生活接觸，並以種種方法使之與「生產」

發生關係。許多年齡較大的學生已是職工會的會員，並有許多人是共產青年團團員或黨員，且以其均爲此等組織的成員，故希望他們能負起並完成一定的公民任務。工人學校裏的學生，在其學習的幾年中有從事於某種公民活動的義務，特別是在放假的期間，他們須在假期回到其所選派的團體，並作報告。工廠學校的學童，希望其能參加工廠的公民生活，他們同時以學徒的資格在廠中做工。農民青年學校的學生，是鄉村社會中選擇出來的並在政治上積極的青年分子，且希望他們對於鄉村讀書室的工作有所貢獻，讀書室是農村中的政治教育與活動的中心。高等技術專門學校與大學的學生則有某種限量的公民活動必須執行。這種服務的工作可在掃除文盲的中區，在扶護社的活動中，或在校中的俱樂部所組織的各種研究社的活動中來執行。這些學生對於生產的接觸，則藉按其學習的方針參加實際的生產工作，以補充其書本上的學習之正式的必需工作來達到。在夏季的幾個月，許多學生都到工廠或機關裏實習。但是這種理想之實際的應用，不是完全成功的；雙方都有訴苦，在學生方面覺得不能得到真正的訓練，而在工廠或機關的管理人員，則厭惡這些派來實習的學徒滋擾與浪費。公民活動與實習的工作，常是機械式的與虛擲光陰的。

工廠學校似或可以最完善地表現蘇維埃制度所產生的新式學校的理想。這些學校的校址，都設在工廠或生產的企業之內或附近，而且職工會也參預指導與維護這些學校。共產青年團是這種學校的發起人之一，並繼續與之發生親近的與正式的關係。學童與較老成的工人同道工作並共同生活，因此得經常地在無產階級的影

響之下。在工人俱樂部裏，這些學童助其活動；有一次，看到某處的學童並無自己的俱樂部設在校中，而祇利用附近的工人俱樂部，以爲他們的研究社與其他活動的根據地。這些學校的數目雖比較上仍屬有限，但是他們的發展與他種學校比較卻是最快的。與此類似的農民青年學校也同樣地顯示學校與實際的生產及與一般的社會環境所發生的不斷的接觸，但因鄉村社會中的地理條件與一般的文化條件不同，接觸的程度較差。

蘇維埃的教育制度在此都是當作一個單位來討論。但是，我們已經指出：教育是在蘇聯各民族共和國自成一個分立的，雖是彼此聯絡的，人民委員會的各種體系之一。蘇維埃的教育制度之一個特點，就是以當地的語言爲校中授課的語言。蘇聯的俄羅斯單位對於自己所轄的自治的民族集團，特別注意於用各小民族的語言來編輯教科書。因爲本地人的教師尙未產生出來，俄人的教師須受特殊的訓練，以在這些小民族的學校裏工作。因此，這些學校成爲發展較落後的民族集團之民族的覺悟的中心之一，而且這種民族的覺悟再加以推進，而爲走向政治覺悟的初階。對於沒有文字的幾種小民族的語言，已代爲創造文字的形式，此亦視如教育的準備工作；且當這種新文字寫成的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舉行公民的示威。在學校的教學大綱中定出區域的研究，此種研究的注重亦藉以喚起學童對於公衆事情的興趣，並由此再喚起其對於全社會的興趣。在另一方面，蘇維埃的學校及其教學大綱之推行於這些小民族的集團，是在集中的統制與統一的利益上來實施的。

「新式學校」的教師人才問題，是共產黨領袖們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最初的幾年間，許多教師，如果不是

抱積極的敵對態度，起碼是不大友善的。在另一方面，黨的組織不能空出許多工作人員以分配到教育的事業上。訓練出新輩的教師是頗費時日的。所以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與控制之下利用老教師。例如在鄉村區域中，此種對教師的控制，是由一個黨的委員會來執行，在城市裏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控制更易組織起來。教師都要加入職工會，而另一種施影響與控制的辦法即就此建立。在較大的學校中採用了定期的與常常舉行的會議，而對於較小的學校則按區召集會議，組織特殊的訓練班，以訓練與再訓練各教師。

在蘇維埃的學校裏，一切等級的教師僅約百分之三是黨員。在較重要的學校裏，教導主任或至少擔任「社會的研究」之各科的教師，通常是共產黨員。國家科學參事會的委員也是共產黨員，他們準備教學大綱，並審查與介紹這些學校適用的教科書。此外，又設立一個紅色教授學院，以迅速訓練高等教育機關裏教席之新的候補人員，此等教席尚須繼續利用在舊制度下訓練出來的專門家。這些老教授尚不能即刻被人取而代之。他們與一切教師一樣，必須受一種非正式的馬克斯主義的試驗合格。因為當局堅持着：革命已證明了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是唯一的合於科學的思想派別，所以一個教師不懂馬克斯主義，便要在學童或學生面前鬧笑話。

這些教師至少在形式上均已接受新的觀念與方法，這或是此等積極辦法的效果，又或許是時過境遷後普遍的改頭換面之一部分。他們在一九二五年正月召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以此種態度表達於紀錄上。在這大會所通過的「宣言」中，教師們承認他們過去的錯誤，說那時候他們是「受民主與自由的口號所欺騙的

浪漫主義者，且以信仰各階級之民主的和諧，而成爲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不自覺的武器。」這宣言的結尾有許多通知語，其中有一段通知語是給「共產主義者的同志們」，其措辭是：「蘇聯的非黨員的人民的教師們給你們以熱烈的敬禮。在我們的全聯邦的代表大會上，我們敢對一切勞動者宣言：從今日以後，我們決不把自己的工作任務與共產黨的任務以及該黨創造新世界的偉大鬭爭分離。」這大會的代表又對其所代表的教師們作如下的通知語：「我們已執行了你們的志願。既往不咎。在我們面前有無限的前途，同時亦有多方的困難與負責的工作。可是從今以後，我們不是孤獨的了。我們正在與全世界的一切勞動者同道工作。我們是與他們富有經驗的領袖們同道；我們與共產黨攜手。」這宣言的另一段是給「世界各國的教師們」，其措辭爲：「蘇維埃的政府機關就是我們的機關。共產黨就是我們的黨，而且我們都信任它。我們與人民同道，與蘇維埃機關同道，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正在建設一種新生活，一種新式學校。」

在共產黨人方面對於非黨員的教師之態度，亦一變而爲對他們重新觀念取信任的態度。把教師們奪取過來，認爲是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偉大成績。在教育上行使這種領導的辦法已如上述。蘇聯的教師是受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所領導的。由教師的職工會機關與教育人民委員會及黨合作所出版的爲教師閱讀的報紙與雜誌，都在一般的新聞與教育生活及教育問題的討論中，給以共產主義的路線。在鄉村區域中的教師，則藉參加鄉村讀書室以引入政治的與公民的活動，鄉村讀書室在形式上是隸屬教育人民委員會，但在政治上是受共產黨與

共產青年團指導的。這種幫助地方的公民活動之必須執行的義務，相信其能在教師方面展開共產黨領袖們的教授法理論。因此，對於非黨員的教師，從共產主義的教授法又通常從黨的機關，並經過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經常施以一種壓力。這種壓力逼得在教育上與在其他一般的事業上，對於新的觀念與方法之實行，能作更大的努力。這種壓力同時又起控制教師及其活動的作用，這就採用了一種守護的成分，並有時在地方的條件下成爲一種檢查的形式。

舊統治的俄國教師在其對學童與學生灌輸某種政治觀念的努力中，曾受監視與嚴格的約束。甚至在這兩種制度表示有某種相似的特點時，要比較它們的上下是不容易的。但是，新式學校的教師與舊統治學校的教師比較，在其工作中顯然較爲積極與有濃厚的興趣。軼出此種一般的說法之外，若要對於蘇聯非黨員的教師或由共產主義的教授法所製定的教學大綱與教學方法所起的影響作一結論，未免太早。

共產黨與尤其是共產青年團及兒童先鋒，在給教育以共產主義訓練性質的綱領中所起的作用，在論「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共產主義的兒童先鋒」的各章中，即自第二至第四各章，已予論述。因爲上面所說的本身還是一種概要，所以讀者須再參考到這幾章。這可回想得到：在兒童先鋒的運動中，希望這運動的觀念將來會變成整個勞動學校的觀念。下一章將討論特殊的政治教育的機關，這些機關是爲過渡時期組織起來的，直待常態的學校建設網能達到全體兒童並能供給爲蘇維埃公民所必需的一切政治教育爲止。在教育人民委員

會的政治教育部之下的掃除文盲中心與鄉村讀書室；也是一時權宜的辦法；在蘇維埃的教育計劃的進展中，這些機關亦將完成其原來的意旨。

茲舉出幾個綱要以對這一很廣泛的題目之此種必需的扼要論述作一結論。一般地說來，蘇維埃的學校是革命的一部分；它不能站在革命的政治之外。教育是坦白地隸屬於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在每一革命的進展時期提給國家的活動綱領。現在的綱領就是：蘇聯發展爲工業化的國家。這種新的政治路線已經影響到教育政策，而且技術的訓練特予重視，不惜減弱普通的訓練。十月革命的勝利已在羣衆間引起更大的活動。這種活動是要利用之以加速經濟的進步，但此種進步必須循社會主義的路線進行。爲着上述的目的，必須有一種簇新的與特異的文化基礎，而且這新文化的基礎必須在青年中埋定。對這種工作，有一切方面的鼓勵。當學校不適合全體兒童的需求時，學校風潮都以滿意的口脛報告出來。羣衆也對於學校的此種性質感覺興趣，並相信大多數的工人與農民贊成這些新方法，是因爲他們看到從這種新式的學校產生積極的有用的勞動。據說，祇是富農對這種新式的學校表示抗議，說它不時常來教讀、寫、算，並同時不把革命前舊式的鄉村學校所重視的宗教訓練包括在課程裏面。

一九二三年政府頒佈的教學大綱是試驗性質的，並經過數年的堅執採用後，纔於現在稍加變通。衆信對於一種固定的教學大綱之堅執在過去是必要的，藉此可以獲得按照新路線的發端，並與舊的方法、舊的思想決絕。

現在則可更注意於建立正式的紀律而不致危及學校的新目的。同時這些教學大綱已大加簡單化了。最後，又決定某些政治的題目，如世界大戰的經過或第三國際應從第一二年級延遲到第三四年級去研究。這些教學大綱所根據的一般原則，已由許多學校實施的結果證明是正確的。這是從第一時期的經驗之一般的調查結果所得的結論。因此，這些一般的原則，仍保持之以為蘇維埃學校的教學方法的基礎，因為「從這種教學大綱所得的總合，可革除唯心主義而造成唯物主義者。」社會的有用勞動可幫助兒童去了解其所學習的各科目間的關係。確定的與甚至形式上的習慣，雖都可灌注到兒童的身上，但此等方法可不致認為是登峯造極的了。所以，在學校及其工作中常有頗多有用的佈置。例如，在數學的教科書中，習題可根據當代生活上的問題，如社會保險，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的蘇聯，城市與鄉村間的貿易，或資本主義國家的軍備。

「有用意的佈置」一語，每當討論教育的與訓練的問題時常可遇到。所以，例如兒童的玩耍，必須導之使可在生物學上與社會上有所用。藉這種方法，建設的努力與甚至有用的工作，將在兒童活動力的最初發展時即已具備。「讓兒童為遊戲而遊戲」這句話被斥為資產階級的口號，說資產階級害怕訓練羣衆，並尤其害怕訓練他們來克服困難。各種遊戲是要反映當代的生活；但當這積極的創造的羣衆的勢力之在當代的生活中，為努力向着一定的目標進行的革命的勞動時，應加以指導與一種提選的手續。所以，蘇維埃的教授法必須把關於遊戲的環境的基本力量，納入有組織的有用意的定規中。共產黨人自己預料到他們的敵對者將稱他們為第五世紀毀滅

「羅馬文化的梵德耳人 (Vandals) 剝奪兒童玩耍的娛樂，並以其殘暴的獨裁甚至侵略到兒童的遊戲領域。

共產黨人堅稱馬克斯主義的學說並不是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其目的首先是在解釋真實的生活；並因此與生活一樣的簡單。——他們堅持地說。因此，倘使選擇了妥善的解釋方式，便可把馬克斯主義甚至向十歲的兒童解釋。相信國家科學參事會的教學大綱，就能代表這種妥善的方式。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將使這些教學大綱所根據的實事分類制或設計制更易應用。調過來設計教學法的本身又使關於生活的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有引入每一課書及甚至與學童每一次的討論中之可能。這種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不僅在社會的現象中，而且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均可得到例證。在教師尚未完全是馬克斯主義者的時候，必須用一種代替的方法，這代替的方法是普通由共產黨人來教授的「政治常識課」。馬克斯主義不是在「社會的研究」科目中的政治常識課；但政治常識課在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未普遍通行前必須採用，因為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必須成爲一個並唯一真實的科學方法；這是他們所解釋的。

注意馬克斯主義方法的結果，如受過蘇維埃教學大綱訓練的學童之試驗所表示的，已在有些共產黨領袖的心裏起了懷疑。學童或學生往往成了一種習慣，在他回答一切問題的開頭一句總是說：「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看來。」在各問題的回答中之簡單的鸚鵡式的背誦公式，甚至不能不使最熱心的馬克斯主義者也要留着印象。關於問答方面，或可允許在此重述一個流行的故事，這故事最足以顯示學生學習應作何種答案，根據這故事，

一個「政治常識」的測驗題問道：如果遇到內部變亂要推翻蘇維埃的統治的事情，你個人應如何對付？若回答說，他要舉起武器來保護工農的政府，則這答案認為不能滿意；正確的答案應該是：這學生覺得不能造成這種局面。

下面幾句是從一個最著名的蘇維埃教授法的倡議者，關於此種教授法的評論中摘錄出來的，這或許可用以總結本章所列論的大要。這些思想是在關於入學前的訓練之討論中發表的，並是代表從教育過程的最初階段所應有的目的。

我們正在訓練的未來蘇維埃的公民，必須是一種堅強的與健康的無產階級分子，是階級的與革命的戰士，是有科學意識的與有組織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者。他必須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全身武裝着必需的知識與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妙道的能力。他必需是在一切經濟的與社會的活動中是集體主義者，以堅決反對剝削者階級藉以建立其政權的私有財產與個人主義的目的……未來的公民必須是一種具有自動組織的並能與他人共同組織的習慣之革命的積極分子。

以上幾句的作者於是提到其敵對者將大聲疾呼：這是企圖把這些特性灌注到兒童的機體中之最荒唐的梵德耳主義。但是他說這些特性是要以積極的努力在蘇維埃的兒童中發展起來，使這些兒童得從蘇維埃制度的學校，造就為辯證法的唯物主義者、集體主義者、組織主義者與革命的積極工作者。這表現理想的蘇維埃公民

的意識之四種術語的公式，可回想得到，已在論蘇維埃的公民觀念一章中提及。在建立新式的蘇維埃勞動學校的一個最初的命令中，可看到下列的辭句：「學校的全部工作，必須以發展兒童的無產階級意識與合於此種意識的本能爲目的，以加重說明全體工人反對資本的團結爲目的，並以準備兒童爲將來作有用的生產的與社會的活動爲目的。」

各種學院與研究院設立起來，以進一步發揚蘇維埃的教授法之目的。在更嚴格的政治的與經濟的領域中，有「馬克斯與恩格斯學院」與「列寧學院」已如上述；這些學院同時以其廣遠的出版活動，亦影響到教育方法與教學大綱及教科書的編制。更特別的還有「共產主義學院」這是共產主義思想的理論中心；又有「青年共產主義訓練學院」以補其不足。我們又可看到一個「列寧格勒的馬克斯主義方法研究院」與「白俄羅斯的馬克斯主義歷史家學會」。在一九二八年初，召集了第一次全蘇聯的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科學研究院的代表會議，在該會議中報告並討論這些學院與研究院的工作及計劃。同時敦促說：辯證法的唯物論，必須在羣衆間宣傳與通俗化，使其成爲真正的力量；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切不可祇限於正式的團體，如共產主義學院的哲學組之類。「蘇維埃的百科全書」已出版十冊，在第三冊中的一切文章，據其序言所說，都是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討論他們的題目；且這些文章都是爲受過中等教育的讀者而寫的，因爲正如一個作者最近扼述時常反覆應用的辭句說道：「馬克斯主義不是一種黨的信條；這是了解一切社會現象之最客觀的科學的與周密的方法。」

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召集了第一次「教養學大會」(Pedological Congress)。克魯潑斯卡對「教養學」(Pedology)下一定義說：這是新的科學，研究兒童人格的形成與發展的定律，與「舊的」心理學根本不同。她解釋說，後者絕妙地適合於唯心主義，而教養學則主要是唯物主義的。在大會中有二千以上的代表出席，代表一切的科學派別。在黨的正式機關報上說：這次重要的大會之結果，將使教養學成爲日常教授法實施的一部分。前此無計劃的教授法研究就告終止，而「對這問題的研究之有組織的規定與系統化，就得全聯邦的委員會之介紹予以實行。」又稱：這次大會明顯地表示：無馬克斯主義的綱領，便不能進行蘇維埃的教授法。在這大會的最後一次集會中，布哈林做了一個長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對教授工作人員解釋如何把辯證的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應用到他們的材料中。因爲這次大會的工作，據說是把革命的十年中所搜集的關於研究人事的一切材料已列舉精華，所以提到大會的材料，不是限於祇關兒童的那些較狹小的特殊問題。克魯潑斯卡在第一次教養學大會的討論中之另一番話，則指出：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揭穿教授法的階級性，並示明在革命的過渡時期教授法的特點應該是什麼，以此它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又說：在蘇維埃政府存在的十年中，雖在蘇聯已做了許多工作以推廣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但最近數年來已示明在教授與訓練的方法上，尚需要一個完全的革命，纔能達到馬克斯主義的蘇維埃的教授法之目的。因爲她看到許多「舊的、老朽的」方法，尚留在蘇維埃的學校中，雖然同時也有「一些新的萌芽。」

第十三章 蘇聯的政治教育機關

「波立不羅斯維」(Politprosvet)一字，就是現時用以指稱本章將予討論的各種機關的工作之簡字；這字就是「政治教育工作」的縮寫。或者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或者黨的中央委員會的鼓勵宣傳部，凡指導這種工作時，都時常彼此合作。在每一省、區與鄉中，都有一個地方的「波立不羅斯維」或政治教育部。「亞極不羅」(Agitprop)，即黨的中央委員會鼓勵宣傳部，也有其省的、區的與細胞的地方屬部。一切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委員會都有其關於政治教育的分部或分委員會，與職工會團體的文化組一樣。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都使之參加這種工作，以爲其本身活動之一部，且須經過黨的作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社會訓練部及其地方的代表，都處處與政治教育部密切合作。鄉的政治教育部的組織把教育工作中的多種成分都聚集在一處。這種組織是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地方機關；但是地方蘇維埃、職工會的地方委員會、地方合作社、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鄉細胞，與鄉村社會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如學校教師、農業專家與醫生，都以咨議的性質包括在內，各受其自身的上級機關之訓令以盡一切的可能來幫助政治教育的工作。鄉村讀書室 (izbaclitina) 這名詞有時譯爲「農民讀書舍」) 是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鄉村讀書室的主任 (izbach) 是由鄉政治教育部得地方的黨細胞之同意而

任命的。列寧曾在第一次政治教育工作人員的代表大會上說：「我們將堅主在政治教育的工作上，公開承認黨的領導權。」

政治教育部是從以前的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校外教育部蛻化出來的。因為在成年人間的一切文化的與教育的工作，都認為必須具有政治的性質，所以決定改變這一部的名稱，並擴充其範圍。黨內工作任務之一，就是對黨員作政治教育。這同時是共產青年團的一個目的，所以這兩種組織在政治教育工作上的合作，是合於邏輯的。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在一切政治活動的場合中，必須行使其領導權，並厲行黨的政治路線。所以訓練黨員的指導責任，就託付於黨的鼓勵宣傳部，而且這是黨的組織裏最重要的一部。黨的政治教育工作狀況，都定期地按區、省與民族共和國，在各大會上收集起來；而全蘇聯的代表大會，則對這工作給以統一的指導。

在這兩個機關之下，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機關。掃除文盲的各中心，亦應歸入這一類機關裏面，現在即將予以說明。鄉村讀書室是在鄉村區域中之政治教育的中心。「政治常識」的學校分成幾個等級，這是政治教育的觀念之最完備的表現。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之代表會議，在其各種功用中，亦有對婦女們起政治教育的學校之作用。其次則有蘇維埃黨校，共產主義大學，政治教育的共產主義學院，這些機關都是訓練政治的領導人才與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員。在莫斯科還有「東方共產主義大學」與「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主義大學」。在軍事人民委員會的一個特別部門之下，但與這兩種公民的團體合作的，又有紅軍中的政治訓練班，這種機關最努力地與

最完美地執行有組織的工作，爲政治教育部之任何機關所不及這裏的教學大綱中定出固定的課程表與授課時間以及所謂「校外的活動。」至於俱樂部、工廠委員會、教育機關的政治常識研究社，則已經在前幾章中說過了；但這些研究社，尚須在此再加申述，因爲它們是補充其較正式的政治教育機關的工作。

掃除文盲，認爲是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列寧曾說過：不識字，就不能完全了解政治的事變，並因此不能在政治的活動中作有效的參加。倘若工人或農民不能讀他們在遊行時所舉的旗幟，則甚至他們的口號也不能發生完全的效果。當新穎的與特殊的活動態度與種類定爲政治領袖們的目的時，則閱讀爲建立這些態度而印發的材料與增進所期望的活動之能力，便是這運動成功的要素。促進識字運動的中心一向是，而且現在正是，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之下所特別注意的，因爲這些中心機關的作用是：當初等學校還不能容納全體學齡兒童時，成爲恰能阻止不識字者人數的增加之堤壩。他們的工作範圍已在討論與此點有關的公民的與其他組織時述其概要。此處祇須提出兩件事情。第一，用於這種工作的主要材料常是政治性質的，所以受此教育的較年長的人，一面教之讀與寫，而同時又可使之成爲更覺悟的與活動的公民。第二，在小民族中的掃除文盲運動，使對於各民族的語言更加注重，這種民族的語言，是在這些較落後的蘇維埃公民中，用以喚醒民衆意識的工具之一種。

掃除文盲的中心，祇是代表在成年人中施行校外的教育工作。在各大城市中，正在設立半識字者的學校，成

年人的高級學校，與最後的工人大學，都在夜晚與星期日上課。最近在莫斯科正在提議與討論，開辦一個農民大學。這些機關首先須有一般的教育綱領；但在一切這些機關裏，學科的分配特別注重社會科學。在所稱的「社會政治與文學」的科目之下，於成年人的高級學校之教學大綱中，列出下列的科目表：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社會形式發展史，西歐與俄國的階級鬭爭史，共產黨史，第一、第二與赤色國際史（赤色國際包括職工國際、共產青年國際、農民國際、共產國際），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與文學。有一種畫報月刊出版，定名為「打倒文盲」；這刊物中從頭到尾登載許多畫片與圖表，使關於政治的與經濟的題目之淺近的文章，得寫給正開始懂得閱讀技術的人們看。

最近開辦一種臨時的特種學校，以在青年間掃除文盲。這些學校的目的，是教育那些在最近數年來或因缺少房屋或因家庭經濟遇到困難，以致不能進入勞動學校的青年。這些學校都是一年畢業的，在鄉村區域與城市均有設立。通常學校的房屋與教師，都在夜間利用之。其所注重的，是在政治的與職工運動的訓練，因為全體這些青年都已學過讀與寫，且有許多人已踏入工資勞動者的積極生活。有些人可藉此升入通常的學校，但是一般地說來，這些學校的目的，是在準備這些青年使其能自動工作。這裏題目與材料的選擇，亦以給予那些不久將成完全公民的人以某些政治教育的成分。通常學校所用的設計教學法，亦在這些特種學校裏應用。第一個問題就是「十月革命」，並在其週年紀念的兩星期前，這些青年就來研究這革命的原理。第二個題目是「蘇聯與其他各

國。」第三個題目是「列寧」並爲正月間列寧紀念日的準備。二月間的紅軍紀念日成爲其次的題目基礎。在三月間則是「勞動婦女節」五一紀念日，則爲下一次研究的目標與題目。政治教育工作在這些學校裏特別注重，以提起這班因環境的壓迫，沒有入過通常的學校，且因其年齡與經驗的關係，對通常學校的初步課程，不適宜的學童們之興趣。有些自然科學與生理的知識，亦擠入這些學校之必須的緊縮的教學大綱中。上面所說的工人大學與農民大學祇在最近纔肇始的，尙不能予以特別的描寫，但知工人大學所欲注重的是「職工運動常識」，農民大學所注重的是「合作社常識」，這都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在大工業與城市的社會中，在工廠與俱樂部裏有無數的中心機關，政治教育部得藉此以教育工人與勞動的知識分子。在鄉村的社會中必須建立這樣的中心機關，而這就是鄉村讀書室(izbachnitsia)。有時整座房子(即一座小的農民屋舍)撥出專爲建設這種機關之用。時常其他機關的一間房子(如合作社)就是這種工作可能的大本營。在較小的鄉村，祇有於合作商店、鄉村學校或蘇維埃辦事處內設一「紅色處」(red corner)。這裏所用的「鄉村讀書室」(village reading-room)一語是從俄文譯出來的，似乎比較常在其他論述蘇聯的書籍中所看見的「鄉村圖書館」(village library)或甚至「鄉村讀書舍」(village reading-hut)一類譯語，較爲切近事實的情狀。一個設備完善的讀書室，將有其常任的主任(izbach)。小圖書館與定期的小刊物之成立，都是以讀書室的名稱來命名的。這會是讀書室之首要的與主要的活動。後來開展一種按有系統的計劃之

團體的與高聲朗誦的讀報工作。這種讀書室不久又開始組織新聞股。共產青年團廣佈於鄉村區域中，因之讀書室成爲他們的組織根據地；在事實上，共產青年負有幫助與指導這種政治教育中心機關的工作之特殊任務的職責。壁報、列寧紀念處、各種研究社，尤其是戲劇研究社，都在這中心機關的周圍與內部滋長起來。革命紀念日的慶祝，常常由讀書室來組織。工人對於某一鄉村的扶護社，即以讀書室爲其實施扶助與影響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鄉村讀書室便是鄉村的俱樂部。對讀書室的主任，現正特別加以注意。

共產青年團對於其對讀書室所負的特殊任務，時常祇作字面上的了解，派一個團員去做讀書室主任，便了事。不久，發現了這一年輕的領導者，對於年長的農民不能有何權威。同時，共產青年團時常有一種趨勢，要獨佔讀書室爲其正式與非正式集會之所，以致年長的農民未曾享用過讀書室。有一次作者要求參觀鄉村讀書室，引起了一個農民與一個共產黨員的談論，在這談論中露出此地所說的事實。年長的農民回答說：這機關已僥倖停閉了，因爲它祇供少年人多作胡鬧，而對於他卻毫無實際的用處。這個共產黨人不得不承認說：因爲年長的農民們並不覺得這讀書室對他們有何利益，所以覺得還是停止了好些。但在最近數年來，各鄉村已爲政治教育部的組織與擴充的特殊對象。這就是說：對讀書室的領導與設備更加注意，與更受上述政治教育部的控制。

一九二六年所有鄉村讀書室的數目共約四萬。有些祇是紅色處，在這裏可以找到報紙與小冊來閱讀。在作者參觀一羣鄉村時，曾在較大的村莊裏看見極平凡的讀書室；而在其他的村莊中則看不見這種機關的痕跡，到

了一九二八年初，據一般估計，因為繼續發展的結果，這種平凡的政治教育的中心，已達蘇聯的俄羅斯單位的鄉村數目約五分之一。有些讀書室設有經常的圖書館，而其他讀書室則由其所稱的「流通圖書館」來服務。

政治常識的學校是政治教育之最特異的與確定的機關。「政治常識」(politgraznata 或 political grammar) 一語，已在論述普通教育與其他各種機關時用過。這裏有其學校與研究社的整個工作網，這些機關都是按照有系統的計劃組織起來，且有固定的研究大綱。這種學校主要的目的是為訓練黨員與青年團員的，但所招收的學生約有百分之十五是非黨員，莫斯科及其省內的轄地有政治常識學校的最大工作網。這裏所有的學校種類，在理論上是通行於全蘇聯各地的，但在較邊遠與落後的省分裏，還沒有遍設種類與學級齊備的學校。下面的實施辦法，是截至一九二七年五月止為這些學校所通行的，從那時候起已有某些變更，現在亦將予以敘述。黨的一切候補黨員，必受過政治常識學校的「縮減了的」教學大綱之教育。但亦可以通常學校的相當教育或自修的工作來代替此等必修的學程。每個黨員都按其工作的條件，實際上派到適當的學校去學習。政治教育的高級機關是否要進去學習，由各黨員自願，但在這些機關畢業以後，能提升其在黨的工作與在蘇維埃、職工會及其他活動。由此可知其目的，是在於使全體黨員都能受過一二種政治常識學校的教育。在城市中心區域裏已得到很廣遠的成績。在鄉村區域裏，困難較多，特別是因彼此地方相距太遠了。鄉村的學校，有常駐的與移動的兩種，都在冬季的三個月中間辦，每星期上課三次；但是黨員時常必須走許多路到遠處的學校上課。較小的鄉村黨細

胞與孤立的黨員還不能有機會入學。有些訓練班在一特殊的代表大會中組織起來，上課時間在兩星期以上。個人的與團體的自修，亦已在城市中開始組織，且為散居各鄉區的共產黨人成立此種自修的組織。

在鄉村區域裏，政治常識的學校，希望其能有迅速的政治影響。例如，該處的黨員須在蘇維埃的選舉中，使民衆更為活躍與更有自覺性。更特別的，是在學校中的討論，藉黨的上級機關所派的指導員之幫助，希望其能給地方共產黨細胞的工作更有生氣。黨員中較年輕的分子，得經過與借助其在校中的工作，以糾正黨部裏較年長的肆無忌憚的官僚所行的黨細胞的路線。

學習的大綱按照學校的等級而異。最簡短的大綱是在鄉村從一個中心區移動到另一中心區的移動學校所用的大綱。在這大綱裏共有十五次「談話」的功課，每次時間為兩小時。所討論的題目如下：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與在蘇聯的工業與農業；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及蘇維埃政府；新經濟政策的要義；國有的工業與其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裏的作用；在農民中各階級，與黨對於這些不同階級的政策；合作社與鄉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兩堂課）；黨在現階段工作的主要任務；黨與鄉村蘇維埃（兩堂課）；共產青年團與其在鄉村的工作；在反對沙皇專制的鬥爭中之共產黨；工人與農民；在二月與十月革命中的共產黨；工人與農民；在國內戰爭終了時與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共產黨；工人與農民；以及蘇聯在現時代的作用，與世界革命的前途。在鄉村常駐的學校裏共有二十二次功課，增加下列幾個題目：蘇聯與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一九〇五年革命前與革命中的農民，工人階級，及

其政黨（三堂課）自一九〇五年到帝國主義戰爭。在較長的課程中，還有幾種題目都在兩堂課以上。

在城市裏政治常識的短期學校，共有十五次功課，研究下列題目：黨的建設與共產黨員必須執行的義務；共產黨是工人的黨；黨與職工會；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獨裁；黨的經濟政策原理；國有工業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國有的工業與農民的農業之聯合，是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成功的保障；鄉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準備無產階級來幹第一次革命時（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兩次革命間的布爾塞維克主義與機會主義；黨與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與保障其勝利的鬥爭；「十月」以後布爾塞維克護黨的鬥爭；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與世界革命。在普通的城市學校裏，共有二十四次上課，加上下列幾種研究的題目：資產階級的獨裁與無產階級的獨裁（兩堂課）；資本主義的工業與我們國有的工業之特點；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我們人民的經濟之趨勢；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國資本主義，與工人階級的政黨之誕生；蘇維埃政府之財政的與租稅的政策；新經濟政策與職工會；共產黨的策略；黨的組織原理。又因在一種較長的大綱之下，還有作更詳盡的研究之可能，有些別的題目，分成兩類補充上去。

政治常識的普通城市學校所用的教學大綱，以較完善的形式刊印出來，把每個題目的討論中所應舉出的重要點都扼要指出。在每一「談話」的末尾都提出問題，並希望學生能來回答。倘為篇幅所允許，可把每次討論所應扼要指出的要點在此述出，這未始不是饒有趣味的事情；因為這些要點的本身已是概要，所以不能從這些

要點再作概要。這種概要，在此可舉出一個特別與本書的題旨有關係的一個例子：這是關於蘇維埃政府機構的討論，這一課的概要之第一節就是：

這與資本主義的國家相反的，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工人與農民「因政府借助於各種方法與妙計，使其不能參加政治的生活，並不能利用民主的權利與自由，在蘇維埃的國家裏這些羣衆都導入經常的，無人反對的，並且有效的參加國家之民主的管理」（列寧）。這些羣衆之革命的建設工作，祇有在無產階級的先鋒——共產黨——領導之下，纔導至與能夠導至共產主義。因此，蘇聯的無產階級藉「全聯邦共產黨」以執行其獨裁與對於蘇聯全體勞動者的領導。

對於黨的工作人員，各細胞委員會的書記與委員，鼓動與宣傳的組織員或煽動員，都有特種题目的研究社與「黨的活動分子」訓練班。這些政治常識的「高級學校」之最重要的一種，就是馬克斯·列寧研究社，該社每星期召集一次，並在整個教育年度祇專門研究一個特殊題目。對於做指導工作的黨的活動分子，包括高級黨部的書記，舉行研究小組會（seminars），在此研究黨內生活最重要的問題與政策，並詳加商談。

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的代表會議有常規的研究大綱，這也成爲某種的政治常識學校。這些代表會議本身的存在，就是根據對於工農階級的婦女在政治意識與知識上的落後之確認。所以對於這些婦女特別需要理論的政治教育。這種代表會議出席的人數，平均從六十至一百，並在這種大的集團中，政治常識學校的討論方法較

不適用。同時，婦女比男子識字的程度較差，所以講演的方法較爲通行。在婦女代表會議中的研究大綱與城市政治常識學校的大綱一般的題目相同。對於農民婦女，則研究的大綱略較縮短與簡單。共有十二個題目：農民婦女在蘇聯的地位；什麼是蘇維埃政府？一鄉的預算與賦稅；在我們的國家裏沒有被壓迫的民族；農業；工業；合作社；共產黨與工農的聯合；列寧論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什麼是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隊？婦女代表是新生活的前哨；以及農民婦女、蘇維埃政府與教育。在刊印出來的大綱中，每個題目的要點與取統計表及普通描寫文章的形式之材料共同刊佈。這是一百三十頁的小書，售價約三角。此外，還有幾種小冊專爲這種代表會議的求學活動而印行，例如「農婦的政治常識讀本」。

出版了全套的教科書，以適用於各級政治常識學校的教學大綱，同時亦爲下面將予敘述的蘇維埃黨校之用；此外，又出版「選文集」以補充之。這種書籍都與大綱相似，同爲黨的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所出版，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有一種最便利的列寧文選的版本，印成四冊，亦爲這些學校的教科書。通史、地理、與政治經濟學概要，亦已編輯起來，專以適用於這些學校爲目的。這些教科書的內容與着重點，都與大綱所定的相同。在一切這種著作中，預定的公式是很顯明的；在有些教科書中，討論終結時應有的結論亦爲寫出，使這種功課成爲一種政治的問答教授法，尤其當一般學生毫無歷史、地理、或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時。因此，發展了黨的教育工作之綱領上的與一般指導上的集中化。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總部，在這種書籍的編輯上亦來合作。政府與黨的機

關各出版一種指導的定期刊物。為避免重複起見，黨的宣傳部擔任指導低級，而政治教育部則指導高級。

黨員按照其學識基礎而分配於各級學校的辦法，不是常常著有成效的。有許多黨員派到政治常識的學校學習，而按其實際的程度則應先入掃除文盲的中心機關，或入半識字者的學校。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的半識字者的學校在三千以上，其中約有八百個學校是設在莫斯科一處。甚至這一龐大的數目還覺太不能滿足實際上的需要，因為工人對於這種學校有很濃厚的興趣。開設這種學校的計劃，就是要增加其學校數目以滿足這種需要，並作為政治常識學校的預備班。這是可以推想得到的，這種普通教育的成分較多的學校所以得人歡心，是因為黨員中的工人分子已厭倦政治常識了。但黨員進入這種普通教育的學校，必須被派定在其工作場所作特別的黨的學習，以完成其增進政治的與黨的理論的知識之任務。

在一九二七年，約有四十三萬三千黨員受到這些學校的政治教育；約有一萬七千個黨校的單位。在鄉村社會中，黨員的政治教育所得的進步較為緩慢；用其流行的術語說來，許多這些黨員仍是「政治上文盲的。」在黨員舉行重新登記時，全體黨員的測驗發見了這個事實，發見了許多地方的黨員並不知道最近黨的代表大會所採用的綱領，且甚至有人還不知道有過這麼一次代表大會的。共產青年團有其自己的政治常識城市學校，與黨的學校有別，雖其組織的基礎與黨的學校大致相同，但其研究大綱比較簡短些。在一九二六年，共產青年團組織了二萬四千個政治教育的單位，招收了四十八萬七千個城市的團員；到了一九二七年底，學校的數目增加到五

萬個單位；共產青年團的政治常識學校，已於此時推廣到鄉村區域。但在鄉村裏，共產青年團在鄉村讀書室內與其周圍的工作，時常是他們的政治教育與訓練的目的。

上面已經說過的黨的教育方法之改變，對於研究材料的選擇給以更大的自由。進入政治常識學校之機械式的指派，是要減少到最低限度。大概每個黨員仍要報告其在政治的與普通的訓練與教育方面繼續工作的情形；但是加入自願的學習團體，或進入普通性質的成年人的訓練班與學校上課，亦可認為是一切黨員所必修的學程之執行。但共產青年團團員或共產黨的候補黨員，則必須執行嚴格的任務：進入與修畢某種低級的政治常識學校。對於黨員之嚴格履行必須進入一種政治常識學校的任務，直至最近數年止都被證明正確：這是可以置信的。據解釋說：在革命的最初幾年中，學習的必須任務，並不覺得是一種外來的強迫的勢力，因為當時一般人對於初步的政治教育有濃厚的興趣，而需要受這種教育的確認，便使這種必須的訓練在事實上成爲自由與自願的。根據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所作之統計的研究，在一百零六萬一千個黨員與候補黨員中（在紅軍中的不計在內），百分之四〇·八，或四三三、一四七人，都已畢業於某種黨校。在這數目中，百分之二九·一，或三〇九、六〇〇人，已畢業於政治常識的學校，鄉村的那種政治常識學校的畢業者不計在內，一四八、七三四人，是讀普通課程，而其餘一六〇、八六六人是讀縮減課程，黨員的總數中，百分之五·九，或六二、二一二人，已畢業於蘇維埃黨校，其中四二、三四一人是第一級畢業，而其餘一九、八七一人是第二級畢業的。全體黨員中

不到千分之三，或三、一五五人畢業於共產主義的高等教育機關。祇有五八、一八〇黨員，或百分之五·五畢業於政治常識的鄉村學校。

這些數字被用以證明實施嚴格的原則與機械式的指派之正確，這是自一九二四年以來的成績，蓋自那年頭起，黨的教育纔在有系統的基礎上進行；一九二四年以前，黨員政治認識的水準是很低的。受了一些學校的教育，黨員與許多非黨員的工人都已得到共產主義的基本觀念。據解釋說，一九二七年五月所以對於政治常識學校的入學必須採取自願登記，正是因為這種政治的與文化的發展有以致之。因為這些學校已不能適應黨員與甚至非黨員工人的活動分子之需要。這些學校的教學大綱被一個作者形容為「其範圍包羅萬象，但其程度卻非常膚淺。」上課已無定規，而學童則多喧嘩；聽說有一個工人批評說：「他們在那些學校裏所教我們的一切，我們都已經在各種報告中聽見過，或者都在報紙上閱讀過的。」在莫斯科的鄰省梁柴（Ryazan）的一次調查，發覺政治常識的兩種學校——在城市的與鄉村的——「都不僅在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中失了威權，而且在非黨員的活動分子中也失了威權。」據說：甚至黨員中的農民也在避免這種學校。有人提議說：對於黨的歷史與其政綱及章程，應有更基本的研究，且應研究黨的目前問題；又有人指出：黨員羣衆顯然願意研究一般的題目，各農業的改良問題，或合作社的組織問題。

政治教育形式之自願選擇的原則之採用，在少數的幾個月中即已見出良好的成績。在一九二七——二八

教育年度的開始，討論目前政治問題的或某些特殊問題的自願組織的研究社數目已見增加。關於本年的完全的統計還沒有得到；但根據隨手可得的材料，則關於黨的教育之危機與其改良的必要之討論，仍在繼續着，這些材料都認為是黨員繼續避免政治常識學校並愛好較有實用性質的與研究大綱較為普通的學校之趨勢。對於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時加入的大批新黨員之政治訓練的籌備，曾特別予以注意。大多數新黨員都已經受過學校中的研究社之基本的政治訓練；這些人都根據其過去所受的訓練與其自己的志願，審慎地分配於各種政治常識的學校或研究社或蘇維埃黨校，且甚至在這裏對於「候補者」應用自願選擇的原則；祇有那些未曾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的人，不得被迫進入政治常識的學校。

已經受批評說有嚴重缺點的政治常識學校的方法，仍在繼續應用。在一九二八年初，黨的中央委員會的鼓動宣傳部，對各級委員會的一切鼓動宣傳部與中央委員會的宣傳團體發出訓令，指示對於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應如何研究。根據其所附的研究計劃，在全體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中，且不僅在這兩種組織的所謂「活動分子」中，必須作有系統的研究。所以一切蘇維埃黨校，政治常識學校，以及代表會議，都要進行這種研究。研究大綱分成四項。第一項是「列寧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第二項是「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諸問題。」與一條附款論「列寧論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與黨在五年計劃中的方針。」第三項的標題是「在鄉村工作的諸問題，」並在第一附款中的第一個研究題為「列寧論鄉村的社會主義建設。」第四項是關於「國際諸問

題：「第一個研究題是『列寧主義與黨在國際問題上的路線；』而最後一個研究題則為『共產國際的目前任務。』此外還有各種特殊的計劃，定出一九二八年正月開始的對於十月革命十週紀念時加入的新黨員之政治教育的大綱。在過去於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新黨員之特別徵求中，有很強烈的『隨波逐流』（*drive with the current*）或『尾巴主義』（*tag along*）的傾向。相信在這次徵求黨員的新運動中，此種傾向或可減弱；但爲抨擊此種傾向起見，特別加重說明先鋒隊對於羣衆及對於其自己的階級之作用的問題。在新黨員中，或有許多百分數的工人從來沒有看見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他們知道些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工作條件，祇是間接的或多少是偶然的從描寫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生活的報紙上看到一些。這些新黨員應在他們的意識上明白地了解蘇聯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此點認爲非常必要的；據解釋說，與工人對於資本主義的工廠之態度相較，蘇聯的工業給其工人對於自己的工業以一種極不同的任務。

在政治常識學校與馬克斯·列寧研究社之上，有政治教育工作的高等教育機關。這些教育機關就是蘇維埃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個別的非黨員，有時可以進入前者，但決不能進入後者。蘇維埃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是嚴格的黨的機關，由黨來支持與管理。有時這些機關稱爲「黨校」，並稱其工作爲「黨的教育工作」；這些機關在事實上確是代表在政治教育的一般領域中之黨的教育。

蘇維埃黨校分成兩級：第一級的學校多見於較大的特區與較小的省城裏；而第二級的學校則見於較大的

省城與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二首都以及各民族共和國的首都裏。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有四十七個第一級的蘇維埃黨校與五十個第二級的蘇維埃黨校，學生總數共計一三、三二五人。自一九二五——二六年度以後，學生數目已有減少，這是因為政治常識學校的發展與較定規的蘇維埃黨校程度略低的短期夜校的採用之結果。進入第一級學校的報考者，必須能夠讀與寫，並懂得算術與代數，且必須具有簡易政治常識學校的大綱所定的基本學識。第二級的報考者，必須能夠寫報告書，且其所受過的政治教育須具有第一級的大綱所定的相當程度，或至少須有普通政治常識學校的相當程度。同時，學生之進入第二級蘇維埃黨校者，必須為黨籍或團籍兩年以上的黨員或共產青年團團員。地方的黨委員會按所分配的名額選派學生，並於其學習時期津貼學生的家屬。

蘇維埃黨校之另一入學條件，則為生產的資格，並補充以公民活動的資格。在莫斯科的一個第二級學校裏，三分之一的第一年級學生是五年以上的「生產者」，並全體學生都是至少參加了一年的積極生產工作；在紅軍中的服役，認為與生產的活動相等。這些學生的公民活動，包括了很廣泛的範圍。有許多人是做過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細胞的書記的，約有二十個是重要工廠細胞的書記；其餘的人是細胞委員會的委員。有些女子是細胞或地方委員會的婦女組織員，及為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的地方代表會議的負責者。其次則有村蘇維埃與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或委員。合作社的經理處與職工會的工廠委員會，亦有代表派到這集團裏。再有幾個黨的鼓勵宣傳的工作人員與鄉村讀書室的政治教育的指導員。大約五分之一是青年婦女，五分之四是青年男子。

在這第一年級的集團中共有二百十三人，其中一百三十四人是工人，四十九人是農民，與三十人是公務員。平均的年齡是在二十三至二十六歲之間。

在蘇維埃黨校裏，坦白地宣佈其目的為訓練煽動員與宣傳員。普通教育減少到最低限度；必要時，授學生以相當的數學、俄文、與自然史；但其主要的着重點則在於階級鬥爭史——即革命史、共產黨史、蘇維埃建設或蘇維埃政府的形式與功用。至如鄉村讀書室的指導員，合作社的經理，或工人俱樂部的組織員一類的工作，則無專門化的特種研究。這些學生普通都是預備做黨的工作，如做一切與每個活動領域中的領導者，如煽動員與宣傳員。「煽動員」的一個較簡單的定義是：拿一個單獨的觀念向一大集團的人衆解釋；而「宣傳員」的目的則在拿多種觀念的全部，向一較小集團的人灌輸。這兩個名詞用來，與「教師」一字有同樣的尊敬表示。這也是應該注意的：煽動員或宣傳員，都希望其不僅能解釋列寧的學說，而且能時常預備與準備對於在工人階級與在農民中的一切反無產階級與反共產主義的傾向，作堅決的反抗。

政治教育之最高機關為共產主義大學與學院，修業期間為四年。莫斯科的斯維特洛夫共產主義大學（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是這種機關之最大的與最重要的一個。這大學的校址是從前的一個私人教育機關之設備最完善的房子，而且其校長為一個最老的黨的工作人員。在設備方面說來，這可算是所看到的最好的教育機關。走廊與室內牆壁上的地圖與統計表是其設備的特點；因此學生正在工作的任務與問題，都

經常地以很簡明的意識形態揭示於學生的目前。一張很大的世界政治地圖在休息室中裝置得非常巧妙，使學生能坐在室內一目瞭然。

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主義大學創辦於一九二二年，並於一九二六年爲其所招收的各方工作人員之第二屆畢業期。這大學之較大的部分設在莫斯科，並以其較小的部分設在列寧格勒。畢業生約有二百人；在他們中間有立陶宛人、猶太人、波蘭人、白俄羅斯人、德國人、愛索尼亞人、與芬蘭人。有少數的非黨員亦得進入並畢業出來而未加入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修業的年限也是四年。全體畢業生，都希望其能在蘇維埃黨、或職工會的團體中擔任負責工作於其民族的所在地，尤其在鄉村區域。這些非俄羅斯區域的代表都能得到革命的無產階級中區的較廣大的經驗與精神，並學得俄文與俄國工人與農民的生活及其條件。在他們四年的修業期間，每年的夏季必須回到他們所派出的原來地方，以執行教學大綱所定的實習工作，並藉此與本區域的人民保持密切的關係。與家鄉的黨的工作人員之經常的通信，也是學生在首都的學習時期中必須的活動工作之一部分。他們又必須在俄國的工人與農民中間執行實習的工作。

孫逸仙共產主義大學是與其他高級黨校不同的一個機關。這裏的學生主要的是從中國招收來的，但在學生的團體中亦有印度人、日本人、與高麗人。其教學的課程，與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主義大學大致相同，但其訓練的重要部分，即是使這些來自東方的學生參加實習的活動於俄國的工人與農民中，比較有些困難。其他一般性

質相同的黨的高級教育機關則爲：莫斯科政治教育學院，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或烏拉爾·西比利亞共產主義大學，這些大學的目的，是在訓練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實際之合格的黨的工作人員。

高居在一切這些訓練馬克斯與列寧主義的學校與大學之上的，則有搜集這些領袖的著作與學說的學院。馬克斯·恩格思學院，已把這些領袖的著作及其註釋編成一部極大的文集，並在進行以數種文字出版他們的全集，甚至注意較切近的政治問題的，則爲列寧學院；在不久前完成了莫斯科一個中心廣場上的新建築，以爲該學院的總機關。這學院是一切列寧親筆的材料之貯藏所，並將負責出版列寧的全部著作及其註釋。

各種政治教育的學校都採用教學的實習方法 (the laboratory method of teaching)。某些教學大綱的概要，示明這種方法如何適應於課程的目的。分組集體研究問題的辦法也在提倡並實行到某種程度。但是，對一個聽者的集團作報告的習慣，是一切蘇維埃式的各種集會的特點，而且許多教員也覺得祇有用演講來授課，纔能在所允許的時間內得講遍各種題目。從所有不多的偶然幾次教室參觀與教師的談話所得的印象是：有建設性的討論很難得到，甚至當學生已在生產中與公衆生活中有廣大的實際經驗爲基礎時，亦難得到。

許多授課的工作是由在行政的與經濟的機關中站負責地位的黨員來充任。這樣，助成所學更切實用，同時這些教育機關可爲領袖們充作政治的與經濟的趨勢之優良氣壓表。這對於共產主義大學特別是如此，這裏的學生都與其所自來的工廠與鄉村保持經常的關係，並藉他們的問題與討論，得把工人與農民所想到的熱烈的

問題從活躍的政治生活中剖露於各教師的面前。

蘇維埃黨校或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在學習的第一年中並不令其作校外的公民活動。此後，在第一個暑假期間，他們必須回到家鄉，並在其所選派的團體裏工作。在第二年與自此以後的幾年中，學生必須執行某種最低限度的校外公衆工作。有許多學生被派到政治常識的學校裏做領導工作；其他學生則被派到工人俱樂部。在斯維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中，學生對於每小時的工作與活動都有記錄。「自制」(self-control)的辦法在起初不大通行，但後來纔承認爲一種有用的訓練方式。或有人要說：這對於通常的俄國人是一種新奇的辦法，因爲他們是向來不大看重時間的。有一特種工作室，指導、控制、與分析學生的公民活動。

在蘇維埃黨校裏，各有可能，招收一種小民族的學生。在作者參觀到的一個學校裏，學生完全是韃靼人。他們全體都能說俄語，但需要教他們讀俄文。在參觀的那一天，看見他們正在默讀關於十七世紀一個農民暴動的領袖——史丹卡拉秦 (Stenka Razin) ——的一首詩。一個學生被問到如何用現在的話語來解釋這首詩，他在回答中彷彿對一羣工人或農民做報告一般；由此可見這些學生正在準備的實際工作經常在他們面前表演。

黨員政治教育的宗旨，是要使每個黨員在事實上成爲黨的政治路線在其四周非黨員的工農羣衆間之執行者。一個負責的政治教育工作人員寫道：

政治常識學校是要訓練黨員成爲工人與農民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之實際的領導者，使他們能時常把自

己的問題與疑難提到黨員面前以求解答；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使每個黨員成爲宣傳黨的路線之精幹的煽動員，爲在非黨員的羣衆間這種路線的解釋者。

高級蘇維埃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的宗旨，與此大致相同，祇是要負些較大的責任。這些特種黨校的教師代表會議通過了下列決議案：

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了黨與蘇維埃政府在這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現時期的複雜與矛盾的條件中之黨的任務，這決議應是決定蘇維埃黨校所研究的內容之準則。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爲此後數年所扼要指出的現在鬭爭與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目前任務之理論的與歷史的背境與其根據列寧主義的解釋，應成爲在蘇維埃黨校中一切社會科學的教科講解之中心目的。

在一切黨校中的目的，無非是增進黨的活動分子之領導能力。在業工人，特別令其繼續學習，以超過黨員的必須條件以上。因此，企圖造成一種新的人才，叫做「工人宣傳員」(propagandist-workman)。政治教育的工人人員會有趨向於變成一種專門家的，甚至官僚主義的分子，且其宣傳工作的效力因以減低。據現在所期望的，在任何企業裏的宣傳員應該是本地地方的人，而不是被人看作外來人的派來的演說者或指導員。同時現在的趨勢是企圖在黨員中採用較多量的普通教育。他們認清了：良好的政治意識需要普通知識爲基礎，這種普通知識是爲從前盡量求速成的造就宣傳家與煽動家的努力中受着犧牲。祇是背誦口號的煽動方法，已開始喪失其

在革命的初期與較英俠的時期所有的效力。黨校的教學大綱是趨向於造成狹義的煽動員，不是造成真正的領導者。這種危險已為黨的領袖所承認，他們督促各黨員說：應利用最近開辦的夜校或大學自己發動來增進普通知識。這種學習也認為是黨員公民活動的一種義務之執行。

政治教育工作特別組織得好的是在紅軍中。這裏的條件特別利於此種工作；紅軍兵士在軍隊中的生活有兩全年，而且他們的全部時間，甚至在休息的時候，都在監督或至少在指導之下的。政治教育之一部分目的是在增進兵士的戰鬥員氣魄。但是，甚至在紅軍成立時國內戰爭的數年中，有系統的政治教育亦在進行，而與嚴格的軍事目的不相關涉。現在紅軍中的政治教育，與一般的蘇維埃教育相同，是一種普通教育的與文化的訓練，而尤注重政治訓練。一切這種政治教育的工作是受所謂「普爾」(Pur)的鼓勵宣傳部指導的。「普爾」是「共和國的政治管理處」(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之簡字，這是海陸軍事人民委員會的一個分部。

訓練紅軍兵士使之成為「戰鬥的公民」(fighter-citizen)之任務，有兩種執行的方法，「戰鬥的公民」一語係借用討論這題目時常用的術語。第一，有必修的政治課程，佔每日七小時訓練時間的二小時。這些政治課程的上課時間是在每天的早晨，這時候兵士的頭腦新鮮且在聽演講與討論中較能受益。其次則有課外的自願活動，大都在黃昏舉行。這些活動以兵團的俱樂部為中心，而且一團裏的每一單位都在其營房或軍營裏各有列

紀念處。因此，空閒的時候可利用之以作較普通的活動，如閱讀書報，研究社的工作，與關於政治與經濟問題的講演大會。

紅軍兵士之正式的學習大綱，首先注意到每年秋季新募的兵士之識字。在一九二五年，加入軍隊的青年有百分之三十是不能讀與寫的；在一九二六年，因上述的掃除文盲中心的工作在青年中組織起來的初步訓練之結果，已減少到百分之十二；共產青年團在此對於招入軍隊服役的團員，負有一種義務。於識字之後，纔開始實行爲這兩年的服役時期所計劃的政治課程的大綱。在第一年中，所學習的科目是普通的，祇常常注重政治的題目及其解釋。在第二年中，學習的科目比較專門且偏重在經濟方面，蓋留意到爲紅軍兵士服役期滿後回去做生產工作的準備。第二年的學習概要，現在手中沒有較完善的材料，但第一年的學習大綱，在本書所研究的題旨上比較值得注意。

在這第一年的學習大綱中，有一百十三次「談話」講授其相當的各項題目。這些題目分成數類。第一類共有十二個題目，關於解釋軍事服役的理由，軍事的組織，政治訓練班的重要，軍事訓練，軍事的秘密，刑罰與懲罰，與最後現役軍人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以及優待條例與特權。第二類是關於「防衛蘇聯的紅軍」，有下列各題：工人與農民如何奪取政權；工人與農民的聯盟；工農聯盟是蘇維埃政府的基礎；無產階級獨裁；我們的經濟政策；蘇維埃政府是工人與農民的政府；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聯邦；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蘇聯的各共

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與蘇聯人民委員會行政院的主席。

大綱中的第三類授以紅軍的簡史。第四類討論共產黨與紅軍；這一類的最後題目是：「列寧的偉大教訓即是共產黨的任務。」第五類的名稱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聯」；在這一類之下，每個國家都依次提出討論。大不列顛帝國為表上的第一名，並給以三次授課鐘點，而法國或美國則僅一個鐘點。第六類的標題則是這樣一個口號：「如果你要和平，須作戰爭的準備」；而其第一個題目便是討論新戰爭的危險。第七類的總標題是：「勞動者的國際組織」；首先討論「在敵人國家中我們的朋友」；其次敘述共產國際，「殖民地國家中民族革命運動的滋長」；並以下列題目作結尾：「紅軍是世界革命的武裝力量。」

第八類回頭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建設作更詳細的討論，包括蘇維埃政府的一般經濟政策。土地法與森林法特別予以注意。在第九類「外國資本家與蘇聯」的總標題之下，討論到對沙皇債務的否認與外國資本的收歸國有，以作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政策及對外國資本允許租讓權的概要之引論。各科的最後一類則冠以很廣泛的總標題：「紅軍是覺悟的公民底學校。」這最後一類題目，主要的是為教育農民的兵士。在此扼述農村的各種重要機關及其組織與功用；並論及鄉蘇維埃、合作社、農民互助會、國家保險、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細胞、鄉村讀書室與其軍事室，在鄉村的軍事準備宣傳，退伍兵士的特權與優待條例，以及為退伍兵士與團隊及整個紅軍繼續發生關係的設施。

在新兵每年給以短時期訓練而分成五年訓練的區域單位裏，政治的課程減少分量。這種政治教育的工作，是在第一並最長的時期做的。在第一期訓練之兩個至三個月間，研究政治的鐘點共有五十次，每次時間為一個半小時。在此與在兵士募入常備軍的地方之目的相同的。其計劃為藉這些演講與討論，以「準備一種覺悟的與訓練有素的蘇維埃政府的防衛者，使其明白了解蘇維埃政府的鞏固，祇有在加強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聯盟，並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纔有可能。」在此的政治研究亦在軍事訓練之前，並分成各小組來指導，以便舉行討論。一般的題目都與上面所說的相同，祇是用較簡短的方法來講授。

載有政治課程的大綱各書，都給以討論的綱要，以備這集團的指導員或領導者之用。為區域單位用的書，除了正式的大綱之外，還補充以完備的解釋，這都可在每個题目的第一鐘點閱讀。應行提出的要點，與事實上在每課中應做的結論，都以正確的文句寫出。藉這種方法，馬克斯主義的歷史觀與共產主義的政治觀得以保障。關於兩點的解釋特別有趣。在討論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和平政策時，指導員必須給以正確的指示；資本主義的各國政府之不可調和的敵視與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使這種政策須有相當的限制。第二點須要作審慎的解釋，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獨裁。聽演講的兵士，主要是農民。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必須加以說明，而行使這種領導權之黨的領導尤須解釋得詳盡。對於蘇維埃體制的這兩個基本原則時常欲作緘默的企圖，其結果祇有害處：這是予以加重說明的。農民的兵士，必須使之了解這些原則的必要與合理。

這些功課都是由常任的軍官來指導的，這事實使各項討論必須定出很確定的內容與指導方法，一如這些研究大綱與其所出版的補充書籍之所定。從前有特別的政治工作人員專任紅軍裏的政治教育工作，這些人時常是共產黨員。此種政治工作人員是從共產黨的黨代表發展出來的，此種黨代表派到每個軍事的單位裏，在其各種任務中亦有監視被招入紅軍做技術專家的舊軍官之任務。自從工人與農民中訓練出新的一批青年軍官以後，這種特殊的黨代表便不再用了。但他們仍舊留在軍隊裏做政治指導員。在最近數年中，這些特殊的指導員已被廢除，而政治課程的指導責任則由常設的司令部負擔，但有一個政治工作人員幫助指導員準備教科的資料。每一團裏都有這樣一個政治工作人員。紅軍有其軍事的學校；而且政治工作人員即在軍事政治學校裏訓練出來的。祇是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纔有資格進入這些學校。學習大綱中約有五分之三是規定作普通的與政治的教育，其餘則作嚴格的軍事訓練。最高的軍事教育機關是「軍事政治學院」這是特別為紅軍訓練政治工作人員的。

在紅軍中政治教育方面的活動中心，是在營房的俱樂部或列寧紀念處裏，或當夏季團隊露營在野外時則在軍營裏。因為訓練的問題，列寧紀念處佈置起來以作研究社的工作，並較工人的紅色紀念處為更有作用的中心，而俱樂部則祇為全團作羣衆活動之用。在列寧紀念處裏供給兵士以書籍、小冊、與現時的定期刊物。因為同一的房子又須為政治訓練班應用，所以這裏又有為正式研究用的材料，同時亦有表示這些研究成績的圖表。兵士

自願地組織各種研究社，這與工人俱樂部的研究社一樣是研究的集團。有些兵士取農學或電學爲其有興趣研究的科目。政治研究社時常是最大的研究集團之一。戲劇與音樂研究社，普通都以全團爲基礎，經較大的俱樂部組織起來。兵士通訊研究社亦是各團一律都有的，該社將同時對團裏的壁報供給積極的編輯員。再應說到的，就是兵士通訊員又與普通報紙及軍事機關出版的特種報紙通訊。在夏季幾月中，俱樂部與研究社的活動大加縮減，而體育則爲例外，但當團部到野外露營時，列寧紀念處也帶去，並變成「列寧幕」(Lenin Tent)。外面的政治工作人員也來幫助其演講的組織與研究社的活動。

在區域的單位裏，則既沒有時間，又沒有設備，不能在兵士服役的短時期內作校外的活動。在兩次受訓練的時期之間，希望兵士能參加於工人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一類的活動。他同時要在這些機關內負組織軍事室的責任，這樣實有助於他自己的軍事訓練與一般工人與農民的軍事準備。區域的研究，利用之作爲軍事訓練的基礎；區域研究者時常在其研究社、職工會、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的區域研究中，注意到戰略與一般經濟富源的問題。

在政治的研究中對於報紙與時事新聞的利用，似乎在紅軍的政治教育工作中做得最爲完備。兵士比較工人或農民有更多的空暇時間以閱讀報紙。在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比較其他任何機關（黨的機關也不例外）的政治工作人員更爲訓練有素，而且「不需過多的印花板模型」（引用共產黨領袖的話）而能活用政

治教育的方法。在某團的營房中，看見一種饒有趣味的指導閱讀報紙的方法。在一塊大板的中央有一張世界地圖，在地圖的各邊貼着幾條外國時事新聞。在每條新聞上都有一根線通到地圖上這件事情發生的地點。我們參觀這營房，正當宣佈波蘭干涉蘇聯的計劃的時候。在另一塊板上貼着關於波蘭反對蘇維埃的各項新聞。還有一個關於波蘭的簡短書目貼在這公報的板上。

紅軍兵士的政治訓練又以實際參加其四周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生活而作進一步的發展。已經說過了，兵士亦得參加蘇維埃選舉，並有代表選入蘇維埃。合作運動亦有其支社設在營房裏。工人的兵士祇在其服軍役期間是職工會的消極會員，但當他從紅軍裏回來時，他就不需任何形式而恢復其在職工會裏的活動。因此，他仍繼續對於職工運動及其發展發生興趣。工人對於兵團的扶護社使之與生產發生密切關係。在區域的單位裏，則兵士在一年中祇是短時期脫離生產。最後，兵士的農民家屬經常與他通信，告以自己的困難，希望其在城市裏的兒子對這問題能有幫助。這種通信是受鼓勵的，並藉此以使農民的兵士得與鄉村生活保持聯繫，且得與鄉民質問到或訴苦到的行政機關發生聯繫。據說這一切事情都使兵士的政治研究與活動具有更切實的形態；因為在蘇維埃制度下的軍隊是不許與整個國家的生活脫離關係的；且是事實上被積極地導入四周的社會生活中，並導入革命的政治鬥爭與其文化成績中。

在服役期間的最後數月中，有政治訓練的集中；政治課程的鐘點與各種研究社——尤其關於合作社，鄉村

讀書室，與蘇維埃建設——的活動時間，特別增多。希望用這種方法能保證退伍的紅軍兵士積極參加這三方面的活動。這種訓練具有略較實用的性質；其方法為令社員做報告並根據這些報告提出問題與舉行討論。希望每個退伍的兵士，能為鄉村讀書室或區域單位的訓練中心開闢「軍事準備處」(Military-preparedness Corner)的主動者；倘若已有這種軍事準備處存在，他須助其繼續發展與大衆化。所以關於退伍兵士於其回到工廠或鄉村時須加特別注意的特殊問題，是在其服役的最後數月中給以圓滿訓練的。

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是引導至少在兵士中被選舉的積極的分子進入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的特種經理人。在紅軍的每個大的單位與在許多較小的單位中，都有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細胞。這些細胞與黨或青年團的其他細胞不相關涉，並且是置於「普爾」指導之下的。紀律的必須條件使這種辦法成為必要。但是，紅軍的細胞並沒有完全脫離黨的活動，而且黨員個人仍須執行其公民活動的必須任務，但因兵士有其特殊的義務與必須執行的任務，其公民活動則有相當限制。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領導各種自願的活動，如成立研究社之類。一般地說來，細胞是一團裏的公民活動之另一中心，有時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的細胞統轄俱樂部或列寧紀念處。許多人當其在紅軍裏服役的時候加入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一般人覺得入黨的最容易條件即施行於紅軍兵士間。在一九二六年，五十二萬個紅軍兵士中有五萬共產黨員。

軍官與兵士的關係已在論蘇維埃國家機構的一章中討論過了。在此要指出的是這裏所用的「軍官」

(officer)與「兵士」(soldier)二字已在蘇聯的字典中廢除了。全體都稱「紅軍」(Red Armyists)有些是發號司令的人員，而其餘的人則都是在較老與較有學識的同志指導之下，來執行其應盡的軍事服役的義務而已。在軍官與兵士之間有更好的同志關係，這是毫無疑義的。軍禮亦加以簡單化，並減到最低限度。傳令兵的制度已加廢棄。肩章亦已廢除，官長祇用外衣領口上的小小標記來區別。但是紅軍有其紀律與其規則。共產黨人主張在舊的軍隊中引用的委員制，在其新的紅軍組織中已不採用了。據解釋說：已發展到選舉軍官的委員制在過去是必要的，因為要保護工人和農民的兵士以對抗出身於其剝削者階級的軍官。現在，軍隊是工農的紅軍，這裏的指揮人員是由工農的政府派出來的，並且大部分是從工人與農民階級出身的，所以委員制再沒有採用的必要；這是他們所解釋的。因此，自治的原則不復見於紅軍中，祇有合作社或研究社的組織是例外。

在紅色海軍中，服役的年限比較長些。政治課程的大綱差不多與在紅軍中所用的相同，祇因分攤在較長的服役時期中比較不那樣緊張。在軍艦上與在海軍大本營中，在小集團內組織校外活動亦有可能，但因自然的條件關係，其與四周的生活接觸祇能在很有限的範圍內組織起來。為要適應這種情形，所以決定使共產青年團來負扶護紅色海軍的責任；又因自然條件的關係，這種扶護工作的實施亦是難於組織。演講與參觀的組織與由共產青年團機關供給書籍；這似乎是此種扶護工作所能做到的範圍。因為蘇聯的海軍在目前規模甚小，在這裏的政治教育工作亦沒有像在紅軍裏那樣大的規模。

在紅軍兵士中之有很具系統的政治教育與訓練的組織，其原因是很明顯的。藉軍事的服役，一大羣青年農民引入城市的中心區，並於其兩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在這些中心區的無產階級空氣中度日。在這裏，這些農民又得認識工業的行程，尤其認識組織工業的蘇維埃形式。他們學得大規模生產的集體方法與技術上的方法，並學得城市工人的工會組織法。同時，他們又能藉陳列館、戲園與其他文化機關的設備，得以參加到城市中心區較高的文化生活。鄉村共產黨人在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細胞裏學得黨的組織與領導的更好方法。紅軍把一切這些觀念帶回他的鄉村裏，並希望他不僅能幫助農民的文化發展，而且能幫助農民與工人階級的聯合。紅軍就被稱為改造農民羣衆的實驗室。

在政治課程的大綱之下，紅軍兵士首先教以爲什麼他必須費其一生的兩年光陰去作軍事服役的原因；他是被徵調去守護革命的戰利品——農民的田地與工人的工廠。區域制度被解釋爲一種減輕軍事服役的負擔之努力。他須於服役期滿後積極參加軍事準備運動（the military preparedness movement），這又是減少國家與常備軍兵士個人的耗費之努力；這是他們所解釋的。當他已完成這種準備自己爲革命的戰士之特殊的義務時，服役的期間將利用之以使他成爲更有用的與具有生產能力的公民。在其他題目的討論中，在一切公開的大會上，與在研究社的活動中，經常地提出這幾個要點。其次，每年有紅軍成立的週年紀念之公衆的大慶祝；這是蘇維埃體制的一個政治紀念日。一切報紙與團體都以關於國防問題的文章或集會來紀念。這些事情又對紅

軍在日常生活與政治上的地位作進一步的加重說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正式的政府機關報「伊士維斯太」發表關於八週紀念的一篇文章，題名爲：「紅軍與蘇維埃的公民活動」內有下列的文句：

在紅軍的週年紀念日，讓每個黨的工作人員，每個經濟上的工作人員，每個工人，每個農民，每個蘇聯的公民，向他自己與向他所屬的團體報告他已經怎樣執行了他在軍事上的義務……因爲祇有藉學校、俱樂部、讀書室、公民團體、體育與競技，並藉文學軍事化一類的工作，來發展軍隊以外的軍事訓練與操練，我們纔能減少軍事服役的年限與維持常備軍的耗費。

紅軍兵士的「政治教育」負擔是很重的。在一九二七年，紅軍中有七百一十個俱樂部，約有七千五百個研究社，近六千個的列寧紀念處，超過六千五百種壁報，差近七萬五千個兵士通訊員，以及九千五百所紅軍圖書館，內有八百萬本書籍。這是可能的，許多人都歡喜出去散步，看看陳列館，或聽聽俱樂部中的講演。但是政治的課程把操練的鐘點減少了。同時其他的活動對於青年農民是頗新奇的；並且從在陳列館裏時常遇到的幾隊兵士的面孔上看來，覺得他們對於這些新穎的事情具有真正的興趣。在俱樂部中的戲劇表演、活報、與音樂晚會，都有娛樂的成分，雖其主要的內容，甚至在歌曲中，將加以選擇，要能表顯革命的原則與提起革命的口號。下列故事是最近在一種論紅軍的共產黨人著作中以顯然滿意的態度述出來的。一個退伍的紅軍兵士被人問到他在那年的軍事訓練中學到了什麼，他的回答是：「機關鎗與政治。」

在政治教育工作中，共產黨人都知道有四種成分：黨內的研究與訓練，一般的政治教育，行政上的政治訓練，與在政治組織方面的訓練。一切政治教育的基礎是共產黨。在紅軍中這些多種的訓練成分最爲完備，因爲共產黨藉其細胞與對紅軍兵士政治研究的控制，成爲紅軍中唯一的政治領導者。在黨員政治教育的高級機關中有軍事政治學院，以一個初期的紅軍領袖托爾馬雀夫（Tolmachev）的名字爲這學院的名稱。這學院與共產主義大學同屬一類的機關，它供給政治課程大綱的材料，並領導與指導紅軍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本章所述的祇是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現象。掃除文盲的任務是在政治教育的範圍以內的，且在目前自衛統治遺傳下來與在新制度下滋長起來的文盲人數之多，使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減輕注意。對於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員，即前面有一章中所稱的自覺負責的公民，特別注重於特種的政治教育。但是非黨員的工人活動分子，亦允許其分享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員的這些特種學校的教育。在婦女與紅軍兵士中特別注意其政治教育，兩者的原因恰恰相反，婦女是最難受教育的，而青年兵士則是最容易受教育的分子。其次，在最近幾年中，因鄉村讀書室發展而成爲政治教育的中心，全體農民已是政治教育方面的主要對象。

第十四章 文學藝術與劇場

此處所論述的革命後十年來的文學、藝術與戲園的發展，祇是一般的，而且常常是從公民訓練題目上着眼的。一般地說來，劇場、文學與藝術用以作有系統的與廣大的政治宣傳及政治訓練的，尤其是劇場。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討論得很多，無產階級的文化已有其機關與組織的成立，但一般人承認經過第一時期的熱心，以後在這方面的努力必遇到一種長期的與困難的任務。但發展藝術表演的訓練同時用以作政治覺悟的訓練。若遇這二種成分不能兩全時，則政治成分必不可犧牲。例如，我們已經看到紀念儀式必須常有革命的階級覺悟的成分，雖藝術形式的成分或亦加以重視。

因為此處所述的都是很一般的，所以把文學、藝術與劇場三者合在一章裏說過去。電影的俄文簡字是 *Кино*，它和無線電都因其物理的特性，當用作政治宣傳時，獨具特異的方法，比諸劇場與文字二者能起較廣大的作用。下面一章將述及蘇維埃制度中的電影與無線電。音樂則在廣義的劇場中都同時表演，且亦藉無線電來播送音樂，已在好幾處提到過了，在往後討論這兩種設備的兩章中亦將予論述，但在討論無線電的一章裏，因其能及到更廣大的羣衆，將予更着重的敘述。這種分類是相當權宜的辦法，但以下對各種特點的加重說明，將指示

此處所採用的敘述法的邏輯。

當代的文學家大都是對十月革命及其主義仇視的。祇有幾個少數的例外者。高爾基是否爲這些例外者之一，或許還有問題。他對農民所表示的堅強與坦白的不悅，無論如何即可使他站在模稜兩可的立場。在最近幾年中，他自願地流放外國，實際上的意義就是從積極參加新制度的文學生活中退休。（高爾基回莫斯科作六十壽辰大慶祝事，以下將予論述。）其他顯然的例外者是亞力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據著名的蘇聯文學批評家說：他企圖「把基督教的愛與革命的暴動混合起來，並把神祕主義與唯物主義混合起來；」很快以後他「於這些矛盾在他的心靈裏起了決裂時，犧牲於這戰鬥中。」比高爾基與勃洛克在外國較不著名的詩人維也遷斯拉夫依凡諾夫（Vyacheslav Ivanov）已在砲聲隆隆與內戰中退休，入其所愛好的希臘人世界，而重返其少年時期的生活；他與許多別的人一樣爲新制度的獨裁與恐怖所離棄；這是一個蘇聯當代文學評論家所說的大意。很快以後，更大的一羣革命前的俄國作家都逃亡出去。其中許多人在其外國的放逐中仍繼續寫作，但他們的最近作品在蘇聯沒有影響，因這些作品不准自由入境與流通。

在革命的初期，並未產生新的散文作家，要在這時期找尋此等作家是毫無理由的。這時期的文學是宣言散文與政綱的文學。但是無產階級的詩人卻已出現了，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台孟培德尼（Demian Bedny），此處將以他爲這類文學家最卓絕的例子。這個無產階級詩人的主要特點是革命的熱忱——例如他熱烈信仰世界

革命之急速成功。這就產生了稱頌勞動、工廠、鐵與鋼、及肌肉的讚美詩。他企圖在詩中表現唯物主義的與集體主義的觀點。這些無產階級詩人起初是年紀較大的人，他們是在舊制度中受到訓練而沒有到戰線上去的。現在他們變成新生活的詩人，且其題目總是：工人的郊外宅，在赤色旗幟下，或為鬪爭的歌曲。工廠是工人階級受苦的策源地，但也是他的力量與團結的策源地——這就是此種詩的常用題目。這些作家的特點是對世界抱定共產主義的觀點與富有革命的情緒，他們完全是革命的忠實擁護者。但這革命初期的無產階級詩無寧趨向於抽象。這種詩祇限於抒情的，而對工人階級的生活與狀況祇作很普遍的描寫。在這種詩裏特別覺得單調，也沒有新的體裁創造出來，所以在這方面據蘇聯的批評家說：無產階級的詩「還是資產階級的詩的附庸。」

無產階級的詩受一九二一年所採的新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許多共產主義的詩人，對於退讓革命初期的軍事共產主義之原則與實施的新政策不願接受。當他們看到資產階級分子及其思想重在文學上也擡頭的時候，他們的信仰動搖。但他們為一個強大的集團所反對，這集團的刊物叫做「職責所在。」另一集團在「少年先鋒」的周圍團結起來，代表新進的分子，因此被認為對革命的文學大有希望。參加這第二集團及幫助它的還有些老輩的共產主義的政論家，其著作大半是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

共產主義者的領袖告訴我們說，在這第二集團中可得「洞見未來的文學，」這是一種在音調上充滿生活的愉快、希望、與毅力的文學。這已經不是從前那種對革命作抽象寫法的文學了。在新經濟政策下的建設時期中

每天的事實，都是寫作的題材；這些作家不怕寫這樣細小的事實，因為去做最細小的事情和踏上革命綱領中之每一步驟均成爲必要的了。一個蘇聯的批評家在描寫這集團時寫道：「他們對革命最後勝利的信仰始終不動搖。」對於細小事情之感興趣，成爲革命第二時期中無產階級詩的特點。這集團的一個作者之下列詩句，已建議爲這集團全體的箴言：

把星球如地上泥塊一般地顛來倒去，並在電的詩中吟詠宇宙這是甚善甚美。可是現在還要你表示能
在一個小小省委的主席討論森林問題的活動中，感覺到前途的曙光。

無產階級的詩人已成立了學社，工作室與類似的組織。他們是初期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即所謂無產文化 (proletcult) 中的活動分子之一部。這種無產文化，在國內戰爭與經濟破壞的時期中，必然是多少胡亂的，祇要經濟來源可以設法，這運動總是受到維護；同時檢查的條件亦對無產階級詩人有益。現在則有無數的無產階級詩人與無產階級作家的組織，團結在工人俱樂部、壁報與一切羣衆的報紙之周圍。

詩的表情形式成爲對無產階級青年分子特別強有力的宣傳品。在一個無產階級讀詩的晚會上，我在莫斯科得到參加的機會，見其聽衆大都是青年，其中許多人顯然是工廠裏的工人。一個關於無產階級詩史的開場報告未能得聽衆的歡心；報告者是一個知識分子，且顯然是被派來作一簡短的歷史報告的；他是一個不可忍受的笨拙者，而這班青年也不遲疑的表示其厭煩。但無產階級的詩人自己登臺並誦讀其最近的作品時，聽衆的興趣

頓覺濃厚。少年蓬勃的藝術家與幾個較著名的詩人都列在晚會的節目中。其詩句充滿了革命的熱忱，而這班青年人傾心聽其誦讀的詩意。時常在與青年的談話中——譬如與鄉村的民警隊長及與莫斯科旅館的助理會計——知道他們是無產階級的詩人，並極以自己在這種場合活動為榮耀。

在一切種類的報紙上——在中央的機關報上，尤其是在為工農刊行的羣衆報紙上——詩都佔了廣大的篇幅。台孟培德尼是伊斯維斯太及真理報的經常投稿者，他的題目常是政治與經濟的時事問題。工農的通信詩常用詩的形式寫出來。這種詩是否通順固成問題，但在蘇聯廣為利用的插畫與諷刺畫插入其中，使這些詩句便可充作輕描淡寫的篇幅；蘇聯的報紙，甚至更通俗的羣衆報紙，通常都以篇幅繁多而且「內容充實」為其特點。壁報上也有許多篇幅留給其出版團體之各分子投載短小的詩稿。

文學上的「未來派」正當革命前在俄國也活動起來了，他們確定地同意於革命，並迅速對其維護與服役。他們像無產階級的革命一樣，痛恨矯揉的小資產階級的語氣與態度，並在相當意義上也要求闖破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基礎。但不久後，對於未來派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問題起了爭論。有些人深信放蕩的未來派確實同化於無產階級中是不可能的。馬耶可夫斯基 (Mayakovskiy) 曾是未來派傾向的領袖之一，他也像無產階級的詩人們把街頭巷尾甚至溝壑的醜語都引用在他的大作中，甚至在句法上以白話代用文言，而且減少音律的重要性。因此他就反對舊有的習尚，並至少在這基礎上來參加新制度的建設。但許多人對他這些

方法能否使他自己易入其所稱頌的無產階級之門，尙抱懷疑。馬耶可夫斯基和他的一派人當初確曾在藝術大衆化上做了許多扶助的事情；他之成爲「跑街的詩人」即是一例。馬耶可夫斯基又對那些企圖創造所謂「生產藝術」的建設主義的戰士供給材料，那些人認爲一切包括文字語言的藝術都是物的建設。這派人稱爲「左派」，取左字的激進意義，把左字 *Left* 縮寫成 *Lo!*，可是他們的注意力漸漸祇趨向於形式方面，並如一個蘇聯的批評家所說的，「減弱其直接採取四周的實際事情之意識」，以致脫離羣衆。

國內戰爭的終了與新經濟政策下建設時期的開始，對革命的「文化戰線」招致更複雜的任務，但同時亦引起更大的注意，無產階級的詩，未來派的主義，以及革命前的傾向，均能更自由地發展，推廣他們的見地，並充實他們的形式與內容。尤足注意者，爲一羣經過國內戰爭的游擊戰爭中的游擊隊，或戰爭與經濟恐慌條件下受無窮的行止不定之訓練的新近少年作家之加入。其中許多人曾服務於革命初期各種與軍事及政治鬭爭有關的組織裏。一切在革命初期僅以一般形式提出的問題，現在必須更具體的去研究。同時這些問題成爲更劇烈討論與爭辯的題目。最後，從新經濟政策所產生的新條件中，在文學上也發生了一個集團，此即托洛斯基很巧妙地稱爲「同路派」者是。

同路派就是那些祇在形式上接受革命，而不一定完全了解革命的任務，不一定富有革命的精神與較深刻的革命志氣的著作家。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可以「革命事業」相託付的；他們以其階級身分或階級僻性的緣故

力難勝任。他們未曾是共產主義者，並未曾確實了解共產主義的政綱。他們中有些人對於現代的生活有採取傲世態度的趨勢，但對於資本主義的秩序亦取同樣態度，並因此「在反對日趨滅亡的舊世界之鬭爭上，給革命以一臂之助。」他們即在後一意義上稱為同路派，雖顧名思義可知他們對於自己與革命同路之點何在是不清楚的。

例如農民的詩人，與無產階級的詩人相反，祇能認為是同路者。他們描寫農民的生活，並介紹田野與森林間的新鮮，甚至稱頌農民的宗教生活，常把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對立起來，而以前者為較勝一籌。他們對農民的暴動精神，對他們奪取土地與攻擊地主階級的革命手段，歌詠讚美詩。但是一個蘇聯的批評家說道：他們自己卻已表示其不能同化於革命的有組織的計劃及其嚴格的紀律精神。另一批評家稱他們為蘇維埃的「農民主義者」，借用昔日稱以農民政綱為根據的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名詞。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特別是列寧的一派，對這種農民主義的傾向曾作最劇烈的鬭爭。

同路派的題材主要的是採取革命的事蹟。近年來文學上的最佳作品中有些就是這一類的著作，描寫革命的條件下之現代生活。特別對鄉村的生活作形容畢肖的寫真，並聽說寫得非常真確。有一個作者描寫反布爾塞維克的知識分子與舊官僚階級的生活狀況，其題名為「白衛隊」。這本書的出版，是分期刊行的結果，沒有連續出版完，但後來把這故事編成戲劇了。這種關於革命初期的反革命運動之在舞臺上的表演，以後將予論述。但是

同路派如果繼續贊成革命，他們可在革命的一切方面選擇題材。同路派有開發俄國農民潛勢力的功績，這種潛勢力甚至為前此描寫農民生活之最能幹的作家所不能見到的。「地主資產階級時代」的作家——如托爾斯泰、柴霍夫、或布寧——從來未能探索到這些潛勢力，這是共產黨人常說的。這類作家即藉描寫其新發現的農民特性成為同路派，他們把這些新勢力或歸功於共產黨政綱，或祇視為革命時代的產物。

據共產黨的批評家說，同路派文學的一般性質是具有深刻的「現時代建設精神」，事實上這派文學是對革命價值作總的重新估價。這派文學特別是以「積極主義」來代替「消極主義」的反映。表面的事態是其注意的中心點；且對地理上的區分，社會集團，與時事問題都作更細心的研究，以使用文學的形式把它們描寫出來，這是革命前的作家所不及的。總而言之，這派人使文學更接近於人類論、科學、與政論家的作品。另一蘇聯的文學批評家覺得甚至這班文學家所描寫的事情，幾乎時常都是可以用各種總名詞來命名的事情，例如「紅軍兵士」、「農民」、「烏克蘭人」、「宗派主義者」等等。這派作家又描寫「舊勢力與新勢力間的衝突，這些衝突的總和就叫做「十月革命」。

革命前的俄國古典文學，在蘇聯的文學生活中仍有強大的影響；這是指舊制度遺傳下來而須充分利用的那些作品，在一切機關的圖書館裏，這些作品顯然是最能取悅衆人的。在莫斯科較大街市的書舖裏，及在每年定期陳列的街道書攤上，十九世紀的與革命前的舊版書籍售價都很低廉。時常有舊資產階級的家庭，因受經濟壓

迫，不得不拋售其藏書，而工人與新興資產階級則購買此等書籍。在鄉村的讀書室裏，若遇昔日地主家庭的圖書未被毀壞，則往往利用之，至少利用其一部分。曾有一個時期，對這種書籍嚴格限制，禁止許多革命前的書籍在羣衆的圖書館與讀書室裏採用；祇是如托爾斯泰一流的嚴格文學的著作得予採用。在托爾斯泰文集的通俗本裏所刊行的祇是文學上的著作。且在一切俄國古典文學的新版本中，著者的社會與階級的身分時常在序言裏很留意地加以說明。例如一個著名的蘇聯文學批評家對托爾斯泰及其著作作下列的介紹：

世人祇能按其目前利益所定的實用目的而相當接受他的概念，從他的堅勁辭句中，祇能採取其符合於生活的一般運動與羣衆的要求的一部分。人生是不能等待的，而且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畢竟不再相信懺悔與祈禱的力量，並不要再聽謙卑與忍受的宣傳。羣衆不願想望那種爲幸運的、無情的、貴族式的托爾斯泰的心靈所洞見的高尙目標。但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暴行、自私、與剝削的辭句，確是從誠實的心坎中發出。當他號召調和與消極抵抗的時候，事與願違，他的學說事實上散播了造反的種子，並激起仇恨的惡感。

十九世紀中葉的詩人嚴克拉索夫 (Некрасов) 也大爲介紹，且其著作亦廣爲普及民間。當他死後的五十年紀念中，在真理報上差不多有一全頁專載評論嚴克拉索夫的文章。有一篇文章評論他是「怨恨與悲哀的詩人」，因他所描寫的是農民的受苦。他指出這個作家對十九世紀六十與七十年代的革命知識分子發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於馬克斯主義的布列漢諾夫也受了他的影響。許多其他的革命工作者，都承認他們得益於嚴氏不

少。另一個批評者指出嚴克拉索夫的偉大力量是由於他的著作之簡單與使一切人都可了解的體裁，「給貴族出身的詩人之浮誇的詩以致命的打擊。」巴克洛夫斯基（Болотовский）於一九二一年寫了一篇論文，巴氏是著名的馬克斯主義的歷史家，茲將其原文介紹於下：

嚴克拉索夫本身並未成爲社會主義者，但他在其寫給知識分子的讀物中，知道如何喚起激怒的恥辱觀念於徒手做工的人們之前，於那些以粗糙的手來勞動而使吾人得在文學與科學中埋着一種已使許多知識分子變成社會主義者的意識的人們之前……在一九一七年中，俄國的知識分子對於勞動者奪取政權的回答是在藝術上與科學上怠工，此時他們已忘了嚴克拉索夫。可是在俄國的無產階級看來，這貴族詩人的恥辱意識，都是爲什麼無產階級應回憶嚴氏爲他們自己的詩人之一的另一原因。

在革命初期的幾年中，高爾基是一個接受新制度的文學家之一顯明的例子；雖他在革命前已常與革命的政治方面接近，但這還不一定使他能被認爲是這樣的文學家。彼時列寧與高爾基已有個人的密切關係，而且這個領袖對這作家有時稍離列寧主義的真正道路也予原諒。後來，高爾基退居外國，是因爲身體不好，並有人猜想也有政治的原因。他的筆頭所寫的文章，那時卻在蘇聯的報紙或雜誌上很少發表。但在他的六十壽辰將到時，他被選爲「無產階級作家的鼻祖。」在他答復一個高級技術學校裏的文學研究會問他是否爲一個無產階級的作家之信中，高爾基對「無產階級作家」這個術詞，按他的了解作如下定義：積極痛恨一切壓迫人類與阻礙其

能力之自由發展與長成的東西；並無情地痛恨寄生者、庸俗漢、傲慢者，與一切形式與一切種類的毫無好處的人們。這封信是在一九二八年初寫的，其結語是：

你們當然知道蘇聯所提的完全廢除武裝的計劃，已為在避免生靈塗炭的性質上信仰進化理論的文明人所拒絕了。我們必須了解並記得國際聯盟所表示的這種卑鄙怯懦，無非是歐洲文化的完全破產，並明顯暴露這種文化真正反人道的本質。假如你們要成為誠實的人，你們必定要做革命者。

一九二八年三月，高爾基回到莫斯科，參加其誕辰的慶祝典禮；這事成為一件大規模示威運動的基礎。工人與農民以及知識分子都來參加慶祝他的集會與遊行。他的著作之取悅衆人，特別是工人，已在各圖書館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對高爾基的慶祝都當作一件文化上的大事看；這次慶祝能哄動一時，甚至不能讀與不能寫的工人與農民都來參加，可見在最近數年來，文化上有顯然的發展。一個真理報上論文的作者，在他發表這種意見時，喚起讀者注意蘇聯還有許多半開化、無知、與「流氓」的現象，這「文化的景色」各種顏色是很豐富的，但黑暗的分光線也是很多。但他看到「向來在各種工人俱樂部教育與文化的晚會上，仍常有擾亂秩序的醉漢糊塗與流氓行動，」尙未在高爾基的紀念日發生，覺得滿意。

在此羣衆讀書的習慣漸漸發展之時，舊的古典文學也日益為衆人所愛讀。在蘇聯的報紙上載有工人的話，表示他們願讀與自己生活不同的各種文學作品。農民要讀技術上的書籍比讀革命的政治書籍興趣濃厚。無論

何時，凡在參觀或注意到一個圖書館的時候，誰若問起舊文學書是否在讀者中廣為流通，則其答案時常是肯定的。在一個婦女治罪機關的小書架上，也可大致決定彼處所供給的讀物是何種性質；革命前的書籍比直接宣傳的革命文學書還要陳列得充足些。可用的讀物之有這兩種絕然不同的區分，就提示了舊的古典文學通行於民間的問題。

一種為新制度兒童閱讀的新文學書，已成為共產黨領袖之另一先入為主的辦法。舊的童話，甚至人類的故事不僅認為無用，而且簡直認為有害；無論如何，這些童話是不適宜於蘇聯教育制度的綱領與一般的教育宗旨。在各書店鋪面的陳列中，可看見冒險的故事，革命時期的兒童英雄，以及列寧與其他領袖幼年時期的故事等書籍。兒童先鋒運動也出版小書，敘述模範兒童之偉業。有系統地準備兒童文學書正在長足進步中，但是尚在初期狀態。兒童先鋒運動的定期刊物，正以時常引人注意革命的英雄主義與革命的征取而埋着「思想的基礎。」無論在何場合上，對兒童也是一樣，文學是反映新制度並同時具有其獨特的意旨。當代的作家寫給兒童讀的是其校中的工作。無產階級的詩人台孟培德尼的著作特別介紹給兒童閱讀，並加以利用。在預備關於現代生活的題目綱要時，這種材料的來源是必須給兒童利用，甚至給低級兒童利用的。因為台孟培德尼不僅認為是詩人政治家——新生活的探求者與宣傳家——而且認為在他的活動中是循循善誘的。同時編輯教科書以助教員向兒童解釋這些作者，而且這種解釋常是馬克斯主義的。此外，教員又參考許多馬克斯主義者筆頭所寫特種

書籍與論文，以了解每個最重要的當代作家和整個當代的文學。

在論述蘇聯的報紙時，我們已申述大衆之參加新聞記者工作，如投稿壁報及加入工人通訊社、農民通訊社、紅軍通訊社等組織。當向壁報或向定期的出版物投稿時，工人、農民、紅軍、職員、學生與學童都被邀描寫他們所看到的自己團體中的一般生活。投到壁報或定期的報紙之稿件，有些具有真正的文學價值，並爲蘇聯的文學批評家在此觀點上加以討論。這些純正的作品，在其思想與內容上都是代表共產黨人所努力的理想，即是反映現代生活與在這生活中成爲生產因素的人們所創作的文學，向壁報投稿與在壁報內部的工作及通訊員的活動，都是由一切機關的文學研究社所組織的。這些文學研究社又具有較廣泛的宗旨，幫助其社員研究與正確了解舊時代與新時代的作品。

無產階級的詩人已爲革命編出許多歌辭。在這方面，台孟培德尼又是其中寫作最多者之一。在各城市中區通行的一種歌曲叫做「小磚塊」。這歌的樂譜具有標本式的俄國低半音的調子，但同時能表現鬪爭與成功的精神。這歌辭的原文是描寫一個在磚廠裏做工的少女的生活。雖勞動條件困苦艱難，她卻一心一意求工廠與其生產的進步。別的人再添上新的與不同的辭句。有一段敘述小磚塊的歷史。這些磚塊曾爲資產階級用以建築工廠，在廠裏剝削工人，但後來工人奪取這工廠，並在戰鬪中把它毀壞了。於是工人們就用這些磚塊來作巷戰的障礙物；當他們在反對資本家的戰鬪中獲得勝利時，他們重新建造這工廠。因此，他們就對現在成爲建築自己工

廠的原料之小磚塊非常愛護了。此外還應注意，舊式的俄國歌曲易達革命的詩歌目的。這就是指那種分段的歌辭（*chastushka*），這是一種通俗的、有音律的、與歌唱的小調，其內容是根據個人與個人間，或個人與團體間，關於日常生活問題的談話。這種歌的新歌辭也有大批編出，有些為共產青年團用的，有些是為紅軍用的，其他是為一般的工人農民用的。

其他各國的文學，革命前的俄國讀者嘗藉繙譯得以閱讀，並且俄國的學者階級曾對西歐的著作表示很有興趣。在現今蘇維埃制度下的私人出版事業極受限制，繙譯外國書的選擇，都在政府與黨的統制之下來計劃的。技術上的傑作被這些黨政當局認為較國外資本主義世界的思想來得有用。技術上的著作，甚至屬於教育方面的，已繙譯得很多，但是介紹西方各國的文學作品於新進的蘇聯工農讀者都較為稀罕。描寫各國生活的一般著作繙譯得較多，但在此的選擇都是根據上述的蘇聯文學所定的目標進行的。好比美國的生活，則譯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書來閱讀，左拉（*Zola*）也是最通行的外國作家之一。

當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全聯邦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組織了一個國際的大會，到會者有四十以上的外國代表。龍那茶而斯基（*Lunacharsky*）在大會上對無產階級的文學作如下的說明：

無產階級的文學應對已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的新人物作藝術的與綜合的描寫。我們的文學尚未脫離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的形態。革命已把俄國的文學改頭換面了，使它更接近於寫實主義，並更接近於集體生

活的描寫。在去年一年中當代的文學確實轉向於社會的寫實主義，至於現在呢，在蘇聯這塊地方誰都可以飽覽寫實主義的散文。

這次大會根據龍那茶而斯基的報告通過了一個決議案，指出十月革命不僅使俄國文學保持在世界文藝中的榮耀地位，而且「創造各種條件以使文學在形式與內容兩方均得新的發展。」這決議案又喚起注意烏克蘭的喬治亞的亞米尼亞的，以及其他的民族文學之值得注意的發展，這些民族文學是在舊制度下被人深思熟慮以阻其發展的。最後，在這決案上說到「蘇聯文學的偉大教育意義，這種文學首先把整個的共產主義觀點引用到藝術裏，而與無產階級的心理相輔而行。」

「藝術」一字將用在下面專指俄人所稱的「繪形藝術」其所包含的首先是繪畫，這種藝術的應用，有特別簡直明瞭的特性以助革命；繪畫的藝術家事實上已動員起來，且無論如何是在所謂「突擊隊」的基礎上利用。這些藝術家在革命的初期曾畫出驚人的傳單與諷刺畫。他們裝飾各種慶祝會的會場，並在蘇維埃與其他羣衆集會的大會場牆壁上繪起各種圖畫。最後，他們在「煽動車」上繪起形形色色的圖畫；現在我們仍可在莫斯科街道上看見電車上飾以各種革命的圖畫與標語。在革命初期爲宣傳用的繪起圖畫的列車，現在已不再用了，但這種東西足以代表繪形藝術在革命過程中的應用。

當革命的初期，因經濟恐慌，物質上大感缺少，以致藝術家的活動受嚴重的限制，此點應加注意。但不管這事

實如何嚴重，一大羣的青年藝術家自己投入煽動的工作中，並以其技藝為新領袖們服務。革命的口號藉著色與繪形能使羣衆更易了解。

重要的各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大會中的每次會議用圖畫來紀錄，已成為革命中行成習慣了的事情；繪畫與照相均得在此應用。領袖們的肖像繪畫也成為宣傳技術之一種，雖共產黨的批評家曾攻擊舊派的畫家，說他們偏向於繪像，其本意無非為貴族服務。

繪形藝術訓練的擴充，已有顯著的傾向。教育機關與學校的數目大大地增加，尤其是在工業的藝術方面。為工人們辦起許多夜校。在工人與紅軍的俱樂部裏，研究繪畫的裝飾藝術的學社特別普遍。這種組織的本身又可使工人與兵士休息的住宅裝飾得五光十色。但尚未聽見無產階級繪畫家的出現。最後，還有革命的藝術家協會組織起來，其任務為對革命，日常生活，尤其是勞動，作寫實主義的描寫。這協會的藝術家還要使藝術的形式成為政論家活動的附庸。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獻身於宣傳的任務較諸傾心於犧牲內容以逐形式的為多。在尚形派與「生產派」的衝突中，後者佔得優勝，其所號召的是創造有用的東西和適應生活的實際要求。

革命的藝術家協會是一全蘇聯的組織，且特別注意於獎勵各地方民族的藝術及利用各小民族的風俗以作題材。在一九二六年這協會的展覽會所陳列的一切圖畫，可歸入以下三類：「革命」、「勞動」與「小民族」。這展覽會中有幾張著名的畫，在他處亦看見過。表示勞動過程與勞動條件的最重要與最好的圖畫，為職工會所

得，以陳列其特別的圖畫陳列室，或以裝飾較大會場的牆壁。時常在圖畫中明顯地寫着口號。一張引起外國參觀者特別注意的圖畫，題名為「資本主義的完結。」其中心人物為一個銀行家，他從自己的行裏走出，正要踏上樓梯預備下街。在他的背後是一個骷髏，拿着他的鐮刀，嗤笑這自信與自驕的資本家，因為在街上已擠滿了舉起紅旗的工人，正在等候他下樓梯為他們捉住，可是這趾高氣昂的資本家面孔向上，看不見下面的羣衆。從藝術的觀點上說來，這張圖畫並不特別好，但圖中的表情卻清楚而有力。

在蘇維埃的制度下，純粹藝術與應用藝術的區分應予消除，這種意見的發生，是因為注重生活的生產方面緣故。在應用藝術方面，即在所稱的「藝術工業」方面，革命已給以顯著的改變。這一門藝術也充分利用以作政治宣傳。例如在農民的家庭工業之刺繡工作中，誰都看得見現在所刺的是紅軍，不是從前各種動物一類的東西。小的雕刻常是農民家庭工業的產品，也以革命的圖形為雕刻的對象，或是各種的工人，或是著名領袖的面目。早在一九二〇年，即組織了第一屆手藝工人的會議。此次會議的目標是使這些工人作有組織的宣傳活動。例如，在陶器工業中，革命的象徵或口號，革命生活的景象，以及革命首領的肖像，均選為畫圖的材料。舊的傳統的習尚已被摒棄，而蘇維埃的習尚起而代之。一個最古與最大的製造神聖的宗教圖畫的研究院，仍保持其原有的老職員，並保存其過去的一切技藝，但現在所製的已是非宗教的，且甚至是蘇維埃的題材。有些工廠製造各種棋類，把紅軍司令、工人首領、與農民充作新式的棋子；有一種棋把從前的「牧師」改作風車。

據共產黨人說，正當十月革命的時候，俄國的戲園是在藝術衰退的時期中。這種危機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有一種傾向，要破壞戲園已定的傳統，並有確定的反動，反對莫斯科藝術戲園所重視的自然主義。又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在政治反動的影響下，戲園力圖避免當時社會上所表現的輿論精神，而採取嚴格的非政治的路線。

首先的與直接的革命效果，就是把戲園向大眾開放。這多少是一種機械式的改變，是容易達到的。聽戲者以工人與新的公務員為多，甚至在歌劇與舞劇場上亦是如此。從前的幾個國家戲園，包括歌劇戲園，雖在經濟困難中亦仍在繼續進行，視如革命為工人得來的另一征取物。劇目則有些變更，有些歌曲與戲劇，因是宣傳舊的愛國主義，已被刪去。私人的戲園也獎勵其繼續維持，雖其中有許多戲園，如莫斯科藝術戲園，已大大縮小其活動了。但一般地說來，劇場的藝術家比舊制度的其他專業團體較為優待，以供握政權的階級消遣與娛樂。教育人民委員龍那茶而斯基本身是戲劇的寫作者，這事實也是戲園能得優待的條件之一。他在事實上因從該委員會預算中撥出鉅款以接濟戲園，受人批評。可是他在對這些抨擊者的回答中指出劇場的重要，說它是接近羣衆的媒介。龍那茶而斯基既以教育人民委員的資格直接管轄國家傳藝戲園，他又替此等戲園辯護，說這些是「過去最好的戲園，它們無疑地應受國家另眼看待，視如戲劇藝術各種傳授之守護者。」

同時新的戲園亦已創辦。這些戲園稱為具有「革命的創造的」性質。這些新戲園之明白確定宗旨，為「提高戲園標準以供羣衆享樂，並於其因缺乏藝術的、文化的、與政治的價值而遭危殆時，以革命的方法澄清之。」所

以當革命的初期產生了一種自然稱爲「教育的戲園。」這種戲園的劇目中都是宣傳性質的革命戲劇。又因革命初期舉行多種慶祝，各種示威與遊行都以羣衆戲劇的形式組織起來。幫助革命的收穫之深入與鞏固，認爲是戲劇藝術家之一種公民義務。負起此種職責者之表演場所之一，爲在公衆的廣場與街道上及在各戲園與政府機關的大廳中所舉行的集體慶祝會。這種集體慶祝是積極的革命局勢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慶祝會的顯著現象，爲其大規模的與羣衆的性質。

直至一九二一年，當國內戰爭以後，蘇維埃政府對於戲園的政策纔得最後確定。於是兩種戲園間橫着一條鴻溝——國家傳藝戲園與革命戲園。後者之卓越的倡議者，爲前莫斯科藝術戲園的社員梅葉霍爾特（Meyerhold）；以此戲劇藝術家命名的梅葉霍爾特戲園，已成爲新方法與新概念最奏成效的例子。職工會也在戲園方面活動，設立戲園以專門的劇員出場表演，且在工人俱樂部中增劇藝社的組織。在文化的一般場合之這一部門的新舊競爭中，政府及黨的影響，較爲不直接施行。這兩個營壘相對峙的區分，經雙方內部各起變化後，不久即已趨於消滅。這種變化是按引導戲園走入文化革命的總任務之政策方針而行。龍那茶而斯基最近在共產主義學院的報告中，述及這種關於戲園的政策。此處所引的祇是這報告的摘要；但這摘要已能指示這政策所根據的主要立場：

龍那茶而斯基同志認爲一切藝術的戲園，是對羣衆思想影響最有力的武器，他指出無產階級不能而且

不應放棄這武器，它是教育工農，使敵人解體，與引導小資產階級分子到自己方面為目的。戲園就為着這些目的應成爲最好與最深刻的宣傳者，把內容與藝術家的印象主義之一切方法打成一片。

這種政策一部分由教育人民委員會中的主要劇目委員會助其施行，這劇目委員會是輔助的檢查機關，並對一切戲園的劇目，包括電影，加以統制。這種委員會共分二部，其一部管理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國立戲園，而另一部則管理一切其他戲園。批准了的戲劇或電影列成各表，並把這些表每二星期分送一次。表中又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列入無條件批准的戲劇，而第二部分則列入批交地方當局判決的戲劇。表上並載有被禁止的戲劇。對劇目總委員會的作用之正式討論，足以表示此種政策的一般觀念。取材於沙皇時代最後數十年之事蹟的歷史劇，得予批准的祇是那些思想路線尚不歪曲太甚且至少有相當的革命性質之戲劇。在所謂的「蘇維埃趣劇」中表現一種不健全的傾向，劇目委員會利用其統制權以與此等傾向鬭爭。例如，諷刺劇雖認爲是一種極有幫助與必需的東西，但劇目委員會遏止任何在「少年蘇維埃公民觀念」的諷刺劇的假面具下之祇開玩笑的企圖。

對戲園的政策，又得教育人民委員會之政治教育部經過其特設的藝術股作進一步的推動。這藝術股特別注意於指導農村中的工作。一般地說來，這一股的職務是組織地方的工作，特別是在演戲方面，並使戲園與觀衆更能接近。在劇藝方面的統一政策，業已埋定基礎。教育人民委員會出版一種雜誌，從前的名稱本是「戲劇藝術家與觀衆」，現在改成範圍更廣的名稱「蘇維埃的劇藝」。最近又刊行了一種特別的雜誌，叫做「鄉村戲園」。

最後，舞臺訓練所在政治教育部的管轄之下成立起來，其目的爲增進以及指導一切鄉村的劇藝工作。

從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戲園，當初大都繼續沿用他們從前的劇目。某些藝術家對於某些劇中職司的扮演似有反映革命事變的影響。例如在莫斯科藝術戲園青年劇員的技術室中，這種趨勢特別顯著。可是等到一九二六年，莫斯科藝術戲園纔把根據革命事蹟的戲劇排入劇目中。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成爲戲劇界的大事，並引起大大的討論。甚至在最後一次的預演中，這種戲劇是否許其排演還成問題；檢查的當局堅稱，在頒給最後許可證以前，這劇還要作相當的變更，而且政府當局與共產黨批評家又對寫劇者與演劇者對革命的解釋大起攻擊。這戲劇的原名是「白衛隊」，但祇許其稱以無意義的劇名：「都平家庭時代」(The Days of the Turbin Family)，劇中的主要角色是在烏克蘭作反布爾塞維克運動的官吏，表演他們爲着一條無希望的路線作鬪爭，但演得使人憐恤的樣子。共黨的批評家馬上起來攻擊，說這劇犯了歷史上的錯誤，堅稱「在目視與參加國內戰爭的人們看來，在見到過白衛隊墮落的真面目的人們看來，在廣大的勞苦羣衆看來，首先是在我們青年人看來，這齣戲是荒謬絕倫到不能容忍的。」這戲劇所以受責備的原因之一，是它「把白衛隊概念化了，且在舊的官僚階級的周圍罩着一道調和的神怪光輪，可是這種官僚曾被歷史與革命的無產階級處以殘酷而公正的刑罰。」

這齣首先在莫斯科藝術戲園以革命的題目排演的戲劇，參加的角色完全是該劇社的青年劇員。共產黨的批評家在他們的評論報上所說的下列一段話，就對他們而發的。

「這些青年生力軍的任務是與加在他們身上的不正確的影響作鬭爭，並要在戲劇題材的選擇上求得進步，把這些題材正確地解釋出來，且把他們從老劇員所學得的技術應用於純正的革命的當代生活上的各種任務。我們的戲園的任務是要從這含有啓迪性質的戲劇界大事做出審慎的結論，以求在劇藝上反映蘇維埃時代的工作更進一步，時常力求技術標準的提高，而同時又要適應正在發展的革命的廣大的觀劇羣衆。

但這齣戲劇證明了偉大的成功，並在莫斯科藝術戲園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劇目中佔了很大的地位。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計劃書中，這齣劇仍是繼續列入。

莫斯科藝術戲園又於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劇目中，加上第二個革命的戲劇：「第十四——六十九號鐵甲車。」這齣劇是取材於同名的小說，作者爲伊凡諾夫（*Ivanov*），他是最著名的同路派文學家之一。一個共產黨的評論家，對這齣新劇作如下的分析：

藝術戲園對於革命戲劇的編演來得非常緩慢，至於這種戲劇的正確表演，更是特別欠缺。按它的能力看來，表演原始的農民運動比較表演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來得好些，「鐵甲車」的表演，足以說明莫斯科藝術戲園正在誠懇地選擇能鼓勵新的蘇維埃觀衆的題材。

莫斯科一個大工廠的共產黨細胞與工廠委員會組織討論會，討論這齣戲劇，並邀請這戲園的代表參加。據共產黨報紙對這次討論的記載，工人們議決：演劇者能正確地表演日趨死亡的資產階級，甚至對農民的表演亦佳，

但他們在工人的領導問題上演得比較不好。但是這討論會的意旨是：「正在勃興的，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而獲得強大力量的工人階級，能成爲加強藝術戲園工作之新的與堅強的原動力。」就在這個基礎上表示了如下的意見：藝術戲園應得工人的同情的扶助，而工人們取此種態度可使藝術戲園成爲自己的戲園。藝術戲園的代表在會場上所說的話，據該報的解釋是表示「接受十月革命，並努力與正在世界史的舞臺上表演的新階級作更密切的聯絡。」

在歌劇與舞劇方面，除了從前於歌劇節開始時舉行的「爲沙皇慶壽」現在不再舉行外，劇目無甚變更。例如「爭取赤色彼得格勒」還與「婆利斯戈杜諾夫」(Boris Godunov)在歌劇的佈告上並列起來。但從藝術家的觀點看來，其革命內容的歌劇並無特異的成績。可能的例外是「十二月黨」這是根據共產黨指爲革命事蹟的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事件的一種歌劇。還有一個通行的新歌劇，名爲「兵士伊凡」宣佈排入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冬季表演的。對這些革命的歌劇與舞劇的詳盡評語未曾看見。共產黨的報紙祇時常批評說：歌劇與舞劇尙未適應新時代與新時代的概念。

新的革命戲園之目的，可總括如下：第一，以實驗爲目的，在劇場的佈置上確按科學方法。這種工作特別在梅葉霍爾特的「作場」中進行着，並在他的戲園的舞臺上表演。吸引聽衆更積極注意劇情之設備也已經佈置起來。第二，以創設獨立的無產階級戲園爲目的，假手於俱樂部中的工人劇社或鄉村讀書室中的農民新劇團，並最

後假手於實際上在一切較重要的紅軍單位裏形成的戲劇研究社。所謂「無產階級的戲園」是要再在革命紀念節中採取羣衆化裝與狂歡的形式表現出來。最後，要創設一種通俗的革命戲園，其所演之劇使羣衆能夠了解。在這一方面，職工會須爲組織的因素，他們且得專門藝術家的幫助。

莫斯科職工會戲園所表演的「浪潮」可選爲革命的煽動的代表劇。劇中共有十二種插話，都是表演革命的鬭爭與其最後勝利。這事情是在小的省分裏的市鎮發生的。這戲園又排演一新的戲劇，叫做「叛變」以紀念革命的十週年，這戲是根據在烏拉山發生的一種國內戰爭的故事。戲園的主任在接談時指出：關於適合階級鬭爭原則的問題，無顯著的成效可說。他又補充說，戲園的任務是提起一種純正的「革命的感動力」指示那些爲在蘇聯廣大面積的較邊遠地方鞏固蘇維埃威權而仍須克服的困難。劇中的主旨是爲着一個概念，即社會主義而鬭爭的團體鬭爭。這主任又解釋說，這戲劇的目的是以描寫紅軍的初步發展以促進軍事的準備。

莫斯科革命戲園是在莫斯科蘇維埃直接領導之下，且有政治部以選擇劇目；這戲園的目的是「對來自羣衆間的聽衆，作廣大的社會的與文化的訓練，以共產主義思想的精神，擴大他的革命自覺性，其所用的方法爲創造在戲園中所能辦到的活潑的與一般化的表演形式，這些是包羅多方面的現代生活與革命事蹟的一切形態之寫真。」思想的內容時常使藝術的形式受犧牲，但所努力的是使此二者作正確的聯合。這專門的革命戲園在事實上已至少施其影響於莫斯科的無產階級羣衆，這是無疑的。在至一九二五年止的兩年生存中，莫斯科革命

戲園分給工人、紅軍兵士與相當數目的農民之免費戲票約達十五萬張。此外，還約有三十萬人經職工會的介紹得到折扣的票子。

誰若要明白最大與最好的革命戲園——梅葉霍爾特戲園——所佔的地位，便可看一看最近紀念革命十週年的新劇「蘇維埃的鄉村」。這齣劇的主要內容是無產階級革命對農民的影響。同時藉戲園的作用，城市也得聽到鄉村的呼聲。全劇包含連續的一套寫真，具有統一的題材，即蘇維埃的鄉村；且具有統一的姿態，即建立新生活的快樂。所注重的事物是農業機器化，穀類的輪種，電化，鄉村共產青年團員，掃除文盲的鬪爭，學校的工作，十月的洗禮，農婦的公民生活，紅軍的兵士，鄉村工人學校的畢業生，鄉村的無線電，鄉村的戲園，公衆衛生，蘇維埃機關的缺點，農民與保護蘇聯，以及私有財產本性的逐漸消滅。

某些新的方法也用於這新劇裏，以獲得最大的政治效果。不僅戲園的全體劇員，而且技術學院的學生，這戲園所扶護的兒童先鋒隊，以及一羣從前無家可歸的兒童，都引導到劇場上表演。電影也在劇中用到，特別是在表示新舊社會的區別時。當這新劇開始時，梅葉霍爾特說道：

這劇將在經常的劇目中繼續排演，並用以經常啓發工人聽衆去扶助新的鄉村。同時，將取相當步驟使此劇爲農民所歡迎，以便向後者指示無產階級獨裁的十年中爲農民做些什麼，並因此加重說明採取社會主義原則的有利。

俄國舊的戲劇名著中許多種爲革命戲園所改削而予以排演。據一般人所深信不疑的，舊劇所能起的最好作用是助成新的創造活動。因此，過去在文化上已有的成績，不僅是要去作消極的摹仿，而且要抱批評的態度去把它改造，以適合新的熱望與目的。涅斯脫洛夫斯基（Нестеровский）的「森林」改成革命劇後，與原文大有出入，幾乎辨認不出了；但這舊改新的劇本似乎能得聽衆歡心，甚至能得其中頗多的少年分子之歡心。

戲劇研究組，在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兵房、與學校中有廣大的組織。據一般估計，這些研究組有幾萬個。俄國人特別歡喜演戲並長於戲劇的表演方法；甚至在不識字的農民中，演戲常常是很通行的，且許多農民歌曲原來有戲劇的成分。共產黨人相信：演戲是喚起一般創造力的工具，不僅是羣衆的戲劇訓練，而且是一般政治訓練的基礎。在這些戲劇研究組中，有時劇本爲組員自己寫成的；這些戲劇的預備是戲劇研究組各項活動之一。但是較普通的還是本地的業餘劇員團體排演外面供給的劇本。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等幾個團體準備了劇本，以供各種戲劇研究組應用。這些劇本分門別類地編起，並可爲蘇維埃日歷中各革命紀念日慶祝之用。這些戲劇坦白地稱爲「煽動的戲劇」。專業的藍衫團或業餘團體在工人俱樂部、紅軍兵房、與鄉村讀書室所表演的「活報」是劇場的另一應用，並爲演劇的另一方式，這在論定期出版物的一章中已予論述。

一般人相信：新戲園的創設，需要劇員，尤其是劇員的整個團體，受基本的訓練。第一，新的劇員必須置身在「劇中的生活」，並因此學得生活的實在法則。「新派的劇員探求自然的健全動作，其所謂「表情」是演戲者

之心理的與生理的科學的必然結果。」——這是一個共產黨批評者在討論這題目時的評語。在一切關於新戲園的討論中，都注重所謂「自然複演力」。

新的演劇方法，以「吸引聽衆深入戲劇的筋骨」爲目的。因此，戲園須訓練大衆也能表演自己。用以達到此目的之一方法，即分派一羣劇員站在戲臺前面原爲奏樂用的場所。於是，這羣人成爲觀衆與臺上的演劇者間之連鎖。劇員轉過身對着奏樂所的「常人」說話，就等於以自然的態度向座中的聽衆說話一樣。另一方法，則爲從戲臺上或月臺上分散傳單給觀劇者，稍停演一些時候，以便這些傳單收拾起來並爲大衆閱讀。革命的劇場佈置之另一現象，爲廢除化妝，使演劇者是一個普通的常人，不沿用習俗所尙的與人爲的假面具，使觀劇者對他不敢減少感動的力量。又以講臺的佈置來替換私人房子的心理與經驗，使劇員能更自由地表演。或把聽衆的座位都用十足的燈光照着，使戲臺與聽衆座位間無顯然的界限。有時完全廢除布幕。戲劇界中所謂「左」傾，如文學界中的未來派一樣，注重演劇的各種門檻與奇妙，而其結果則失卻內容的實質。這並不與現代的精神相膾合，且在後者的影響之下這些極端的方法漸歸廢棄。

革命戲園中之另一實施，則爲請求聽衆表示其對於劇中所表演的觀感。各人分給一張表格填寫，每個聽戲者須回答表中的問題，並因此表示他對於戲劇的內容，劇員的表演，與戲園的一般政策有何意見。至若在職工會管理下之戲園，莫斯科的工人通信員都被邀批評戲園的工作，特別是敘述一般工人的意見。提議排入劇目中的

戲劇，須預先由戲園的經理召集被選的一羣工人通訊員共同討論。「有組織的聽衆」即藉此種方法得臻完善。若把傳藝戲園的聽衆與革命戲園的聽衆互相比較，則亦頗饒趣味。莫斯科藝術戲園的聽衆，顯然是新舊的知識分子與「簡單的住民」；實際上在這種戲園的客廳裏，人人都會自覺彷彿回到革命前的俄羅斯一般。祇在歌劇與舞劇中，可見到少數男女工人。在另一方面，在梅葉霍爾特戲園或職工會戲園裏，則有許多工人積極地回答劇場上所表演的一切，並於休息時間在客廳中表示另外一副景象。因為聽衆的「工人化」是蘇維埃政策目標之一。各職工會得到減價的戲票及大批免費戲票。縱使這樣做法，聽衆中的工人比數，甚至在革命戲園裏，仍不甚大。但是有組織的聽衆是幫助戲園找到新路徑的一個方法；希望這些工人聽衆將使戲園能爲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路線而服務。

戲園之發展到龍那茶爾斯基在共產主義學院的報告中所指示的理想，龍氏也承認是一件緩慢和困難的任務。他自己也反對把蘇維埃政策中的馬克斯主義的方法用到戲園、文學與藝術方面，反對用直接的與強硬的手段以作中肯的企圖，以解釋他自己的話。舊的戲園已完成美滿的技術，並已是寫實主義的。新的劇藝，正希冀其逐漸發展，其目的是在劇場上反映現實。龍那茶爾斯基在與一個著書論蘇聯戲園的英國作者之談話中說道：「我們用戲劇、趣劇、諷刺劇以譏笑過去遺下而爲吾人所仇恨的一切，而同時亦以之揭發新制度的缺點。」

第十五章 無線電電影與音樂

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從過去在一九〇五年革命與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武裝遊行中所得的經驗，證實了控制一切交通工具的重要。所以在其奪取政權的綱要中，所有的無線電設備是其首先要奪取的對象之一。大的廣播電臺當時用以向全國各地宣佈京城中的大事，且推而廣之，向全世界宣佈俄國的革命。他們毫不延宕地注意無線電的發展，其理由實有數端。世界革命的目標提示了無線電訊的極廣大用途，其發電時的稱呼爲：「給全世界的人們。」在無線電上已無國界存在，並且相信至少有些電訊會傳達到各國工人羣衆的耳朵裏。在他們的本國裏，無線電訊的應用可使無法通信的地方得藉此傳遞消息。電報與電話的交通網尙感不足，且僅限於大城市；而革命中的擾亂又把許多這些交通電線毀壞了。國內戰爭的發展，要維持各革命政權已成立的區域間之聯絡，不得不跨過敵人的區域。後來用慣了，常藉無線電發出一般的訓令，甚至特殊的命令，又從莫斯科與列寧格勒中區傳遞成功的消息給各城市的共產黨團體。革命的目標與方法是要引起羣衆的行動，所以必須盡可能地給大眾週知，且無祕密的必要。

當革命在軍事的與政治的戰線上均得最後的勝利，並能轉向其注意力於文化戰線時，無線電交通的實施

與其機器已頗發展。包羅全蘇聯的強力廣播電台與分站的建設計劃即加考慮，在大規模無線電網中的首要電台單位且已建築起來。（據一般估計，一九二七年蘇聯共約六十個廣播電台。）在已經厲行的文化革命中，無線電也是幫助解決羣衆間廣大的文盲問題；甚至那些不能閱讀的人也能藉此聽知一切。一般人相信無線電可爲發展識字運動的刺激物，從無線電得到的觀念能提起一種興趣，以促進閱讀報紙的願望。無線電在煽動與宣傳上確有無疑的價值。

曾有一種希望，欲於一九二七年在蘇聯的每個鄉村均有無線電收音機的設置，藉以紀念十月革命的十週年。據官方報告，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全國僅約二十一萬三千架收音機，其中不到十分之一是在鄉村的。按蘇聯的法律，一切收音機須向當局登記，並須繳納登記費；所以很有可能，大家都是沒有登記的，且其數目必超過官方的統計。最近有一個作者估計，收音機的裝置或許多至五十萬。可是，甚至這個數目仍爲共產黨員自己認爲很低，因與他國的數目比較及與發展無線電的計劃與努力比較是如此。我在距莫斯科三百哩內的一羣鄉村，共參觀一個星期之久，祇看見一個無線電。這是一個小的礦石機，爲一個鄉村小學教員所有，且裝設在他的房子裏。用這架收音機祇在很集中注意力時纔可聽到莫斯科。有人告訴我：有一架旅行機時時拿到這一羣鄉村的中心公社。

技術上的困難阻滯了推廣無線電收音機至鄉村公社的計劃。電力的缺乏，使這問題成爲一個難問題。而且

蘇聯工業所造出的收音機品質很壞，蓄電池的困難與機器的經常損壞，使農民對無線電失了信仰。農民的通信員寫道：幾個星期以後，「我們的揚聲器沈默起來了，」而農民對於徒耗金錢於不妥用途，大感不平。這問題引起了一般人覺得採用較簡單的個人的礦石機為妥。至少為目前暫時計是如此。為使無線電普及起見，有一種有組織的勢力。「無線電友」是一種較不嚴密的組織形式。在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甚至在紅色紀念處或學校裏，都有無線電研究組。組員煽動民衆裝設揚聲的收音機並為此目的共同捐款。他們又研究無線電的技術，或者他們自己製造一個簡單的收音機。最後，當局希望他們能把一切對農的宣傳品的大意編入無線電的節目中，同時為向工農解釋與剖白節目內容的媒介，因此，他們是「有目的」利用無線電的宣傳家。為這團體刊行了一種雜誌，以增進他們對於廣播無線電的興趣與知識；雜誌中有節目的宣告與關於這些節目的一般討論，又這刊物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啓發無線電聽衆的正確「思想。」

莫斯科兩個廣播大電臺就是共產國際的與蘇聯商業僱員職工會的電臺。後者為莫斯科職工會城市蘇維埃與莫斯科省職工會所享用。共產國際的電臺是二者中的較大與較活動的一個。每星期的播音節目都在一切報紙上宣佈。星期日的節目從早晨起整日地播音。一星期的其他各日從下午四點鐘起開始播音。星期六則停止播音。每日由「農民報」或「工人報」費了一點鐘時間摘錄本日的消息。無線電友社擔任經常播送世界語課程；這種語言為蘇聯的無線電熱心家選為無線電交通的國際語。每星期有一天規定一點鐘用世界語播送「國

外消息。」所播送的音樂會，稱爲「農民音樂會」或「兒童音樂會」，但也有普通的音樂會。所播送的講演辭都是關於下列一類題目：動物的結核病，養馬術，蜜蜂的病，或人類的神經系——把講演題列成一表，宣佈在某一期播送。然後播送有確定範圍的政治談話，論述下列一類題目：「美國的職工運動」或「紅軍的國際重要性及其任務」這是隨便從一星期的播音節目中抄出來的題目。又對各地職工會的委員會播送消息，如在選舉的時候，則播送選舉的經過，以及其他職工會活動的消息。再有關於合作社的組織及一般經濟問題的講演。

在這些無線電節目中，常把克列姆林宮裏一個塔上的大鐘所敲的正午與半夜的鐘聲包括進去。聽說各省的聽衆對節目中這一點表示特別有興趣，因爲這樣使他們感覺到他們與蘇維埃制度的政治中心常有接觸。當局的政策認爲：組織特殊的技術室以播送特別爲各省分準備的節目，不如把莫斯科的時事中選擇最好的來播送。一般人相信，用這方法可使播音的質量改善。這也能幫助傳播所公認的蘇維埃制度中的文化及政治中心的影響。最初的實施方法，祇把莫斯科街上的市聲播送出去，以給各省的聽衆覺到活動中心區的目的生活狀況。在其他大城市裏，還有各地的廣播電臺。這些電臺的節目尚無何等保障，但可臆斷他們在大體上是根據莫斯科各電臺的節目而定。莫斯科節目的轉播送，祇留爲特殊的紀念與臨時事件應用，但一般人希望將來得廣播與轉播的幫助，能使莫斯科的播音在全蘇聯一切地方都可聽到。

在各大城市中，廣播與擴音都在各特殊的紀念中廣爲應用。從各廣播電臺到各校大工人俱樂部的直接通

電制度正在莫斯科採用，並預料在其他較大城市亦將採用。用這方法，可使各領袖在示威遊行與蘇維埃的特別慶祝會中的演講辭能為更大的人羣所聽見。最後，有人閱到一個計劃書，要使在革命的幾個大紀念日中於列寧墓發出的演講辭能為蘇聯全體民衆所聽見。最近莫斯科的報紙載稱，在紅場發出的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演講辭已在丹麥聽到。

工農監察員最近調查了無線電廣播公司，這公司有出售無線電器具及組織廣播電臺的專利權。這個托拉司不僅虧空很大，而且在業務的管理上很不像經營事業的樣子，並犯了蔑視業務之罪。結果，這公司被解散。黨中央委員會的鼓勵宣傳部於是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這無線電的問題。會有幾個改組廣播事業的計劃書，在一切建議中都特別規定黨的思想領導，因為過去的組織在其播音節目的內容上也發覺不滿意。但是對於應否成立蘇聯的組織，各有不同的意見，結果就附設一個經理處於蘇聯人民委員會常務執行秘書處。這個新的政府機關，須更細心研究無線電的聽衆，並根據所研究的結果準備播音節目。同時，須在草擬各種計劃與節目時得各種政府機關及其他團體的合作，特別注意於在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裏促進集體的合聽，並因此須注意更有系統地分配無線電收音機的組織工作。

電影或用通行的半官的俄文縮寫稱「慶諾」(Кино)，它是特別有用的，是政治教育的捷徑。列寧曾有一次對教育人民委員會發表意見說，「我相信在我們所有一切的藝術中電影是最重要的。」有一個國家的電影托

拉斯，或國家電影(Gobliho)。蘇維埃電影(Sovliho)則是製造與開演蘇聯影片的國家企業。教育人民委員會有一部專管影片與映演電影的各種業務。在最近一個討論影戲園問題的省代表會議裏，有該省教育廳的電影部代表及政治教育部的代表參加。工人俱樂部需用影片很多，並在這省的地方會議上該省職工會的所謂「文化委員會」也派代表參加。

當革命起初的幾年中，除了簡短的新聞片外，實際上並無蘇聯影片的製造。在影戲園中，從前都是演映外國片及少數在十月革命前製造的舊俄影片。外國的影片實際上壟斷了蘇聯的電影界，雖然這些片子被認為思想上為蘇聯觀衆所不能忍受的，並在政治上常是墮落的。直至一九二三年，纔有所謂國家電影組織起來。不久即有蘇聯影片出來與外國影片競爭。至一九二六年，在蘇聯開映的電影共分三種：外國影片，新的蘇聯影片，及所謂「教育片」。影戲園則分成兩大類：由「國家電影」以經商取利性質開辦的大電影「宮」；及在工人俱樂部於娛樂節目中表演的電影。

為解決推廣電影機到鄉村的問題起見，政治教育部於一九二四年成立一個特殊的電影部。這新部門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創立一種標準的電影機，可用於不易得到電力的鄉村。又一個簡單的電影機須能為全區的鄉村服務。所以對於鄉村觀衆的需要與嗜好，又加以研究。最後，在鄉間開始作一種有組織的宣傳，以傳播各區自備一架電影機的觀念。根據鄉村生活的影片都有準備起來，相信這些是特別適用於農民觀衆。在一九二七年，約有一

千五百架電影機在鄉村公社中映演。這還認爲是很少的數目，且又覺得適用於鄉村的好片子還沒有製造出來。鄉村常祇得到在城市用損了的舊機。

在一九二四年，蘇聯所映演的影片祇有百分之二八·五是所謂蘇維埃的片子，其餘都是外國片。在一九二五年，其百分數增至三十，且蘇維埃的片子較外國片仍繼續增加。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外國片仍在商業的戲園裏繼續佔優勢，但除了幾片趣劇及某種教育片以外，沒有一種外國片不被修改與改變而能拿出表演的。一個特殊的影片鑒定局，叫做「政治出品部」，專司採用外國出品在蘇聯表演的責任。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劇目部有審定影片及戲劇的立案權（其方法已在上章論戲園時討論過了）。對蘇維埃的影片有一特殊的藝術蘇維埃管理電影，這機關附設於政治教育部，它對影片內容作思想的指導。在一九二五年約有三百種影片送到藝術蘇維埃審查，其中審查合格的不到一半。據委員會的報告，這些被審查的片子的大多數，或是「無政治常識」或是它們沒有聯繫到社會的題材，或是它們純粹是煽動性質，此外是完全無藝術價值的。在審查合格的影片中，六種是關於工人階級的鬪爭史，十一種是取材於國內戰爭的片段，九種是描寫當代一般的社會狀況，十四種是描寫鄉村生活。六種影片取材於各小民族的文化與風俗。教育片共計四十六種，祇有兩種片子是屬於開墾或探險的一類，八種片子是趣劇。其餘約有四十種顯然是無類可分，並歸併一道，冠以「其他」這總名詞。

在一九二七年蘇聯電影的會議上，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主席克魯魯斯致開會辭。她加重說

出許多人把電影祇看作一種簡單的娛樂方式之錯誤。她又指出電影可為很有害的，也可為很有用的；以此種巧妙的技術，不僅能反映事實，且能曲解事實。她說：「資產階級」用電影的技術來曲解事實，以在羣衆間進行其宗教的宣傳，或宣傳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她堅持說：美國與西歐已有的高等技術當然必須利用；但在蘇聯電影中，必須含有極不同的思想內容。因此，她解釋說：「蘇聯電影必須準備並表演能幫助觀衆更深刻了解革命鬥爭的事實與概念的各種影片。」

因為對電影的任務會有廣大的討論，莫斯科的「農民報」亦舉行一種新的開會形式，討論「鄉村中的電影」。這討論會的主要材料就是幾個著名的領袖所寫的幾篇短文，回答自鄉村寄來的不滿意於影片的性質及其映演的浩大費用的信札。這次討論的目標之一，是要定出什麼影片是農民所歡喜的。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之一個負責的工作人員，米舒梁各夫（Meshcheriakov），關於電影有下列的統計材料。他估計蘇聯鄉和區的數目共有三千。當一九二七年，這些鄉區所有的固定的或移動的電影設備不到一千所。所以在鄉村公社裏，每九萬二千居民可有一個電影中心區。有幾萬鄉村的農民從來沒有看見過電影；在有些鄉村裏，每月演電影一二次。在另一方面，有二千架電影機，因需要修理，擱起不能用。另一作者提起下列事實引人注意：約在五十個小城市裏，三百個城市性質的居所，與二千個農業中心區，沒有電影機，至於佔龐大百分數的農村，更不必說了。但按另一參加討論的人說（他自己是地方農民刊物的編輯員），列寧曾經說過：一種好影片可做幾千宣傳員的工作；

說：蘇聯電影是傳達黨與政府的口號到農村的最好工具之一。據一般估計，在一九二七年看電影的人數，全蘇聯共有二萬萬人；而幾種影片，如「巴椿金巡洋艦」看過的有二百萬人。

一類民族的企業，如朱瓦舒電影（Chuvash Kino）或烏磁培克電影（Uzbek Kino），亦已開始。因人才與財源的缺乏，這些地方集團，在方法上是很多業餘嗜好的性質，且大致是失敗的。激成這些地方局部努力的原因，是因那些人相信「國家電影」沒有充分注意到利用各地方的生活狀況來編蘇維埃的影片。同時又發表意見說：在電影方面的中心工作人員，並未完全實現電影是對文盲特別多的落後的小民族之最易了解與最易達意的藝術形式。

在蘇維埃影片的一張很長的名單中，我祇能看到少數的幾種。「小紅魔」這影片已在論述兒童先鋒的一章中描寫過了；這種片子描摹國內戰爭時期的兒童英雄，具有明顯的宣傳目的。其他蘇維埃影片時常加重說明各種革命的口號，我多看了這種片子就覺厭煩，因不斷的宣傳，似欲避免而不可能。「巴椿金巡洋艦」大概是技術上最有成績的片子，且是蘇維埃影片中最著名的。這片取材於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黑海艦隊暴動的歷史事實。我於一九二六年夏同一羣美國人看了這個片子。觀眾除於看至舉起紅旗時外，並未表示特別的熱情。這片子為外國的消費者用時，稍有變更；哥薩克隊向羣衆開槍的景象略有減少，尤其是對小孩子描準的地方；在兵艦裏於暴動中殺死教士的一段，完全刪去。我在紐約看這片子的時候，覺得此處觀眾比較莫斯科的觀眾表示更多的感

動與熱情。解釋此種現象的理由，或許是因莫斯科觀衆有許多親身經過革命的事蹟，並參加如銀幕上所演的鬭爭。名叫「手槍與十字」的影片，其主旨爲替外國「資本主義的」政府服務的天主教教士所作的偵探活動，又有幾段片子是最具寫實主義精神的描寫猶太人在舊俄制度下的暴動。

若把莫斯科觀衆對「手槍與十字」的革命影片及對杜格拉斯法彭克 (Douglas Fairbanks) 的「零分」所起的感想互相比較，則可知道他們對後者有較大的熱烈情感。這根據革命事實的片子，動作是很豐富，且在技術方面，這蘇維埃的出品也是絕妙的。但這蘇維埃的出品，每段片子都有政治宣傳呈現出來，而毫不迴避。看到常可譯成目前流行的口號之影片中的最高點的時候，羣衆表示非常冷淡。當觀衆鼓掌時，很不自然，祇很少的幾次纔有由衷的笑聲。在另一方面，「零分」的觀衆很敏覺而積極，時常發出大笑；且旁觀者亦得明白覺察其娛樂的精神。凡自覺地看到了很多蘇聯影片的局外人，都覺脫離政治宣傳，是真正的休息；一般的觀衆似乎也是同樣反感。

科學片或教育片，已由蘇維埃政府使其廣大的發展。當一九二六年，這種影片已經有二打左右，原定的計劃尙未完成。關於這些片子，我所看到的祇是「戒酒」、「勞動」和「健康」。一個因飲酒過多而死者的致命情形，在銀幕上表演得非常詳細。有許多片子說明飲酒對於健康的影響，且特別說明對於工作能力的影響。這些片子都有佈景來補充；有一段稱爲「一個貪酒的汽車夫所見的一切」是影片中佈景很有成績的。其他的片子表示

狂飲前後舉鐵錘力量的測驗。最後，映着一種酒後的瘋狂動作，此片的結束是嗜酒的父母所生的癡子及因飲酒而妨害衛生的幾張影片。其他的影片是用以宣傳預防肺病與花柳病的。這些教育片差不多專在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或類似的機關裏映演的。欲使這種片子推廣到商業性質的電影院之努力，大體上已遭失敗。一般人相信，此種影片得政府的統制，能保護其不致有非科學的濫用。

「電影晚會」是工人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中更通常的活動。往往在一次政治性質的報告或討論之後，宣佈演電影以作結束。在演講所的四周，可看見工人在外面企待着電影的到來。俱樂部的管理員不得不增加電影晚會的次數，以滿足其會員的此種需要。但是這種趨勢，受人批評；且在一次黨的代表會議中，把電影列入議事日程以爲討論的主題，並通過決議案說：工人俱樂部不應變爲簡單的影戲園。

當一九二八年的三月，電影的性質與用途之整個問題提出作詳細的與有權威的討論。國家電影托拉斯受了檢查；雖這托拉斯能以其商業的利潤示人，可是它並沒有遵循黨的指令，或依據政府各機關的政策而定其自身的政策。在去年十一月紀念革命十週年時，蘇維埃電影的政策成爲令人注意的問題。在那時候，電影托拉斯不去集中到蘇維埃的影片以作爲自身對革命紀念的貢獻，而主要的拿出外國的美國的影片來演。共產黨的記者及領袖們鳴不平地說：莫斯科幾個大影戲園，不去演映「巡洋艦巴椿金」或高爾基的「母親」，而去演「斯加拉毛序」(Scarrouche)。在各種地方的代表會議與在報紙上作非正式的討論之後，召集了一次黨的代表會

議，以整理在討論中所得的材料，並確定與決定運用電影的新政策。就用這種方法來動員「無產階級的蘇維埃的公衆意見」，藉以在影片方面施行較大規模的控制。

教育人民委員會重新審定「蘇維埃電影」本年度影片製造的全部計劃，以爲這種動員公衆意見的一部分工作。預備製造的共有一百二十九種影片；其中有十三種是表演俄國一般的革命運動，十五種是表演十月革命與國內戰爭，七種是表演國際革命運動。三種影片是關於紅軍生活條件，二十二種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問題，九種是描寫提高文化的奮鬥，三種是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與反對飲酒和流氓主義的鬥爭。有兩種影片是反宗教的宣傳片，而另有一種則以抨擊反猶太主義爲目的。七種影片是以兒童間的先鋒運動爲其題材。無論在那一種影片裏，其攝影的背景都是取材於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在這製造計劃中的影片，若作得失權衡，則顯然是不能滿意的。許多影片已經着手製造了，所以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劇目總委員會，不能從思想內容來着眼完全實行其統制的職務。而且一般說來，蘇維埃影片的製造是受不起從思想的觀點來檢驗的。教育人民委員會的一個決議上說，「蘇維埃電影屈服於簡單住民的嗜好與需要的壓力之下。」同時「蘇維埃電影」並不企圖使其工作與蘇維埃的公民機關發生關係，而且在實際上阻礙後者對它的影響。因此，它就未曾正確執行黨或政府的指令，以有毅力地促進電影在鄉村的應用，改善其對各城市工人區域的供給，與時常特別注意影片的內容。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最後決議中，要「蘇維埃電影」從速「創製受得起思想檢驗的影片，選用實際生活的題材，並

同時要能代表藝術的作品。」

這次關於是項整個問題的總檢討，似乎表示大衆——包括工人與農民——對於描寫國內戰爭時期的鬭爭與英雄行爲的影片覺得滿意。並表示外國傳奇的或簡單無目的的探險影片，也不能得工農觀衆的歡心，雖或這種影片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或簡單住民的需要。且堅持地說，工人與農民所需要的，是顯示經濟改造的進步，生產的過程，與經濟活動之社會主義的方法之各種影片，此等影片能滿足他們求更多知識的需要。在一個會場上，有一發言人表示他的觀點，認爲電影應絕對用作一種消遣的工具。但是這種意見，沒有人來擁護，而且引起其相反的意見更爲堅執，認爲電影的片子必須時常視爲一種教育的與訓練的工具。

據傳聞的工人與農民的意見，又有認爲外國的影片應該革除，而祇用蘇聯的影片。但是這一類的政策遇到兩種實際上的困難。蘇聯的影片祇一九二七年獲到一點利潤，而外國的影片則是過去使「蘇維埃電影」能夠存在與商業得有進展的要素。第二，現時蘇維埃影片的製造不足以供給已經存在的各種各類的電影機關的需要。第一個事實似足以表示共產黨人一方面與蘇維埃政府機關有衝突，而另一方面則與電影的觀衆有衝突。前者欲盡一切可能來利用電影以作政治教育，使其成爲文化戰線上之鬭爭的一部分工作。電影的觀衆則顯然是愛看外國製造的談諧的、美麗的、與探險的影片。而且能獲利潤的，也是這種影片。在決議案上，在正式的會場上，工人與農民在紀錄裏總記起他們自己愛看蘇聯製造的教育影片；但在實際的實行上，工人們顯然是到商業性質

的影戲園比到他們俱樂部裏的電影晚會還要勇躍些。農民則無從選擇，假如有電影偶然拿到鄉村，而他們又買得起電影票，那末就去看一看。

在莫斯科各小學校對大羣兒童中所舉行的問答測驗的結果，也表示一種愛看外國影片的趨勢。較幼的兒童表示不歡喜愛情的影片，但他們都熱烈地提起「道烏格」(Dour, 這是 Fairbanks 在蘇聯稱喚的別名)的影片好看。這班兒童們在其解釋爲什麼看外國影片比看蘇聯影片更歡喜的辭句中寫道：「在那些影片上表演另外一種生活；」「富貴的人有他安樂的時間；」「無論如何，我們對自己的生活總是知道一些；」或「我們的生活是厭煩與困苦的。」八百個兒童提起二百二十四種關於兒童的影片，這些影片是他們看見過的，但是他們認爲好的，祇有一種影片。實際上，在蘇聯的影片中找不到好的趣劇；這是共產黨人自己也承認的。

一九二八年討論電影的黨的代表會議，最後確定電影的任務應如共產黨領袖所想的那樣。第一個任務是使電影在事實上成爲領導、教育、與組織羣衆來執行社會主義建設與文化發展的各種任務之工具。這種領導權必須握在無產階級的手裏，並因此必須有顯明的階級路線，而現在的小資產階級與簡單住民的趨勢之表現於製造影片的政策上者，必須切實予以剷除。第二個任務是團結與正確地組織在電影界有創造力的工作人員，這些人會保障獲得正確的思想內容以及藝術的價值，且使電影更能接近工人與農民。第三個任務是使電影之趨向於工人和農民，不僅在其影片的內容方面，而且對於影片的製造與分配事務的組織及其經濟基礎，均應着重。

工農有一個提議說，電影應使其發展到能代替飲酒；這樣，影片就可代替酒而為勞動者消遣的東西，而同時又可作為公家財庫收入的來源。

在討論電影的全蘇聯共產黨代表會議上，該會主席在其結論的演說辭中，舉出下列事實，並作如下提議。工人與農民的需要並未得到充分的電影來滿足，影片的製造有很大的程度是來適應簡單住民的口味的。若遇影片的內容在思想上是合格的，則它在藝術的觀點上又有缺點，而且證明其不能使觀衆感覺興趣。對於獲利較鉅的商業性質的影戲園注意過甚，而對於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則太不注意。直至現在，黨對於電影還沒有充分的領導，而這種領導作用必須增加的。必須設立一個指導的機關，其主要的性質是直接與黨的中央委員會發生關係的一種政治的與文化的機關。雖在許多細小的問題上頗有意見紛歧，但是終究得到一個共同的意見，認為在一切文化工作上——電影亦包括在內——有厲行階級路線的必要。在這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中，有下列的辭句：

電影須認為是鼓動的、教育的、和訓練的工作之一種形式。所以教育人民委員會，農業人民委員會，衛生人民委員會，以及職工會的文化部，必須向製造影片的團體定製特別的文化影片，並付給此項定款。電影必須成為教育的工具，與書籍起同等作用。

在這些決議中還有一點引起大家注意：電影畢竟拿到黨與蘇維埃公衆意見的「視鏡」之下來鑑別了，那

些組織製造影片團體的負責者，自會覺到：這些決議不是紙上空談，黨要監視代表大會這些決議與黨的指令是否能在實際上執行。

共產黨人對於電影所希望的是什麼，或許可在其對一九二八年初製成的一種稱爲「聖彼得堡的末路」的影片之評論中明白看出來。評論者指出：這劇的中心題目是「從農民間發生出來的黑暗的與盲目的力量和技能的與革命的工廠無產階級」之比較。工廠的工人承認須作有組織的階級鬪爭之必要，而農民的青年則企圖藉爲正義而爭的道德上的與無政府主義的騷動，來解決一個特殊的問題。他又評論說：「農民與工人之有相互的階級聯合與共同的道路之覺悟，是資本主義與沙皇主義的威權之成爲他們共同苦悶的結果，而且這種覺悟最後表現於共同的暴動，這就是工人與農民的「十月。」這種影片又受了批評，說其基本的題材尙不能編排得令人信服。蘇維埃的影片必須「充滿積極的革命的共產主義的內容，在這一方面它與資產階級的影片有嚴格的區別，以此給世界以各種新的電影形式，其力量能使世界革命勝利的日期愈加逼近。」這是引述另一個共產主義的作者之評語。

電影上的「危機」引起了一種企圖，要使「蘇維埃電影友」更能活動起來。這種自願發動的組織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標的一種羣衆團體。它有四百個細胞，三萬五千個社員，社員中百分之三十五是工人。它現在計劃增加社員，尤其在工人中間，該社已開始進行其實際工作。獲得電影機分給各集團一個一個輪流映演，並組織研

究電影機器的傳習班與函授社。又有一種「革命的電影協會」在許多城市組織起來，與電影工廠發生關係。關於電影的各種專門的雜誌受了嚴重的批評，說他們的目的不在滿足工人與農民，而在滿足小資產階級的觀眾，並因此不能成爲正確的思想中心，而且對於訓練問題的領導殊少注意。「蘇維埃電影友」主要的是無產階級的組織，須在黨的指導之下幫助此種領導工作之發展。

在音樂方面，十月革命是音樂界國家組織的開端。音樂就開天闢地的被看作一種社會的力量。因爲音樂是組織工作上的要素，它就成爲政治上重要的，並爲國家所需要的東西。因此，必須促進音樂，尤其是按自動組織的路線來促進。這種組織上的觀念，是蘇維埃體制中時常存在着的，且因共產黨人深信音樂特別沒有組織，所以此種觀念在音樂界方面特別表現得明晰。據共產黨人說，在革命前的音樂是握在私人的手裏，他們視此爲難得之寶；雖曾有相當的國家提倡，但是這種提倡沒有一般的計劃。革命初期的特點，就是爲握得政權的新階級努力攫取音樂藝術的寶庫，這與其他各種藝術具同樣情形。這種基本的思想，是集中一切音樂活動的觀念之所由出者。在新的聽衆間，開始作音樂教育的積極的宣傳運動；歌劇與音樂會，主要的是爲工人組織的。許多音樂專門家自己不能適應新的經濟條件，並因此旅居外國。政治上的信仰與經濟條件，是那些許多逃居外國者的動機之所在。這班人僑居外國，是技術領導人才的損失，但亦爲音樂界的後進者掃除障礙。

共產黨人承認在音樂上的題目尙起次要作用，所以革命後所發展的音樂未能充分表現革命的思想，共產

黨人也不爲此而煩惱，而且甚至當代後進的作曲者也是在過去時代訓練出來的；並且他們雖在革命時期起來參加活動，但對於選擇音樂題材方面一向是袖手旁觀的。革命的影響之表現，即在傾向於紀念主義（*Memorialism*）的趨勢與簡樸化的自覺的努力。共產黨人在這裏表現一種努力，要填塞介乎羣衆的音樂意識與受過高等訓練的選拔出來的專門家集團間之鴻溝，這種鴻溝他們自信是從前存在的。據說，有幾個最有天才的作曲家不自覺地承認了：音樂不僅能用之以達組織上的目的，而且主要的是組織上的一種方法，是能用之生效的一種能發生影響的工具。共產黨人發現一個作曲家在樂譜上很明顯地表現馬克斯主義的唯物史觀；在革命以前，俄國的音樂意識則傾向於神祕主義與幻想主義——這是他們所解釋的。

音樂又是蘇聯的小民族之覺悟的意識藉以能夠自由發表的一種媒介。據說，如猶太民族，得以音樂來慶祝其脫離幾世紀來的長期壓迫的解放，創立其自己的民族音樂，且不是一種愛好者的通俗的性質，而是一種有高級藝術基礎的。其他各民族集團，尙能在舊統治之下亦得保持其民族音樂的特點。可是非俄羅斯的民族集團，是受着限制，且甚至於受暴虐的壓迫。現在，據說，甚至更落後的小民族畢竟也能自由發展其民族音樂。對於此種自立的形式，已有極廣大的鼓勵，而以民族的事情隸屬於較高的階級原則，一如其他一切事情一樣。烏克蘭農民的羣衆歌，或小民族工人的小歌，是特別予以重視的。

與在文學上的情形相似，有所謂「鼓動」的音樂。某些通俗的音樂形式，例如農民與工人的歌謠與樂曲的

對語，均按其內容的性質把它組織起來。革命的觀念與革命的口號就用這種方法找到捷徑以達羣衆。這些音樂的形式並不視爲可作將來的藝術或甚至代表任何獨立的藝術價值，這裏並沒有虛偽，要把此等音樂形式視爲不僅是便於宣傳的媒介。爲維護此等表現音樂的形式起見，對於兩種俄國的民族樂器特積極地予以鼓勵：一種是六弦琴（mandolin）一類的琵琶來茄（balalaika），另一種是俄國到處通行的與代表一種通俗樂器的和合琴（accordion）。農民與工人伴着這兩種樂器合唱團體歌。琵琶來茄的業餘研究社與和合琴的業餘研究社，在許多俱樂部與鄉村都處處可以見到，並且這些研究社彼此競賽，以策勵其發展。

最近爲舉行和合琴彈奏者的競賽，組織了許多音樂會，其參加的人數非常衆多，足見此種音樂在民衆間極其風行。同時，和合琴亦稱爲不僅是簡單的娛樂器具，因爲此種樂器與民衆的日常生活有極密切的聯繫。「羣衆都懂得和合琴；他們都愛好它，並信仰它。這就是爲什麼和合琴與琵琶來茄一類的簡單的民間絲弦器具之所以成爲我們最好的伴侶，以與一切種類的文化落後與文化貧弱奮鬥。」——這是一個評論家的評語。他又進一步指出，和合琴較諸所謂「文明的音樂」爲更易學的宣傳樂器。一篇論這次和合琴彈奏者競賽的文章指出：這次競賽與一九二七年類似的競賽相較，參加競賽者所彈奏的歌譜選自古典傑作者較不多見，而農民的羣衆歌曲與工人和紅軍兵士的革命歌則表演得更多了。在一九二七年那次較早的與第一次的競賽中，所選的歌譜大部分是出自吉卜西歌唱隊（Gipsy chorus）或西歐的卡巴律（cabaret）的音樂。這兩種音樂，在這第二次的競賽

中完全沒有了。但有提議說，國家出版托拉斯應更注意於出版爲和合琴彈獨奏與合奏用的樂譜。在音樂的市場上，私商人有很大的勢力，且足以阻礙當局所施的指導與統制，使其不能按本來定爲可能的與所期望的程度來執行。

音樂的教育，從最初時期卽已認爲是國家所必需的東西，所以已經採了適當的步驟以改組音樂專門家的訓練機關。音樂專門學校大開門戶以招收更多的學生，使無產階級分子得以引入音樂的職業中。據說，在這些改組了的音樂學院裏採用了更多的科學方法，但是除了集體主義的教學方針以外，關於這些新方法實際的性質尙未得到解釋。最稀奇的與特殊的觀念，則爲無領班的音樂隊，或「全班合奏隊」，這是明顯地表現革命的心理。這種觀念的最初表現，稱之爲音樂隊方面的「十月」（革命），是反對領班對於整個音樂隊所施的心理上的專橫之抗議。又據解釋說，音樂隊的領班利用隊中各音樂專家的「勞動」攫取一切藝術上的「利潤」以自肥，因此在音樂隊中的「無產階級」的心目中，他就成爲某種意義的「資本家」。但是，這種無領班的音樂隊並不通行，並且限於少數孤立的試驗中。

俄國的革命不必等候其讚美歌的寫作，已有「國際歌」隨手可得，這歌從此以後成爲蘇維埃的國歌。革命的領袖們及其在秘密活動時期所已經接觸到的工人領袖們，均已知道這歌的樂譜及其歌辭。沒有一個大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集會，不在結束時候高唱「國際歌」的，並且隨時隨地，從兒童與工人的口中，在鄉村與紅軍的

軍營中，都可聽到此種歌聲。一種傳統的革命、喪葬追悼歌，亦是隨手可得的，這歌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期間唱得很普遍，並採用爲第二種半正式的革命讚美歌。這歌的音樂是悲壯的，且同時富有激動性的，其第一句就是：「你已在鬪爭中犧牲了。」共產青年和兒童先鋒也有他們特殊的進行曲，其歌辭當然是關於革命的鬪爭及其勝利的。「兒童先鋒進行曲」是一種簡單而富激動性的調子，且其結語是：「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對於共產青年，則分段歌唱法（*chastushka*）予以新穎的題材與辭句。這些歌唱的個人或全隊間的對語，很適宜於宣傳的目的。從前，較流行的歌曲是取材於幻想的題目，雖其所形容的事情尙是個人的或團體的一般生活。這種多少是自然的自行娛樂的形式，在非正式的集會中於俄國的工人與農民間甚爲通行，這些工人與農民對於團體歌與唱戲很喜歡，而且很有天才。這種分段歌唱法成爲傳播新概念之妙不可言的捷徑。共產青年在其反對宗教一類的宣傳中，運用這種歌曲頗多。

爲工人用的特殊歌曲，已經編起很多。此等歌曲時常採用舊樂譜，而祇換上適用於新時代的歌辭。無產階級的詩人在此作政治的貢獻，歌詠各種革命讚美歌，並描寫工人生活上的變遷。最通行的新的工人歌曲之一，「小磚塊」的歌辭已在前章論述過了。這歌的歌譜是低半音的調子，並在這方面提示了傳統的俄國羣衆歌曲，但在這歌的音樂中有凱旋的與權威的調頭，恰與其歌辭相配。紅軍的兵士唱歌之多，與舊式軍隊的兵士一樣。紅軍兵士一面有正式的「國際歌」與各種半正式的工人歌曲，一面又在馬路上列隊進行唱着換了歌辭的舊歌。學生

也有他們自己的歌。我在莫斯科一個工人學校聽到一羣學生在走廊唱歌，我馬上辨認出這歌好像是教堂的一種讚美歌。但我更仔細的一聽，纔知道這是非正式的反宗教宣傳的歌。這歌所以要用讚美歌的樂譜，是要加強歌辭中所表現的對於宗教觀念的抨擊。

革命前俄羅斯的貴族與富翁階級通行的音樂，是吉卜西歌唱隊的歌曲。過去這些吉卜西歌唱者的音樂隊，通常祇在最大的飯館之私人大菜間裏表演。現在於大城市裏還可遇到此種歌唱隊。到了最近，吉卜西的歌曲祇在地窖的飯館裏歌唱，此等飯館的主人大都是新興資產階級中人。但在晚近的幾年中，吉卜西的歌唱者又公開出來，在大的大客滿座的飯館裏歌唱。在有一個地方，聽衆看起來是無產者，但顯然是該階級的最壞分子，雖然這個飯館是首都最大的合作社經理的。起而代替吉卜西歌唱隊者是藍衫團；這種團體至少在外貌上是蘇維埃式的。這個名稱是根據於俄國工人傳統的服裝而來。俄人包起褲腳的外褲和長統的靴子，是俄國工人中最通行的服裝形式之特徵，這些少年的娛樂者就把這種服裝加上該社的標記和緣起漆皮的邊。與這些劇員相伴的，還有幾種音樂隊。所奏的音樂之主要特點，似乎在其宏大的音量與迅速的速度。藍衫團的戲劇隊在此再來提到，因該團具有音樂與戲劇雙方的藝術。這些小小的劇團本來認為主要是表演活報的宣傳團體，這是熔演劇歌唱跳舞於一爐的劇團，一方面發展其藝術上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則推進到簡單的娛樂而與政治教育背道而馳。因為有這種傾向，以致他們陷入某種被輕視的地位。對於資產階級的觀衆，他們在事實上證明是特別找尋在蘇維埃體

制之下，所設備的各種各式的娛樂之頗廣大的經驗中之最活潑與最堪娛樂的公衆表演。關於時事問題的譏諷是很聰明的，且時常對革命的成績作譏刺的批評。其題材的性質總是蘇維埃的，即把目前的題目與問題包羅進去；但是在其對於革命口號的表演中，特別以油口滑舌的語調達之。藍衫團之所以陷入被輕視的地位，或許就是該團所採取的這種自由批評所致。

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在夏天花園的諷刺話劇中與在冬季的馬戲中，都是繼續不斷地表演。在諷刺話劇場上之個人獨唱或團體合唱的歌曲中，時常唱到政治問題。在馬戲園中，各丑角均能談到「目前的猛烈問題」即革命的題目。在幾個少數的事例中，革命的原則祇被諷刺話劇的歌唱者或馬戲園的丑角於幽默的掩飾之下作間接的攻擊。但是莫斯科最著名的丑角受到「人民藝術家」的稱喚，與俄國戲劇界其他著名的人物齊名，蓋其對於革命的態度與藝術的天才均有足稱。但是馬戲中輕身善跳的絕技，受了訓練的動物，騎馬術，或甚至音樂廳的歌曲，卻不能在娛樂的過程中隨手負起政治教育的任務。

在工人俱樂部，紅軍營房與鄉村讀書室裏，各種的音樂研究組已經敘述過了；這些是最能得大衆歡心的研究組。這裏有兩個要素足以促進俱樂部活動之此種特殊形式的發展。普通在俄國較廣大的羣衆間，唱歌與音樂都有傳統的嗜好，俄國的羣衆音樂在數量上與藝術的質量上均有足述；再則，革命的領袖亦有自覺的努力，欲盡量利用音樂所能做到的接近羣衆的一切機會。甚至古典的音樂，亦須在蘇維埃的體制之下供政治上的使用，這

是推廣文化到廣大羣衆間之計劃大綱的一部分，而且又是施行各種影響的門徑。但是要達到這一最後的目的卻更困難。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的紀念中，一個共產黨的音樂批評家嘆息道：列寧的人格與其革命的事業沒有在音樂中反映出來，雖然，據他的意見，音樂的藝術已畢竟把握住以藝術表現革命的題材之技術了。他舉出著名的作曲家克雷恩 (Krein) 的「追悼歌」 (Mourning Ode) 以作例證。他覺得其他作曲者在其歌曲中給予「列寧的憶像」 (Image of Lenin) 已有成功。這批評家所嘆息的是：還沒有人能編出一種合奏樂以反映列寧的革命創造力，而與皮索文 的愛情合奏樂 (Symphonie Eroica of Beethoven) 相頡頏。

第十六章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馬克斯主義主要的是一種國際主義的學說；而馬克斯主義在蘇維埃制度中的應用則爲布爾塞維克主義或列寧主義。蘇維埃制度之共產主義的創造者與領導者，時常加重說明他們的學說與政策有國際基礎。在另一方面則在蘇維埃統治的時期中民族主義的態度在羣衆間之顯然的發展，是一切局外人的學者與觀察者所注意與加重說明的事實。普通在俄國可遇到許多似非而是的事情，而尤其在革命中這種事情的解釋，至少一部分見於蘇維埃公民訓練的姿態中，這訓練亦有涉及蘇聯公民對國外世界的關係。蘇聯的公民都被希望能爲國際主義者，但是現時的具體事實，已給這種觀念塗上顯明的民族主義的色彩。用以造成國際主義者的方法，結果是促成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之發展。蘇維埃制度的國際主義時提示逼人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是在「歷史上第一個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前即已爲世界所周知的。最後，在蘇聯境內有猛烈的地方的民族主義，且在某些方面比較具有國際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革命以前的情形還要更強烈與更自覺些。

在革命前，俄國有許多集團與個人傾向於國際主義，並因此是顯著的非民族主義者，這是常見的事情。許多俄國人的特性往往是缺乏愛國主義。這種普遍的現象大體上是確實的，但必須加以相當的分析。舊制度之政治

的與社會的條件，爲造成一切爲西歐人士覺得離奇的事態之主因。在沙皇統治之下，有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可是這在那時候是官方的民族主義，並因此是絕對的與武裝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是抱自由主義觀點的，俄國人所不能接受的；在社會主義者看來，則這是被咒詛的東西。這種事實是造成俄國知識分子的國際主義觀點的力量之主因。在另一方面，保守派的政治觀點的基礎之一，便是武裝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而且舊的專制政體有很多程度是立足於這種官方的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舊統治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都藉虐待帝國中非俄羅斯的各小民族以自肥。所以，俄羅斯的愛國主義不能期望於波蘭人或芬蘭人，並且烏克蘭人也因受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各種限制，甚至烏克蘭民族文化習尚的表現亦受限制，以致減弱其愛國思想。在舊俄統治之下，猶太人特別受到虐待而被視爲次等小民，因此國際主義特別盛行於他們中間，而尤以知識分子爲甚。在工人中間，在舊統治下各種權利之被剝奪，實有助於社會主義者的秘密宣傳，而且使他們對這主義的國際形態亦表同情。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已毀滅了，至少減弱了，對統治者稱爲「小父親」的簡單的直覺的信仰，這種信仰本是工人羣衆間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的成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結果與一般文化的與政治的發展，使「小父親」的信仰也在農民中間有顯然的減弱。農民文化的落後阻止了更有理由的愛國主義之發展。農民的興趣祇集中在本地的鄉村環境中，而這種環境是不能促進農民對於地主階級出身的文武官吏所主持的現存制度有所留戀。

兩年半的世界大戰會引起了俄人愛國主義的發展，甚至影響到更廣大的羣衆間。自由主義者與甚至溫和

派的社會主義者都變成愛國者。非俄羅斯民族的分子曾斷定說：他們所熱望的是在俄國與協約國合作而得到勝利。俄國的工人與農民都與平常一樣地證明是絕好的戰鬪員，且似乎（至少是遊移的）承認這次戰事所牽涉的民族利益而不顧一切困難。民衆的領袖，與官僚相反，企圖獲得限制工人組織與保持農民爲卑下小民的法律之廢止，以此作爲促進愛國主義的戰時辦法，因爲當時軍隊遭受敗北，且經濟的負擔日益加重，愛國主義已在嚴重的試驗中。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一方面是以愛國主義爲基礎的革命，尤其對於知識分子，但對於工人與農民亦有同樣的情形；舊統治之受譴責，就是犯了「賣國或愚頑的罪過。」同時，二月革命是一種反對當時所發生的經濟困難情形之自發的羣衆抗議，經濟困難的發展大部分是因舊官僚愚頑的結果。民衆既遇到這種經濟的破壞，就厭倦戰爭。

二月革命的後果之一就是戰爭與革命的關係問題。這問題可用那時候發動的鬪爭中的口號之簡單辭句來敘述。保守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被責以敵視左派，企圖利用戰爭的局面以擊敗革命，或至少限制其發展。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號召繼續戰爭以維護革命。布爾塞維克反對繼續參加「擁護地主與資本家利益的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在一切國家中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主張在俄國連同他們的另一口號立刻應用，這另一口號即爲「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歸工人與農民的階級機關。階級的利益普遍地宣傳到各民族的所在地；無產階級的團結是布爾塞維克宣傳戰壕兩對岸工農攜手的基礎。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認爲戰爭足以

維護革命，並同時預備與其他各階級合作以繼續戰爭，此派被布爾塞維克斥為「社會主義愛國派」與社會主義及工農利益的叛徒，布爾塞維克祇對政權已握到工農手中的國家纔容許有自衛的戰爭。新政府威聖的基礎正埋在這戰爭與革命的關係之一切討論中。

在這時候，從俄國革命中發生的另一口號是「和平不能有割地與賠款，且須以人民有自決權為原則。」這公式雖為自由主義者與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所接受，而事實上是國際主義者的綱領。後來這口號補充以設立工農政府的蘇維埃國家形式與蘇維埃聯邦的觀念時，便完全適合於世界革命的觀念。這口號含有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或「在世界帝國主義的苦厄下」的人民之民族主義運動中，承認民族的原則為革命鬪爭的開端之意義。至如在一九一七年應用於俄國，則這口號又是對當時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擁護者之一種攻擊，俄羅斯民族主義受戰爭的影響在知識分子中曾增強起來，並受他們在羣衆間的推進而成為二月革命的一部分。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接受了這個公式，同時又牽涉到另一矛盾，布爾塞維克就能在革命的這一階段利用此種矛盾而作他們進一步反對「自衛的戰爭」觀念的宣傳運動。自十月革命成功與蘇維埃制度的建立，布爾塞維克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觀念得到了實際的應用。

在蘇俄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上，前而已經說過的兩大時期也劃分得很明顯。在一九二一年以前，有「軍事共產主義」在這幾年中，非但蘇維埃制度未得各國外交上的承認，而且在此制度管轄下的國境，亦受着經濟的封

鎖，且有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紅軍則與白黨軍隊——「地主和資本家」的軍隊——作戰；而後者又受「世界資本主義」的庇護。在「敵人」掌握中的各部分舊俄帝國的領土，漸漸奪回到蘇維埃主義方面，而蘇維埃主義亦在世界上獲得地位。曾在匈牙利 (Hungary) 與巴伐利亞 (Bavaria) 建立起蘇維埃制度，且在德國的革命中亦有蘇維埃的觀念。紅軍曾進展到里加 (Riga) 與華沙 (Warsaw) 的城門，並時常隨身傳播着蘇維埃的觀念與制度。在一切國家中，於這戰後的數年間都有工人運動，而此種運動實具有「革命的可能性」。在十月革命的卵翼之下，共產國際成立於莫斯科，成爲「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這是積極宣傳的時期，既是進攻的，又是防守的，一面促進世界革命，而同時又藉此種宣傳以作防護新制度的工具。

自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採用後，首先就是發生了與各國通商關係的重新建立，並繼以正式的承認。關於蘇聯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互相作用的討論，已不屬本書所研究的範圍以內；我們在此所要說的，祇須提及新經濟政策的時期就是所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一個時期就夠了，但在這時期時常加重說明「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並經常以此事警醒工人與農民。世界革命的觀念並未廢棄，而外國干涉的危險也未信即已消滅。這祇是一個休息的時期。蘇維埃政府與其他各國政府關於宣傳問題之不斷的爭論，助長了關於世界革命與革命的防護問題以及一般的關於這新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之討論。

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季，蘇聯與世界各國的關係起了變化，此爲一個新的第三時期的濫觴。引起這種變化的

主要原素，祇能簡略地說過去。在國內經濟方面，共產黨人開始說起「改造」時期，以與「恢復」時期有別，其所根據的是此時顯著的經濟進步已走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的道路。在國外的世界，共產黨人見到資本主義制度削弱的象徵，他們認為各國在世界大戰後，祇能達到所謂暫時的穩定。在這兩方發展的趨勢中，共產黨人看見了全世界的階級鬭爭重整旗鼓；並依他們的觀點說來，在這新的形勢中，蘇聯成爲資本主義新進攻的對象，同時又是新的革命浪潮之激動物與造成此種希望的東西。共產黨內部的爭論已給蘇聯的地位與作用下了更明晰的定義，被解釋爲證實這種對世界形勢的新觀點之幾件大事就是：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大罷工與礦工的罷工，中國的革命運動，在一切國家中的罷工與工人的示威遊行，法西斯主義的傳播，英蘇外交關係的破裂，與蘇聯大使在華沙之被暗殺，這祇是說到最重要的幾件事情。共產黨的領袖說武裝干涉與實際的「經濟干涉」之迫近的危險，是世界資本家欲毀滅蘇維埃制度的另一企圖的準備中之一步驟。在他們看來，新的形勢之他方面的現象，則是其他的世界各國革命潮流的高漲，而同時蘇聯在其他各國的勞動者與被壓迫者間的威聖，亦有相當的增加。因此，保護革命與蘇聯對世界革命的領導之兩個觀念，就提出作公衆熱烈的討論。自一九二六年開始的這些發展，供給了作一更明顯的公式之材料，以表達蘇聯公民根據該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應行採取的態度。

蘇聯脫離世界其餘部分之銳利的分化。時常爲列寧用其對世界人口之很簡略的分類顯示出來。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史太林在其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中，亦重新提起列寧的這個分類。地球上人

口的總數估計爲一十九萬零五百萬，其中一十一萬三千四百萬被歸入住居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之一類。於是把其餘的人口分成三大集團：一萬四千三百萬是蘇聯的人口，二萬六千四百萬是中等國家的人口，而祇有三萬六千三百萬是「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大帝國主義國家。」史太林於是解釋中央委員會對黨的代表大會的報告爲什麼應首先提到國際形勢，說道：

同志們，我們的國家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局面中生存着與發展着的。它的國外形勢不僅依靠其內部的力量而且依靠這種資本主義包圍的情形，依靠環繞着我們的國家之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勢，依靠他們的強弱，依靠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強弱，依靠這些階級的革命運動之強弱。我並不需要細論我們的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的世界革命運動之一部分。

從這種世界革命的綱領，可知共產黨對於其以蘇聯的名義與國外「資產階級」的政府所訂的條約之態度，是多足論辨的事情。下面一段是從一九二八年三月間真理報關於在德國簽訂勃列斯脫·列托夫斯克條約 (the Brest-Litovsk Treaty) 週年紀念的社會論中摘錄出來的，雖沒有很確定地針對這一點立論，但是以顯示這種條約怎樣站在工人與農民的利益上來解釋：

勃列斯脫和約是蘇維埃政府對於資本主義的一個妥協。但是這是屬於格殺敵人的一種妥協。自訂立和平條約以後，布爾塞維克主義對於德國軍隊的影響增加了，而且德國的革命受這件事實的引動而日益逼近

了。這社會主義國家與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切「和平」的關係，都與勃列斯脫和約一樣是對此等國家的特種妥協。而且這種妥協也是格殺帝國主義者的。此點的明證就是全世界一切勞動者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進，以及這些羣衆對向蘇聯狂吼的帝國主義益臻仇恨。

蘇聯外交政策的全部內容之如共產黨人所草錄者，本身就需著一本書來研究，此處所徵引的幾段，祇是選錄出來以指示對其所採取的政策之解釋的一般方向而已。史太林在一九二七年黨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可再用以說明這種解釋的趨勢。史太林自己對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報告做出一個提要，指出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相互作用如下：

(1) 我們已經與四周的國家保持和平，不顧極大的困難，並不顧「大強國」的資產階級之挑撥的進攻。

(2) 我們已經增強蘇聯的工人階級與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工人之聯盟，不顧許多阻礙，並不顧朽腐的資產階級善於造謠的報紙之多方誹謗。

(3) 我們已經提高無產階級在千百萬的勞動者間與在全世界的一切部分之領導的威權。

(4) 我們以一黨的資格幫助了共產國際與其各國的分部，以增強他們在全世界一切國家內的影響。

(5)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黨對於發展與擴充世界革命運動所能做的一切事情。

(6) 我們已經擴大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在其發展中造成空前的速度，並獲得其對於全部國民經

濟的領導權。

(7) 我們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的工業與農民的農業間的聯盟。

(8) 我們已經藉依靠貧農的政策增強了工人階級對中農的聯合。

(9) 我們已經在本國增強了無產階級的獨裁，不顧國際包圍的敵視，已對一切國家的工人表示無產階級不僅能毀滅資本主義且能建設社會主義。

政府與黨的負責領導者，關於他國政府積極地，並有時聯合地，企圖以直接的與間接的方法推翻「世界第一個勞動者的國家之言論，或者似無根據。」私人的個人或團體之反蘇聯的活動與各國政府人員的個人言論，均被解釋為這一種政策的證據，並指出與引證出來，以提起工人與農民的注意，時而特別提出，時而僅作一般的提示。時常指出的一個普通的提示是：各國的資本家看見了蘇聯經濟生活之社會主義的改造之成功，並認清了他們不能允許此種成功的繼續與發展，在一九二七年所表現的逮捕事件，造成了略嚴重的戰爭恐怖，地方的共產黨人傾向於從字面上了解其領袖的言論，說休息時期與蘇聯和其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關係時期正告終結。地方的代表會議，在其對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之各項決議的討論中，主要的注意於涉及國際形勢與蘇聯在這國際形勢中的地位之那些決議。人民都開始購辦與貯藏貨物及糧食，以防戰時的經濟失常。

這種反響嚴重地擾亂了經濟計劃與其綱領，而出口用的穀類屯積受其影響尤甚。因此提示即刻有外國武

裝侵略的言論稍稍減少。但是仍在加重說明蘇聯之受「資本主義包圍」並找出與向工人與農民指示外國資本家「經濟干涉」的證據，甚至反對蘇聯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之努力，亦被解釋為其敵人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陰謀毒害的計劃，因一個工程師集團之煤礦的經濟反革命計劃發生，三個德國工程師被捕。一九二八年關於這種階級戰爭的審判之討論，解釋這件事情又是外國經濟干涉的現象。

下面一段引語多少是隨便選自足以表示加重說明「敵人的資本主義包圍」的結果之許多例證。去年莫斯科一切高級技術學院將屆畢業的學生，於其畢業前夕的全體代表會議的決議案中有如下一段：

關於我們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之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我們遇着許多困難。我們的敵人正在企圖破壞我們的建設工作，並用了種種新的形式與方法以達到這個目的。

蘇聯最重要的機關與團體，都有其國際活動的領域，或至少具有國際的形態，以確定其關於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之這些簡短扼要的解釋，並根據這些解釋以在蘇聯各種公民間促進其對於政府與黨的政策以及因此而生的蘇維埃公民義務均能完全了解。這種國際方面的訓練，我們在前面幾章於敘述各機關或團體時已常常說到，並以這最後一章為參考。茲冒相當重複的險，再來評述這些機關與團體，視此為在蘇維埃公民中發展共產主義者的世界態度之工具。這樣再來評述，將又顯示這些機關與團體所組成的龐大的並同時是統一的體系。每一種大的公民範疇對於共產黨這方面的訓練之反應，在此祇能略作提示。

在理論上說來，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許多分部中之一個分部，須視共產國際爲一切共產黨人的最高機關而對它負責的。按同樣的理論，在蘇維埃政府中的共產黨人，必須視如在此負責的官吏而隸屬其政策於這個國際團體的目的與策略之下。該黨決定要蘇維埃政府採取的政策，常常提到共產國際以求正式批准。因此可說：蘇聯的共產黨在其負起蘇聯的領導責任中，是得全世界共產黨員之支持的，並且這種解釋用以興奮該黨的黨員，以求獲得更大的興趣與努力。可是這種理論在實際上有些不同。蘇聯的共產黨，因爲是最大的分部，並按其反覆常用的成語是已經「克服資本主義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已經執行奪取政權的綱領之一分部，故在事實上是共產國際中的實際的權力機關。該黨以列寧爲共產國際的首創者與領導者；而且列寧主義按其這特殊的黨所解釋是這兩團體的權威。蘇聯共產黨人根據他們的實際經驗與成功在事實上建議，且甚至命令，整個共產國際與其他較小的分部之政策。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大部分是根據蘇聯共產黨的經驗定出；其他各國的共產黨經常告之自行布爾塞維克化，意即採用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所根據的黨的建設原則。該黨因是最大的分部，對其國際的團體給予最大的物質幫助。至若這種幫助究竟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取自該黨在政府中成爲執政政黨之國家的公家財庫之大有爭論的問題，在本書並無討論的必要；在此祇須提及蘇聯共產黨是對共產國際在人才上與物質上都是最大的幫助者就夠了。

蘇聯的共產黨員個人或共產黨，因較「資產階級」國家的黨有這種更大的經驗與更大的幫助能力，發展

了一種特殊領導權。一種世界領導權的意識。爲避免暗示俄羅斯的領導權起見，該黨的名稱改作「全聯邦共產黨」。該黨並以此名稱暗示這結構與組織的面貌，得於世界革命到來時指揮這個革命。且這種領導作用當應用於全世界時也祇是擴大行於蘇聯內部的那些特性。對於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人似有發號施令的態度。莫斯科的領袖雖時常說：他們把蘇聯的工廠分給全世界的勞動者共享，這些工廠是屬於全世界工人的，但他們往往對他的共產黨人根據共產國際是蘇聯共產黨人事實上的最高機關的理論有何建議而尤其有何批評時，則表示不悅。他國的共產黨人來此幫助領導革命的，並不常常能如其所預期的精神來努力。因爲蘇聯的共產黨人已經爲革命流了血，已達到與得到對第一個工人的國家之控制權；而其結果，不願無產階級團結的原則，他們表示欲保持這領導權於自己手中的明顯趨勢。因世界革命的延期，他們就集中自己注意力於蘇聯政府的與經濟改造的任務。所以，在國際主義的理論之下，一種民族主義的形式甚至在共產黨人中發展起來。領袖們在祇有共產黨員參加的黨的代表大會上，時常說到「我們的國家」或「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義務」雖也有說到蘇聯爲其他各國的工人與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祖國。

共產青年團也與它的父母——共產黨——一樣，祇是一個國際的組織——青年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青年共產國際簡稱「啓姆」(KIM)。「啓姆」也有執行委員會與共產國際相似，其辦事處設在克列姆林宮旁邊共產國際的那座房子裏。「啓姆」的代表大會也定期在莫斯科舉行。因爲這種組織裏的青年人不像他們黨

裏較年長的同志那樣負責任，所以這些代表大會與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比較不正式一點。但是這組織的國際形態時常予以重視。共產青年團因是黨的預備學校，必須在青年中發展共產主義者的國際觀。爲此目的，在前面論這種組織的一章中所列舉的共產青年團的各種活動之很大的百分比，是直接或間接與這種運動的世界目的有關係的。對於青年們有特殊的紀念日——國際青年日，這紀念日是在俄國革命前即已定出的，但在革命後採用之以爲每年大的革命紀念日之一。這第一次秋季紀念日，是在九月間於學校開學的前夕並於各工業機關在夏季後再行恢復全量生產以及秋收亦已告成之時舉行的，這便成爲一件重要的大事。青年在一切紀念與遊行中都起重要的作用，而他們自己的這次特殊的節期，則有助於使他們覺得在這種活動的場合裏負有總的責任。

對於國際形勢的注意，能使鬭爭的觀念極度加強起來，這特別從國內戰爭結束後是如此的。青年人或至少他們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分子，找到這裏是他們的熱情得以表現的廣大場所。派到共產青年團裏面指導的共產黨核心，把這些青年人推動到表示種種抗議的程度與形式，共產黨人大概覺得採取這種抗議形式比較方便些。無論如何，黨可時常憑藉青年團以激起反對「敵人資本主義包圍」的遊行示威與宣傳運動。雖對這些被選出的青年工人、農民、職員、與學生的代表要求須有程度很高的政治覺悟，但是並不希望這班青年人能了解他們的國際義務之全部責任。在宣傳與鼓勵方面，他們已證明是最有用的集團，有較多的時間以作這種活動，且能以最縱情的方式參加此種活動，尤其關於世界革命與防衛蘇聯這兩個觀念。共產青年團亦廣被利用以作公民團

體徵求會員的運動，或作有國際性質的特殊用途之捐款運動。最後，共產青年團，像共產黨對它自己一樣，對於兒童的共產主義組織以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國際觀念灌輸於兒童先鋒。這裏的領導責任迫令這些青年人不得不更正確地定出他們的觀點。

外國的參觀者時常得與年輕的共產青年團員談論國際形勢。他會被問到他自己的國家裏有無革命的可能，或問到資本家干涉蘇聯的準備如何，而且他會被這種青年人所表示的對各種事實的興趣與知識所驚駭。作者曾有過幾次這樣的經驗，而且實際上關於蘇聯的每一遊記都說到這一類的談話。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國際目的被共產青年團員感覺到最強烈，如果不是意識到最完備的話。藉印刷品上與由代表大會或通訊所建立的關係，共產青年得時常與從共產主義的觀點所解釋的各國狀況以及各種運動發生接觸。這些接觸的意旨之一，就是要使青年人認識在「他們祇從書本上知道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狀況與教育。以更多的個人接觸為基礎，希望這兩種制度的比較，能使青年工人與農民更明晰地認清蘇維埃制度的原理，並可在他們中間發展更強烈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情感。

對於蘇聯兒童中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兒童先鋒，則沒正式的國際組織。但是兒童先鋒在國際青年日的紀念中卻包括在內的，他們幫助其年齡較長的同志——共產青年團員與共產黨員——徵求新黨員，或捐款以助國際革命的或防衛蘇聯的團體或事件。藉印刷品，並藉與各國兒童的彼此通信，蘇聯的兒童先鋒得認識其組織之

真世界規模，而且全世界各國兒童先鋒的團結觀念，亦印在他們的腦中。作者在莫斯科一個小學校裏受到小孩子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美國有沒有兒童先鋒。與蘇聯兒童先鋒談話中的問答，時常涉及國際關係的題目，並發覺兒童們對於此等問題有非常濃厚的興趣，且對其相當的革命口號亦甚熟識。兒童先鋒參加其年齡較長的同志之集會及紀念會，每當這些會涉及他們與國外「資本主義」世界之關係時，兒童先鋒的參加特別來得多。在這些會中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表示熱情與應用象徵主義。兒童先鋒的共產青年團領導，在黨的領導之下來執行，保障這種興趣與熱情循着共產主義的方針。

蘇聯本身就是一個國際的政治團體。當它於一九二三年正式成立的時候，曾有建議新的名稱爲「歐洲與亞洲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這個建議所以失敗，因爲它並沒有照顧到世界上其他三個大陸。蘇聯的組織機構是能擴大以至包括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這種特點已在討論新的蘇維埃的國家式範時常常說到了，蘇維埃的標記，如五個尖頭的紅星，象徵蘇維埃制度的世界規模。這蘇聯的世界規模又表示於審慎避免採用含有民族主義態度的文字。在蘇聯內部最大的與佔優勢的單位是俄羅斯的單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論到這一單位時，這正式名稱的五個字之第一個字母讀成一個字，使「俄羅斯」一字可不必用，很難得聽到共產黨人用「俄羅斯」一字；若遇不能避免時，如常用以作討論的題目時，則這字將放在引號裏。在說到與他國的關係時，所用的名詞時常或是「蘇聯」或是「蘇維埃政府」，祇有一兩次例外，這時候「俄羅斯政府」一語顯然

是因牽涉到舊俄的利益而提到。在國內用以指稱思想的傾向以及世界各國仍稱爲「俄國」或「蘇俄」以示這區域的特點之法定的事實之形容詞，都時常是「蘇維埃的」而不是「俄羅斯的」。在與堅執用「俄羅斯的」一字之外國人談話中，共產黨人或共產青年團員在其說話或回答中用「蘇維埃的」一字來代替。在年老的知識分子與在年較老的工人與農民間，「俄羅斯的」一字仍在通用，當說到蘇聯的正式語言時，「俄羅斯的」一字不能避免；但採用這種語言爲正式的語言時，加以解釋說：這是過去十月革命的真正語言，如「布爾塞維克主義」及「蘇維埃」一類的文字，都是從此爲全世界的工人與勞動者所採用。

在蘇聯內部，根據民族文化或地方的經濟利益而來的地方特殊主義，須與之作積極的鬥爭。地方的區域研究之受鼓勵，是要確定其文化的與經濟的來源以使之能有更完善的發展。但是整個的蘇聯的共同利益——即工人與農民的階級利益——必須在純粹的地方利益之上。凡遇有歷史的基礎，以狹小的民族集團之形式而存在的事實，則蘇維埃制度的聯邦性質卻承認此種事實，而同時使地方的利益隸屬於蘇聯的政策之下。烏克蘭人享受着文化的自主；他們用其本地的語言，唱其烏克蘭的羣衆歌，讀烏克蘭文的書，並有特殊的機關以增進他們的文化發展，使他們更能表現其工農的真面目。新的行政區之採用，其中目的之一，亦是要廢除往往能供地方特殊主義做根據的舊的行政單位。在蘇聯內部唯一嚴重的地方民族主義，是烏克蘭與高加索的喬治亞的民族主義，而這些民族主義已予以嚴厲的打擊。一般人相信他們一部分是由舊日大俄羅斯武裝的與專橫的民族主義

所激起。據稱，這種心理的習慣業已迅速剷除，且解釋這是給新制度以一種負擔的舊統治之另一合法的主義。因為烏克蘭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無從直接表現，要確定此種民族主義如何解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蘇維埃主義的國際主義與從前專橫的與逼人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多方相似，亦沒有可能。反猶太主義是革命前合法的民族主義之另一形態。所以，一切反猶太主義的表現，都歸咎於舊制度，並解釋這是敵人所用的階級鬥爭的武器。俄羅斯愛國主義，烏克蘭民族主義，與反猶太主義，都宣稱與馬克斯主義的階級學說不相容，並是「危險的離開了」黨與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蘇聯所據以成立的原則。這些主義的堅持，認為是暫時的，而增強或發展這些傾向的積極活動都解釋為反革命的。

蘇聯的政府組織示明它具國際的性質。紅軍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軍隊。紅軍兵士當正式加入服役時所宣佈的誓辭亦包括這一點意旨。無論何時說到紅軍，它保護全世界勞動者的路線之義務的事實，是時常予以重視的。它常常是「工農紅軍」，並無狹小的民族思想。它的迫切義務則是保護革命的征取物——農民的土地與工人的工廠。因這兩個集團仍用舊俄的名詞連在一道，在他們與紅軍的兵士看來，紅軍們可視為一種民族的團體。但在成為訓練紅軍兵士與紅色海軍的一部分工作之政治研究中，蘇聯的國際任務特別予以重視。在論特殊的政治教育的一章中所述的這些研究的內容概要，已把這個事實明顯地指示出來。紅軍兵士回到他的原來鄉村或工廠時，希望他能被重視的要點反映出來；他把蘇維埃的經濟原則的觀念，例如合作社與生產的集體方

法都帶回去；他在服役的期間曾把注意力集中於國防問題，但退伍的紅軍兵士則有在本地宣傳他的新的世界觀之義務。

蘇維埃政府在它與各國的正式關係上，有兩種重要的新實施是從它的國際性質之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產生的，並有使這種觀點日益進展與大衆化的意向。在最初幾年中，蘇維埃政府超越各國政府而直接與各國的人民發生關係。常各國共產黨人或勞工的領袖被逮捕或以革命的活動而定罪時，蘇維埃政府曾有幾次採取外交的步驟，表示他們認為這種人是他們的革命國家之人民。又在革命的最初幾年中，與正在同一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衝突」的非蘇維埃國家，如土耳其與波斯的博愛的聯盟之實施，亦是發源於這國際主義的觀念。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這些新奇的實施，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的時期中，已不以同樣的程度來施行或重視了。在第三期開始的過去二年中，這些較早時期的實施又重新出現。例如，最近蘇聯在日內瓦會議中的軍縮提案，被在國內解釋為代表全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之觀點與希望。

在蘇維埃政府制度下之另一實施，可在此述出，藉以表示其如何在羣衆間提出與發展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態度與綱領。地方蘇維埃，尤其是大的城市蘇維埃如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蘇維埃，時常在其常會的議事日程中提出國際形勢一項。地方蘇維埃的特別會議常常召集以討論國際危機，如一九二三年的巴爾福的哀的美頓書 (Balfour Ultimatum) 或最近的蘇英外交的關係破裂；並且由這些地方團體通過關於外交政策的決議案。

與告各國勞動者書。雖然一切外交關係都是由蘇聯政府機關來執行的，但是各民族單位，如烏克蘭，與甚至地方蘇維埃，都討論與通過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決議案。這種辦法作為動員廣大羣衆意見的基礎，在與各國正式磋商蘇聯外交時常要根據到這種羣衆意見，同時這是使蘇聯公民成爲世界革命者與蘇維埃的愛國者的政治教育。

蘇聯的職工會有他們的國際組織，稱爲「赤色職工國際」。這個團體由蘇聯的職工會發起，模仿共產國際的組織而成立，它也與共產國際一樣，在理論上是比蘇聯職工會高一級，並是國際的機關，但在實際上是後者藉以影響各國工人的工具。職工國際簡稱爲「潑羅芳坦」(Proletar)，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於莫斯科召集的職工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中，五大洲與五十個國家都有代表參加，但蘇聯的職工會會員超過一千萬，代表佔了多數。這次大會討論了與通過了關於全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決議案，並且這次大會，尤其是蘇聯的職工會，對於這些運動的性質與進步所負的責任，是蘇聯代表在其發言中經常提到的。負起這種責任的嚴重性，或可以在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大罷工中蘇聯職工會的活動爲最好的例證。其所建議的進攻性質與欲直接以莫斯科職工會的領袖來領導的趨勢，對於他們的蘇聯職工會的國際任務的觀念之重視實有幫助，至少在他們的活動分子中是如此。捐助工資百分之一的辦法，爲蘇聯一切職工會會員進行到數月之久，這給此種觀念以具體的內容，且很確定地印入他們的腦際，尤其因爲這種對英國罷工的幫助之結果，引起他們與英國政府的爭論。敵方宣稱：這種捐

款的組織採取特別方法，使人人沒有逃避這「自願捐助」的可能。但對這種捐款確是無人抗議，而且職工會的機構得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個宣傳運動；共產黨的領袖解釋這些事實為他們的國際觀念已被工人與甚至被擁有蘇聯幾個最大職工會的勞動知識分子所自覺的接受之明證。

職工國際又是表示蘇維埃制度的原則與目的，為各國有組織的工人與勞動者正式接受。蘇聯的職工會藉與這國際團體所轄的各國職工會與其他團體合作，得在「敵人資本主義包圍」中找到朋友與讚美者。有些地方把捐助英國罷工者的捐款負擔解釋為必要的，因為這是英國政府對蘇維埃國家所取的政策有以致之；這種對大不列顛朋友的援助，將增強他們反抗干涉蘇聯的新趨勢之力量，蓋莫斯科的領袖們覺得英國政府有這種干涉的政策。所以，蘇聯職工會的國際活動具有愛國的姿態，是防衛「第一個勞動者國家」的準備的總綱領之一部分。

共產黨人希望漸漸使農民從個人主義的方法轉變到集體主義的方法，並從狹小的地方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觀點轉變到更廣遠的國際觀。當在革命的最初幾個月中，托洛斯基主張與「資本主義世界」作革命的戰爭，當時列寧回答說：這樣，農民不會了解，且不會作戰的。在此後幾年的國內戰爭中，農民看見了外國干涉援助白黨軍隊，而由白黨軍隊來犯的意義則常是把農民已經奪得的土地歸還地主。共產黨人在其宣傳中利用這個事實頗見奏效。不僅能把農民奪取到自己方面來，而且能使他們開始從國際階級鬥爭的意義上來思索；在俄羅斯國

外還有敵人正在幫助剝奪農民的革命戰利品——土地——之企圖。在其他各國的工人運動，據解釋說，會把農民的敵人推翻，並同時會解救工業品的缺乏與提高穀類的價格，其方法即為於擴大這新的經濟制度之基礎，實際上包括幾個工業較發達的國家時，使這種經濟制度有作更有效的生產工作之可能。於是，因農民運動已開始在幾個鄰國具有確定的與甚至革命的形態，農民國際就告成立，使農民更能直接與這些運動及國際的鬭爭發生關係。農民國際並未成為活動的或著名的機關。但是它仍舊存在，並在農民的報紙上與蘇聯一般的報紙上時常提到它。

蘇聯職工會與合作社的領袖，都時常加重說明他們的組織之國際的血統關係與國際的目的，以在其他各國的相當團體中，又或在他們自己的會員中，掀起內部的衝突。蘇聯職工會在英國罷工中的活動可再來敘述，這是示明蘇聯職工會領袖幫助他國一種運動的領導，或甚至是自居領導地位的趨勢的一個時候。蘇聯合作社的領袖會與國際合作協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的秘書處關於他們在這協會裏的活動問題發生爭論。在這次爭論中，蘇聯合作社的領袖宣告秘書處的觀點為參加該協會的團體，尤其為合作社的羣衆——這些團體的社員，——所不能承認的。這些蘇聯的分社覺得自己是工人與農民的羣衆的機關，應負責實與改正其他各國的羣衆組織的領導之義務。他們時常罵現存的領導機關是為階級敵人的利益而工作的。對於這種特殊機關或團體的義務與作用的解釋，在較活動的或共產黨分子看來，無疑地增加它的重要性。但是一個

蘇聯的機關或團體之在國內負有繁重的日常任務，使其結果對於這特殊團體的國際興趣與活動所給予的時間與精力常加忽視，而且非黨員的社員亦有開始循着這種民族主義的路線去設想的現象。但是在每個機關或團體裏的共產黨領導的功用，則在經常堅持這種機關的活動有具國際形態的必要，視此為其機構與目的之主要的蘇維埃特性。在一般的農民運動與合作運動中，民族主義的傾向有成普遍現象的趨勢。

蘇聯最大的與最著名的自願的公民團體，或者在其目的上具國際的性質，或者是準備防衛蘇聯的。「木潑兒」即援助革命者的國際互濟會，已在前面一章中敘述過了。蘇聯有最多的會員人數，並因此對該會的財政幫助亦為最大；會員加入，即假定他們對世界革命的觀念是尊重的。會員中也有活動分子，此種分子使各國分部的活動常能生氣勃勃，而各國分部則以細胞為組織的單位。代表大會，會員的徵求運動，歡迎各國交換過來的或刑期滿後僑居到蘇聯的革命者之示威遊行，都使該會與該會的目的時常呈示於工人與農民的面前；「不許侵犯中國協會」(Hande-off-China)是另一個自願加入的團體，這是因中國革命的發展而產生的，祇須提到這兩個團體並再參考在前面一章論自願發動的公民組織一般的論述，就足以闡明蘇維埃公民活動之在這一方面用以增強蘇聯公民的國際主義觀之方法的一般情狀。其次，在防衛蘇聯的準備方面，則所謂「航空化學會」是基本的與最大的自願加入的團體。這簡寫的名稱是從前的「防衛合作社」(Society to Co-operate in Defense)與「航空化學業餘社」(Friends of Aviation and Chemistry)之混合體的代名詞。據稱，這混合的

團體共有會員總數三百萬人。自與英國的外交關係破裂以後，發生了一種自願的團體，稱爲「回答張伯倫」(The Answer to Chamberlain)，進行飛機捐款的工作。

共產黨人與紅軍的領袖藉這兩類自願的公民團體，能夠一方面推廣其革命運動的統一原則，與另一方面作一致的軍事準備，共產黨人能允許這些自願的羣衆團體，得採取他們共產黨人所不能表現的民族主義的路線。紅軍的領袖能拒絕一切組織軍事訓練的責任，因這種責任是航空化學會的一部分活動。同時在該會的活動中，商業航空的提倡與化學在工業與農業的發展上或傳染病的防止上之應用，諸如此類，都重視之爲該會在另一方面相等重要的活動。藉這種方法，會員得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多量的自願貢獻，而於俄國及世界革命雙方有利。

各學校、研究院、與大學，以及政治教育的特殊機關之學習大綱，已在前面幾章中述其概要。在這些大綱中，「共產國際與世界革命前途」和「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聯」這兩個題目，雖以稍不相同的名目表示，卻常常是在課程表中佔重要地位，並分配得很多的授課時間。再則，訓練東方各國的與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黨員的特種大學亦應在此提及。

在革命的紀念日中，有幾種紀念日是特別具有國際性質的，例如五一節，國際勞動婦女節，與國際青年日。紅軍紀念日則是以國防問題爲中心的主要紀念日。同樣，在各項宣傳運動與徵求運動中，有些每年舉行，其中一方

面有「木潑兒」的徵求日，而另一方面則有國防週。但在一切的紀念與宣傳運動中，世界革命與資本主義干涉蘇聯的問題，都是在印刷品、演說辭、以及全國宣傳的口號中提出；這些紀念與宣傳運動是各方注意力的定期集中點。這些問題在文學的與戲劇的作品、電影片、無線電節目，以及音樂與歌曲之「正確的思想內容」藉以組成的題目單裏，亦佔重要位置，這在論及這些政治教育工具之利用的幾章中已予論述過了。

國外新聞的篇幅比例，不僅在較大的指導的報紙，而且在較小的工農小報，都佔着很大的部分。在為青年與兒童閱讀的報紙中，也有非常多的長篇短論述及國際形勢。蘇維埃政府與其他各國政府外交往來的文中，亦盡量在報紙上披露，因為這時常含有宣傳的成分與宣傳的價值。蘇聯代表在日內瓦軍縮會議的討論中之報告，甚至在為鄉村讀者刊行的小週報裏亦有登載。這種材料的登載時常附以解釋說：祇有在蘇維埃的制度之下，纔能有參加這種會議的代表將所討論的與決議的事項，充分地與自由地報告出來。且通常都說：在蘇聯討論國際關係比在其他以出版自由自誇的國家裏更公開與自由得多。共產國際或職工國際定期的告全世界各國勞動者書，都在大報披露全文，並在小報摘錄概要。特約通訊員與從官方的通訊社——塔斯(TASS)——所發的新聞要目，包羅一切重要的國家。共產黨對於報紙的領導，使確定一致的解釋方針與集中注意力均有可能。一種特殊的口號廣播於全部出版物的迅速，是最堪注意的；而且無論何時，每當政府的外交政策號召表示蘇聯的公衆意見時，這機器馬上可以發動。

「軍事化」一語用得頗自由，並且用於「全國軍事化」一類語句中。但是，共產黨人堅稱：他們軍事訓練的宏大綱領並沒有含蓄軍閥主義的意義，蓋軍閥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蘇維埃的國家式範，尤其是它的軍隊組織之特點，即在針對着擁護共產黨人這種意見。因此，在工農政府之下的紅軍，是羣衆的「血中之血」，完全參加到羣衆的生活中，並因此在羣衆的完全控制之下。民衆軍事化的蘇維埃形式，多方與普通的國防綱領相似。這種宣傳，藉增進組織與紀律的觀念，並藉增強鬪爭的觀念，加強了共產黨人經常指爲他們的訓練要點之各種習慣。這些習慣是在俄國的羣衆間，甚至是在受過教育的各階級中，所特別缺少的，這有種種的原因，此處不能予以討論。在一切蘇維埃的團體中，而尤其在這種軍事化的綱領中，對於紀律的重視，以其目前的經濟狀況與其人民的習慣而論，實含有建設的意義。

軍事準備的綱領所有的負擔與耗費，都放在其他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身上，尤其自在日內瓦的會議中提出完全的或部分的廢除軍備的建議之後。這些建議都在國內解釋爲藉向各國的勞動者證明蘇聯要求和平的誠懇願望以增進蘇聯的安全之一種努力，且亦爲減輕世界勞動者與蘇聯工農對軍備的負擔之一種誠實的企圖。據解釋說，從蘇聯的政策在日內瓦遭受失敗的事實，祇能得到一個結論，這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有其各方的矛盾與對立，繁重的與經常增加的軍備不可避免。因爲蘇聯必須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繼續存在，它就必須作防衛自身的準備。倘若羣衆的軍事準備之遠大的綱領能夠實現，則祇有在這時候可把常備軍減少到

爲安全所允許的最低限度。這是他們所解釋的。爲着這個目的，在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以及在各學校裏組織了軍事準備研究社。在高等的教育機關裏，則有至少限度的軍事科學與軍事訓練的必修課程。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活動也把軍事訓練包括進去。體育俱樂部一般地與有些地方特別地注意與發展此種訓練，以作將來軍事服役的預備。爲着這軍事化綱領的特殊需要，已編印了大量書籍。

最近革命十週年紀念的慶祝，用以喚起關於軍事準備的宣傳與組織之注意。在莫斯科的慶祝，表示其所達到的發展最高度，這就是領袖們所力行的理想。因爲在遊行中隨着紅軍隊伍之後，還有按區域的民警隊伍，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的武裝隊，工人武裝隊，以及不穿制服而拿着鎗枝的女工，兒童先鋒隊，與志願的看護隊。在一九二七年秋季，這些志願的軍事訓練團體中，有許多實際參加到紅軍的定期檢閱。軍事的檢閱時常在遊行中佔着很大的部分，而包括許多軍事的成分於一切紀念中，此種措施日益成爲慣例。一般人相信，用這種辦法可使紅軍進一步深入羣衆，藉以預防軍閥主義的形成，據他們所說，軍閥主義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分離的。

國際主義與蘇聯防衛的兩個觀念，均藉來自各國的參觀代表團以經常宣示於民衆的面前。除了共產國際與職工國際的正式代表團之外，還有實際上來自世界每一大國之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無數職工會與工人的代表團；有些國家的代表團有來到兩次或三次之多。其他各國的農民代表團之組織尙不多見。此外，各國的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亦整隊而來，東方與西方的學生團體亦有來到蘇聯旅行。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有十月革命十週

紀念的慶祝，全世界各國都有代表團被邀參加，代表人數差不多有一千，形成了一個組織，稱爲「蘇聯之友社」(Friends of Soviet Union)。這些代表團所代表的共有三十國，據稱是「選舉」出來的。過半數的代表是蘇聯職工會的客人，但其整個團體則稱爲「工人、農民、與激進知識分子的代表。」

當較早的時期，來到蘇俄的這種代表團，欲得本國政府的正式批准，往往受到多種困難，因此，這種參觀可更加重地解釋爲「資產階級」政府對蘇聯的仇視與各國勞動者對蘇聯的相當友好之明證。蘇聯到其他各國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團，時常被各國政府機關拒絕在護照上蓋印，有時正當他們預備動身的時候加以拒絕。這種代表大會的本身之幾次反對這樣拒絕蘇聯代表團或甚至祇是拒絕在護照上蓋印的簡單事實的抗議，均成爲對蘇聯特異的國際地位作廣大討論的材料。

參觀代表團時常在蘇聯的報紙上廣爲宣佈。正式的歡迎通常由政府領袖來表示。人民委員會行政院主席李柯夫 (Bykov)，在其對「蘇聯之友社」所發的演說辭中，曾解釋這種歡迎的性質。這不僅是對外國的客人作慇懃的招待，而且要把蘇聯在經濟上與文化上的成績「提出報告」，因爲「這些成績有國際的關係，而且有關於全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他指出這些外國來的客人應覺得有一種道義上的權利，要求蘇維埃政府代表作這樣的報告。「蘇維埃政府認爲不僅對選舉它的工人與農民必須說明與說明它的政策之正確，而且要對一切爲和平、爲社會主義、與爲廢止人對人與國對國的殘暴行爲而鬪爭的人都作此等說明與證明。」這話引自這

演說的一種報告。有幾個較重要的職工會代表由史太林來接見。與史太林的會見採取回答問題的方式，問題於事前由代表團預先提給他，而史太林的回答則在報紙上廣為披露。例如，他對一九二七年非正式的美國職工會代表團的回答，不僅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而且在「農民報」上發表，用這種方法，共產黨人就藉各國所派的代表團將他們所說的話轉達到各該國的工人。

凡共產黨員與年齡較長的共產青年團員以及加入職工會組織的非黨員的工人，都在理論上是完全的與自覺的國際主義者。這種國際主義態度的表現，可見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在莫斯科召集的為蘇維埃體系中最大的唯一有組織團體之職工國際代表大會的告民衆書。這告民衆書，說到「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與消除各國人民間的界線，」號召「解除階級敵人的武裝，」並以如下普通公式作結語：「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關爭中之統一戰線萬歲。」這告民衆書的主要方向，是反對其所稱的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正在製造的新戰爭之準備。這文件繼續解釋說：這些準備必引起進一步剝削勞動者，並因此是特別趨向於反對「工人階級已從資產階級的剝削解放出來的國家。」對於蘇聯的國際形勢之估計有如下的措詞：

任何國家的資產階級對蘇維埃共和國與我國勞動者的壓迫，是與它對其本國工人階級的進攻成有機的聯繫。這因此是同一事情的兩方面。這正因為世界的工人與被壓迫人民都來另眼看待蘇聯，所以這種壓迫日趨嚴重，並企圖對蘇聯作經濟的與財政的封鎖。

這番話是對「全世界的工人」說的，其標題為「起來防衛蘇聯」這一口號。

這種以蘇聯為世界勞動者與一切被壓迫人民的祖國之觀念，是共產黨人藉以否認其有帝國主義目的之罪過的根據。他們引述常用的蘇維埃帝國主義或赤色帝國主義的名詞，而堅稱這種名詞毫無正常理由。據稱，根據同樣的事實，蘇聯的軍事準備並不表現是侵略的民族主義；而且幫助他國的革命運動或民族主義運動，也不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

列寧曾指示過兩種對外戰爭是公正的。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可在保護工農利益的觀點上作防衛的戰爭。第二，「在外國帝國主義的苦厄下」之人民可作民族獨立的戰爭。列寧這種有權威的公式，允許共產黨人可對弱小的與被壓迫的人民作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援助，並可對這些人民的民族主義的與革命的運動貢獻意見與加以領導。這種物質的援助、意見，與甚至領導的給予，都在國內解釋為有助於蘇聯的安全與國際觀念的勝利。

世界革命與蘇聯之革命的防衛，這兩個觀念是彼此有密切關係的。二者都給蘇維埃制度以許多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是蘇聯民衆的公民活動興趣藉以得到與他的公民訓練藉以進行的機件與步驟。在這兩個觀念中，都有關爭的成分與特殊集團在這關爭中的領導之成分，並因此在蘇聯的公民訓練中特別明顯地把刺激的方法作自覺的與有系統的運用。

結論

這本書是研究各國狀況的叢書之一種，其目的是在敘述革命後的俄國，即蘇聯的公民訓練之方法。敘述的方式與其說是技術的與比較的描寫，無寧說是分析與一般的說明。蓋這裏所涉及的是一個革命時期的新設施，而公民訓練則為這時期中的鬭爭「前線」之一；此種事實使我們有採取一般的描寫方法之必要。但是其他各種制度的實際情形亦時常注意到，並示明其相似點與異點。有幾種研究的共通計劃，亦可應用於蘇維埃的方法，祇要把着重點稍加變更就好了。在新的革命的社會制度中所期望的公民反應，除了有些重要的增加以外，大體上是與在以民族立國的國家裏所激發的無甚差別。在最初幾年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中，情形有些不同，但這是國內戰爭的時期。據解釋說，從現在的新經濟政策將發展出社會主義，而為達到合作的共產之初步，不過這是未來的事情。但是，蘇維埃制度應保證在公衆事業上之自覺的興趣，參加政治之熱烈的願望，對於「革命的」奉公守法之真正的負責意識，與在公務上之特殊盡義務的意識。

在目前的過渡時期中對公民所期望的各種活動是：選舉、納稅與認購內債，對國防的資助，與對國家法律的遵守。在革命的設施上之特殊的意義是在於選舉，即在於多種的與新的各種選舉。政治上的考慮，決定了賦稅的

政策與流通公債的方法，而立法則務須積極與廣博，以增進與登記革命的變更。較積極的一般的公民興趣，希望其能與革命氣息相關，如紀念會的參加與對文化發展的注意。對勞動與經濟政策的重視，實給蘇維埃制度下之公民義務的觀念以較大的內容。必須對新的社會制度之採用——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有所貢獻。這種特點使在公民活動中具有經常的要義，並對公民訓練給予確定的方針。蘇維埃制度的某些基本原則恰恰就在這裏。在政治活動中必須時常有階級的應付方法，並在經濟方面的活動中必須循着集體主義的方針。公民活動時常以這些附帶條件來激動，最後，經濟的活動亦是必須的；賣不出生產品或做不出工作，可被解釋為怠工，在某種條件之下，怠工就是反革命。

爲要得到這些反應，利用了政治的、經濟的、與民族的利益。在蘇維埃制度中，宗教的利益之存在亦被承認，但有一定的政策以使之減到最低限度並控制之。再則，個人的私人利益祇是有條件地加以考慮，以重視新制度的基礎之集體主義的觀念。階級的——政治的與尤其經濟的——利益是與私人利益相反的；階級的利益是在民族的利益之上，後者之提倡祇是用以利於前者；階級的利益是與宗教的利益針鋒相對的，在經濟上與思想上都是與後者不能相容。

階級的經濟的利益受到最強烈的激動，視爲革命的學說基礎之一部分。政府宣告一種確定的經濟理論，即以社會主義爲走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主要的生產資料之國有，與因此而產生的國家經濟企業網，均給這理論以

作廣大的實際應用。法律以及行政上的措施都具有積極的目標，以循着這理論的路線而引導與策勵經濟的活動，使政府與個人的日常生活得有具體的關係。蘇維埃制度的這種特點——其最著名與特異的特點——對激起興趣的問題，既加上重要，又加上困難。

建設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之觀念，是所用的最通常的刺激物；這實際是代替以民族立國的國家中之愛國主義的觀念，並趨向於使其革命民族化，且使公民活動顯赫光榮。時常加重說明這新制度的與每一特殊機關之無與匹敵的性質。至於「在歷史上初次」施行的政策與方法之在領袖口中的談吐，幾乎成爲下意識的行爲。這制度的新奇，被利用之以提起羣衆的興趣與吸引羣衆的參加。世界上沒有像紅軍那樣的軍隊，沒有像工農政府那樣的政府。

共產主義的正鵠尚未達到，蘇聯祇「在到社會主義的路上」，而社會主義則祇是共產主義最初的階段。現代的人必須在其人生觀上信仰革命的經濟原理，而不能完全享受到一切的利益，此等利益將於新制度建立成功時臻於完美。但工人們經常地聽見人家告訴他們說：蘇聯的工業將於不久後達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不能達到的擴充與生產的速度，而且在無產階級獨裁之下的工業「合理化」將不與工人或一般勞動者的利益背道而馳。同樣的，農民亦得到允許將獲得標準的生產品並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之最進步的農業社會中，空前未觀的優美生活。集體化與電氣化是這裏的要素，並解釋說：祇有蘇維埃制度能保障這些方法的發展將在事實上有

利於勞動的農民

建設新制度的任務之困難用以加強這種刺激。在國內或國外的反對者，其經常所稱的「資本主義包圍」供作其所欲的活動之具體對象。鬪爭與忍苦的觀念成爲其所用的一切技術之主要的特點。一個正從國內外的多年戰爭之蹂躪恢復過來的而且經濟上與文化上落後的國家之環境，使有提出實際工作，技術訓練，如整理與建設工廠與採用較好的農業方法之類的具體任務，既屬可能，亦屬必要。作技術進步的意義解釋的「美國主義」與革命主義合爲一體，而爲一種思想的態度；並且這兩種成分的正確平衡，是經常注意到的事情。

在其他各國可遇見的所通用的各種工具，例如教育、文學與藝術、愛國的社團，或各種紀念會，均同樣在蘇聯應用，以刺激公民的興趣。蘇維埃制度在這方面的特點，是對每件可能的工具之審慎的運用與對運用這每件工具的方法之深思熟慮。這種工具用在此處，對其基本的宗旨說來，或許奏效較少，但以公民訓練的重要，則認爲注重政治方面是完全正確的。因爲蘇維埃制度的目的是要循着新的路線重新訓練全體人民。共產主義的訓練是要在革命的空氣與在積極運動的條件中進行的；革命的政治是要使之深入一切的機關、團體與各種活動的場合。煽動與宣傳的方法之採用是毫不遲疑的。凡遇特殊的情形，須採用首要的與更積極的刺激，而對其他問題，則用次要的與較不直接的刺激方法。直接行動的方法是革命的特點，而且革命的環境使人們可藉革命的名義而採取強迫的成分以能夠增強這種刺激。強迫手段的採用，現在漸加限制；據稱，行政的壓力祇限於絕對必需的範

園內纔可採用，現正注意於立刻消除足以引起反感或誤會之點。但是，社會有用的公民活動之定義，需要採取紀律與報酬的辦法。又造成更特別的「反社會活動」的觀念，對此種活動採取相當的嚴格制裁或甚至壓迫的辦法。在此又引用階級的原則，重視階級的意志與階級特權的享受，而對任何出賣階級利益的行為加以懲罰。

各種工具與方法應用的效果都加以研究與考核，因為相信羣衆既在這革命局面中自己起來行動與作建設的努力，這種革命局面所有的各種條件，使對於人類的品性與對它所施的方法，有作更合於科學的研究的可能。對於公民活動的刺激所起的各種品性上的反應，都是注意到的，雖然在這問題上亦須按一般的習慣而注重階級的原則。成爲蘇維埃方法的特點之對一個問題取坦白的直接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特別表現出來。因爲在這裏各種不同的反應成爲革命過程的組成部分。相信在各種不同的階級裏有程度互異的政治傾向。新興資產階級之無選舉權，就是因爲這個階級特別易於作政治的組織與行動。至於工人與農民，則前者祇是相信其有組織與領導的能力，而後者卻視爲是政治上被動的。

在這些階級的區分中，個人品性的要素是加入共產黨時所注意到並予以承認的。藉此方法，自覺地與審慎地選出革命的活動分子，加以特殊的訓練，並以特殊的組織與方法來刺激，使它成爲建設者與煽動者。在這分等級的尺中之另一極端，則是抱着簡單住民態度的人，這種人是最被輕視而且多少是置之不理的。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承認有各種可能的與所期望的等級。在非黨員的羣衆間有活動分子與被動分子，而對它們所施的刺激亦

因此有所不同，除了須加強迫的被動分子之外，亦還有一種有條件的活動分子，各種集團，或甚至每一集團裏的個人，對於公民的反應，不是完全任其自由行動的。工人必須是活動的，私商人必須是被動的；在鄉區裏，貧農必須是活動的，且富農必須是被動的。農民的羣衆——中農——與勞動的知識分子，都希望他們能接受其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分子之政治領導。且在進行活動的每一階級集團中，有下列的主要分類：黨員，非黨員的活動分子，非黨員的被動分子，與對其階級利益沒有覺悟的簡單住民。

根據這些一般的說明，就可看出蘇聯的公民訓練怎樣利用各種在其擺佈下的技術以進行。蘇聯擁有從前俄羅斯帝國的同樣的地理與經濟的統一性，雖然芬蘭的喪失與從前波蘭及波羅的海岸各省的喪失，使其出海的通衢較不易得與略無保障。對於這擁有歐洲東部的大陸與其地理的引長橫貫亞洲北部之造成政治上統一的完整的觀念——許多世紀以來的傳統——已仍仍實現。有一種蘇聯的郵票，以鮮明的紅色標出歐亞兩洲的地圖上這塊廣大與統一的地面。這塊地面的統一，是過去舊俄帝國力量的來源之一，這種地理上的統一，現在要歸功於蘇聯的政治統一。在經濟上各區稍有差異，但不甚明顯；經濟發展的水準，在這廣大地面的全部，以其主要的地帶說來，大體上是很多相同的。

種族的區分是很多的，但以其數目之多，與各小民族（差不多沒有例外）都在過去沒有強烈自覺的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使可不顧這種民族的紛歧而有造成統一的可能。這裏，某些蘇維埃的原則，例如與民族相反的

階級，與藉聯邦的形式以在某種限度內承認的民族原則，使蘇聯較諸採取強迫的俄羅斯化方法之舊俄帝國能得到更鞏固的統一。從前歸併於俄國的最有野心的民族集團，如波蘭人、芬蘭人、立沙尼亞人、與立陶宛人，都已退出去了；這些集團是舊俄帝國統一的最大障礙。足以加強種族區分的文化區別，在各小民族與這統治的民族集團間亦無顯著的現象。烏克蘭人在許多方面與俄羅斯人很接近。喬治亞人雖可稱為另一強烈自覺的民族集團，但他們遠處在該國一條山脈之外的一隅。

一切民族的集團，尤其是統治的俄羅斯民族集團，一向都有移民遍居這塊廣漠的與一式的平原。在西比利亞可遇到俄羅斯的工人或農民與在伏爾加（Volga）或在烏克蘭所看到的很相同，他們都與其他種族雜居一處，這些種族或許是原來的居民，或甚至是佔統治地位的地方集團。在蘇維埃制度之下，這種移民的趨勢仍在繼續。民族歧視最厲害的各區域大部分都在這平原的邊疆。高加索與克里米亞，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一方面是石油與其他礦產的富源所在地，與這經濟單位的勞動市場，而同時又是工人得在山區平原享受大陸氣候的療養所與休息及養身的地方之所在地。這些地方因種族不同而起的強烈衝突存在一天，則這種衝突是具有經濟形態的，是工業製造的利益與農業的利益間之衝突。各小民族主要的是從事於農業，而工業的發展則極大部分集中於俄羅斯的各大都市。工業化的計劃，為政治的與經濟的目的，要改正道方面的均衡關係。蘇維埃制度之政治統一的基礎，是工人與農民兩階級的聯盟，促進這兩個經濟集團的聯盟，是一切蘇維埃機關的共同目標，希望這

方面的成功可以解決種族歧視的問題，這方面能否成功，認為是蘇維埃主義的一種測驗。上面所說的移民，現在是按鄉村與城市間及區域與區域間進行，而且這種辦法有助於蘇維埃主義的發展，成為工人與農民間政治統一的連鎖。

鄉土的留戀與愛好，卻沒有加以忽視，且利用之以作公民訓練的技術。蘇聯各民族集團的文化特點予以重視，而地方的區域研究則由自願的社團與學校加以提倡。但是這些政策並非希望提倡地方的民族主義。對於民族集團的文化成績之重視，加上對在蘇聯的政治制度之下民衆有文化自主的機會之更大的重視。對地方的天然形勢與文化狀況所感的興趣與引以自豪的心理，都指導之使其趨於共負全蘇聯的共同任務以建設新的社會制度之觀念。

土地與人口的喪失與未收回的問題，在蘇維埃主義之下採取雙重的形式。如以民族立國的國家所了解的同樣觀點說來，蘇聯祇有兩個土地未收回的問題。波蘭的東部國境分裂去了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的分子；而卑沙拉比亞 (Bessarabia) 的「竊案」，則解釋為對於莫爾達維亞蘇維埃共和國 (Moldavian Soviet Republic) 之不公正的事情，該共和國是蘇聯的一個單位。這小小的共和國建立起來以使所稱的不公正事情顯然露出。對於因革命而旅居外國的許多僑民，有一種願望欲使某種階級的分分子——工人與農民——能夠回來。其他各集團不需要回來，因為有階級的或政治的關係。外國僑民的存在用以保障國內按階級與黨的基礎以求統

一與守法。至於未收回問題所包含的另一意義，則是蘇維埃主義之國際姿態而產生的。世界上的勞動者與被壓迫者都認爲是蘇維埃主義的公民，須使之漸漸了解這種主義的原則。這種任務的意識用以促進對蘇維埃主義的原則之更大的信仰，並以保障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對這些原則之在蘇聯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中厲行的領導。

舊俄帝國是「神聖的正統教的俄羅斯」而其政治統一的基礎之一是國家的教堂，即大多數人民的教堂。在舊統治之下對於宗教與教堂的政策，趨向於使其自己不能成爲造成統一的要素。教堂在俄國的傳統作用之一缺點，曾用政教完全分離與拒絕教堂參預教育的政策使之消除。信教自由爲新制度所許可，並在這個基礎上得作宗教的宣傳。與種族紛歧相當的宗教紛歧，現在使之盡可能地減少；而且這種政策以嚴格限制教堂或宗教團體或會社之活動而得具體的形式。但是，這祇是問題的一面。教堂與新制度間的衝突是革命的原則之一，並且這種衝突採取直接行動方法的形式。宗教是根據思想上的理由而受責備的，且教堂被宣佈爲剝削人民的一種武器。這些都是領導方面所宣示的觀點，對於政府的政策頗有影響。教堂被承認爲是競爭者，或用更直接的革命術語說，是「敵人」；並且宗教信仰之受攻擊，即根據於階級的利益而來的。同時，加重宣傳與提倡革命的信仰，其所採的方法時常使旁觀者覺得是宗教運動的態度與方法。

對於各種經濟集團，蘇維埃制度所根據的階級原則，使一般地激發公民興趣問題與保證擁護新的政治傳

統問題得大大地簡單化了，現在已不須要均衡營業與勞動，或均衡地主與農民。地主的集團已被取消了，雖然所謂「富農」提示這集團尙有小規模出現。在商業與工業上的新資產階級與甚至這種富農都在被容忍與被利用之列，但不希望他們歡喜新制度。祇有工人與農民的利益是被照顧到的，而且在這兩者之間以工人的利益佔優勢。農民中的經濟分化是顯慮到的，而且半無產階級分子——貧農——成爲特別關懷的對象。各機關的職員與薪金勞動者組成第三集團，其利益亦是被照顧到的；在這裏，例如在技術專家的小集團裏，有根據階級的分化，如一部分是資產階級出身的與另一部分是工農出身的。後者希望能保持其各自階級的態度。資產階級的技術專家，不論他從事於那一部門的工作，希望能以新制度所保障的建設工作之較廣闊的機會爲其職業興趣之所在。他的忠實，雖承認隨其生長與訓練的環境力量而轉移，卻是特別加以探求的，但欲保證其忠實，覺得對於某些經理或工程師的集團行金錢上的報酬方法較爲便利，至若經常記在心中的目的則爲「奪取」中農，中農是代表農民階級而非工人階級。列寧於一九二一年以問話的形式對這問題下了定義說：誰能滿足農民，是站在獨裁地位與控制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部分之無產階級呢，還是在新經濟政策之下發展的新的資產階級？

政策界的連續性祇是暫時被十月革命打斷。君主政體的傳統已於一代來迅速失了依據，並因最後君主的性格與政策而瓦解。舊的政府機構已在二月革命之下毀滅了，並且軍事的傳統已因戰爭的最後一年之失敗與因此而起的頹喪心理及革命最初幾個月的影響而削弱。十月革命即對準這些傳統來攻擊，並且負起積極打擊

其殘餘的任務，因這些傳統的性質與其具有建立一套新的傳統之技術，此種打擊實為必要。這裏政府服務的間題認為非常重要，且自始即有自覺的企圖欲使政府服務具有新的性質，並建立一種能使新制度的原則日有進步的傳統。

相信有一種新的政府機關是在發展的過程中。現在所有的是「蘇維埃工作人員」不是「官吏」且在軍隊中以「公民戰鬪員」來代替「軍官與兵士」。工農民警就是普通的警察，而特種政治警察則為「無產階級的露鋒寶劍」。一種工農檢察團把一切政府的事務都置於羣衆的控制之下，這種工作要革除官僚主義的精神與傾向。再則，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政府的事務多而且繁，其組織的方法是要使人人易於參加，並定期改組，使同時可作為治國的學校。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祇須假以時日，國家是要「自歸消滅」的。在內政與軍事機關招收服役人員時，階級的原則便要應用到，以符合於各該機關的正式名稱。按階級的選擇法輔以特種統制制度，這是一個單獨的政黨之合法的專利權來實行的。這種情狀特別希望能在政府的服務中創立新的傳統，使這種服務具有新的蘇維埃德模克拉西的特點，並作為激發工人與農民的政治興趣之一種技術。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政策使有設立繁雜的行政機關之必要；但藉各種自願發動的經濟團體，例如職工會與合作社的作用，相信能做到與發展有效的羣衆控制。用這種方法以抨擊從前對「政府」態度的舊習慣。馬克斯主義的國家理論有時以通俗的辭句述其概要，說明強迫的成分祇是到合作的平民政治之過渡時期的暫時的惡現象。

共產黨的獨特地位影響到蘇維埃制度的一切姿態；例如在政府的服務中這種被選擇出來的集團中之成員享有特權的地位，並負起特殊的責任。這種黨在其自己的結構上也是奇特的，而且「黨」這個名詞用以稱呼這種團體，亦祇是以其變更了的意義來了解。加入這個黨是受種種形式與積極的限制所束縛，而且黨員須服從一種鐵的紀律，這種紀律現已有效地厲行。黨的定義可說是有特殊訓練以在革命的特殊條件中作一種特殊的領導之特殊集團的組織；它在技術上是執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些特點造成了黨員對這種黨與該黨對之負完全領導責任的政治制度有高度的服從。在非黨員羣衆方面接受這種領導，宜稱是這新的政治制度之不可分離的成分。希望黨與一切羣衆團體的聯繫及這種領導的方法能使這種接受具有積極服從的性質。

一切種類的選舉是時常舉行並對一切集團舉行的，且藉這些選舉以使黨的領導能生效力而同時能適應於非黨員羣衆的利益。除了蘇維埃的選舉以外，還有工廠委員會與職工會的地方委員會的改選，以及合作社的地方辦事處與中央辦事處的改選。婦女則有她們自己的選舉與其代表會議的選舉。自願的公民團體正式的選舉較少。共產黨的黨員則有黨的選舉；而且黨的訓練學校即輔助黨的領導的共產青年團，也有定期的與正式的選舉。選舉是在選舉者的全體大會中舉行，其方法則爲舉手或歡呼。相信這種選舉的方法能引起更積極的與自覺的興趣；這種方法認爲是政治上有用的，而且不僅是便利的，蓋藉此可以公開的與直接的發表意見。被選者對

選舉區的全體選民作報告，亦藉這種選舉方法得以激勵與易於實行。代表是按職業選出，並且選舉是間接的；並相信蘇維埃制度的這些選舉的特點，能使選舉的行爲更自覺與有理性。選舉次數的數數與種類的繁多，希望能給非黨員的羣衆有與一個團體發生關係的意識，並可作爲於大多數選民對黨有確定好感的體系裏造成黨的尊嚴之技術的代替物。在蘇維埃體系裏祇有一個黨是否可能的問題，認爲是已經解決而成爲原則了的；祇有蘇維埃制度的本身將來會引起多黨制之這一問題應否提出，現在成爲爭論的問題。

職工會、合作社、與會員普及與自願的一套公民的或愛國的團體，都是蘇維埃制度設備起來以爲非黨員的工人、農民、或蘇維埃的工作人員表示經濟的與別的更普及的利益之捷徑。職工會已把絕對大多數的工資獲得者包羅進去，而合作運動亦已與很多的個別農戶及工資獲得者建立關係。該國的經濟政策與活動，由職工會與合作社促進之，並且據說控制之，蓋這兩個團體與政府的團體有特殊的與權威的關係。職工會稱爲「共產主義的學校」，而合作社則認爲是到社會主義的初階；這兩團體的經濟任務又輔以文化教育的工作。這種工作使它們的活動之政治姿態更爲確定。這兩者都稱爲「新制度的堡壘。」

學校與一切等級的教育機關之用於公民訓練，是特別加以沉思熟慮與有系統的。一切的教育都置於國家的控制與共產黨的指導之下。共產主義的訓練是一切教育共有的一部分；統一的學習大綱與教學法的集中監督與詳細規定，都是要助成這個目的之實現。學校是受最廣義的「政治化」了，要把革命的傳統授給後進的青年，

使革命承緒，並訓練人民以有效地擁護革命的原則。普通的學校制度輔以政治教育與共產主義訓練的特種機關與組織；兒童先鋒運動與共產青年團對於學校與在學校內部都負有特殊的任務。又有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灌輸，視此種主義為分析社會現象之唯一的科學方法。一切學校的課程表裏所定的蘇維埃公民科鐘點之多，使學校的體系成為蘇聯公民訓練的基本單位之一。特種的「政治常識」學校，在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裏的政治常識研究社，婦女的特種代表會議，在紅軍裏的政治研究，成年人的學校，與兒童學園，補充了普通的學校體系。

語言已利用為在幾種饒有趣味的事情上激起反應的技術。政治界的統一觀念，已由俄語為舊統治的官話性質，早在一切集團中通行以補充本地土語的事實，予以促進。在邏輯上，俄語亦已成爲蘇聯的正式語言；這種語言有時稱爲「革命的語言」。同時，每種小民族語言在本地應用，亦在積極提倡中。因此，藉廣大的與正式的採用地方土語，一般文化的與政治的覺悟得以發展。這些對於在蘇聯裏每種民族文化的傾向之讓步，希望使以階級為基礎而不以種族利益為基礎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統一能夠更加鞏固。文學與藝術，劇場與音樂，以及電影與無線電，都是在蘇維埃體制下所用的技術中之最主要的幾種。對於革命前在這些領域的作品與成績所感的興趣，都集中在它們的技術方法上；而在內容方面，祇是表示舊制度的缺點或工人與農民的革命傳統的繩子採用。凡所承認之舊制度的優點，現在都為新制度所利用；而且這些自己表現的與文化成績的捷徑，都為握得政權的新階

級所利用，以表現他們的階級意識與鬭爭的觀念。同樣的，科學亦爲他們所「征服」，以爲羣衆謀利益。對於這些領域的興趣，例如對於文學與科學的興趣，均以新制度保障更廣遠的與更自由的活動之權利來刺激。一切循着這些自由表現的路線之活動，都導之走向特定的方針，以反映新的生活狀況與加強國家政治的與經濟的政策。

定期刊物是發生政治影響的最有力工具之一，現已完全按照新的路線加以改組。蘇聯的刊物是官方出版的，所謂官方出版的意義即指一切報紙或定期刊物都是政府與黨的機關報，或是一種確定的團體，如職工會或合作社之類的機關報。這種刊物都有系統地組織起來以服務於各階級或各特殊的集團——工人或農民，一般的職工會會員，或學校教師。政府與黨的機關報有特殊的任務，爲其他一切刊物的指導機關。因有各種新奇的組織，如非職業的卻是定期寫稿的通訊員，尤其在工人與農民中間，與在一切重要機關裏非正式的壁報，蘇維埃的刊物極其充分地利用於激起所希望的反應與激發維護新制度的興趣。

象徵主義在蘇維埃制度之下亦不免成爲一種技術。在廣予採用的革命的象徵主義中，有各種新觀念的表現，時常與各種舊觀念針鋒相對。代表專制政體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雙鷹，現在由斧頭與鐮刀來代替。紅旗是革命鬭爭的標記，而紅星則指示革命目的所在的地球上的五個大陸。在錢幣與郵票上，從前沙皇的肖像代以列寧及其他領袖（包括一個著名的科學家）的肖像，以及新的統治階級——工人與農民——各種姿態的圖形，或手持勞動的工具，或身穿紅軍兵士的制服。革命的口號都散佈在這些標記上。新的雕像與紀念碑，甚至新房子的

建築藝術，都象徵各種新觀念。在紀念會與羣衆示威中的儀式，都有系統地組織起來，並盡量利用這些機會加上裝飾的成分，以象徵這新制度的各種觀念。對於兒童，並以某種程度對於青年，各種儀式佈置起來以激動情感。但是現在所重視的是對於各種儀式與象徵之作合理化的與實事求是的應用，因為這樣能使這政治制度對工農的日常切身利益作更有效的密切聯繫。時常有一種宣傳，藉階級的意識與階級的應付方法以激起「建設努力的興奮精神。」

關於國際的態度，階級的原則決定了須激起何種興趣與要引起何種反應。對於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勞動者的尊重與對一切資本家與剝削者的相當的仇恨，就是這種國際態度的要點。這就是和平的政策，而同時又是防禦的準備政策；這是一種不侵略的政策，或按階級觀點的侵略政策。假借世界革命與國防兩者的名義，時常激動民意，以維護「勞工國」的外交政策。一切可以利用的技術之用於發展工農的國際態度，特別明晰地表示蘇聯公民訓練方法之深思遠慮與完備無缺的性質，且亦足以表示共產主義者的蘇維埃公民觀念的內容。

現在已進展到十年以上了的俄國革命，有它的所謂「文化戰線」，且在這方面的目的是要重新訓練全體的人民。在這第十一年頭中，政治的空氣仍是一種積極的鬭爭空氣——在共產黨領袖的主義之下的階級鬭爭的空氣。例如在鄉村區域，在農民內部各集團間的衝突，已經更加尖銳起來，這是有意地把它發展起來而當作一種政策看待的。因他們相信重新訓練民衆的任務，需要佈置一種積極的政治運動。階級鬭爭的原則，在經濟的活動

與發展的國家計劃中是到處離不了的，這是蘇維埃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因此，政治要素的影響加重說明是蘇維埃主義的原則。這樣對於政治的重視，給蘇聯公民活動的觀念以更大的內容，並給公民訓練的任務以更大的重要性。

革命的成績與共產黨領袖組織羣衆的政治活動與廣大的公民訓練所採用的各種方法的成績之一，就是農民與工人，尤其是青年的「積極性」有顯然的增進。所深思的「文化革命」策勵一切可能的施影響的方法之應用，以依照新思想而促進羣衆的活動。一切可能的技術之最充分的利用，是集中於一個特殊的集團——蘇維埃體制中獨一的黨之少數的被選的黨員。對於青年及兒童的公民訓練，還有各種特殊的組織。蘇維埃的政府形式，希望能夠促進一切種族集團的羣衆的政治興趣與政治活動，同時予以經常的與實際的訓練以造成有用的公民。定期刊物是官方出版的，其目的在於加強黨的政治領導，並以實際的政治訓練羣衆。職工會、合作社、與各種愛國的團體，都在政治教育方面負得特殊的任務。各種陳列館，藉參觀制度的廣大發展，以有組織的方法利用之以作公民訓練。革命的紀念日與宣傳運動，都在新制度的生活中佔有特殊地位。在各學校與大學裏，蘇維埃的公民學科視為重要的功課，並給以一定的內容以把革命的原則灌輸於後進青年的頭腦中。「政治常識」的特殊學校與在紅軍中的政治研究，補充與重視各特殊集團的公民訓練。文學、藝術、與劇場，與尤其是無線電、電影、與音樂，都有計劃地利用之以激起公民的反應與使公民的興趣易於表現。在一切這種激發公民興趣的刺激中，以

莫斯科爲中心的國際運動之促進與蘇聯之防衛，這兩個觀念是時常離不了的。

過了革命的英勇時期之最初幾年，較平凡的經濟改造任務已提到首要的位置，因此政治上的注重已有些減輕了。但是，非政治的態度是時常受抨擊的；做蘇維埃的公民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革命與其所產生的蘇維埃制度，在其公民訓練的設備上，可說是在這方面之大規模的與澈底的實驗。在階級鬭爭的學說之下，團體行動的態度顯然是受提倡的，並最充分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技術以確定與促進這些團體行動的態度。握住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以在羣衆的日常生活中給「工農政府」這個正式名稱以實際的意義，並以指示這勞工國之特別的新奇的特點。因爲革命時期的後進青年走入積極的生活，要確定該國所採用的各種方法之實效如何，與尤其蘇維埃制度在政治教育方面所施的熟籌的與經常擬訂的計劃之實效如何，將有可能。

參考書目

最重要的定期出版物，尤其與本書有關的報紙，均在這裏列出。有些報紙與定期刊物是作者數年來長期閱讀而毫無間斷的，而其他一些報紙雜誌則僅閱過少數的幾期，祇作樣本來研究。這裏所列的書籍，被利用的程度亦多不相同；所以幾種最通行的教科書，雖未會對之作詳細的分析，但亦列在這書目裏面。一本書或一種定期刊物的小標題，沒有把它們按字面一一譯出，而祇將其大意譯在大標題裏面，以示明這種出版物的性質而已。有些書名是代表小冊性質在工農中間廣為流通的小本子。俄文書的出版，並不把出版者的名字指明；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出版事業的集中，使這種指明無論在出版物的來源與在訂購的關係上看來都沒有必要。這本書差不多完全根據俄文的材料，但有幾種被選的英文目錄亦附在這裏；選擇的根據是在可供拙著所欲研究的革命的特殊姿態作參考。

總論

Kritsman, L. *Gerochevskii Period Veliko Ruskoi Revoliutsii* (俄國大革命的英勇時期)

1925.

Narodnoe Prosvetshchenie v R. S. F. S. R. k 1925-26 Uchebnomu Godu (一九二五——二六

教育年度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教育) 教育人民委員會出版, 1926.

Sovetskaja Kultura (蘇維埃的文化) 伊士維太報館出版, 1926.

Voprosy Kultury pri Diktature Proletariata, Sbornik (在無產階級獨裁下的文化問題, 文集) 1925.

定期刊物

Bolshevik (布爾塞維克,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經濟雜誌) 週刊。

Izvestia (伊士維太,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工、農及紅軍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聞報) 日報。

Katalog Agitatsionno-Propagandistskoi Literatury (鼓勵·宣傳圖書目錄, 國家出版部的營業處出版) 版。

Kommunisticheskaja Revoliutsiia (共產主義革命,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鼓勵宣傳部機關報) 月刊。

參考書目

四五九

- Komsomolskaia Pravda (共產青年真理報, 共產青年中央委員會與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 日報。
- Krestianskaia Gazeta (農民報, 出版者: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週報。
- Krasnoe Studencheslvo (赤色學生, 無產階級學生會中央委員會機關報,) 月刊。
- Na Putakh k Novoiu Shkole (到新式學校的途徑, 人民教育委員會國家科學參事會科學教授法組機關報,) 月刊。
- Nasha Ga eta (我們的報紙, 職工會的全聯邦中央蘇維埃機關報,) 日報。
- Pechat i Revoliutsiia (出版物與革命, 文學、藝術、評論, 與介紹新書的雜誌,) 月刊。
- Pionerskaia Pravda (兒童先鋒真理報, 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出版,) 週報。
- Pravda (真理報,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 日報。
- Proletarskii Sud (無產階級法庭, 莫斯科省政府法庭的機關報,) 半月刊。
- Rabochaiia Gazeta (工人報,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紙,) 日報。
- Selkor (鄉村通訊, 附屬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農民報館出版,) 半月刊。
- Sputnik Agitatora (鼓動員指導書, 黨的中央委員會鼓動宣傳部的機關報,) 半月刊。
- Uchitel'skaia Gazeta (教師新聞報, 蘇聯教育工作人員聯合會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 週刊。

共產黨

Agitatsiia i Propaganda v Derevne (在鄉間的鼓動與宣傳；黨與青年團的鄉村細胞用的指導書，中央委員會出版) 1925.

Iaroslavskii, Em. Istoriia V. K. P. (b) (蘇聯共產黨史) 1926.

Iaroslavskii, Em. (文集的編者) Kakim Dolzhen Byt Kommunist: Starina i Novaiia Moral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舊的與新的道德) 1925.

Kaganovich, L. M. Kak Postroeva R. K. P. (b) (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的建設；黨員叢書中的一本小冊) 1926.

Kalendar Kommuniste na 1926 (一九二六年共產黨員的曆書)

Khataevich, M. M. Partnagruzka v Proizvodstvennykh Tacheikakh (在生產細胞黨員的工作負擔) 1925.

Lenin, V. I.: Organizatsionnye Osnovy Partii (黨的組織基礎；從黨員的列寧遺言中選出) 1926.

Mitrofanov, A. Kh.: Vydvizhenie Rabochikh i Krestsian (工人與農民的進步；從黨的地方監察

委員會的林中發出) 1926.

Molotov, V.: Politika Partii v. Derevne (黨在鄉間的政策) 1926.

Neveskii V, : Istorija R. K. P. (b), Kratkii Ocherk (俄國共產黨簡史) 1926.

Partia v Tsifrovom Osveshchenii (在數目字上所示的黨黨員的統計材料) 1925, 1926 (第二版)

Spravochnik Partinogo Rabotnika (黨的工作人員指導書) 第三版, 1926.

Stalin, I.: Voprosy Leninizma (列寧主義問題) 1926.

Subbotin, A. A. : Kak Rabotaet Tsentralnaia Kontrolnaia Kommissia i Raboche-Krestianskaia Inspetsiia (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察團怎樣工作, 黨的第十四屆大會叢書中的小冊) 1926.

Svetlov, F. 歐 Berdnikov, A. : Otko Dolzhen Znati Kazhdyi Rabochii Vstupivshchii v Kommunisticheskuiu Partiu (工人入黨須知) 1924.

Uskav V. K. P. (b)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黨章) 1926.

Volosevich, V. : Samnaia Kratkaja Istorija V. K. P. (b) (蘇聯共產黨簡史, 第二版) 1926.

共產青年團與共產主義的兒童先鋒

Bukharin, N. I.: Uchitelstvo i Komsomol (教師與共產青年, 在全聯邦教師代表大會中的報告)

1925.

Chaplin, N.: Leninki Put Komsomola (共產青年的列寧道路) 1925.

Gessen, Vladimir: Komsomol i Iunye Pionery (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 1926.

Kastalskii, V.: Komsomolskii Ustav (共產青年團章程) 1926.

Komsomolskii Byt (共產青年的生活) 有 Taroslavskii 序言的文集) 1926.

Komsomolskii Pesennik (共產青年團的唱歌集) 1926.

Komsomolstam o VII Sezde V. L. K. S. M. (爲全聯邦列寧的共產青年團第七屆代表大會告共

產青年) 1926.

Krupskaja, N.: Vospitanie Molodezhi v Leninskom Dukhe (列寧精神的青年訓練) 1925.

Nashi Sezdy (我們的各屆代表大會) 共產青年團各屆大會的決議彙編) 1925.

Politicheskoe Vospitanie Komsomola (共產青年的政治教育) 1925.

- VII Sezd V. L. K. S. M. (共產青年團第七屆代表大會) 1926.
- Shokhin, Andrei.: Komsomoli Shkola (共產青年團與學校) 1926.
- Sputnik Iunogo Pionera (兒童先鋒指導書) 1926.
- Vitin, V., 與 Slepkov, A.: Azbuka Komsomoltsa (共產青年初階) 1926.
- Volkov, A.: Sputnik Vozhatogo (兒童先鋒領袖的指導書選文集) 1926.
- Zalkind, A. B.: Pionerskoe Detskoe Dvizhenie (兒童先鋒的兒童運動) 1924.
- Zalkind, A. B.: Revoliutria i Molodezh (革命與青年) 1924.
- Zorin, V.: Sputnik Pionera (兒童先鋒指南) 1926.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公民教育叢書 蘇聯公民教育一冊

(34182) 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amuel Northrup Harper

譯述者 馬曹雲 復建

主編者 王雲 五

發行人 王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五五八七

(本書校對者龍旭光)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word "EPOCH" or similar characters.

